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

12位老共產黨人的反思

李　銳　胡績偉　謝　韜　等著
張博樹　主編

晨鐘書局



內容簡介

本書是爲紀念中共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逝世20周年推出的大型文集。

本書的作者是一群老共產黨人，他們有的曾是耀邦先生的老戰友、老部下，與耀邦有過密切的工作聯系或私人接觸；有的是耀邦主政時重要的黨政官員、學者專家。作爲贊成改革的體制內人士，他們當年都是耀邦主張和政策的積極支持者、踐行者。20年後，這批可敬的老人大多已經進入垂暮之年，但憂國憂民的衷腸一點也没有變。如果説有什麼變化，那就是他們對這個黨、這個體制有了更加透徹的體察和認識，對中國要走什麼路有了更加清醒、明確的理性自覺。這樣一個老共産黨人群體的出現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可以把它理解爲中共黨内民主派形成的某種準備，甚至起點。

本書如實記録了一代老共産黨人對當今中國問題的深入反思，表達了他們愛國、「救黨」、希望推進中國政治改革和民主化進程的殷切之情。

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

——12位老共產黨人的反思

李　銳　胡績偉　謝　韜　何　方　鍾沛璋　辛子陵
林京耀　宋以敏　張顯揚　杜　光　王家典　周成啟　合著

張博樹　主編

晨鐘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12位老共產黨人的反思/李銳 胡績偉 謝韜 等著.
—晨鐘書局,2010.9

ISBN 978-988-17804-9-2

Ⅰ.①胡… Ⅱ.①李…②胡…③謝… Ⅲ.①中國歷史—文革—現代
Ⅳ.①I247.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087898號

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12位老共產黨人的反思

作　　者　李銳　胡績偉　謝韜 等
責任編輯　危丁明
出版發行　晨鐘書局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
印　　刷　彩迅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6開
　　　　　19印張　34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988-17804-9-2
定　　價　98.00元

總　序

「轉型」對中國人來說，並不是一個輕鬆的概念。從1840年鴉片戰爭算起，中國的近現代社會轉型已經經歷了100多年，迄今仍沒有完結。這個轉型可以分為許多方面：政治轉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文化轉型，總的說，是要完成中國從前現代的皇權社會向現代民主社會的歷史跨越。

「轉型」對我們來說並不輕鬆，還意味著中國人在尋求這種歷史跨越時，走了太多的彎路，吃過太多的苦頭。我們曾認為一種全能的政治體制、一種無所不包的計劃經濟、一種人人都「鬥私批修」的社會生態能夠把中國人引到「人間天堂」，到頭來卻不過是一場夢，一場做了30年、最後變得支離破碎的夢。從這個夢裏走出來，擺脫它的影響，我們又用了30年。這30年有成績，畢竟中國的經濟面貌有了大的改觀，市場經濟的合法性也得到了確立；但这30年也帶來了新問題，那就是權貴資本氾濫，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社會的深層結構性矛盾凸顯。更令人心焦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狀態和「信仰」狀態。我們曾經信孔夫子，信馬克思；但改革開放3。年後的今天，除了金錢，中國人還信什麼？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依託又在哪裏？

顯然，中國的「轉型」仍然任重而道遠。

我們要克服各種障礙，繼續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最終建設一個符合人類普世文明原則的憲政民主國家；我們還要完成中國人的精神重建，為我們這個民族找到新的靈魂棲居之所；最後，並非不重要的，我們要以适雙重的建設為依託，以全新的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形象参與當今的人類事務，參與全球治理和構建人類的新文明。做到了這三件事，我們的「轉型」才算有了一個圓滿的結果。

本文庫願意記錄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進程。

我們將記錄在這個進程中,中華民族最優秀的那些大腦的思考與求索。

我們希望,大家都來做中國轉型事業的推動者、建設者。

石逸群

《中國轉型建設文庫》總咨劃

目 錄

導　言

紀念耀邦，推進轉型

論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歷史角色

張博樹

胡耀邦是中國共產黨內少見的開明領導人，改革派領袖，當代中國轉型進程中的重要歷史人物。1989年胡耀邦的逝世引發了八九公民維憲愛國運動和六四天安門事件，遂成為中國當代史的分水嶺。

今年是耀邦先生逝世20周年，寫作、編輯、出版本書首先是為了寄託有良知的中國人對耀邦先生的懷念之情。

但是，又不僅此。胡耀邦去世20年，中國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一黨專權的政治體制造成權貴資本氾濫，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結構失衡，在根本意義上阻礙中國回歸人類普世文明，當年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且其嚴重、惡劣程度已經遠甚於當年。20年來所取得的所有經濟成就在一個助長貪腐的體制面前，均顯得黯然失色。

這就是我們當下面對的現實。它意味著，我們今日紀念耀邦，必然懷著一份深深的現實關懷；這種紀念，除了緬懷故人，更是為了推進耀邦先生未竟的事業，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本書題為「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其意即在於此。

我更想提醒讀者關注的是本書的作者。

這是一群老共產黨人，他們有的曾是耀邦先生的老戰友、老部下，與耀邦有過密切的工作聯繫或私人接觸；有的是耀邦主政時重要的黨政

官員、學者專家。作為贊成改革的體制內人士，他們當年都是耀邦主張和政策的積極支持者、踐行者。20年後，這批可敬的老人大多已經進入垂暮之年，但憂國憂民的衷腸一點也沒有變。如果說有什麼變化，那就是他們對這個黨、這個體制有了更加透徹的體察和認識，對中國要走什麼路有了更加清醒、明確的理性自覺。這樣一個老共產黨人群體的出現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我把它理解為中共黨內民主派形成的某種準備，甚至起點。

這篇導言，我就想結合紀念耀邦，談談「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歷史角色」這個話題。我們將依次討論：什麼是「黨內民工派」（黨內民主派的定義）？何以說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民主派的一面旗幟？耀邦去世2。年，當今中國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黨內形勢出現哪些新變化、新特點？為什麼人們希望黨內民主派能引領中共實現自身的理念轉型和組織轉型？這些問題的澄清，有助於加深人們對當代中國政治改革和許多重大課題的理解。

在這個基礎上，我將很榮幸地向讀者介紹輯入本書的各篇鴻文，與讀者分享我的閱讀體會，並以此表達晚輩對這些老共產黨人的敬意。

中共黨內民主派的界定

中國共產黨是根據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創建的革命政黨，在政黨分類上，屬於現代極權主義政黨類型。嚴密的組織、服從領袖、禁止一切派別活動是極權主義政黨的基本特徵。毛澤東當政時的中國共產黨曾經把這些特徵發揮到極致。在那時，不大可能出現對立於黨的最高領袖的不同政見。比如劉少奇，即便他在建國初期有一些不同於毛的上張，但遭到毛的批評整肅後迅即俯首稱臣，緊跟唯恐不及。林彪揣度毛的心理頗有心得，大智若愚的「韜晦」之術也算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但最終仍不免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功虧一簣，成了中共歷史上又一次「路線

鬥爭」的犧牲品。總之，在毛那個時代，中共黨內甚至沒有按照它自己的黨章規定應屬正常或起碼的「民主生活」，出現不同政見、形成有組織的黨內派別更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一個專制性政黨內部出現分化，產生不同的政治主張，只有在這個黨生逢的歷史條件發生變化、作為極權主義政黨的黨本身也開始走向衰落時，才有可能發生。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正是這樣一種情形。

從大的時間尺度看，20世紀是中國的大變化、大動盪期。中國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特別是制度轉型，就發生在這個時期。這個轉型的目標本來是建立現代民主政治，用來取代在中國延續了2000年之久的皇權專制制度。但是，歷史發展本身往往充滿了悖謬。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把西方激進的社會理論——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並與俄式革命戰略相結合，形成共產黨自己的改造社會的理想和綱領。令人驚異的是，這個黨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竟然取得非凡的成功，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裏打敗了自己的對手，從而獲得按照黨的既定理念去改造中國的現實機會。

當然，我們今天已經知道，這是一出烏托邦悲劇。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從告別專制、走向共和意義看，本來代表著中國現代社會政治轉型的正確選擇；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致力於建設一個「階級專政」基礎上的「新社會」，其實倒是對這一歷史進程的扭曲，乃至背離。可歎的是這樣一個歷史哲學意義上的真理，中國人是在付出巨大的代價後方才認識。——當年的中共領導人和千千萬萬普通的共產黨員，不是都曾真誠地相信自己所要建設的，才是「自由民主的新中國」麼？！1949年的成功，賦予中國共產黨巨大的政治合法性，也成就了一個革命政黨向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極權主義執政黨的身份轉變。這個黨曾經是強有力的，不僅因其「革命」理念的深入人心，而且因其出色的組織控制和動員能力；而這兩者，又都與一個魅力領袖的存在結合在一起，並互為因果。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歷史條件，那就是中國社會這塊巨大的土壤。這

是塊富含專制文化基因的土壤。一個極權主義執政黨只有植根於這樣的土壤中，才能根深葉茂，如魚得水。

然而，時代在變，中國也在變。既然這個黨的理念追求在歷史哲學意義上本來是錯的，虛幻的，那麼歷史本身就總要創造出糾正這種錯誤的條件和機會。1976年毛澤東去世，1978年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這樣的機會終於開始顯現。改革開放其實是對當代人類普世價值的回歸，也是對1912年所代表的制度選擇的回歸。儘管當政的共產黨領導人不願意、也不太可能一下子就承認，但套用一句馬克思上義的語言，這是一個歷史趨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我們還要看到，這個偉大進程不但對社會的影響極其深遠，對執政黨本身的影響同樣極其深遠。社會選擇和價值傾向的多元化會在執政黨內部弓起反響，引起黨內成員認知和組織意義上的分化，從而最終改變執政黨內部的政治生態。社會的民主化要求執政的共產黨自身也必須發生變化，執政黨的自我轉型已經被提上日程，而這必然意味著，共產黨作為專制主義政黨的衰落將不可避免。

中國共產黨的黨內分化首先是認知意義上的分化。

我們看到，這些年來，共產黨內出現一批有識之士，他們當年參加革命本來是為了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但大半生的經歷證明，這個他們親手參與創建的體制非但建不成這樣一個「新中國」，反倒離這個目標越來越遠。只有憲政民主，那個原來被馬克思主義批判為「資產階級」的政治體制建構，才是人類的光明正道。他們是這個黨的成員中的最早一批覺悟者。「兩頭真」可謂對這批老共產黨人的如實寫照，那就是，當年參加革命、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是真；現在提倡憲政民主、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同樣為真。正是這樣一個「兩頭真」老共產黨人群體的出現，為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形成做出重要開局。

對中共體制內變化素有研究的旅澳學者馮崇義先生曾經把判別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標準歸納為如下三項：「第一，認同自由主義民主的價值體系，儘管在學理上對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認識程度可以有深淺不同。第二，反對一黨專政。從民主的角度反對個人迷信、領袖獨裁但並不明確

反對一黨專政的人，至多也只能算是半個民主派。第三，在行動上從中共內部積極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區別於有思想而沒行動的黨內潛在民主派、也區別於作為公開的反對派從事民主運動的黨外民主派」。「嚴格說來，中共黨內民主派實際上指的兩部分人，即極少數完全意義上的自由民主派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主義民主傾向但未必完全認同自由主義民主的「半民主派」」。（參見馮崇義「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和中共黨內民主派」等文）

我基本上贊同崇義兄關於中共黨內民主派的這個界定，需要補充的是：這裏的「派」只是廣義而言，指具有相同或近似價值取向的黨內成員所組成的鬆散群體；識別他們的「共同性」的，首先、而且（就目前而言）主要是他們認知上的特徵，而不是組織上的特徵。這就是說，廣義的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出現，首先是中共黨內認知分化的結果。它有可能發展為中共黨內的某種組織派別，甚至導致中共的組織分化，但這是未來的事，遠不是當下。

但黨內認知分化作為一個事實的存在，仍然意義重大。在當代中國改革的偉大進程中，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孕育產生乃至隆重登場，就將以此為始。

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民主派的一面旗幟

中共黨內民主派有兩面旗幟，一面是胡耀邦，一面是趙紫陽。二位都曾擔任過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又都在這個職務上被黨內保守勢力拉下馬來。

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有名的「紅小鬼」，參加過長征的老革命。耀邦當年曾頗受毛澤東器重，長期主持共青團工作，儘管在60年代特別是文革中受到過迫害，卻從沒有動搖他對共產主義的原初信仰。文革後復出，耀邦積極推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大力平反冤假錯案，重新評估黨的

歷史，極力反對個人崇拜和「終身制」，倡導「說真話」，愛護和保護知識分子，營造寬容的社會氛圍，堅持「發展」、「創新」馬克思主義，在經濟、科技、教育、農村發展、「精神文明建設」、國家發展戰略、和平外交等領域提出廣泛的改革設想或舉措，凡此種種，均是為了拯救這個黨，試圖重新恢復這個制度的生機，給中國人民帶來幸福。耀邦確曾真誠地相信，經過共產黨人的不懈努力，黨的原初理想的實現仍然是可能的。

當然，耀邦的局限也在這裏。耀邦先生雖勤奮好學，但在認知方面未能超出傳統馬列意識形態的囿限。耀邦為人真摯、坦蕩，人格高尚，這在共產黨高級領導人中是極其難得的。但是，他的獨立人格一旦與「組織原則」發生衝突，就往往發生變形，這使耀邦內心深處充滿痛苦。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自由化」問題上，耀邦雖盡力與鄧、陳周旋，乃至抗爭，但也免不了委曲求全，對兩個「左王」反擊不力，所以如此，除了現實政治鬥爭的複雜、殘酷外，耀邦自己並未從根本上反思一黨制社會主義的弊端，是重要原因之一。認知方面是一個因素，心理方面是另一個因素。長期的黨內生活、巨大的意識形態傳統和禁錮使得即使耀邦這樣的人也未敢觸動心靈深處的禁區，這種無意識的自我防衛機制是尚待科學研究揭示的重要秘密。1987 年胡耀邦含冤下臺。在生命的最後兩年耀邦同吳江、李銳、于光遠等人的交流說明他已在思考一些更深層面的問題，可惜歷史沒有能給他足夠的時間完成這種思考。

總之，無論就認知層面還是就組織行為層面言，胡耀邦仍然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共產黨人，是一個並未同舊體制決裂、仍然試圖在傳統軌道內為這個黨和這個國家尋求出路的探尋者。那麼，我們為什麼又說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民主派的一面旗幟呢？

我以為，可以從下面兩個含義上理解這個命題：

首先，耀邦的認知理路雖然總體上仍未擺脫傳統意識形態的羈絆，但他的思考中已經包含大量可供挖掘的新的思想元素，這些思想元素或認知元素帶有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因素，經過提煉、提升，完全可

以轉化為當今中國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所需要的思想資源和體制內動員力量。

舉個例子。早在文革剛剛結束不久的 1977 年，耀邦就曾指出：「禁錮我們這個民族創造力的，一個是精神枷鎖，什麼「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直到「兩個凡是」，都是教條主義的。還有一個是「組織枷鎖」，歷次政治運動積累起來的冤假錯案，各種錯誤的組織結論，把幹部知識分子壓得抬不起頭來。他們的親屬、朋友，被剝奪了擔任適當工作的權利，無法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麼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呢？」（盛平主編《胡耀邦思想年譜 1975～1989》，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 2007 年版，頁 56）

「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麼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呢？」——此話講得何等之好！雖然耀邦這句話有它特定的語境和所指，但卻蘊含了太多可供思考、可供挖掘的東西。關於民主，耀邦曾坦率承認自己還沒有「研究清楚」，但他明確指出「民主問題沒有研究清楚前，各種各樣看法都可能提出來，但都不可當作定論」。（同上，頁 330）這裏表現的是一種開明態度，因為既然還沒有「定論」，就應當允許人們就民主問題進行討論，發表不同的見解或主張。關於「黨性」，耀邦曾這樣講：「以前我們很長時間把黨性理解為聽黨的話，任何情況下服從組織決定，理解為就是組織性紀律性。看來，這不應是最本質最核心的東西。我想，實事求是，追求真理，才是黨性的核心。」（同上，頁 729）儘管耀邦自己也沒有能完全做到這一點，但提出這個觀點本身，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已經十分難能可貴。關於這個黨的現狀和未來，耀邦則時不時表露出深深的憂慮：「現在是我們當權，現在是我們登臺表演，今後 10 年中間，我們這些人究竟演出什麼戲來？是演出一場威武雄壯的話劇來，還是演出一場悲劇來？是演出一場笑劇來，還是演出一場醜劇來？」（同上，頁 332）耀邦對這個黨走向衰退心存警惕，對黨內越演越烈的腐敗現象痛心疾首，大聲疾呼「不

歷史，極力反對個人崇拜和「終身制」，倡導「說真話」，愛護和保護知識分子，營造寬容的社會氛圍，堅持「發展」、「創新」馬克思主義，在經濟、科技、教育、農村發展、「精神文明建設」、國家發展戰略、和平外交等領域提出廣泛的改革設想或舉措，凡此種種，均是為了拯救這個黨，試圖重新恢復這個制度的生機，給中國人民帶來幸福。耀邦確曾真誠地相信，經過共產黨人的不懈努力，黨的原初理想的實現仍然是可能的。

當然，耀邦的局限也在這裏。耀邦先生雖勤奮好學，但在認知方面未能超出傳統馬列意識形態的囿限。耀邦為人真摯、坦蕩，人格高尚，這在共產黨高級領導人中是極其難得的。但是，他的獨立人格一旦與「組織原則」發生衝突，就往往發生變形，這使耀邦內心深處充滿痛苦。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自由化」問題上，耀邦雖盡力與鄧、陳周旋，乃至抗爭，但也免不了委曲求全，對兩個「左王」反擊不力，所以如此，除了現實政治鬥爭的複雜、殘酷外，耀邦自己並未從根本上反思一黨制社會主義的弊端，是重要原因之一。認知方面是一個因素，心理方面是另一個因素。長期的黨內生活、巨大的意識形態傳統和禁錮使得即使耀邦這樣的人也未敢觸動心靈深處的禁區，這種無意識的自我防衛機制是尚待科學研究揭示的重要秘密。1987年胡耀邦含冤下臺。在生命的最後兩年耀邦同吳江、李銳、于光遠等人的交流說明他已在思考一些更深層面的問題，可惜歷史沒有能給他足夠的時間完成這種思考。

總之，無論就認知層面還是就組織行為層面言，胡耀邦仍然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共產黨人，是一個並未同舊體制決裂、仍然試圖在傳統軌道內為這個黨和這個國家尋求出路的探尋者。那麼，我們為什麼又說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民主派的一面旗幟呢？

我以為，可以從下面兩個含義上理解這個命題：

首先，耀邦的認知理路雖然總體上仍未擺脫傳統意識形態的羈絆，但他的思考中已經包含大量可供挖掘的新的思想元素，這些思想元素或認知元素帶有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因素，經過提煉、提升，完全可

以轉化為當今中國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所需要的思想資源和體制內動員力量。

舉個例子。早在文革剛剛結束不久的1977年，耀邦就曾指出：「禁錮我們這個民族創造力的，一個是精神枷鎖，什麼「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直到「兩個凡是」，都是教條主義的。還有一個是「組織枷鎖」，歷次政治運動積累起來的冤假錯案，各種錯誤的組織結論，把幹部知識分子壓得抬不起頭來。他們的親屬、朋友，被剝奪了擔任適當工作的權利，無法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麼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呢?」（盛平主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頁56）

「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麼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呢?」——此話講得何等之好！雖然耀邦這句話有它特定的語境和所指，但卻蘊含了太多可供思考、可供挖掘的東西。關於民主，耀邦曾坦率承認自己還沒有「研究清楚」，但他明確指出「民主問題沒有研究清楚前，各種各樣看法都可能提出來，但都不可當作定論」。（同上，頁330）這裏表現的是一種開明態度，因為既然還沒有「定論」，就應當允許人們就民主問題進行討論，發表不同的見解或主張。關於「黨性」，耀邦曾這樣講：「以前我們很長時間把黨性理解為聽黨的話，任何情況下服從組織決定，理解為就是組織性紀律性。看來，這不應是最本質最核心的東西。我想，實事求是，追求真理，才是黨性的核心。」（同上，頁729）儘管耀邦自己也沒有能完全做到這一點，但提出這個觀點本身，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已經十分難能可貴。關於這個黨的現狀和未來，耀邦則時不時表露出深深的憂慮：「現在是我們當權，現在是我們登臺表演，今後10年中間，我們這些人究竟演出什麼戲來？是演出一場威武雄壯的話劇來，還是演出一場悲劇來？是演出一場笑劇來，還是演出一場醜劇來?」（同上，頁332）耀邦對這個黨走向衰退心存警惕，對黨內越演越烈的腐敗現象痛心疾首，大聲疾呼「不

要忘記國民黨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幾年就垮臺的教訓」。（同上，頁 1092）雖然從目前掌握的資料言，耀邦尚未將自己的沉思上升到從理念和制度層面為共產黨另尋出路的高度，憲政、多黨制、建設一個強大成熟的公民社會等尚未系統進入耀邦的思考視野，但耀邦主張大膽探索，不要為這樣的探索設置禁區，已經預設了一個人道的、理性的觀察問題的立場和出發點。而且，我們不要忘記，耀邦是頂著多大的壓力在做這樣的事情啊！

只有深入體察耀邦當年處境之險惡，才能理解耀邦精神之可貴。耀邦去世後兩年，六四突變，軟禁中的趙紫陽繼續了耀邦的思考，把耀邦很多還沒有來得及想明白的問題徹底搞清楚了，趙紫陽也成了中共體制內第一個公開與專制體制決裂的前領導人。胡、趙的思想遺產，是當今和未來中共黨內民主派的重要精神財富，是中國改革事業的寶貴精神資源。在這個意義上，說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民主派的一面旗幟，難道不是恰如其分麼？

其次，更重要的是，胡耀邦和一大批以他為代表的力主改革開放的共產黨人，是極權政治達於頂峰後走向反面的產物，是這個黨痛定思痛過程中產生的體制內新生力量。儘管這個力量還很弱小，在認知、行為方式等方面遠未掙脫舊體制的影響，但他們卻在客觀上代表著某種新的方向。共產黨作為一個極權主義執政黨需要脫胎換骨的改造和轉型，才能從一個專制政黨轉變為憲政民主體制框架內的民主政黨。這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需要。對中共來說，這也是一個痛苦、艱難的自我解構和重建過程。它需要一系列的刺激和推動，包括來自自身內部的刺激和推動。胡耀邦和他的黨內改革派同事恰恰充當了這樣一種推手的角色。儘管在當時，他們自己也未必清楚意識到這種角色，但歷史發展往往是這樣的，行動者在大的歷史轉變年代不自覺地充當了歷史進步的工具，甚至火車頭。

耀邦曾經痛切地指出：「要看到，我們的國家野蠻落後。一個國家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首先執政黨有正常的政治生活。」「一個黨，一個國

家，如果沒有正常的政治生活，就等於滅亡，實際上是一個軀殼。」（同上，頁211）正是基於這一點，基於對文革等痛苦經驗的深刻反思，耀邦堅決反對任何個人崇拜，力主廢除事實上的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終身制。耀邦曾表示，希望中國也能有自己的華盛頓，「我一定只幹一屆，到70歲就退下來，成為黨內首先自覺退下來的一個！」（同上，頁790）事實上，過去30年中國共產黨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為數不多的進展，其中之一就是結束了領導職務的終身制現象，至少在形式上。這與耀邦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當然，鄧小平也積極主張廢除終身制，但他的言辭和行動並不一致。鄧在十三大後名義上退出了政治局，實際上卻仍然是共產黨的太上皇。它反映了我們這個民族根深蒂固的專制傳統，要改變之，談何容易?!

耀邦倡導全面的改革觀。他主張中國的改革必須「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同上，頁826）1986年，耀邦主持制定《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這個文件強調「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參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頁426）應該說，這如實反映了胡耀邦和80年代主張改革的一批共產黨人的共同認識。他們希望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凡此種種，均在客觀意義上有助於推進執政黨的自身轉型。後來歷史又一次發生大的逆轉，六四天安門事件結束了80年代的改革蜜月，但歷史卻記錄下耀邦和他的改革同道的奮鬥足跡。今天和未來中共黨內民主派對改革事業的繼續推進，都是對那一段歷史的承續和拓展。

在這個意義上，把胡耀邦視為黨內改革派的前驅和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旗幟，也顯得極其自然，並符合歷史發展本身的邏輯。

當今中國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黨內形勢出現哪些新特點?

耀邦逝世20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正面看，中國的經濟總量有了很大增長，國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經濟生活中的自由選擇度在加強，這個國家已經從開放中領略到市場經濟的無限好處。但是，與此同時，貪腐也在增長，也在膨脹，而且這個膨脹的速度遠快於國民財富總體增長的速度，更快於普通國民收入提高的速度。人們用「權貴資本」來形容這個日益龐大的貪腐集團，因為他們很多是靠非法利用公權力發的財，然後再憑藉這些不義之財進一步染指、控制公權力。這股巨大的貪腐勢力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軀體上最大的毒瘤。

那麼何以至此?這就要回到六四發生後執政者對自身狀況的基本估計和他們採取的應對之策。六四無疑是中共當政者建政40年遇到的最大危機，用坦克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普通市民，幾乎使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在一夜之間蕩然無存。鄧小平何嘗不懂得這個道理?所謂「大氣候」、「小氣候」不過是給武力鎮壓找一點說辭，他自己也清楚，老百姓對「官倒」、腐敗的憤恨才是這麼多人走上街頭的真正原因。為了穩定局面、收回人心，六四後、特別是鄧小平南巡後的中共執政者採取了兩套並行的辦法：一套是狠抓經濟，促進增長，我們可以稱之「GDP戰略」。執政者的邏輯是，經濟發展了，老百姓得到「實惠」，人心就可收回，政權就可穩定。這樣，人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GDP會成為過去20年中央考核地方各級政府「政績」的硬指標。另一套辦法就是體制內的反貪腐戰略。儘管信心不足，黨的領導者至少希望這樣的努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體制內腐敗的蔓延趨勢。體制內反腐還有一層含義，那就是把它作為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擋箭牌和替代品。黨的領導人努力讓他的黨員和普

通臣民相信，似乎依靠黨的各級紀律檢查機構，就可以解決權力監督和權力制衡的難題。兩套戰略的總目標是維持「穩定」，說的再透徹些，是為了維持共產黨的統治，也就是執政地位。而這樣兩套戰略的實施必然同時意味著，上個世紀80年代黨內曾經醞釀過的政治體制改革將被長期擱置，因為今天的領導人甚至不再具有勇氣領導這樣的改革；至於多元化和以憲政建設為目標的政治改革，則更是被徹底否定，因為這樣的改革被解讀為要從根本上「革」共產黨的「命」。黨的「第三代」或者更新一代領導人肩膀太嫩，心胸又太小，他們似乎扛不起「丟掉祖宗江山」的惡名。

那麼，這樣的戰略能否真的奏效？既可能，又不可能。說它可能，是因為市場經濟畢竟沒有被否定。儘管遠談不上健全，市場經濟還是在「有中國特色」的制度背景下踉踉地發展著，並給中國帶來了機會和財富。更何況，中國還有足夠多的廉價勞動力，可以在國際貿易領域盡顯某種「優勢」。在上述意義內，GDP的連年大幅增長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只是到了最近，這種增長模式內含的危機才逐漸暴露出來，席捲全球的金融風暴則給國內公開的或潛在的經濟瘡疤添了一把鹽。說它不可能，又因為體制內反貪腐絕無成功希望，否則人性就該改寫，人類的歷史也早該是另外一幅模樣。30年來，體制內反貪不可謂不努力，但貪官越整越多，貪術越整越高，反「反貪」的手段越來越精明，也越來越無恥。中國的官僚權貴集團、產業權貴集團和文化權貴集團已經在六四後短短的20年間分別坐大，以致有人說，中國的幾百個權貴家族已經控制了這個國家的命脈！

究竟誰在「革」共產黨的「命」？不是什麼「民運分子」，也不是什麼「敵對勢力」，而恰恰是這些憑藉專制體制飛黃騰達的權貴資本和各個領域的官僚權勢集團！——這一點，人們已經看得越來越清楚了，因為正是他們的為所欲為，造成增長中的GDP的不良傾斜，造成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公、官民衝突，造成讓黨的最高領導人寢食不安的「穩定」危局。不過30年啊！當年那麼昏庸無道的大明帝國，還維持了276年之久；

大清帝國也延續了12帝，如果不是外力壓迫、內部變化，也許還會多維持個一代、兩代。中共建政不過60年，改革開放僅僅30年，領導人更替也不過三、四代，雖然外表還擺出一副「盛世」模樣，骨子裏卻已經腐朽。這是多麼令人震驚的歷史一幕?!

這就是當今中國的基本形勢。

當然，對同一個現象，往往會有不同的解讀。面對「盛世」外表下的深刻危機，僅就中國共產黨黨內言，已經出現三種不同的聲音，每種聲音代表著一個特定的立場，一種回應危機的方案。

第一種聲音，黨內民主派的聲音。他們認為，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證明，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跛足」改革路線最終是難免要失敗的。體制內反腐解決不了體制性貪腐的頑症；只有憲政民主，中國才有希望，而憲政民主意味著不能再繼續共產黨一黨專政的老路。

第二種聲音是黨內「毛派」的聲音。「毛派」指責30年改革背叛了社會主義理想，製造了大批「新生資產階級」。他們認為，只有回到毛的「繼續革命」立場，回到「公有制」，回到文革式的「人民主」，中國才有希望。這個中共黨內「左翼」派別的出現和近幾年來的「當紅」，一方面證明了毛的遺產的複雜性、多面性，另方面也證明，中共壓根兒也沒有對這筆遺產做過真正認真的、夠水準的歷史清理，以至在許多最基本的問題上竟然還歧見迭出，一團混亂。

第三種聲音則是通過「主流傳媒」傳達的黨的「主旋律」聲音。這種聲音過於熟悉，在此就不必贅言了。總的說，只要黨的最高領導集團還沒有從這種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中找到出路，或者即便內心明白但一時半會兒還不便說出，也沒有真的下定決心走出歷史決定性的一步時，他們就只能繼續維持那套自欺欺人的「特色」神話，既忽悠全國的老百姓，也忽悠當權者自己。所謂「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持要用「核心價值觀」對抗普世價值，用「特色社會主義」對抗憲政民主，不過是此類裝腔作勢立場的最新表現而已。今年「兩會」期間圍繞吳邦國的人大工作報告在官辦媒體上展開的鋪天蓋地般

的反「西化」、反「三權分立」、反「兩院制」的宣傳，則再一次暴露了官方意識形態色厲內荏的虛偽性質。

以上三種不同聲音的並存再次證明，中國共產黨黨內認知上的分化已經是一個無可回避的事實。這是當今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出現的一個新特點，也是中共作為老牌專制主義政黨正在走向衰落的明顯標誌。

黨內民主派的歷史責任：引領中共實現自身的理念轉型和組織轉型

那麼歷史如何繼續往前走？去年 12 月，民間發表了呼籲推進中國憲政改革的《零八憲章》，代表了自由知識界和廣大公民追求民主、自由、公正、建設一個憲政中國的心聲。就體制內改革言，人們則希望，黨內民主派能逐漸發展壯大，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偉大進程中，擔負起引領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實現理念轉型和組織轉型的歷史責任。這種「希望」並非虛妄，它是對中共黨內三種立場各自會弓J出何種結果進行客觀分析後得出的结論。

首先，「毛派」主張的無出路性是明擺著的。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回到文革，除非中國人都是弱智，中華民族是一個健忘的、不可救藥的民族。我並不贊成對毛澤東年代的全盤否定，對毛本人和毛時代的遺產確實還需要進行更深入的歷史清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用「繼續革命」的辦法解決不了「新生資產階級」的問題，過去如是，今天仍然如是。「繼續革命」的理論前提本身就是錯誤的，雖然它曾反映了一代共產黨強人領袖的沖天豪情。更何況，毛時代也從來沒有過什麼「人民民主」或「大民主」。獨裁者半是出於烏托邦想像、半是出於黨內鬥爭需要恩賜給他的臣民的「上海一月革命」式的「民主」，與真正的公民自由民主相差十萬八千里。

其次，「主旋律」主張的無出路性也是明擺著的。面對深刻的社會矛

盾，採用鴕鳥政策，堅持「特色」神話，無助於化解執政者的危機，卻在客觀上保護了權貴勢力，等於共產黨的慢性自殺。君不見建國60年，如此「乾坤扭轉」的「歷史紀念」年頭，我們的中央政府卻是以「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為全年工作的總綱，還先後把全國2000多個縣的縣委書記、公安局長招来北京，接受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培訓，執政者危機感之深刻、之切膚由此可見一斑。但為什麼不敢在政治改革方面勇敢地向前邁出一步呢？須知，將錯就錯，抱守殘缺，猶抱琵琶，硬充好漢，既不敢在國際場合公開與世界民主大趨勢叫板，又在內部死守專制政治的底線，這是最無能的選擇，也是最糟糕的選擇。

只有黨內民主派的主張切中時弊，他們的見解與民間自由力量關於中國前途的見解是完全一致的，代表了良心尚存的體制內人士對形勢的清醒判斷。所以我們說，中國的希望在憲政民主；中國共產黨的希望在中共黨內民主派。

關於中國未來政治演變，我在我的那篇《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的「主報告」结尾處，曾分析了這樣幾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中共黨內民主派與溫和的民間反對派聯合起來，共同主導中國的改革，通過較平穩的制度轉型，達致憲政改革的成功；

第二種可能：當權者拒絕憲改，社會矛盾激化，最終走向崩潰；

第三種可能：當權者拒絕憲改，但用更加純熟的手段維持統治，使專制體制死而不僵。

顯然，只有第一種可能，才是我們要盡力爭取的，因為它才是中華民族的出路。

我還想特別指出的是，這條路既是中國的出路，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出路。一黨專權的政治體制必然死亡，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致黨組織卻有可能獲得新生。這種新生的前提和途徑則是成功實現中國共產黨的理念轉型和組織轉型。那麼，何為理念轉型？何為組織轉型？理念轉型指中國共產黨放棄過去的專制邏輯和敵對思維，認同普世價值，也就是自由、民主、公正、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價值觀，認同多黨制和權力的可

替換是監督、制衡公權力的最佳制度安排。組織轉型，則是指中國共產黨通過自身努力，逐步解構原來作為極權主義執政黨的組織結構和組織體系，按照現代民主政黨的建構原則實施組織改組，使這個黨變為一個全新的、可以在憲政民主制度框架內運作和行動的黨。

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黨內民主派顯然肩負著引領中國共產黨完成這樣兩個轉型的歷史使命和歷史責任。

當然，今天的中共黨內民主派還很弱小，阻礙中共實現兩個轉型的黨內對抗力量（特別是權貴資本的力量）又十分強大，這容易讓人感到悲觀。中共黨內民主派要能夠左右中共的發展方向，引領中共的未來，就必須在中共組織內的各個層級上產生自己的代表人物、領軍人物，特別是在中央決策層產生這樣的人物。由於這個體制的腐朽和它所特有的逆淘汰人才選拔機制，產生這樣的人物和這樣一種力量似乎顯得越來越困難。這些都是事實，不可視而不見。但我還是相信一點：歷史總是要向前走的。中國要實現憲政民主，這是大勢所趨，誰也阻擋不了。執政黨或是自己主動改，或是被歷史推著改，或是被歷史所淘汰。無非是這幾種可能。如果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轉型過程中，擁有數千萬黨員的、諾大的中國共產黨裏邊竟然產生不了幾個像樣的改革者，產生不了一群真正以中華民族未來為己任的、敢於向舊體制宣戰的大智大勇之人，產生不了能夠引領這個黨走向新生的一支健康力量，那只能證明這個黨真的氣數已盡，無可救藥了。果若如此，則不獨是這個黨的悲哀，也實在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悲哀。

但是，我們不希望看到這樣一個結果。

我相信，眾多中共黨內的有識之士也不希望看到這樣一個結果。

本書作者們的努力，就是在向相反方向，也就是使中國共產黨獲得新生的方向，所作的努力。它給人們帶來了希望。

本書各篇鴻文的大致介紹

本書共輯入12位老共產黨人的大作。

李銳先生和胡績偉先生是讀者十分熟悉的中共黨內改革派元老。李老以一部《廬山會議實錄》名揚天下；胡老上個世紀80年代執掌《人民日報》，為「人民性」振臂吶喊。二人都是中共黨內著名的改革先鋒。如今兩位老人都已經90多歲，但仍然關心著國家的前途和這個黨的前途。記得在兩位老人家中，晚輩與他們切磋書稿的主題、結構時，兩位元老前輩都極其認真。稿子也都經過反復推敲、修改。李老的文章題目是「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這是對耀邦先生人格的讚美，反過來也是對這個體制培養了大批「奴才」的尖銳批判。李老指出：「中國自古以來，專制王朝，老百姓當慣奴隸，少數官員效忠當奴才。過去共產黨是必須當馴服工具，群眾學雷鋒當螺絲釘，少數奴才們助紂為虐」，黨內生活「極不正常」。是胡耀邦開始打破這個傳統。「胡耀邦能在共產黨內出現，非常了不起，戰爭年代出來的人，服從慣了，更不容易了。他獨立思考，他不當奴隸，更不願意當奴才。延安搶救運動時，到處大抓特務，他當時擔任總政組織部長，自己做了個試驗，找幾個絕對沒有問題的年青人，一逼供信，就都承認是特務了。於是他立即找毛主席說，不能再幹這種事情。這是他親口對我說的。」李老還在文章中引用了88歲壽辰時自己寫的詩「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並再次呼籲，「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的合法性計，為國家、民族和天下蒼生計，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時不我待！」

胡老這些年來在老伴狄沙女士的協助下著述頗豐，不斷有新作問世。這次胡老給本書提供的文章是「要自由民主，還是專制壟斷？」胡老認為，「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路線是自由民主的路線，一條是專制壟斷的路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

他實行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路線，追求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後者的代表人物是鄧小平，他搞的是一個專制壟斷的社會。」據胡老看，胡耀邦、趙紫陽當政的12年，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最好的12年；這個「胡趙新政」，是對建國初期「新民主主義」建設路線的繼續，可惜後來被黨內的保守勢力匱斷。對於當今的政治體制改革，胡老認為，2007年謝韜提出中國應該走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的觀點引起很大反響，但「我左右尋思，感覺使用「新民主主義社會」一詞更為合適，雖然多少有些不得已」。事實上，胡老近年來一直主張用「新式的民主主義革命」的提法來概括今天的改革，認為這種提法執政者更有可能接受。值此耀邦去世20周年，也是「六四」20周年紀念之際，胡老呼籲，應該從為胡耀邦、趙紫陽平反開始，走向平反六四，為中國的改革開出新局。

謝韜先生也是我所尊敬的共產黨人老前輩。我和謝老還有一段師生緣分。那是20多年前，我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書時，謝老是研究生院的第一副院長。1987年，我們曾同乘一列火車到襄樊遊覽古隆中諸葛亮故居，後到湖南張家界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有機會向謝老當面討教，包括那個把謝老牽連進去的胡風案件。時隔多年後師生再次見面，謝老已因他的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名噪海內外。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去謝老家拜訪謝老，討論謝老為本書提供文章的主題。謝老當時精神非常好，與晚輩圍坐沙發，侃侃而談近兩個小時。我們商定謝老這篇文章的主題將圍繞執政黨的組織轉型話題展開。謝老已經就這個話題寫過一篇短文，發表在第20期《領導者》雜誌上，但言猶未盡，很想就此機會做一個更深入的探討。謝老還索要了一些有關耀邦的資料，表示在訪談、寫作前再做些研究準備。遺憾的是，這件工作還沒有來得及進行，謝老就突發腦血管病住進了醫院。幸虧搶救及時，總算脫離了生命危險。目前，謝老的病情已有很大好轉，但繼續原來的訪談、寫作計劃在短期內是不現實的。有鑒於此，本書收錄了謝老在《領導者》刊發過的那篇文章「共產黨組織轉型的思考」供讀者分享。這篇文章指出，共產黨強調自己的「先鋒隊」性質，組織上奉行「集中制」和「集權制」，在教

黨組織形態上其實是極其落後的。「先鋒隊」理論完全不能適用於建設一個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開放的、群眾性的現代政黨。這樣一個政黨應該強調「民主」而不是「集中」，強調「分權」而不是「集權」。謝老還以國民黨為例，指出「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百年老黨，已經經歷了從革命黨到專政黨再到憲政黨的轉變。1948 年「行憲」後，本來國民黨就應當向憲政黨轉化了，由於在內戰中失敗，國民黨先是在大陸後來在台灣實行了四十年「戒嚴狀態」，延誤了組織轉型。中國共產黨要獲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國民黨走過的憲政之路。覺悟越早，轉型越及時，對於黨的未來發展就越有利。」——這真是一位老共產黨人拳拳愛國、愛黨、又企圖去「救黨」的肺腑之言。我們衷心希望，謝老能早日康復，繼續為我們這個民族展現他的良知，貢獻他的智慧。

何方先生 1950 年代曾在張聞天身邊工作，在中共黨史研究方面有重大建樹。這次何老為本書提供的重文是討論耀邦對民族政策問題的貢獻。眾所周知，民族問題歷來是十分敏感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話題，最近由於西藏問題的凸顯，這個話題尤其具有格外的尖銳性。何老並沒有作任何回避，而是嚴肅批評了執政黨在民族政策制定和實行中的許多自相矛盾之處:「60 年來，我們一直宣告實行的是民族區域自治，但這只是表面的和對外宣傳用的，實際情況卻是另一回事。因為所謂自治，就得允許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但我們實行的則是「黨管一切、漢人當政」。」「黨歷來在所管轄的地區，都強調和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建國後不但沒有放鬆，而且還隨著各種政治運動得到不斷加強。所謂一元化領導，實際上就是一黨專政的人治，也就是黨管一切和以黨代政。在內地如此，對少數民族地區更不放心。既然黨管一切，哪里還談得上「民族自治」?」「我們不只是要「黨管一切」，而且還要「漢人當權」。例如以前蘇聯也是實行一黨專政和以黨代政的，但它的各加盟共和國，黨的第一把手大體上都是該共和國的主體民族出身，黨委和政府成員也多由本地人組成，很少由中央和外地派來。少數民族幹部到中央工作都是擔任實職，而不是虛位。有的全黨和全國領袖就出身於少數民族，如斯大

林、鐵托。這在中國，既沒有發生過，也不能想像。」就西藏而言，何老並沒有否定共產黨本意在「解放百萬農奴」的初衷，但「黨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和內地一樣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還以救世主自居，這本身就違背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從外面輸入的這種制度變革，大大超出了少數民族群眾的覺悟和認識，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強加。」「我們長期從階級鬥爭的立場出發看待民族問題，也一直用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的觀點看宗教，所以對宗教總是不信任，總有一種近乎自發的排斥心理，不但要加以控制，還要按自己的模式進行改造。這當然只能引起他們的不滿和反對。我們又習慣於不從自己方面找原因，只知道強制教育和進行鎮壓。但是壓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矛盾就越來越激化了。」想想近年來西藏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這位老共產黨人的金玉良言真值得我們的當政者駐足沉思！何老在文章中回顧了耀邦對民族問題的主張，認為應該繼承當年耀邦的精神，尊重和信任少數民族，實行真正的充分的民族區域自治；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實行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動自由。何老特別強調，「所有這些旨在使各民族團結友好、愛國家愛民族，使自治區和平穩定、繁榮開放的政策與措施，能夠實現的先決條件，還是整個中國的民主化。也就是經過政治改革，變成一個憲政法治的國家，否則沒有可能。」這篇材料翔實、說理充分的兩萬字的長文，很難想像出自一位87歲高齡的老人之手。何老寫此文時，由於精神高度集中，導致失眠，曾一度住院。即便是在病床上，何老的思考與寫作也沒有停止。其情其景，實在令人感佩。

鍾沛璋、辛子陵、林京耀三位先生的文章則從耀邦與知識、知識分子，耀邦反對文化專制，耀邦對發展民營經濟的貢獻等不同角度，對耀邦先生做了深情回憶，強調要繼續耀邦未竟的事業，把中國的改革推向深入。

鍾老上個世紀50年代就在《中國青年報》工作，80年代曾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局長，與耀邦有不少工作上的接觸。「當時中宣部也在中南海辦公，有機會見到耀邦同志。我看到香港報刊登載許多以胡喬木

為代表堅持極左觀點的一些領導，對耀邦的攻擊活動，感到很擔憂。一次我帶了幾本香港刊物去見耀邦，想請他看一下。耀邦卻坦然明確地對我說：「我不看！」。有一次去看耀邦，他正在案前思考，他說：「不要誇大文藝作品的作用，應該允許創作自由，不要把文藝創作看成洪水猛獸。」可以看出為了保護文藝創作自由，耀邦想了許多。」鍾老是著名的「兩頭真」式的老共產黨人，他的回憶讓我們不由得生出幾多思考，又幾多感慨！

子陵先生的大作則在紀念耀邦的基礎上，把論題直指當代中國的新聞體制改革。「長期以來，特別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鉗制輿論，萬馬齊喑，眾口一詞，黨犯多大錯誤都是「偉、光、正」，領袖犯多大錯誤都是「萬歲、萬歲、萬萬歲」，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再遭受嚴重挫折，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慘痛的歷史教訓。改革開放3。年了，經濟建設事業有了飛躍的發展，但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跟上，言論自由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紀念耀邦同志，我們要繼續反對文化專制主義，為中國人民的言論自由而鬥爭。」事實上，這些年來，子陵先生自己就創作了大量獨立研究基礎上的嚴肅作品，產生很大的社會影響。在為本書提供的這篇文章中，子陵先生回顧了建國6。年來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和被扭曲的坎坷歷史，呼籲新聞改革不能再拖延，公民要有「臧否時政的自由，有對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討論批評的自由」；還應該「設置對立面，扶持民營報刊」；再就是「制定新聞出版法，新聞出版徹底擺脫人治」。共產黨真的要懲治腐敗，新聞自由是最好的良方。「事實證明，中國特色的黨內反腐機構管不住黨內的官員，官員監督官員，等於用白貓監督花貓，是靠不住的，多年來「越反越腐」就是證明。真想反腐敗，就把對官員的監督交給群眾，交給媒體。希望中央以此表明反腐敗的誠意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

耀邦關注社會，關注民生，積極支持發展民營企業，把個體經濟發展和民營企業發展譽為當代中國的「光彩事業」，這些，林京耀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做了寶貴的回憶。比如，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城鄉的

個體買賣活動出現並且發展迅速，「有人把從事販賣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的人稱為「二道販子上，對此，耀邦同志說：「什麼二道販子？是二郎神！農民手裏只有點糧食，不販賣糧食還有什麼好責！應當允許長途販運，應當幫助農民出賣餘糧！」這樣旗幟鮮明地支持農民和個體商販販賣農副產品的活動，在當時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事實上，耀邦還系統地提出了有助於改善民生的「富民政策」。當然，政治體制改革跟不上，「富民」最後變成了「富官」，這是後話，也是今天中國憲政改革必須解決的難題。

中國的對外關係與外交政策制定，是普通讀者通常不熟悉的領域；耀邦在這個領域的貢獻，恐怕就更少為人知曉。宋以敏女士的長文「胡耀邦在對外關係上的撥亂反正」為我們展示了這個領域許多鮮為人知的事情，堪稱是一篇深入研究基礎上的有分量的作品。以敏教授的文章上來就指出：「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國際地位有了顯著提高，人們都歸之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國內工作方針作了根本性的撥亂反正，也就是改「以階級鬥爭為綱」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當然是對的。但在對外關係上的撥亂反正，長期以來，人們卻提得不多，可能重視不夠。其實，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際上，這兩個撥亂反正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後者更為重要。因為對世界形勢的根本判斷，是我們制定對外和對內政策的基礎和前提。試想，如果我們一直認定，大戰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那還能放心大膽地埋頭於經濟建設嗎？正是在這個世界形勢判斷和對外政策的撥亂反正上，胡耀邦在當時中央領導人中是認識比較清醒、也提出得最早的一位，對我們黨和國家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在這方面極為豐富的思想和實踐，或被抹殺，或被歪曲，人們很難看到歷史真相。」以敏教授用大量史料證明，正是胡耀邦，較早得出關於世界形勢和時代問題的新判斷，那就是應該用「和平」代替「戰爭」，用「發展」代替「革命」，並以此作為制定外交戰略和外交政策的基礎；正是胡耀邦，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國要奉行完全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一改過去外交政策中的“一邊

倒”或「一條線」。在外交思想、外交業務和外交風格上的撥亂反正，耀邦也有很大功勞。而「胡耀邦所以能為對外關係撥亂反正做出巨大貢獻，是因為他站到了歷史潮流的前面，具備非凡的眼力、魄力和毅力，並且有一套正確的政策思想和具體做法。他的貢獻，有些是我們今天外交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只是没有得到應有的承認；有些沒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因此没能收到應有的成效。這是他本人的遺憾，也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損失。」我想告訴讀者的是，以敏女士是何方先生的夫人，夫婦二人同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所以這篇文章自然也傾注了何老的心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這對老夫婦、也是兩位誠摯的老共產黨人連袂向讀者作出的奉獻。

在討論了內政、外交諸領域耀邦的傑出貢獻和它對當今中國社會轉型的意義後，我想換個角度，提請讀者關注一個更具思想意味的話題。一般而言，關於耀邦與這個體制的關係，關於這種關係所具有的矛盾的、乃至相互錯位的性質，迄今為止還缺乏有深度、有力度的研究和反思。張顯揚和杜光兩位先生為本書提供的重文，則對此做了有意義的探索性開掘。

顯揚先生在本書作者群中，是很特殊的一位，因為他既是一個老共產黨人，卻又因「一貫反對馬克思主義，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而於1987年被開除黨籍。不過，這倒也成就了顯揚先生作為叛逆者和獨立思想者的英名。顯揚先生這次提供的文章標題是「胡耀邦下臺的意識形態背景：人本思想與黨文化的分歧」。這篇三萬字的長文闡述了這樣一個觀點：胡耀邦是一個真誠的「人民主體」論者，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轉移；那些批評耀邦的人則是「黨國主體」論者，或「權力主體」論者，一切以黨國的權力、實際是他們自己的權力為轉移。而耀邦在和這些人抗爭時「只覺得他們這樣做很不正派，卻没有把這些惡行和他們的意識形態背景聯繫起來。其實，這正是他們所服膺的以「黨性」為標榜的黨文化使然。見利忘義，出爾反爾，趨炎附勢，落井下石，是這個黨文化在黨內鬥爭中很正常的表現。幾十年來，黨內鬥爭無數，有哪一

次不是這樣對待不幸淪為鬥爭對象的人？何況，他不是別人，而是被認定為離經叛道之人。另一方面，由於沒有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上升到意識形態高度去反思，他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心中，還深藏著一個與黨文化完全不同的以彰顯人性為指向的人本思想。這個人本思想，類似於一種潛意識，看似默默無聞，實際上一直在引領著他的思想和行動。」我們可以把這種現象理解為無意識支配著耀邦行動的個人人格與現存體制的明顯錯位。顯揚先生還指出：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個人特點；他所關注的，是革命實踐中的實際問題，不是一般的理論問題。他是革命家、思想家，不是理論家。他的人本思想，不成體系，甚至連「人」這個人本思想的核心概念，都是借助於「人民」、「群眾」、或「人民群眾」這些普通的政治術語來表達的，但它絕對符合人本主義的基本精神。他所理解的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概念，更不是可以拿來自我標榜的符號，而是由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組成的實實在在的群體。所謂人民的幸福，人民的痛苦，都是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幸福和痛苦。他的「人民主體」思想，真正是以「人」為本的，是人本主義在當代中國條件下的獨特表現。顯揚先生特別語重心長地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缺乏民主、自由、人權和人道主義傳統、而封建主義流毒很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這份人本思想遺產，顯得格外珍貴。它對於我們沿著由普世價值鋪就的世界文明大道，進行現代化建設，尤其是進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現存的政治制度是按照黨文化，即「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建構起來的。這樣的政治制度，和以專制主義為核心的封建主義遺毒互相適應，互相促進。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義，正是改革這種政治體制的最好的指南：它們既是「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的對立面，又是封建主義遺毒的強大的消毒劑。」

杜光先生也是我很熟識的著名學者，活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黨內老前輩。杜老的文章從另一個角度深入分析了作為「偉大的民主主義者」的胡耀邦。這篇文章首先指出：胡耀邦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從來不隱

瞞或美化自己的所作所為，是一個罕見的陽光型的政治家，「滿身透明，滿身陽光」。但是，如何從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高度，來觀察胡耀邦的傑出貢獻的性質，仍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中國100多年來的歷史，是一部曲折複雜的、至今還沒有完成的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革命史。撥開歷史的迷霧，我們不難發現，從洋務運動到現在的100多年歲月裏，充滿著民主主義同專制主義的矛盾與鬥爭。在這個歷史時期裏，登上政治舞臺的人物，都不能不在這個矛盾面前作出自己的選擇，並在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的鬥爭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展露自己的真容。所以，評價這個時期的歷史人物，都應該把他們放在這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下，揭開各種各樣的粉飾和偽裝，從他們對民主主義還是專制主義的取捨抉擇裏，記錄下他們的所作所為，在這個基礎上，作出褒貶臧否的結論。」杜老指出：「我說胡耀邦是偉大的民主主義者，根據的是他的實踐，是他對社會和歷史所作的巨大貢獻的性質，而不是他的理念。」「胡耀邦是一位真誠的共產黨員，他相信自己一生都在為共產主義而奮鬥。但在客觀上，他為之窮盡畢生的聰明才智，獻出全部精力以至生命的事業，卻是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在中華大地還籠罩著專制主義的迷霧的歷史時期裏，任何一個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都不能不屈從這個不可違抗的歷史規律。所有真誠地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革命者，大概都處於這樣的歷史錯位之中。」這是一個重要的、給人以啟迪、又可能引發爭議的觀點。杜老接著探討了「民主主義的實踐怎麼會以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為旗幟」這個更具歷史縱深感的話題，討論是從兩個層面進行的：一是世界範圍的共產主義運動，二是中國近百年來的社會現實及其發展。這位老共產黨人、如今的自由派學者認為，共產主義這種19世紀的理想在沉寂一段時間後再度出現，而且出現在世界的東方，確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和不幸。「如果說，19世紀40年代在歐洲出現的共產主義，由於缺乏應有的社會經濟條件而不得不流於空想烏托邦的話，那麼，在更加落後的東方，舉起共產主義的旗幟來引導革命，就顯得更不合時宜了。也許，歷史的諷刺就在於，越是貧窮落後的國家與民族，企圖改變落後面貌的善良願望就越

發強烈。因而，在理念的選擇上，很容易趨向於雖然高不可攀、卻被認為是有可能迅速達到的目標。於是，通過暴力來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就成為革命家的最佳選擇。但是，由於根本不具備實現這個理念的客觀條件，結果不能不跌落在更加落後的泥坑裏。共產主義並沒有把俄羅斯和中國帶進天堂，卻弓出了專制主義的魔王。在這個歷史事實裏，滲透著多少血和淚的教訓啊！」

這樣，問題仍然被歸結到當代中國的主題，那就是結束專制主義，建設一個符合人類普世原則的憲政民主國家。本書最後給讀者奉獻的兩篇重文——王家典先生的「歷史實踐嚴酷檢驗馬克思主義」和周成啟先生的「緬懷耀邦，把中國的民主化事業推向前進」——就分別從理論研討以及制度設計和轉型戰略兩個不同角度探討了這個問題。

王老原是江蘇省社科院的民國史專家，這些年專攻晚年恩格斯的思想和第二國際理論家們的歷史貢獻。在「歷史實踐嚴酷檢驗馬克思主義」這篇大作中，王老提出要把「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分野搞清楚。「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以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綱領為基礎，在過去很長的時期裏被認為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正宗。列寧和第三國際是「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鼓吹者和實踐者，他們強調這種「社會主義」不可能在舊社會內自發地、自然地生長出來。事實上，第三國際共產運動和各國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體制的產生和形成，最突出的歷史特點，就在於它完全是以這套東西作為意識形態和模式而自覺地、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構建起來的。上個世紀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蘇東巨變則標誌著這套東西的徹底破產。「有些共產黨的政治家、忠誠信仰者和理論家認為：蘇東事變並不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根本失敗，只不過是一種局部性失敗、暫時性挫折而走向了它的低潮時期。是這樣嗎？不，不是的，絕對不是這樣的。蘇東事變，是一種全局性的、不可逆轉的、永劫不復的失敗，標誌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徹底失敗，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徹底崩潰。」而晚年恩格斯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則代表著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自我修正、成熟發展的新階段。王老稱

為,「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和理論家,直接繼承了恩格斯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繼續領導了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就是他們最傑出的思想家代表。歷史已經作出了公正的選擇和判決,無疑地,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已經出局,民主社會主義卻正在並繼續顯示它的生命力。」就中國而言,文革後胡耀邦給億萬「政治賤民」摘帽平反,事實上抽掉了「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專政對象。「沒有了專政對象,專政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專政對象消失了,無產階級專政存在的基礎瓦解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周老原是經濟理論專家,也是基於時代的召喚,在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位置退下後,開始傾全力研究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並於近年推出《中國民主建設研究報告》,這是一個由中共黨內人士提出的、具有相當理論深度和實踐操作價值的重要文獻。當我向周老建議把這個研究報告的部分內容納入這次為紀念耀邦而作的文章中時,周老欣然同意。周老認為,「我們今天緬懷胡耀邦,最好的辦法,是繼承他的遺志,把他一直關心和倡導的民主化事業推向前進,把中國實現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政治改革推向一個新階段。我認為,實施憲政,建立民主政治,實現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標,也是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和歷史趨勢。」周老的文章列舉了民主政治的若干基本通則,著重分析了中國民主化應該爭取的長期目標和近期目標。「長期目標當然指按民主政治的共同遊戲規則,全部達到民主政治的各項要求,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達到或者沒有達到,這不能由哪個人說了算,而是按照共同的遊戲規則進行衡量。也就是說,不管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還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只要是實行民主政治,就必須做到:1. 少數服從多數,又保護少數;2. 人民代表和政府負責人要通過選舉,包括差額選舉、競選執政,有時是一人一票的直選;3. 多黨制或一黨多派制;4. 三權分立,權力制衡;5、實行自由平等原則,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各種自由;6. 實行嚴格的法制和法治;7 人民議政

參政；8. 軍隊國家化；9. 實行自治，包括民族區域自治和群眾自治。做到以上各點就算實行了民主政治，達到了民主政治的長期目標。」近斯目標則是指近期經過努力可以達到的那些東西，要有路線圖和時間表。「我意可以先易後難，由低級到高級，一步一步地來。先實行鄧小平已經提出過的，後實行鄧小平還沒有提出過的：先實行已取得共識的，後實行意見分歧大的。譬如：先允許言論自由，讓人民群眾有「話語權」，能自由地發表意見，能使每人說真話，做到思想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再進而允許結社自由，成立新的黨派，和共產黨展開競爭。應該說，做到第一步是容易的，它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權，影響一黨專政。它不過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讓大家說說話而已。大多數人是好心的，可以建言獻策，為國家出主意、想辦法，排憂解難，化解矛盾。這有利於國家加強執政能力，有利於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周老強調：「一個明智的政治家不會不搞政治改革，也不會忽視黨內思想派別的客觀存在，更不會動用國家機器'採取「專政」辦法消滅政治異見者。在台灣，統治者尚知吸取教訓，面對歷史上的慘敗與大陸和平統一祖國的呼聲，勵精圖治，並適應人民的民主要求，解嚴開禁，允許多黨競爭，而不致重蹈歷史覆轍，不敢實施專制獨裁統治。中國內地已今非昔比，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已日益增強，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更臻成熟。只要今日執政黨的當權領導人，能拋棄個人的權位觀念和私心雜念，順應歷史潮流，做到民意至上，那麼，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實行民主政治，是大有希望的。」

以上是對12篇大作的一個基本介紹。我們已經大致領略了這些老共產黨人、老前輩的寬闊胸襟。當然，更仔細的閱讀後讀者會發現，在總的立場、價值判斷大致接近的前提下，各篇文章的觀點也有不盡相同之處。在一種開放的討論中，這是完全正常的。重要的是，它們如實記錄了一代老共產黨人的反思，關於耀邦，也關於這個時代。還是那句話，我們這個民族總是要向前走、向前邁進的。如果說《零八憲章》是民間自由力量為中國轉型做出的努力，那麼黨內民主派的努力，本書就是證

明。它們都代表了一種偉大的歷史擔當精神。

我願意把這些可敬的老共產黨人的真誠反思推薦給讀者，並相信，在紀念耀邦先生逝世20周年之際，對本書的閱讀會成為我們每一個人一次重要的心靈之旅。

（本文完稿於2009年3月16日）

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

——紀念耀邦逝世20周年

李　銳

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剛剛走出「文革」動亂，卻依舊被極左陰霾和桎梏所籠罩禁錮。衝破陰霾和打破桎梏的，是胡耀邦發動、領導和全力推動的振聾發聵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和冤假錯案的大平反。他以非凡的勇氣，破冰般打開思想解放的局面，掀開了改革開放大潮的序幕。今年4月，是耀邦逝世20周年，我謹以此文向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緬懷。為什麼用這樣一個題目呢？還是借用魯迅的說法：中國自古以來，專制王朝，老百姓當慣奴隸，少數官員效忠當奴才。過去共產黨是必須當馴服工具，群眾學雷鋒當螺絲釘，少數奴才們助紂為虐。

不正常的黨內生活

要談胡耀邦，不得不先談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任何黨員都是黨的馴服工具，這個觀念深入人心，也作為組織原則貫徹下去。作為一個實質上的農民黨，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締造者。毛澤東這個人很複雜，毛的周圍有一幫人。

毛澤東最喜歡的人是高崗、林彪和鄧小平，曾打算讓高崗當接班人。高崗有他的本事，屬於「綠林豪傑」，毛很欣賞。我當過高崗的政治秘

書，他喜歡下圍棋，晚上同我下棋是從不接電話的。離休後我負責編中共組織史資料，從打AB團起，10年內戰肅反，自己殺自己人，殺了10萬。延安時期搶救運動打了1萬5千個特務，但事實上一個打入黨內的特務都沒有。我問過黃克誠，在江西時他就感到，毛有兩個毛病：一是脾氣太壞，二是任人唯親。井岡山下來在福建選前委，多數人投陳毅的票，毛澤東就甩手不幹了。後來陳毅去上海找周恩來，周讓陳趕緊把毛請回來。如蕭克沒投毛的票，毛對蕭一直記在心上。

沒有林彪的吹捧與參與，「文化大革命」可能搞不起來；「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就垮了。後來接班的鄧小平，其實也是半個毛澤東。1989年「六四」風波，出動軍隊鎮壓學生運動，這種連毛澤東活著都不可能幹出來的事，鄧小平卻幹了。「六四」期間，他聽信李鵬和李錫銘謊報「學生動亂」的讒言，要實行軍事戒嚴，蕭克、張愛萍等7位上將聯名上書反對武力鎮壓，他毫不理睬。

總之，80年代的局勢對耀邦來說，很難辦，上面兩個老人壓著。鄧小平贊成「權威主義」，他認為中國總得有「一個人說了算」。耀邦告訴過我，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政治老人的關係，按鄧小平的話說，是「談不攏」，胡耀邦在位時，就開不成常委會；「只能有一個婆婆」，這是鄧小平讓薄一波向陳雲傳達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在經濟上比較堅定，如成立「特區」，這是一個創舉。而陳雲仍堅持「鳥籠政策」，這是原則性分歧。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不管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為既往的正統理論所限制，敢於突破，這是有極大功勞的。而陳雲仍跳不出舊框框，1989年，中顧委發了個「一號文件」，刊載了陳雲同趙紫陽、胡啟立、李瑞環1987年以後的談話，他說：「列寧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對「六四」風波，陳雲則有自己的看法。當時在中顧委，我們四個人（杜潤生、李昌、于光遠和我）反對鎮壓，幾個月批鬥，將要開除黨籍，是陳雲挽救了我們；他說，這種事不能再幹了，否則，以後還要平反。

陳雲對胡耀邦有看法，認為他在人事上用「青紅幫」（青年團、紅衛

兵）。1989 年初我已經 65 歲，決定在電力部退下來。這時陳雲要我到中央組織部組建青年幹部局，意見極其堅決，促我上任，還誤會我是「能上不能下」、不願當局長。於是我只好服從，於該年 3 月調入中央組織部。上任後我只見他一次，見了面就說要「頂住」，言下之意就是頂住胡耀邦。1987 年耀邦在「生活會」上被以前的戰友王鶴壽揭發，非常傷心，他曾對王鶴壽講過一些心裏話。王鶴壽的侄女後來向我透露，揭發耀邦是陳雲的命令。

除了兩個老人，當時還有兩個「左王」看不起他，在兩老之間講閒話，一個是胡喬木，一個是鄧力群。

胡喬木這個人，「一日無君則惶惶然」。改革開放以後，主要在意識形態上，胡喬木仍堅持毛澤東「政治掛帥」的路線，實質上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不過不明說罷了。他是個兩面派，真正的兩面派，今天這樣明天又翻過來。我跟胡喬木的淵源很深，對他比較瞭解。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的時候，曾收集了毛主席 20 幾篇舊作，印了 50 本，給中宣部 1 本，胡喬木要求全部上交，責備我「此種事，有害無益。」我少年氣盛，寫了一本《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1952 年我調到北京的時候，他給我打電話，居然又要我到中宣部管黨史。沒有他支持，《廬山會議實錄》也出不來啊！張聞天紀念文集出版前，夫人劉英寫信要我寫篇文章，後來胡喬木把書的主編叫去加以訓斥：「你幹嘛讓李銳寫文章?」主編說是劉大姐讓寫的，他才不吭聲了。像胡喬木那樣的人，不當奴才不行啊！他願意當奴才，因為有好處。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這種人物。

1986 年，鄧力群把陸鏗同胡耀邦的訪談交給鄧小平，引起鄧的震怒，這也成為 1987 年 1 月「生活會」後胡耀邦下臺的一根導火索。1987 年春，陳雲讓王震等人活動，把鄧力群抬出來當總書記。我在 1987 年 7 月 11 日給鄧小平、趙紫陽寫了一封信表示反對，除了揭發他抵制改革開放外，還述及他在延安搶救運動時犯的一件嚴重政治錯誤。鄧小平 14 日批示，撤銷鄧力群的職務，陳雲、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畫圈了，制止了這個危機。

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趙紫陽合作比較融洽，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對全面改革卻有不一致的看法。那兩個「左王」趁機在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中穿梭，大進讒言。這兩個「左王」對改革開放起了很壞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後又批「資產階級自由化」。清污只搞了 28 天，幸好被胡、趙聯手制止了。

1987 年的「生活會」上，耀邦被迫作了檢查，聽說離開會場後即失聲痛哭。一個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傷心透了，是不會這樣大哭的，尤其是在這種場合。他在擔任總書記時就說過：我尊重老人，又獨立思考。他盡力在兩位老人之間溝通協調，遇大事必請示，同時還要面對兩個「左王」的明槍暗箭與各種阻撓，最後遭到兩方面夾擊，個人事小，全局堪憂，他怎能不放聲大哭！

胡耀邦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胡耀邦是紅小鬼，十四五歲就參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他碰到第一件事是打 AB 團，幾乎喪命，此事終生難忘。此後歷次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他都盡可能予以抵制或在力所能及範圍內做有益之事。耀邦歷來對「政治掛帥」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歡搞條條框框，堅守言行一致。「大躍進」失敗後，1960 年就主張恢復長途販運；他曾公開講話：「衣食足而知廉恥，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能飽肚子」，不怕被扣「修正主義」帽子。

胡耀邦能在共產黨內出現，非常了不起，戰爭年代出來的人，服從慣了，更不容易了。他獨立思考，他不當奴隸，更不願意當奴才。延安搶救運動時，到處大抓特務，他當時擔任總政組織部長，自己做了個試驗，找幾個絕對沒有問題的年青人，一逼供信，就都承認是特務了。於是他立即找毛主席說，不能再幹這種事情。這是他親口對我說的。

5 年前，耀邦去世 15 周年時，幾位團中央的老同志編寫《胡耀邦傳》，我為這本書寫過一個序言。這個序言裏提到：

1950 年到 1952 年，擔任川北黨政領導時，耀邦親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約」；土改中實行保護富農和對地主的溫和政策；不許農民亂罰亂鬥，進城抓人。當年鄧小平這樣評價他：「有主見，不盲從。」

1952 年到 1966 年，他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提倡八個大字：「朝氣蓬勃，實事求是。」他說：「實事求是就是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要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不弄虛作假。要有實幹的精神，言行一致，表裏如一」，他認為執政黨尤其要這樣要求。戰爭年代，形勢逼得你非實事求是不可；執政以後，即容易自以為是，走向反面；堅持實事求是，必須深入實際，尤其需要民主制度和黨的紀律的保證。

1954 年 10 月，《中國青年》編輯問他，「怎樣理解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耀邦回答：「無產階級不是只講革命，只講鬥爭，它也講愛心，講人情味，講對同志、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尊重、關心和愛護。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才是可愛的，人們才能從中感受到更多的歡樂和溫暖。」

1957 年反右派時，他不在國內；回國後，對團中央打的右派進行安慰。他同我談過，生平憾事，對項南和蘇進沒有保護好；兩次自責，批鬥彭德懷時沒講公道話，開除劉少奇黨籍也舉了手。

1962 年下放湖南幫助工作兩年時，他親自到瀏陽、醴陵、平江的生產大隊蹲點。四清運動開始，對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驟都作了規定：凡屬集體瞞產私分，不做處理；手腳不乾淨的，公物歸還，不搞坦白檢舉；群眾向幹部提意見，只「背靠背」；同時號召「一手抓生產，一手抓運動。」湘潭地區因此沒有發生亂鬥和影響生產，大家都滿意。

1964 年 12 月到 1965 年 6 月，在陝西第一書記任上，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四清運動越來越左時。他以大無畏的精神，開展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寬政策、搞活經濟」為主題的超前民主改革，糾正社教運動中侵犯人權的錯誤作法。發出這樣的號召：「社教運動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維護人權，尊重風俗人情」；「民主要過硬」；「領導人要聽反對

的話」。他強調「生產好不好，是檢驗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標誌。」同時，恢復集市貿易，允許短途運輸，發展鄉鎮企業，提倡植樹造林（誰種歸誰）。當年在西北局的領導下，陝西「左禍」特別嚴重，耀邦本人被葉劍英保護先行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則受到十年迫害。

耀邦在「文革」中始終是清醒的。初期同團中央幾位書記同舟共濟，每天有幾千上萬人來揪鬥他們。有人揭發他反對毛主席，說過「太陽也有黑點」；反對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說：「游泳時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嗆水」；他說過「康生一貫左」。他只承認學習不夠，工作有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有次在長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紅腫。他認為毛澤東驕傲了；「不讓權，不做自我批評的。」「驕傲害死人呀！」他曾歎息「搞了八年還看不到頭」，「多行不義必自斃」。

文革後期，耀邦負責科學院工作，主持起草了《彙報提綱》。根據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從而否定了「知識私有」、「白專道路」等錯誤提法，並作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新長征」的報告。後來在「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這《彙報提綱》成了集中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殘酷鬥爭。

由於上述這些事例，我們知道耀邦一生歷經革命磨練，特別注重理論實踐的結合，尤其看重實踐效果，因而能抓住過去黨和毛澤東屢犯錯誤最終走上文革絕路的癥結，那就是毛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做法，從政治、經濟到文化、思想的絕對統治，名為無產階級專政實為一黨專政，一黨專政又變成了領袖專政。

耀邦對中國問題的反思

從投身革命到最後辭世，胡耀邦在黨內生活了 60 年。對這段漫長而沉重的歷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對當代中國的痼疾，他有透闢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結果，使他形成了許多反映和順應人類文明主流的思想、

觀點和理念。耀邦認為，黨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絕對不能迷信任何人，而應該獨立思考；黨和國家生活應該正常化、民主化、法治化，必須杜絕家長制、一言堂、一個人說了算；要愛護知識分子，盡力發揚知識分子的才能；應當重視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則，吸取人類文明共同的優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他提出和實施的許多政策主張，尤其堅持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同步，都體現出一種超越原有意識形態的人類普適價值。即便發生 1987 年的「辭職事件」後，他的思考仍然沒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一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從人類文明的視野，來思考國家、民族、政黨的前行方向，過去在我們黨內，確實是鮮見的。

1979 年 3 月 25 日，西單民主牆出現《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中國人權宣言》等大字報，隨後作者魏京生等被捕，耀邦就極不以為然。他給一位青年寫了一封公開信，在《人民日報》4 月 10 日頭版發表。信中說：「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壓，不是抓，應該是「引導」兩個字。「引導」比「教育」更精確，意義更大。這是我們幾十年工作的經驗總結。壓制的方法，一個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長的辦法。」隨後 6 月間，他又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的發言中，更加嚴正地對取締民主牆和逮捕魏京生等人發表了意見：「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儘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至今沒有作過檢討。聽說他現在還在絕食。他一死就會在群眾中成為烈士，是人們心中的烈士。」（請問，我們現在還能在中央的會議上聽到哪個領導人發出這樣的聲音嗎?）耀邦當時還主張成立一個民主公園。後來，北京市雖然將月壇公園定為民主公園，由於政治形勢影響，無疾而終。當年黨內老人支持耀邦的只有葉劍英。葉說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

範。」

除了獨立思考外，耀邦還很喜歡讀書，重視讀書，在延安毛澤東就曾誇獎他「思想敏銳、口若懸河」。雖然他只讀過一年初中，但他善於博覽群書，讀過《馬恩全集》，也讀過《聖經》。他做報告不念稿子，會寫文章，會作舊詩，字也寫得好，因此被陸定一稱為大知識分子。他常講要愛護知識分子，並盡力保護他們當中挨過整的人。「文革」後堅決反對過去整人的那一套，主張真正實行「雙百」方針；不是停在口頭上，而是認真貫徹於一切方面，要見諸行動。1987 年下臺以後的兩年，耀邦更是積極地讀書，要把人類的這些事情搞清楚。而毛澤東就不同，他不喜歡知識分子，稱為「皮上之毛」，甚至說「知識越多越蠢，越多越反動。」要知道科學知識及其載體，乃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耀邦是理解這個道理的。

無論處於何種位置，耀邦總是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他喜歡隨意交談，講心裏話，能虛心地聽人家的意見；他是一個講人格、講人性、講人情的人。耀邦在工作中重視實情，常往下跑，曾經發誓要走遍全國兩千多縣（大概完成了一多半，此舉卻受到譏評）。晚年後雖然身體不好，他還去西藏考察。

當然，胡耀邦有他自身的缺點，就是天真。我問他當年為什麼要做檢討，他說，我要照顧這個家啊！到了形勢最危急的時候，他不認真反抗了。另外，他身邊沒有得力助手；趙紫陽跟他就很不同，趙有智囊團，緊急關頭，他找人座談求教。耀邦同我談過這樣一件事：胡喬木寫信給他一個建議，喬木是完全錯了，他復信說明，還把原信退回，並沒有留在手中當作把柄。雖然他遇事總要深思熟慮，但有時過於熱心，講話多了難免有失。他不弄權術，從不設防，有時遭人暗算而不覺。他是一個非常寬厚的人，「文革」後他的「多換思想少換人」的幹部政策，引起過別人的意見。

「文革」以後，無論是開理論務虛會，尤其徹底平反冤假錯案，除了胡耀邦，黨內很少有人能如此大幹。之後，不論遇到何種干擾，他總是

堅持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同經濟改革同步；他認同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規律，強調必須走民主、科學、法治之道；他力促輿論開放、言論自由，反對「左爺」們的種種陰謀干預。胡耀邦唯一的缺點就是不懂得保護自己，這很可惜，他不懂得自己對這個國家的重要性，而且他下臺以後也影響到了趙紫陽。對老人的心計，他估計不夠。

推進改革，完成耀邦的遺願

胡耀邦去世，是中國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為師、為友、為長者、為楷模的人很大不幸。但中國出了個胡耀邦，共產黨裏出了個胡耀邦，這又是中國的大幸。

胡耀邦否定「文革」最徹底，在「真理標準」的討論中最堅定。他認為黨不能再受「左」的危害，對於「左」禍肆虐的記憶可謂刻骨銘心。他重視自由、民主、人道，熟悉西方的發展歷史，很願意接受外來的新思想。他對毛澤東的認識是全面的，在「文革」時便不盲從，常說絕對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獨立思考。他力主黨內生活正常化、民主化，應健康發展，一定要避免過去搞家長制、一人說了算的錯誤，並主持了「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的起草。

1989 年 4 月 20 日，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大會上對耀邦一生作了評價，悼詞是經過鄧小平和中央負責同志討論過的，還是比較公正的。但由於 1987 年 1 月「生活會」上強加給他的那些不實之詞，以及迫使他下臺的做法，曾使得黨內外廣大黨員和群眾為之憤憤不平，以致後來引發了「六四」政治風波。對胡耀邦的作為，要有一個全面公正符合實際的總結，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也是關係到我們黨在國內外公眾中的形象問題。如果不能正確認識昨天，也就掌握不好今天和明天。

今天，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已不在了，兩個「左王」的干擾也不存在，這是一種便於與世界同步前進的好形勢。第二個「歷史決議」對

毛澤東晚年錯誤做過總結，對鄧小平也應當照此辦理。這樣，進一步全面改革開放的路就會好走一些。

經過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但代價太大，單位能耗和對資源、環境的破壞也居世界前列。中國現在的經濟總量大概占全世界的15%，可是我們用掉的煤炭大概占世界三分之一。更可怕的是貪污、腐敗愈演愈烈。現在全國人口的。4%掌握了全國財富的70%，貧富懸殊比美國還要厲害（美國5%的人口掌握占60%的財富）。大大小小的腐敗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結，使共產黨淪向了一個利益集團，構成了新興的權貴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近幾年來，中央領導人陸續提出了「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物質、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治國方針，這些善良的願望明顯優於30年前的「四個堅持」，但要真正落實，前提是不能再走一黨專政的老路，必須按照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價值規律，即自由、民主、法治、憲政來治國理民。這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老大難的問題，對它的解決不能再猶豫不決了！政治體制改革千頭萬緒，我建議首先從開放言論自由、實行輿論監督，和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幹部個人收入、家庭財產申報、公示人手；必須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以法治國，實施憲政。「唯一懸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這是我88歲自壽詩中的尾聯。現借此文，再次呼籲，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的合法性計，為國家、民族和天下蒼生計，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時不我待！

胡耀邦的辭職和辭世，是上個世紀80年代帶有濃烈悲劇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觀點，迄今還有許多沒有付諸實踐，尤其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引出了許多危機。但是，無論如何，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對於一個在通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艱難跋涉的民族和國家來說，擁有這筆精神遺產也實為大幸了！

（2009年2月）

要自由民主？還是專制壟斷？

——紀念胡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

胡績偉

「文革」以後，新的一代領導人著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開始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前進。作為80年代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就是其中一位非常傑出的領導人。他在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的在任期間，與當時「左」的勢力進行了持續鬥爭，於1987年被迫離開了領導崗位後鬱鬱寡歡，1989年4月溘然離世，留下了諸多的遺憾，也在人民心中留下了難以泯滅的崇高形象。時值紀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之際，我撰文謹向這位優秀的領導人表示深切的緬懷。

從我和鄧小平的三次交鋒談起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路線是自由民主的路線，一條是專制壟斷的路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他實行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路線，追求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後者的代表人物是鄧小平，他搞的是一個專制壟斷的社會。以前對鄧的評價就是集權專制或獨裁專制，我的看法卻稍有不同：集權專制主要指政治上的專制，但鄧小平不僅在政治上專制，對整個政策，對政治、經濟、軍事、思想都是專制的，「壟斷」一詞比較全面。

作為這兩條路線鬥爭的親身經歷者，我以本人和鄧小平直接交鋒的三次經歷為例，簡要地說明「專制壟斷的社會」究竟是什麼樣的。

第一次交鋒，發生是 1979 年 6 月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當時，我既是四川代表團成員，還是主席團成員，鄧小平則是主席團的領導小組成員。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我做了一個《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發言，中心思想就是：民主是一個國家制度，不是一種作風。要依法保障人民享有管理國家的權利，如選舉權、監督權和罷免權等。我還在發言中對汪東興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當時人民住房很緊張，可身為國家領導人的汪東興卻嚴重違反黨紀國法，利用職權，在中南海內非法耗費國家大量資金，為自已和子女修建豪華住宅，建築面積達 5387 平方米，每平方米造價達 1286 元，比人民大會堂和北京飯店的造價還要高出一倍以上。據估算，這個錢如果用來修居民樓，可以解決一千戶人家的住房問題。我提出，這種違法亂紀的行為，發生在我們主席團的成員中，應該予以罷免。這個發言得到了其他代表的擁護，可是鄧小平卻批評我：「這是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名單，你還提意見?!」他還把這個發言印發到各個代表團，惹得大家議論紛紛。事實上，邓小平這種說法是不對的，雖然人大的所有文件都經過政治局批准，如果經過批准而不能討論，那就不要列在議事日程上去。既然列到議事日程上去，那就是要大家討論提出意見。我這麼說，他也不說什麼話，也就算了。其實，我這個發言不是代表我一個人，而是代表了三個人，還有我們人民日報的人大代表王若水、政協代表余焕春。「對汪東興實行罷免權」，這個話，不僅我在四川代表團講，王若水也講，余焕春在政協也講。我講得很簡單，他們講得很具體，比如豪華住宅的防震牆玻璃是多少層、花多少錢等，結果影響很大。這樣一來，就引起中央的注意。以後的一個會上，汪東興就不能不做檢討，接著中央撤銷他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他後來提出辭去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也獲得批准。汪東興的問題算得到了解決，說明我的發言是沒有錯的。

這是我和 104，平的第一次交鋒。從這件事我看出：第一，在邓小平

眼裏，人民代表大會僅僅是個橡皮圖章，不用討論，通過就行；第二，官官相護，維護貪污腐化；第三，鄧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在提出「兩個凡是」以後，汪東興是積極擁護，而且處處打壓反對「兩個凡是」意見的急先鋒，即使犯了嚴重的貪污罪行，鄧還是保護的。從這一點也看出鄧的政治立場。

第二次交鋒和 1981 年批判白樺的《苦戀》有關。當時的《人民日報》明確表示不參與批判，於是《解放軍報》就寫了一篇文章批，胡喬木還幾次催促我要《人民日報》轉載。我和幾位負責同志交換意見後一致認為，軍報這篇，還是使用文革時期大批判式的調子，扣上什麼「反社會主義」、「賣國王義」之類的政治帽子，很多文藝界的人士看了之後都很反感，所以《人民日報》不登。其實，《苦戀》這篇小說裏無非說了這麼一句話：「我愛祖國，可祖國不愛我。」後來胡喬木就向鄧小平告狀。鄧小平召集了當時的文聯主席周揚、中宣部副部長朱穆之、新華社社長曾濤，還有我，一共四個人，當面責問我為什麼不登。我說，那篇文章完全是一種文革時期「扣帽子、打棍子、無線上綱」的那一套，我們不轉載。周揚、朱穆之、曾濤也同意我的看法。我還說，儘管他這個話不完全符合事實，但到了沒有飯吃、只能去河裏抓魚、吃生魚的地步，在這種條件下說出「我愛祖國，可祖國不愛我」，也情有可原，只能說作家在寫作語言上考慮不夠周全。鄧小平就抓住這點說：「既然有不夠的地方，咱們還是可以批判的，你們人民日報自己寫一篇。」周揚就出來承擔責任，說這是作家出的事，應由文聯負責寫一篇文章進行批評教育，然後交《人民日報》發表。這樣一來，鄧小平也不能不同意，但他最後又講了一段話，認為現在文藝界思想混亂，反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還很嚴重。他還以詩歌《將軍，你不能這樣做》、話劇《於無聲處》等文藝作品為例，認為這些都是傷痕文學，「文革」都已經過去了，不應該再把這個話題拿出來。

這裏，鄧小平此時已經提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且他把傷痕文學歸罪於中央領導的軟弱渙散。那時的領導人主要是胡耀邦，這話

的矛頭自然也是指向他的。從這裏可以看出，鄧小平是一個要搞思想統治、思想壟斷的人，而提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也是毛澤東的繼續。這說明從那時起，鄧小平已經提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張，而且已經開始認定胡耀邦是支持自由化的，已經對耀邦定下了以後趕他下臺的罪名。

第三次交鋒發生在1981年3月。當時胡耀邦組織《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規定了今後的方向應該是反「左」為主。這篇文章發表以後，鄧力群就叫他的秘書向中央告狀，說這篇文章只講反「左」，不講反右。於是鄧小平就說，這篇文章有很大的偏向性，應該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我當場就頂他，我說，小平同志，你這個話也對，但不全面。毛澤東在《矛盾論》裏講過，任何時候都有主要矛盾，領導人應該抓主要矛盾，在反「左」反右的過程中，反「左」應該是主要矛盾。我還列舉了鄧小平、陳雲已經講過的主要講話，用子之矛反對子之盾。我這樣一說，他也沒辦法再說，只好承認。後來，鄧力群在會議後組織人起草會議紀要，用了很長的一段話引述鄧小平的「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講話，好像《人民日報》這篇社論還是錯了。鄧力群叫他的副主任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雖然這篇社論是胡耀邦組織的，但勸我應該把這個責任承擔下來，不應該把責任推到胡耀邦身上。這個話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意思就是讓我把這個責任推掉。我對他說，《人民日報》登的東西都由我來負責，如果是錯了，我當然要承擔責任，更不會推掉。況且這篇文章本身沒有錯。他們把紀要原稿給我們看，我們都不同意，這樣對胡耀邦的個人影響也不好。當時華國鋒還是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是秘書長，大家都在推胡耀邦當總書記。我說，你們在這個時候發這個紀要，會產生很不好的影響。這就把鄧力群揭露了。他後來也把這個通報壓下來。鄧力群之所以這樣做，實際上體現了鄧小平的意見，要反「左」也要反右。

這次會後，我發現鄧小平是一貫的「左」傾。「左」傾這個問題太複雜了！但是，簡單地說，就是如果跳過資產階級革命而直接搞社會主義

革命的，就是「左」，這已經成為一個共識。毛澤東的主要錯誤是「左」，不是右。在1972年，周恩來傳達林彪的錯誤就是「左」傾，江青他們就反對，王若水寫了一封信問毛澤東，林彪是「左」還是右，毛澤東最後說林彪是右，右得不能再右了。這說明「左」右之間的鬥爭歷史比較長久，直到今天，是反「左」為主還是反右為主，仍然是一個問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反右，鄧小平後來說50年代末的反右是「擴大化」，胡耀邦剛頭著手平反冤假錯案，結果發現百分之九十都是錯的，那你怎麼說是「擴大化」呢?!在寫「九評」的時候，寫作組的領導人是鄧小平，他的極左思想和毛澤東是一致的。那個時候《人民日報》發表了幾篇文章批極左，但也不敢直接批，而是批假右真「左」。

胡耀邦後來的罪狀就是「一手軟」，「一手硬」。「一手軟」指的就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活動的縱容。從1979年西單牆到1980年北京大學的選舉、1986年中國科技大學和上海的學潮，胡耀邦的罪名是在領導精神文明建設時「軟弱渙散」。(關於鄧一貫反右的問題，我有專門文章，這裏不多說。)

兩條路線的鬥爭：是自由民主？還是專制壟斷？

胡耀邦和鄧小平代表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一條路線是自由民主的路線，一條是專制壟斷的路線。

這兩人之間長達十年的鬥爭，首先表現在思想言論自由方面。我用一個很形象的說法形容耀邦同志是一開始就插上了兩個「騰飛的翅膀」，自始自終都堅持思想理論研究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而鄧小平卻在意識形態方面搞專制壟斷，一開始請來了兩個老謀深算的狗頭軍師作為左右助手，專門打壓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胡耀邦批判「兩個凡是」，但鄧小平復出給中央的信卻講的是：「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

共產主義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這裏面有好幾個「凡是」。鄧小平以後還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其實這就是四個「凡是」。我們就比較隱晦地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針對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提出是人民民主專政；針對堅持黨的領導，我們提出的是：只有改善黨的領導，才能堅持黨的領導；針對堅持社會主義，我們提出有真社會主義和假社會主義；針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提出毛澤東思想有正確的、錯誤的思想。這些亮出爭論的鮮明主題的文稿，都是胡耀邦推敲、審查、批准發表出來的，在當時影響非常大。

民主和專制兩條路線的鬥爭，同時還表現在經濟政策上。在 1979 年 10 月發起關於「生產目的」的討論中，胡耀邦強調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人民，不是為了生產而生產，不能「以鋼為綱」，也要注意輕工業和服務業，不能忽視人民的生活。1981 年 4 月，他發起了「人民群眾是主人翁」的討論，對「包產到戶」表示支持，一直到完全取消人民公社為止。在這些討論中，鄧小平的勢力卻多次出來阻撓。例如當時有個張浩事件，讓當時在安徽的萬里很被動。後來萬里調到北京分管生產，這才逐步把包產到戶推廣開來。胡耀邦支持搞承包，還提出要發展農林牧副漁，胡喬木就公開表示反對。他給廣東省委寫了一封信，說魚塘承包是搞資本主義，讓當時的省委書記任仲夷給頂住了，他寫了個調查報告給中央，說喬木這個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人民日報也發文章表示支持。這時，鄧力群又把馬克思搬出，說社會主義不能雇工，但事實上鄉鎮企業早已雇工。胡耀邦新官上任三把火，平反冤假錯案、真理標準討論、支持包產到戶、廢除人民公社，功勞很大。

這裏須糾正一下，現在紀念改革開放，都在說搞特區是鄧小平的功勞，我認為這是不符合實際的。1977 年冬，我去深圳，當時我站在分界線的山坡上，看見我們這邊是一片荒涼，而那邊的香港卻是一片繁榮。當時廣東的負責人是習仲勳，他提出應該學習香港。在當時有一個很大企業的骨幹人物叫袁庚，主張在靠近深圳的地方開闢一個自由港口，也就是蛇口工業區。習仲勳讓我去那看一看。吳南生在一個帳篷裏接待我，

他把蛇口的規劃講給我聽。後來蛇口工業區慢慢發展成為深圳特區。特區這是習仲勳、任仲夷他們先搞的，不是鄧小平一個人的功勞。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壞的傳統：就是一切的好事都是領袖幹的；一切好話都是領袖說的。雖然鄧小平主張特區發展經濟，但是規定這是經濟特區，不能搞政治特區。原來計劃是要把香港的經驗慢慢引進來，但僅限在經濟領域。後來深圳特區發展很快，胡喬木就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去看，回來得出一個結論：特區除了國旗是紅的，其他都是白的。他對特區很反感。後來中央決定要擴大沿海五個特區的時候，胡喬木又出來反對。他寫了篇文章，叫《中國的租界是怎麼來的》。要知道，租界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但現在的特區是我們自己搞的，怎麼能相提並論?！後來海南變成了特區，有關部門又劃出一塊地方——博鰲，讓資本主義國家到此投資，胡喬木就說這是賣國主義。胡喬木罵特區，其實是附和鄧小平的意見，因為鄧是不許引進資本主義所有先進東西的，只是引進經濟領域中一些先進的東西。他把市場經濟叫做商品經濟，但市場經濟一直到今天還是政府干涉市場，市場還沒有完全的自由，所以國際上還不承認中國是個市場經濟的國家。

總的來說，胡耀邦和鄧小平的區別主要有兩點：胡耀邦主張全面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時進行；鄧小平是搞跛腳改革，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且把政治改革都批判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讓八億農民先富起來，是富民政策（他在貴州的一個講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鄧實際上是先讓有權有勢的人先富起來，對一些私營企業先富起來卻受到了國營經濟為主的種種限制。所以那些「先富起來」出現了嚴重的暴富。現在全國上下貪污腐化日趨嚴重，已經形成權貴資產階級，是富官政策的結果。

在鄧小平看來，發展就是硬道理，只要經濟發展了，不用管其他。事實上，僅僅盯著生產總值的提高，這是不可取的，在貌似繁榮的下面，隱藏了許多矛盾，如兩極分化等。鄧小平認為，只要把經濟搞上去了，

其他都沒關係，並且用經濟發展來壓倒政治改革。他所謂的對外發展，重點是依靠國外，弊端也很多。

保守勢力戰勝胡耀邦的六大法寶

在整個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的「左」和右的勢力此消彼長，鬥爭激烈，社會也在偶爾的停滯中發展，總算也有成就。令人遺憾的是，以鄧小平為首的勢力卻在最後能戰勝胡耀邦，他們靠的是什麼？我總結了他們的幾大法寶，分述如下：

第一，靠老教條。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毛澤東思想，還有 80 年代以後成為最大教條的四項基本原則，經常成為那些保守派用來打壓對手的「尚方寶劍」。

第二，靠老資格，什麼事情都是一個人說了算。鄧小平仗著自己在黨內的老資格，當共產黨這個家裏的最大的「婆婆」，專斷獨行。

第三，靠大批判。無論是批周揚，批王若水，批我的「人民性」，還是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無不扣以大帽子，用的儘是「文革」時期那一套政治手段。他們搞政治迫害，無法無天。比如在 1979 年的理論務虛會上，胡耀邦的發言是經過我們這些主席團成員通過的，但會議最後鄧小平作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連會議領導與組織者的胡耀邦事先也不知道。

第四，搞宮廷政變。1987 年召開的「生活會」，胡喬木、鄧力群等一干人在鄧小平的授意下猛烈攻擊胡耀邦，要求其做檢討，把他逼下臺。事前不知情的習仲勳當時就明確表示，這是不合乎程序的做法：「你們沒有權力討論總書記的去留！」

第五，搞陰謀詭計。1985 年胡耀邦做了《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我們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但因為當時胡耀邦要出國，他就把各種意見統統交給了時任人民日報社社長的秦川，要求秦川先進行修改，等

他回來再討論發表。但胡喬木不經請示就把稿子先拿到《紅旗》雜誌發表，然後讓全國廣播，逼著《人民日報》也不得不登。這篇講話在海內外造成了很壞影響，一直保持開明形象的胡耀邦，也受到了很大影響。喬木這種搞法弄得耀邦有口難言。

第六，搞武裝力量。「文革」以後，鄧小平一直表示不擔當黨政主要領導職務，但軍委主席一職卻無論如何是要當的，因為只要掌握了軍權，就掌握了國家。1987 年十三大通過決議，鄧小平任軍委主席。時任黨的總書記是趙紫陽，國家主席為楊尚昆，任軍委副主席。這樣，鄧小平居然凌駕在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上，後人恐怕是難以想像的。「六四」以後，曾有人指責是楊尚昆命令讓軍隊鎮壓人民，楊尚昆喊冤，「我有什麼權力調動軍隊啊！」鄧小平才是最後拍板採取武力對學生進行鎮壓的人。

「六四」以後，還搞了兩次大的政治運動，一是清查運動，二是黨員重新登記（也叫清黨運動）。當時有四個人，于光遠、李銳、杜潤生、李昌，胡喬木不讓他們保留原來的黨籍。最後陳雲表示不同意，這才把這四個人保了下來。這兩個運動整了一大批人，一大批被那些保守派視為眼中釘的同志。但究竟整了多少人，現在沒有人進行研究和統計。

回到新民主主義道路上來

2007 年，謝韜提出中國應該走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人民日報》刊文表示反對。我左右尋思，感覺使用「新民主主義社會」一詞更為合適，雖然多少有些萬不得已。

自 1912 年滿清倒臺以後，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個話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在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時候就已經講過。延安時期，特別是六屆六中全會時，毛澤東作了一個《論新階段》的大報告，還發表了一個《告全國人民》的公開信，在這裏毛也講得很清楚。毛澤

東把它歸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這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段，需要實施幾十年。毛澤東認為，不能從資產階級社會直接跳到社會主義社會，這兩種性質不能混淆，之間存在著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毛澤東還說過，從中央到地方，都須經過人民選舉，後來他還說，我這個就是三民主義，就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羅斯福的「四大自由」。

經過了抗戰和解放戰爭以後，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當時憲法和人民政協的綱領上都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三年以後，隨著三大改造的結束，毛澤東的想法發生了變化，稱中國馬上要進入社會主義，並且認為劉少奇所堅持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反動的。之後，他提出的「資本主義當權派」等等，都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毛澤東想當世界革命的領袖！所以他在「文革」前就已經發動了所謂國際共產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他認為蘇聯已經是修正主義，中國要搞一個最純正的社會主義。毛澤東很快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提出要搶先跑步進入社會主義，這也造成了後來「文革」十年的浩劫。

我考慮過民主社會主義的提法，為什麼他們不贊同？恐怕有這麼幾個原因：第一，民主社會主義主張搞和平鬥爭，不搞武裝鬥爭，軍隊為國家所有，政黨不能擁有軍隊；第二，搞多黨制和議會鬥爭，就手能搞一黨專政；第三，搞混合經濟；第四，不搞思想壟斷。民主社會主義這些東西，共產黨都接受不了。所以，我考慮提新民主主義比較容易被接受，第一，要在黨的領導下；第二，軍隊不變；第三，經濟上維持公有制為主；第四，在共產黨領導下，逐步地發展思想言論自由。我認為，在「胡趙新政」的 12 年裹，是共產黨執政以來最好的 12 年。我認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還是可以搞一定的民主。比如在台灣蔣經國時期的國民黨，比如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聯，都是先例。但是現在的中國，要出現像蔣經國、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人很難，鄧小平去世以後，只能指望領導集團裏產生比較先進的人物或派別，然後由他們去推動改革。我不主張「體制内」、「體制外」的說法，體制外不一定都講民主，體制内不一

定就是假民主。我不認為「胡趙新政」12年是假民主。胡耀邦提出理論研究自由、思想自由，提出從黨內民主推向社會民主。趙紫陽在民主方面比胡耀邦還強調民主，又有很大的發展。可惜「胡趙新政」僅僅12年就被鄧小平扼殺了。可以設想，如果按照胡趙的本意，如果能夠堅持20年，3。年，或者更長時間，「胡趙新政」會發展出更好的情況，就會出現更新的景象。

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獨立的歷史階段，只有為這個歷史階段搞幾十年，甚至更長更多的時間，才能達到社會主義。在我看來，胡耀邦、趙紫陽的「十二年新政」，是重新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10年，是成功的10年。胡耀邦沒有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獨立的歷史階段，但當時于光遠寫過關於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一個提綱，據光遠同志對我說，後來胡耀邦給他打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話，表示同意。「胡趙新政」之所以是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10年，是由於胡、趙堅持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胡趙新政」中，能夠平反冤假錯案、反對「兩個凡是」和推行「包產到戶」的農村改革和經濟改革，是由於徹底否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否定了中國當前處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也就否定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你死我活的鬥爭。這樣，就重新承認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的現實意義，新民主主義社會是獨立的社會形態，將長期在中國存在。從1937年到1953年，毛澤東在抗H根據地、解放區和建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實踐還是成功的。關於這一方面，我曾有專文來說明，這裏就不多說了。從1953—1976年毛澤東放棄了新民主主義，急於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這是已經形成的歷史事實。

當然，關於「胡趙新政」中胡耀邦存在的若干缺點和不足之處，這不只是受到短短12年的限制，還受到很多來自鄧小平等一股頑固保守勢力的重重阻撓。要根據當時當地的特殊條件來評價，所以，我以為不要

苛責古人。現在重提重建新民主主義，也不能照搬延安時期、建國時期和胡趙時期，也要按新的歷史條件。有一條應該肯定，應該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不應是社會主義革命。雖然反帝的任務現在沒了，但反霸權主義、反恐怖的任務還有；以前反官僚資本主義，現在應該反權貴資本。中國長期處在新式的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並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

對於整個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創立，我已經在我的著作《胡績偉自述》第4卷中有所論述。將來，在我的有關「胡趙新政」一系列的論述中，我還有特別的闡明，這裏也不多說了。

2009年是特殊的一年：胡耀邦去世20周年，「六四」20周年，建國60周年，五四運動90周年。在此我建議，先從為胡耀邦、趙紫陽平反開始，以後逐漸平反「六四」，通過提高憲法地位，保障人權，推進中國社會的改革。如果說，當年胡耀邦推進社會改革首先是從严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開始的話，那麼今後要從糾正鄧小平時期的一系列錯誤開始。鄧小平在世時搞出了許多新的冤假錯案，現在的黨政領導的首腦應該對此作出一個交待。

（定稿於2009年3月15日）

共產黨組織轉型的思考

謝　韜

中國共產黨的現行規章制度，源於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和第三國際，現在，到了進行全方位的反思和革新的時候了。

一. 從「先鋒隊」到開放型政黨

十六大修改的黨章，在容納了「三個代表」思想後，向「其他社會階層」（包括資本家和食利者）打開了大門，但是又沒有放棄列寧「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提法。黨章第一句話：「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在邏輯上是含糊不清的。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解釋：第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的先鋒隊，所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先鋒隊。但這種解釋顯然背離真理。第二，中國共產黨既是中國工人的先鋒隊，也是中國資本家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是工人先鋒隊和資本家先鋒隊的集大成者。但是，當工人與資本家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更多地代表誰呢？已經有學者指出，它更多地代表「精英聯盟」。第三，不論「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階層」，只要成為「先進分子」，就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從而可以運用第一種解釋。

但是，這裏又引進了兩個新的問題：「工人階級」已經不是人們常識中的工人階級，資本家和高級經理也能算作工人階級嗎；「先進分子」由誰來確認：工人、資本家、選民、黨官僚、理論權威？……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正說明「先鋒隊」理論已經完全不能適用於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群眾性的現代政黨。

列寧的「先鋒隊」理論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地下組織、秘密活動的實踐總結。「先鋒隊」由「職業革命家」作為核心，構成一個「從極狹小極秘密的組織直到非常廣泛自由的组織（鬆散的組織）」的組織鏈條。中國共產黨嚴格地尊奉「先鋒隊」理論，也是在「四一二事變」、「馬日事變」之後。此前，它曾以一種相當開放的心態擁抱新黨員，在組織上獲得了迅猛的發展。當統治集團不允許它成為一個群眾性政黨的時候，它才縮回到「先鋒隊」的殼裏。

按照「先鋒隊」、「先進部隊」這一套傳統框架，引入了「三個代表」新提法，不是「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而是「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利益」不同於當下「利益」，這不是「後進分子」能夠自發地認識到的，必須靠「先進分子」長期地「灌輸「。因此，可先進分子」的職責不是「代表」「後進分子」，而是「教育」、「改造」他們。在現行的黨員發展機制下，「先進分子」只會根據既定的理論範本複製自身，而不會反映「人民群眾」不斷變化中的真實心願。

黨章第5條：「發展黨員，必須經過黨的支部，堅持個別吸收的原則。申請入黨的人，要填寫入黨志願書，要有兩名正式黨員作介紹人，要經過支部大會通過和上級黨組織批准，並且經過預備期的考察，才能成為正式黨員。」第6條：「預備黨員必須面向黨旗進行入黨宣誓。誓詞如下：我……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這套做法，出自列寧1904年的《進一步，退兩步》，當然還有更早的源頭。如此繁瑣和帶有神秘色彩的吸收黨員辦法，是革命黨人從地下幫會组織學來的用於自我保護的一套防禦措施，與現代的群眾性政黨是格格不入的。

法國社會黨章程規定：入黨是自由的。在每一個聯合會內，聯合會

代表大會選舉出一個聯合會黨員接納辦公室。聯合會黨員接納辦公室登記聯合會接到的入黨申請並立即轉交給支部書記。所有提出入黨申請者都由支部書記邀請他親自來到支部參加接受其入黨申請後的下一次會議。如果他不能親自出席接受其入黨申請後的第一次會議，他會再一次被邀請出席隨後的會議。如果支部的一名黨員對入黨申請提出反對意見，只有在聽取有關人員的意見並經秘密投票表決，有四分之三多數加以反對時，才可拒絕接受入黨申請。從申請入黨者向附近的支部遞交申請書之日算起，支部應在一個月期限內邀請申請入黨者參加支部的下一次會議。要是支部沒有召開這樣的會議，如果當事人重新向附近的聯合會提出申請，在向聯合會黨員接納辦公室交納黨費的情況下，就認為他已經被接受入黨。不接受入黨申請的主要理由是拒絕跨黨分子。（陳露譯：《法國社會黨的原則聲明和章程》，原文來自法國社會黨網站。）

中國共產黨要成為一個現代政黨，必須實現從以職業革命家為核心的先鋒隊組織到開放型的群眾性組織的轉變。後者的工作重心既不是理論灌輸和思想改造，也不是以群眾運動和武裝鬥爭的方式顛覆政權或者維持一黨專政，而是廣泛吸納黨員，聯繫盡可能多的選民，在競爭性選舉中贏得勝利。

下面提出寬嚴尺度不同的兩種備選建議。其一，年滿 18 歲的中國人，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願意參加黨的一個支部並在其中工作，按期交納黨費的，即可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有關的支部須在接到申請後一個月內舉行會議，如果沒有四分之三與會者反對；或者有關的支部沒有在一個月內舉行會議的；該申請自動生效，黨齡從申請入黨之日算起。其二，年滿 16 歲的中國人，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願意按期交納黨費的，在地區黨員接納辦公室履行正式登記手續，即可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交納黨費滿半年，即可全面行使各項黨員權利。

二. 從集中制到民主制

現行黨章一再重申:「堅持民主集中制」,「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的統一整體」,「堅持和維護黨的民主集中制」。並把民主集中制解釋為「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其實,這種「辯證法」並沒有給出任何確定的涵義,完全是一種語言遊戲。其實,「民主集中制」是一種誤譯,其本義是「民主的集中制」,「民主的」是一個修飾詞,主詞則是「集中制」。(應克復:《「民主集中制」的本質與毛澤東的集權思想》,載《當代中國研究》,2005年第4期。)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派提出建立一個「集中制的黨」,是專門針對孟什維克派建議實行黨內民主制的。列寧說:如果要實行「廣泛的民主原則」,必須具備「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第二,一切職務經過選舉。沒有公開性而談民主制是很可笑的,並且這種公開性還要不僅限於對本組織的成員。我們稱德國社會黨組織為民主的組織,因為在德國社會黨內一切都是公開進行的,甚至黨代表大會的會議也是公開的,i然而一個對所有非组織以內的人嚴守秘密的組織,誰也不會稱之為民主的組織。」(《列寧全集》第6卷,131頁。)顯而易見,「集中制的黨」既不實行政治公開性,也不實行真正意義上的選舉。

經過百年政治實踐,什麼是「民主集中制」的真相:早已經被人們所洞悉。「民主集中制」的實質只有兩條: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領袖。它用黨的中央機關自上而下地委任黨的地方機關,取代了黨的地方機關的自治和自下而上地產生中央機關。它用中央和地方各級執行機關駕馭和指揮權力機關,取代了中央和地方各級執行機關向權力機關負責。

在十七大召開前,中共中央(新聞報導沒有明確指出是中央委員會、政治局還是書記處)撤換和任命了一批省級黨委的委員、常委和書記。

各級地方黨委也是逐級這樣做。現行黨章為這種反民主的舉措提供了依據。黨章第 27 條：「黨的地方各級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常務委員會和書記、副書記，並報上級黨的委員會批准。」第 30 條：「黨的……基層委員會、總支部委員會、支部委員會選出的書記、副書記，應報上級黨組織批准。」這裏所說的批准制，已經使選舉制大打折扣。第 13 條：「在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基層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上級黨的組織認為有必要時，可以調動或者指派下級黨組織的負責人。」只要上級認為「有必要」，就可以隨時實行任命制。這樣一來，自下而上的民主過程，「一切職務經過選舉」，就成了一個沒有生命活力的蠟像，只是用來在理論上擺擺門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說：「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用等級授職制去代替普選制是根本違背公社精神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 卷，376～377 頁。）從列寧開始的「極端的集中主義」（羅莎・盧森堡語），自上而下的逐級委任制，完全閹割了馬克思所說的巴黎公社的民主精神。

馬克思、恩格斯將黨的代表大會稱為「最高權力機關」，將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稱為「權力執行機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574—575 頁）。代表大會要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權力機關」，代表必須要有充分的發言權和表決權。在代表大會上應當允許不同派系的觀點存在，並開展公開、公平的辯論。恩格斯於 1885 年回憶往事時所說：「馬克思也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他在長時間的辯論中——大會至少開了十天——捍衛了新理論。所有的分歧和懷疑終於都消除了，一致通過了新原則，馬克思和我被委託起草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200、201 頁）在列寧時代，黨的代表大會上還允許有關路線、方政、政策的公開辯論；到了斯大林時代，只剩下主導派系的歌功頌德和反對派領導人的自我檢討；到了毛澤東晚年以後，中共歷次代表大會乾脆取消了大會發言。至於選舉階段的表決，完全成為執行機關精心導演的一出傀儡戲，既沒有候選人的競選宣傳，也沒有秘密的預選，正式投票更是實行等額選舉。

在實行民主制的各國社會黨的章程中，就沒有上述批准制和任命制的絲毫痕跡。而且，它們還在一些領域中實行了黨員直接選舉，取代了過去長期實行的黨內間接選舉制度。法國社會黨章程第7章第14條規定：「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後召開各支部全體大會，由全體黨員秘密投票選舉黨的第一書記。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絕對多數票者才能當選。在第二輪投票中，兩名候選人中得票最多者當選。」第9章第1條規定：「共和國總統候選人由各支部大會的全體黨員秘密投票確定。第一輪投票獲得絕對多數者當選。第二輪投票的條件與第一輪投票相同，只有得票最多的兩個候選人才能參加第二輪投票。」

未來修改黨章時，應當充分吸取各國社會黨的經驗，以真正的民主制取代黨內集中制。作為最起碼的一步，應當恢復中共八大黨章的規定，實行黨代表大會的年會制和黨代表的常任制。有關黨的路線和政策的重大問題，必須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決定。

三. 從集權制到分權制

我們現在講民主憲政或者說憲政民主，民主主要體現為選舉、投票、「數人頭」，憲政主要體現為限權（政府不得侵犯人權）、分權、相互制衡。國家機構要實行三權分立，黨內也要實行三權分立。前者是行政、立法、司法的分立，後者是政治、監督、財務的分立。根據現行黨章，黨的最高執行機構是大一統的、一元化的，又是多層級的、寶塔型的。改革的目標模式是，黨的最高執行機構既是分權的、多元化的，又是少層級的、扁平化的。

現在的「中共中央」，實際上分為四個層次：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197名，中央候補委員158名），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員23名，政治局候補委員1名），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9名）和中央書記處（書記7名），總書記。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都很少開會，經常代表「中

共中央」處理各項事務（包括簽發「中共中央文件」）的是後兩個層次。改革後的中共中央處理政務的最高機構，只需要保留兩個層次：中央委員會（或者叫政治委員會），委員 50 人，候補委員 40 人；中央委員會執行局，由中央書記 1 人和中央機關各部門的負責人組成。

過去有一句話叫做「黨要管黨」。實際上，黨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管黨上，因為成立政黨的目標就是要參政從政，執掌政權，所以「黨要管政」永遠是擺在第一位的。德國政黨法第一條規定：「政黨必須在公共生活所有方面參與形成人民政治意願，特別是對形成公共意見施加影響；激發並加強政治教育；促進積極的對政治生活的公開參加；培養有能力的人承擔公共責任；通過提名候選人參加聯邦、州和當地政府選舉；在議會和政府對政治發展施加影響；將他們確定的政治目標與國家決策過程相結合；並且保證人民與國家機器之間持續、重要的聯繫。」「政黨須在政治綱領中制定他們的目標」。制定政綱和政策，儲備、訓練、推舉政府的政務官和代議±，是黨中央政治系統的主要功能。

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下，設立兩個以上的並行機構，在歷史上不乏其例。

恩格斯在 1890 年代提出，黨報黨刊與黨的執行委員會的關係，應當是前者「形式上獨立」、後者「道義上影響」。他寫道：「你們在黨內當然必須擁有－｛N 不直接從屬於執行委員會甚至黨代表大會的刊物，也就是說這種刊物在綱領和既定策略的範圍內可以自由地反對黨所採取的某些步眾，並在不違反黨的道德的範圍內自由批評綱領和策略。你們作為黨的執行委員會，應該提倡甚至創辦這樣的刊物，這樣，你們在道義上對這種刊物所起的影響，就會比對一半是違反你們意志創辦的刊物要大。黨正在超越迄今存在嚴峻紀律的框框；在擁有二三百萬黨員和不斷湧入「有教養的」分子情況下，要求比至今給予更多的行動自由，……首先需要的是一個形式上獨立的黨的刊物。」（《馬恩全集》，第 38 卷，517—518 頁。）他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倍倍爾說：「執行委員會和你本人對《新時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著並且應該保持相當大的道義上的

影響，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們也應該而且可以以此為滿足。」（同上，88頁。）

早年列寧是追隨恩格斯的。在1903年7至8月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上，列寧支持通過的黨章確定了「雙重中央領導機關」體制。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均由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並對黨的代表大會負責，二者之間不存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中央委員會負責黨的組織工作、財務工作，指導黨的全部實踐活動；中央機關報編委會則負責在思想上領導黨。

晚年列寧建議設立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它由黨代表大會選出，與中央委員會是兩個並行的機構。它的主要職責是對中央委員會及其成員實行全面的監督，紀律檢查委員會只是它的一個下屬機構。列寧臨終前寫到：這個機構「應該「不顧情面」，要注意不因任何人，無論是總書記或其他任何中央委員的威信而妨礙他們提出質問，審查各種文件，並且要做到絕對瞭解情況和使問題處理得非常正確。」（《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696—697頁。）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職能，相當於立法機構對於行政機構的質詢、審議、監督職能。1922年的聯共（布）黨章規定：「各級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本級黨委員會不得加以撤銷，但須經過黨委會同意後才能發生效力，並由後者付諸實施。」「遇到不同意見時，將問題提交聯席會議。同本級黨委員會不能取得協議時，將問題提交本級黨的代表會議或上級監察委員會解決。」按照列寧的意思，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主要功能是約束和限制中央委員會的權力，監督它實施黨代表大會的決議。而到了斯大林時代，修改後的黨章將其任務改變為監督「中央委員會決議的執行」，不再具有監督中央委員會自身的功能。

中央執行機關的第三個分支應當是財務委員會，該委員會的負責人可以稱作「司庫」。在德國政黨法中，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關於黨的經費、賬目、審計等方面的規定，可見財務委員會和司庫在現代政黨中的重要性。

今後，中央政治委員會、監察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應當分工合作，

各自承擔獨立的功能，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彙報工作。同時，還應當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任命黨報黨刊的負責人，黨的中央執行機關只應當保持對於黨報黨刊「道義上的影響」。

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百年老黨，已經經歷了從革命黨到專政黨再到憲政黨的轉變。1948 年「行憲」後，本來國民黨就應當向憲政黨轉化了，由於在內戰中失敗，國民黨先是在大陸後來在台灣實行了 40 年「戒嚴狀態」，延誤了組織轉型。中國共產黨要獲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國民黨走過的憲政之路。覺悟越早，轉型越及時，對於黨的未來發展就越有利。現行憲法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現行黨章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黨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工作。」在經歷文革浩劫後的這一歷史總結，完全可以成為中國共產黨向憲政黨轉型的出發點。

以上這些思考，基於我對 60 餘年黨內生活的觀察和實踐，基於我關於現代政黨建設的閱讀。不揣淺陋，拋磚引玉，是為了引起更多有識之士的討論，集思廣益，為黨探索一條持續長久發展的道路。

胡耀邦與民族區域自治

——改革開放初期胡耀邦在民族自治問題上的撥亂反正

何 方

今年是胡耀邦逝世20周年，特撰此文，以為紀念。

下面談的是胡耀邦有關國內少數民族和民族區域自治問題的理論和政策，思想和實踐。不過這只是個人的理解和心得，自然不一定準確。而要談這些問題，又不能不稍為交代一些有關情況。因此，本文擬分為以下三個部分：中國的民族情況和中國共產黨的少數民族政策；胡耀邦對民族區域自治問題的撥亂反正和卓越貢獻；根據胡耀邦意見對民族區域自治的幾點再認識」。

一

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是由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1979年最後認定為56個）組成。這些已經成為人們公認的常識。但是關於民族和中華民族的概念還一直存在著巨大的分歧和爭論，談中國少數民族問題時卻不能不稍有涉及，只是我個人對民族學並沒有研究，所以只能談幾句可能屬於外行的話。

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是指伴隨資本主義興起而形成的一種人們共同體。不過在習慣上，許多人也把古代的氏族、部落、群體、部族、種族

等都稱為民族。這就使民族有古代民族和現代民族之分。

人們所指的現代民族，是由國家塑造和界定的，因而和國家分不開。這體現在領土的界定、主權的擁有、官方語言的確立、民族認同心理的加強等。多民族組成的國家就形成了孫中山所說的國族，如美利堅民族、法蘭西民族等。中華民族也是如此，只是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既遲且慢，所以形成的時間較晚。中華民族這一稱謂的出現，已到清末民初之際，梁啟超和孫中山被認為是兩個主要源頭。梁啟超 1903 年在理論層面提出「大民族」說。孫中山的主張則意味著國民黨理論和政策上的改變。他在辛亥革命前，還是重複朱元璋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那時的「中華」主要指中原領土及其主要居住者漢族。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和其他革命先行者，才認識到居住中國境內的民族應合稱一個大民族。所以到 1924 年，他又明確地講，「我說民族就是國族」，「我的意見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這就使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含義從排滿最後變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建立以漢族為主、多族聯合的獨立、統一的民族國家。

但反帝爭取獨立和反封建割據實現統一，卻經過了長期的鬥爭。因此，照我的理解，中華民族應該是形成於清末民初至抗日戰爭期間，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算完全定型。因為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實現了中國的真正獨立和統一，對內完成了各民族的國家認同，對外取得國際上對多民族組成的中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公認（雖然還存在台灣問題，但國際社會也只承認一個中國）。那種為了表明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或者把漢族混同於中華民族，而主張中華民族的形成從兩千多年前的秦漢時期就已開始甚至更早的提法，恐怕不夠妥當。因為我們總不能把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及其後裔率領下橫行亞歐大陸，把突厥人西遷直到土耳其與原居民融合建立起近千年的奧斯曼帝國等等，都說成是參與中華民族的形成。正像我們只能把境內（包括境外持中國護照者）各少數民族藏、蒙、維（吾爾）等，算作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但絕不能把境外的同一民族給算進來一樣。

從民族國家出現的幾百年來，世界上保持單一民族的國家很少，大多數國家都是多民族共存。而對多民族國家來說，處理好民族關係，特別是處理好為主的民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關係，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弄得不好，就會造成民族間的長期爭鬥，甚至導致國家分裂。這方面的實證古今中外都有，而且今後還會出現。

中共對民族問題的理論和政策，說是遵循馬列主義原則，其實不儘然。因為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有很大不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的只是為奪取政權和堅持專政的列寧斯大林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處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和民族國家大量形成時期，因此他們堅決主張民族平等，支持民族獨立，反對民族壓迫和一個民族對其他民族的統治。恩格斯有句名言：「任何民族當它還是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可列寧、斯大林就不同了。他們也承認民族自決，承認各民族有根據志願原則選擇獨立或聯合的權利。蘇聯憲法上就明確寫有這一條。但由於他們主張共產黨專政，有權領導（管理）國內一切和對外輸出革命，這就使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只能是一句空話（例如當時烏克蘭、芬蘭等地方政府要求自治，就被列寧斷然拒絕），而只能是主體民族統治其他民族，共產黨成為對各民族的領導者（管制者）。這就是為什麼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這些共產黨執政的多民族國家，反對民族壓迫、爭取民族獨立，竟然成了共產黨喪失執政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至今還只有這三國在冷戰結束時走向分裂，一下變成了20幾個國家。

中共在民族問題上所執行的除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和政策外，還結合與繼承有中國特色的歷朝對待異民族的傳統。這種傳統主要是，把夷夏之分視為「春秋大義」（實際上就是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漢族統治者執行的「以夏變夷」政策。具體作法可以是出兵討伐，進行征服、趕走以至消滅；也可以是懷柔、羈縻、封賞、建立交通、屯墾戍邊，還有恩威並用、開明包容、以及妥協讓步等。其目的都在於保持中央政權和維護國家的統一強盛。因此，中共的民族政策，既遵奉蘇聯和共產國

際的指示和規範，又有中國的特色和傳統。雖然這一政策可以一再變化，而且愈變愈「左」，使一些少數民族和漢族的關係越來越緊張，但因中國少數民族所佔比例較小，所處環境偏遠，所以在和平時期沒有也不會發生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那樣的分崩離析現象。

中共早期的民族政策，由於沒有取得政權，沒有面臨現實問題，所以還可搬用列寧斯大林的教義（而不是蘇聯實踐），唱點高調，如主張民族自決和聯邦制。中央文件和領導人（包括毛澤東）講話，在抗日戰爭前曾多次提出主張民族自決與聯邦制，反對中央集權制。他們還多次提出應讓藏、維、蒙、回（甚至不知是否因不瞭解情況還提到台灣），都有自由聯合或自行獨立的權利。中央正式文件，如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大會制定的《憲法大綱》就明確寫著，「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治權，一直到承認各弱小民族有權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幾次會見外賓時的講話，還一再重申這一主張。

那時我們已經有了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根據地，不但由於統一戰線政策需要表明對少數民族問題的態度，而且在根據地已經成為必須實際解決的問題。所以到陝北不久，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總書記張聞天兼任書記的西北工作委員會，提出了關於蒙古和回民工作的兩個報告，被李維漢說成「為黨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礎」，在黨的歷史上開始了「有領導有組織地進行少數民族工作」。當時提出的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下的民族自決，並且體現出平等、寬鬆和照顧精神。

抗日戰爭開始後，中共已強調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和中國的統一，對少數民族已不再提「自決」，只提「自治」。1938 年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對自治的定義是，允許少數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

解放戰爭時期，不論是在《和平建國綱領草案》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提的都是「承認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權」。由於內蒙曾一度出現部分人（包括部分內蒙人民黨員）要求「獨立」或「獨立自

治」的傾向與活動，中央特於1946年3月的指示中強調，內蒙只可實行地方區域自決，而不是「獨立自治」更不是「獨立」。從此，少數民族眾居區實行區域自治，就成了黨和政府堅持至今的政策。並且在新中國建立前夕，中共就已完全放棄了無論地方還是民族的聯邦制，堅持實行中央集權制。而在黨的一元化領導和中央集權制下，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力就極其有限，甚至名存實亡了。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建國後在民族問題上的實踐。

60年來，我們一直宣告實行的是民族區域自治，但這只是表面的和對外宣傳用的，實際情況卻是另一回事。因為所謂自治，就得允許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但我們實行的則是「黨管一切、漢人當政」。建國頭兩年，黨還多少注意大的民族眾居區的民族特點，沒有完全和內地「一刀切」。例如在西藏，雖然也是「黨管一切、漢人當政」，但開始一陣還大體上遵守了解放西藏的和平協議，沒有進行改革。而且按習仲勳指示精神起草的西藏工委1952年5月16日文件，還體現了西北局派出由範明等率領王作隊進藏時習的談話精神，包括「穩定慎重」、「在西藏反封建為時過早」、「不怕慢只要搞對」等。但西南局鄧小平派出以張國華為首的主要軍政力量卻顯得有些過急過左，因而和西北局工作隊發生矛盾，最後製造了個「範明反黨集團」。西南局領導推行的這種違背自治的"黨管一切、漢人當政」路線，特別明顯地體現在幹部政策上。比如藏族中既有參加紅軍長征的老同志，也有解放前就在藏區鬧革命的大批地下革命者，但解放軍進駐拉薩的5位黨委中只有平措汪傑1名藏族成員。直到1958年成立西藏工委，11名委員中也還是只有他一個人，當然不會起什麼大作用。就是這位唯一的自治區藏族並沒多少發言權的領導人，1960年還被誣為搞「藏獨」，關押了18年（平反後照例是不會再被允許回到西藏領導崗位上去了）。

又如在新疆，分局領導人王震、鄧力群，解放初期在平叛、鎮反、土改中搞極左，以至提出把所謂「大回族主義」作為鎮壓對象。由於他們太不顧當地各民族的特點，急於搞民主改革，還拒不聽從西北局習仲

動的指示和糾正，中央就撤了他們的職。

所以總的看來，雖然在有些地方和有些問題上發生過「左」的行為，但當時中央對全局掌握的還比較穩。加之各族人民長期受國民黨、地方軍閥、奴隸主、惡霸們的剝削壓迫，也盼望變天。共產黨又宣傳自由民主、反剝削反壓迫、翻身求解放。特別是黨的幹部和軍隊，解放初期保持著良好作風，得到群眾和上層人士的歡迎和表揚。造就使一些少數民族地區接管進行得比較順利，一時出現過毛澤東歌頌的「萬方樂奏有于闐」的盛況和柳亞子描述人民希望早日解放的心情：「仁看篝火軍容盛，正是東征西怨時。」

可惜，這種局面在歷史上只是曇花一現，隨著整個國家全面向社會主義過渡，很快就被階級鬥爭、民主改革所取代了。既然國家建設以階級鬥爭為綱，「民族問題說到底是個階級鬥爭問題」，漢族地區發動了不斷的革命和無休止的鬥爭，少數民族地區也自然不能例外了。從此，民族問題就走上了歧路，並且或松或緊地一直貫徹下來。其後果是，少數民族眾居區人口少和區域小的經常出小亂子，人口多和區域大的經常出大亂子，都不夠安全穩定。

黨歷來在所管轄的地區，都強調和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建國後不但沒有放鬆，而且還隨著各種政治運動得到不斷加強。所謂一元化領導，實際上就是一黨專政的人治，也就是黨管一切和以黨代政。在內地如此，對少數民族地區更不放心。既然黨管一切，哪里還談得上「民族自治」？一概都是黨委特別是第一把手說了算。而黨委和第一把手又不是對管轄下的這個少數民族負責，只是按照「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章法辦事。因為他們都不是真正由管轄下的地區選舉產生，而是完全出於上級的委派。所以，我們實際上執行的這種「黨的領導」，它本身就否決了民族自治。

再說，我國各眾居區的少數民族都有強烈的帶有全民性的宗教信仰，如藏族信奉喇嘛教和新疆多數民族信奉伊斯蘭教（廣西可算例外，因為壯族與漢族融合程度較深），但共產黨卻信仰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後來

還把這一條和黨的領導等所謂「四個堅持」寫進了全國各族人民均須遵守的憲法序言中。這不但和憲法條文中的宗教信仰自由相抵觸，而且為代替民族自治的「黨管一切」立下了法理根據。其實，黨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和內地一樣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還以救世主自居，這本身就違背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從外面輸入的這種制度變革，大大超出了少數民族群眾的覺悟和認識，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強加。例如急於廢除封建農奴制度，把被信徒們敬之為神的喇嘛、阿訇一概當作不勞而獲的剝削者，不少人被批鬥和強制勞動以至強迫還俗，主觀上以為是解放人民，實際上卻嚴重脫離群眾。這就是為什麼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費了大勁幫助少數民族翻身、發展經濟，使他們不再受欺壓、物質生活得到一定改善，但他們還是普遍對黨和漢族幹部不滿，使我們不得不加強防範和戒備、也不敢實行和沿海地區一樣的對外開放。

我們黨雖然一直聲稱堅持黨的領導就是堅持民族平等原則，但實際上執行的卻是不信任少數民族的大漢族主義。於是，「黨管一切」和「漢人當政」就吻合在一起了。

黨在一開始就從中國歷史和共產國際那裏繼承和搬來了組織上的狹隘宗派主義傳統，而且有很大發展，以致連自己的同志和戰友都不免發生懷疑和進行迫害，就更不用說對外人了。這在民族關係上就表現為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幹部的歧視。例如，既然是自治，又要實行黨管一切，那自治區黨委，特別是第一把手和真正有職有權的領導人，就應出自本地區本民族的人了。然而不然，除來自延安的烏蘭夫曾有一時例外，自治區像新疆、西藏，以及名為自治的州市縣，第一把手和重要崗位都是上面派去的外來漢人。而且許多漢族幹部還往往瞧不起本地民族幹部，對群眾也是官僚主義作風，並且嚴加防範。群眾對他們當然缺乏親和感，以至產生對立情緒。另外，有些派往自治區搞建設和做生意的漢人，也常有瞧不起本地人的現象。特別是一些國營壟斷企業，來自治區採掘資源，又在補償、用人、保安等問題上不大照顧少數民族利益，更會引起當地幹部和群眾的不滿。他們又往往把這一切歸之于黨和漢人，從而增

加黨群和民族間的隔閡與矛盾。

總之，在黨管一切和漢人當政的雙重約束下，民族自治基本上是沒有的，民族自治區域和少數民族本身，一切都由漢族黨的幹部操縱。如果是真正的民族自治，他們真「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那解放後毛澤東發動的各種政治運動，怎麼能禍及他們？我就不相信，無論是東藏還是西藏，或者新疆各族人民，願意跟著內地搞大躍進和反右傾，不但進行大破壞，還弄得沒飯吃、餓死人和大量外逃？當然，更沒人相信，廣大藏民和穆斯林會自願參加文化大革命，進行破四舊，砸爛大量佛教寺廟和伊斯蘭清真寺，批鬥一些宗教頭領。這分明是響應毛主席號召、執行極左路線的黨組織和內地的漢族青年狂熱分子煽動他們和越俎代庖幹的，他們能「自治」嗎？能管得了嗎？

最後還應說明一點，就是解放後前半期，由於不斷的運動，連續的折騰，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沒有發展，群眾生活沒有改善。這也是胡耀邦1980年視察西藏後的概括。他說，「西藏人民29年來生活沒有多大提高，有些地方還有所下降」（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本文所引胡的話，除另注明出處者外，均引自該書，以下不再一一注明）。特別是從大躍進、公社化和反右傾造成三年困難，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群眾生活較解放前有所下降，在少數民族地區大約是普遍現象。實際上，內地各省，特別是胡耀邦概括的「老（老根據地）、少（少數民族地區）、邊（邊疆地區）」，也並不例外。

這就是建國頭30年執行的極左路線的概況和後果，也就是胡耀邦在民族區域自治問題上進行撥亂反正的歷史背景。

二

經過文化大革命，少數民族問題已經更加惡化了，埋伏著出大亂子的危險、到了必須立即處理的時候了。1980年2月，胡耀邦當選總書記，

3月14和15日召開的第一次書記處會議，討論的就是西藏工作問題，並於會後發出座談會紀要，明確推翻了毛澤東關於「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鬥爭問題」的錯誤論斷，提出了一整套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方針和政策。緊接著，5月他又同萬里等一行親赴西藏考察八天。這都足見胡耀邦對少數民族問題的特別重視和處理重大理論問題的勇氣。

胡耀邦任黨的主席和總書記7年，對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和民族區域自治問題，有許多創新，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我看來，單是這方面，他的水平就在黨的歷代領導人之上，至今尚無出其右者。他在少數民族和民族區域自治問題上的建樹包羅萬象，極為深廣，我由於缺乏研究，下面只能做點簡要介紹。

他很早就提出對少數民族問題要重新進行調查研究，號召來一次「再認識」。1984年書記處座談西藏問題時，他特別強調說，「為了把西藏工作推向前進，必須對西藏情況來一次再認識」。這個「再認識」的精神，當然也適用於對新疆等地的其他少數民族，而且這也是他長時期內論及和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一貫精神。他說的再認識，含義深廣，特別實貴的有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是，他對民族團結的重要性和區域自治的實質有超過以往的理解和概括。在向黨的十二大作報告時，就提出，「民族團結、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對於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來說，是一個關係到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在這以前的1981年2月書記處討論新疆問題時，他也曾提到，「搞好民族關係、加強民族團結，是做好新疆各項工作的關鍵。」那次會上他概括的「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曾受到鄧小平的高度評價，並且成為一句歷史名言。他不只一般地高呼民族團結，而且還極有針對性地強調兩點：一是，說團結主要指「漢族幹部和當地人民的團結」；二是，重視團結上層和宗教界人士的工作。他說，在西藏「不能很好地團結宗教界和上層人士，也就不可能把更廣大的老百姓團結起來，這是因為，那些人的影響往往比你們（指進藏幹部）還要大」。

對於民族自治，胡耀邦的思想認識和所提方針政策，都是我們黨的歷史上沒有或少有的。1980 年 5 月，他在視察西藏工作時明確指出，「自治就是自主權。」「要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面，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自主權，這是一切問題關鍵的所在。」在西藏幹部會上他又說，「沒有民族的充分自治，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大團結。」「三十一號文件(指 1980 年 4 月中央《關於轉發 <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 的通知》) 上說：中央、中央各部門的文件、指示、規定，凡是不適合西藏情況的，你們不要執行。凡是不利於西藏民族團結的，不利於發展西藏的，你們可以變通辦理，你們可以不執行。」「要充分行使自主權，凡根據你們自己的特點，制定具體的法令、法規、條例，保護你們民族的特殊利益。」“不要照抄外地的，也不要照抄中央，照抄照搬是蠢漢思想。」還說，「這條必須討論清楚，不討論清楚，西藏的工作不可能有大的進展。」他這裏提出的才是真正的民族自治，是達到國內各民族和睦相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團結的理論和政策。

其次，耀邦提出的「再認識」，是指對少數民族的情況、對他們的特點要有客觀、深入、真實的瞭解，承認並尊重各少數民族的特殊性。他無論是在視察西藏等自治區時還是在中央討論民族問題的會議上都曾一再強調這點。例如關於西藏的特點，他在 1984 年書記處關於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就有精闢的概括：對西藏比較隔絕的地理環境，長時期的封建農奴制，單一藏族的自我團聚力，政教合一的喇嘛教，以及世界輿論的關注，這些特點使西藏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而且將長期存在（後面還強調：「這種特殊性將長期存在，需要上百年，或者幾百年才能逐漸消失」)。我們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認識過程。」「於各方面的特殊情況，西藏在廣大人們心目中是個很神秘的地方……裏一旦有點什麼風吹草動，輿論反映快得很。北京出點什麼事，有時還不大引起注意，而拉薩、日喀則出點事，外國報紙就大登特登。我們中央的同志，中央各部門的同志，尤其是在西藏工作的同志，究竟對這點認識夠了沒有？是一個很值得認真想一想的問題。」他這一高度如實的概括，在我看來，不但建國頭 30 年，就是

後30年，直到現在，他所提醒的人和部門都還認識得很不夠，甚至沒有認識，所以仍然值得中央「尤其是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認真想一想」。

第三，他要人們「再認識」的另一個大問題，就是要對我們過去的工作和現行方針政策「作一次再研究」。他認為，「從領導王作看」，除了上面談到的「主要問題是對西藏的特殊性，思想認識得還不夠深刻，思想還不夠解放」等以外，更重要的也是他接著講的「「左」的思想還很嚴重」。他認為，我們過去在西藏的工作沒有做好，經濟沒有發展起來，人民生活沒有改善，「根本問題是，極左路線的破壞，在工作上硬搬內地的一套，搞「一刀切」。」而且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左」的錯誤推到極致，嚴重破壞了民族關係，就是「文革」以前的政策也是一貫屬於極左。胡耀邦1982年在他的十二大報告中就兩者並提，說，「過去幾年中，黨中央在民族問題上做出一系列重要決定，糾正「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傾錯誤，恢復良好的民族關係。」

為了說清過去的極左錯誤和大漢族主義，他在1984年西藏王作座談會上特別講了幹部中的「四個擔心」和「三個興趣不濃」。他說，「你們無非是第一擔心是不是在搞社會主義，或者說害怕不能用和內地一樣的模式來搞社會主義。第二，擔心黨的領導會不會削弱。第三，擔心宗教的影響會不會愈來愈大。第四，擔心有朝一日會不會重新出現大叛亂。」他說，對這些問題如果想得太多，不結合西藏的特殊情況和實際需要，就很難解放思想，不能考慮另外一些本應更多思考的問題。結果，你們擔心的那些問題反倒不可能解決。」哪些才是應當更多思考的問題呢？我看你們在以下三個問題上想得不夠，至少興趣不濃。第一，是對如何因地制宜看西藏的特殊條件和廣大藏族同胞的接受程度把西藏經濟搞上去興趣不濃。第二，是對認真做好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做好宗教工作興趣不濃。第三，你們對西藏的固有文化，包括語言、文藝、歷史等等，興趣濃不濃?」「我們的漢族幹部如果不尊重人家，甚至想用漢族文化代替人家的文化，肯定是要碰大釘子的」，「我看不單是西藏，同樣在其他許多民族地區，尊重民族文化的觀念很可能是非常淡漠的。」所以他說，

「我主張你們翻個個兒，把「三個興趣不濃」搞濃起來，而把「四個擔心害怕」大膽放下。生活的辯證法就是這樣，你越怕丟掉的東西，越是縮手縮腳抓住不放，就越是會丟掉；而當你思想解放，視野開擴，索性把怕丟掉的心理拋掉，反而隨著整個事業的發展，更加牢靠。」

胡耀邦這番話講得多好啊！可惜，如他所說，不僅以前有「極左路線對黨的民族政策、經濟政策、宗教政策、統戰政策方面的嚴重破壞」，而且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他希望「值得認真想一想」的那些同志，很多人大概並沒去想，不少人還產生了反感，在實踐中反其道而行。結果是形勢仍然一直不穩，只能靠武力鎮壓、思想禁錮和給予經濟實惠來維持，問題當然談不上他說的「真正解決」。如若不信，可以用 1980 年他考察西藏時所帶的中央《三十一號文件》、1984 年《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以及他的有關講話和報告，同西藏、新疆等自治區的後 30 年歷史和現狀作一比較看。

胡耀邦對民族自治區工作，不但有思想認識和基本方針的闡述，而且有一系列具體政策和實際做法的指示，這些都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在此也只能做到「略舉一二」。

例如他 1980 年去西藏考察，說是帶著中央三十一號文件，「要實際去看看，和那裏的同志研究一下，看這個文件有沒有不夠完滿的地方，還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補充」。通過八九天的考察，他明確指出，「西藏現在的情況不十分美妙」。因此中央決定採取一些非常措施，「概括說就是六個字：免征、放開、走人。」「免征，就是全部免去自治區農牧民的農牧稅，至少兩年，還不准隨便無償徵用勞動力。放開，就是在所有經濟領域都要放寬政策……怎樣對生產有利就怎樣做，不要亂加限制。走人，就是逐步把歷年進藏的漢族幹部大部分調回內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只留少數工作上確實很必要的。」《三十一號文件》上還特別規定，「要嚴格控制各類人員自行流入西藏。」

最後在幹部大會上，胡耀邦講了「當前和今後要解決的六件大事」。這就是：第一，「要充分行使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權」。「西藏是個自治

區，而且是個相當特殊的大自治區。西藏有 120 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八分之一。自治就是自主權。沒有自治就沒有因地制宜，沒有民族的充分自治，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大團結。」「第二，根據當前西藏相當困難的情況，堅決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當前西藏最大的事實，就是群眾的窮嘛，西藏老百姓相當苦，家裏沒有什麼東西，所以我們的意見是要大大減輕群眾負擔。」「第三個大政策是要在所有經濟問題上實行特殊的靈活政策。」正是在這個談放開的問題上，他講得特別透徹，特別重要，提出可以包產到戶到人，實現多勞多得，要老百姓富了再富。他說，「我的意思是放寬、放寬、再放寬。犯了資本主義，不要你們檢討，我們檢討。」（萬里副總理插話說：「最好你是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的西藏。」）還應該對印度、尼泊爾等周邊國家實行開放，發展地方貿易。對外要採取積極態度，要搞緩和。第四條是講國家對西藏的支援。他說，「29 年來，不算直接投資和經費，國家給了西藏 45 億 3 千多萬元，而西藏本身的農工商稅收只不過 5738 萬元。中央決定今年給你們到 4．96 億，以後每年遞增 10%，到八四年就是 8 個億。全國 29 個省區，沒有哪一個省像對你們這樣優待。」他說的第五條，是發展藏族的科學文化教育事業 0「我們漢族有些同志，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說藏族落後，我不贊成。」「輕視西藏歷史、語文、藝術是完全錯誤的。但是我們的教育事業發展得不夠。」他建議辦一所西藏的綜合大學，「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學生。」強調加緊培養藏族幹部，還要求「漢族幹部在西藏工作必須學藏文藏語，作為一種必修課」。不過事後看來，做到這一要求的恐怕沒有幾個。他講的最後一條是「正確執行黨的民族幹部政策，極大加強漢藏幹部團結。」他說，「包括教員等在內的國家脫產幹部，最好在兩年內做到藏族幹部佔三分之二以上。」（萬里插話，「我那天提了個二八開，是指縣級幹部，區級幹部應百分之百。科技人員只要藏民歡迎，佔多少都可以。）耀邦接著說，萬里同志的意見我也贊成，只是不包括車隊幹部。他說，「我們跑到這個地方，30 年啦，完成了歷史任務嘛！我們身體又不適合，工人、服務人員，為什麼要漢族來幹？現在西藏怎麼樣啊？連部隊在內有 3。萬漢族同志（當

時藏族人口只有 183 萬），這怎麼行呢？我們回去第一條就彙報這個問題。」「這樣做會不會引起幾萬個漢族工作人員幹部動亂？我們都要走呀，看你們怎麼辦？我們總有一些好黨員，好樣板。我相信這一條。所以傳出去不要怕。我相信大多數是好同志，能站好最後一班崗。…一這麼一來，我看三方面滿意，中央滿意，漢族幹部滿意，藏族幹部同人民滿意。三方面滿意，我們為什麼不幹這個事情呢？這一條是堅定不移的，你們討論清楚，不要颳風，颳風我們也不怕。」

考察西藏後，路經青海時，他也特別講到：「我們在西藏幹部大會上講的六條，基本上符合你們青海的情況，可以參照研究執行。要把政策再放寬些，要搞好民族團結，要充分行使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權利。」

這裏大段引證胡耀邦視察西藏時的講話，是因為我覺得這些話講得非常好，在我的印象中是過去和現在黨的領導人都從來沒有這樣全面講過的。

胡耀邦這次西藏之行和他所提政策方針，得到西藏僧俗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和擁護。在其他自治區同樣引起強烈反響，國際上也給予很大注意。連逃居國外的達賴喇嘛在黨的十二大時還致電中央說，「當胡耀邦 1980 年訪問拉薩時，我便開始信任他了，因為他敢於承認在管理西藏的工作中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這是值得稱讚的坦率的態度。」「我現在仍然對胡耀邦抱有信心，並希望在將來的某一天同他會晤。」直到 2005 年 11 月 17 日，在接受美國《世界日報》採訪時，達賴還說，「如果胡耀邦當時繼續掌權，西藏問題早就解決了。」

當然，作為總書記，少數民族問題只是他要研究和處理的諸多問題之一，不可能講得面面俱到，何況他還受到很大的局限和制約。但是即使如此，根據當时情況和從事後的發展來看，如果能認真落實他對西藏講話的方針政策，西藏問題也許早已大為緩和甚至得到解決。可惜實際情況正好相反，他的意見不但未能執行，還受到批評，所謂的西藏問題也就越來越嚴重，成了我們國家核心的安全問題之一。在紀念改革開放 30 周年和耀邦同志逝世 20 周年的時候，對西藏、新疆的少數民族問題，

實在應該接受耀邦同志的倡議，來一次「再認識」，早日改弦更張，不能再按實踐一再證明是錯誤的老路走下去了。

最後，再談兩個由少數民族地區引起而屬於全國性的大問題。一個是開發大西北的戰略，一個是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路線，而且具體到種草種樹、反彈琵琶。這可都是中華民族的千年大計，在我的印象中又都是胡耀邦首先提出，並大力號召和實際推行的。在他之前，好像還沒聽說過有哪位中央領導同志提到過這些重大問題。在他提出以後呢？似乎也沒有引起其他重要領導人和有關部門以及省市的重視，只是報刊上熱鬧地宣傳一陣，很快也就「人去政息」，反而更加強了對生態的大破壞，毀壞耕地、污染江河……不少地方甚至鬧到無法恢復的程度，如昆明滇池。在胡耀邦提出20年後才注意起了保護生態環境，但仍然投入不足，比起那些面子工程和公款消費，還是顯得寒酸，大概還沒有完全取消把欠債留給後代的打算。至於開發大西北，近些年總算是提上了日程，只是遲到了20年，交了太多的時間學費。

三

胡耀邦主持制定的認真落實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的兩個著名文件（關於西藏問題的三十一號文件和關於新疆問題的第四十六號文件）以及相關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從發佈和提出，到現在已差不多30年了。在這個不算太長的時間裏，我們國家，包括各民族自治區，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國際地位大為提高。但不容否認，漢藏民族關係和藏族群眾對黨與政府的信任，比胡耀邦進行撥亂反正的那幾年變得更差了。而所謂的西藏問題，在國際上的負面影響也更為擴大和被抬得更高了。這只要將胡耀邦當時提出的一整套方針、政策以至具體做法和前前後後的實際情況加以對比，問題就很清楚了。

現在我們就按照胡耀邦近30年前號召的，對民族問題和區域自治來

一次「再認識」，也就是進行總結，汲取教訓。他自己雖然提出這一號召，但卻申明，只談「現狀」，不談「歷史」。因為這涉及到毛澤東思想的信仰（例如中央1980年4月《關於轉發 V 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 > 的通知》中，在批判「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的錯誤論斷時，還要竭力為毛主席開脫）和當年「老人政治」格局的約束。在經過幾次思想解放和遵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原則，現在也許可以比較自由地討論民族問題和區域自治，包括歷史、現狀和未來了。

這裏著重談的，還是胡耀邦闡發得較為透徹的西藏問題。

西藏問題的根源就在於，我們硬是把一個實行政教合一的農奴制，一下給變成了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社會。這當然出於中國黨要解放全人類的宗旨。為此，對內就要包辦代替，對外就要輸出革命。頭30年支援世界革命的到處碰壁和一再失敗，改革開放後不能不大為收斂。但國內各民族卻只能讓我們折騰，不管它們處於什麼社會發展階段，都得在統一號令下，一起進入我們所設想的社會王義社會。這從一開始就帶有強加的性質，因此曾引起藏民和新疆一些地區的民族動亂。就是和平解放西藏的協定，對西藏地方政府和宗教上層來說也是城下之盟。因為不管怎麼說，他們都是反對改革的。但是自己既無力抵抗解放軍的前進，又指望不了美國、印度等外來援助，走投無路，只得簽字。締結協定後的8年，黨（中央直接領導下的西藏工委）的主要任務就是對這些上層做統戰工作，其他還顧不上，也不能動，所以原有的一切典章制度和社會秩序都在照舊運轉，群眾當然仍在政教合一的上層影響之下。但是在制定政策和具體做法上，我們卻繼承了歷史上封建王朝對藏族「分而治之」的傳統，用行政分屬代替政治治理。上世紀50年代的民主改革，西藏因有十七條協議可以暫不改，但分屬雲南、四川、青海、甘肅等省的10個藏族自治州和兩個藏族自治縣（通稱東藏地區，藏民佔各地居民的絕對多數），卻和所屬省的漢族一樣必須進行改革。結果東藏各地因反對改革先後發生動亂，許多叛亂分子和上層人物又先後跑到西藏進行煽動和準備全藏區叛亂、而西藏上層許多人，眼看著改革會使他們喪失特權和財

產，無論推遲多少時間也還得改革，於是就同逃來的力量一同組織起所謂「衛教軍」與解放軍對抗，終於導致1959年3月的西藏全面武裝叛亂和達賴喇嘛的出逃。

對那次叛亂和平叛，以及隨之展開的民主改革，一直存在著不同看法，在國內又始終是一個極為嚴格的禁區。現在如果實事求是地來討論，就首先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西藏全面叛亂帶有全民性質，是我們黨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急於在藏區推行社會改革所造成的結果。毛主席當時的指示和談話就是證明。他在1959年3月12日發自武漢的指示電中說，「照此形勢發展下去，西藏問題有被迫（這種「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決的可能。」15日接見張國華等人時又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階級本質決定他們要鬧事。」而且，平叛（即武裝鎮壓）也是早有預謀、早有準備的，只是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自以為，只要我們開始平叛、廢除協議、提前六年進行民主改革，等待解放的農奴必定站到我們一邊，支持平叛並起來批鬥農奴主，西藏上層發動的叛亂很快就會平息，而翻身後的人民，也會很快擺脫農奴主和少數宗教上層分子的影響，完全團結在我黨周圍，西藏問題也和內地各省一樣，用不了多少時間就徹底解決了。後來的事實證明，形勢並沒有按我們的設想和預謀發展，而是越來越麻煩了。第二，有意放走達賴是個大失策。這是由於對西藏的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認識不夠，特別是不瞭解達賴喇嘛在西藏民族和藏傳佛教中的地位和影響。毛澤東12日的指示中明確提出，「達賴及其一群……他們逃走時，我以為我軍一概不要阻攔，無論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以上引文均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出的《解放西藏史》）。他認為，放走達賴是讓印度尼赫魯背上這個「包袱」，我們反而可以在西藏去掉障礙、放開手腳搞改革。其實，留下達賴，不但完全可能，而且非常必要。那時他還年輕，只是受到身邊一些上層分子的挾持和影響，又怕這些人的加害。從他出走前的處境以及同我方保持聯絡管道和頻繁交換信函等情況看，不能說他早已下決心叛逃而沒有什麼猶豫和動搖。可以說，他的最後出走，既有被挾持的成分，主要還是我們大開了

方便之門，這就讓那些上層分子帶著達賴和數百名衛隊，於 3 月 17 日晚從容逃離拉薩，經過半個月的水陸行程，毫無阻攔地於 31 日順利到達印度佔領區。如果留下達賴，那就可以使我們對他進行教育和做工作，特別是有利於爭取藏族群眾和佛教僧侶，增進漢藏人民間的團結，也杜絕了外國敵對勢力對他的利用。50 年後的今天，這些問題已經看得更清楚了。

放走達賴給我們國家帶來一系列不良後果：例如：曾使我們在三年困難時期進行了艱苦的三年興兵平叛，也給藏區經濟、政治（特別是漢藏關係）造成極大破壞；由於大量藏傳佛教信徒在我們和達賴的鬥爭中總是站在達賴一邊，也使西藏形勢長期得不到安定；達賴及其 10 余萬追隨者先後逃亡國外（當時只有 17 萬人的山南地區就有近萬人參加叛亂，其中 8 千余人的主力一開始就逃往印度），並在歐美等地進行叛國活動，使西藏問題日益國際化；中印關係從此變友為敵，長期影響兩國關係和民族感情；中蘇分歧走向公開（塔斯社就中印邊界問題發表聲明。赫魯曉夫除訪華時同毛澤東激烈爭吵，其中包括批評毛放走達賴，還開始到處不指名地批判和譏諷中國的內外政策），兩國關係迅速惡化。

改革開放初期，胡耀邦對西藏問題提出的一整套方針政策，就是為了緩解以至收拾極左路線造成許多尖銳矛盾的爛攤子。但是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他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主張沒有得到落實。他在位的時間又不長，對落實的情況似乎也不太清楚。所以當 1989 年春，聽說拉薩發生了動亂，「他滿懷憂慮地說了一句「原來情況很好的呀！是什麼原因引起來的呢?」就再也不說了。」（孫鳴泉:《最後的交談》，載《懷念耀邦》第 1 集）他沒有想到，他對西藏（包括新疆）民族區域自治問題的撥亂反正，只是一陣微弱的清風，很快就被吹翻了過去，而且愈演愈烈。這不只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國家和各族人民的悲劇。

上面我們談民族區域自治的名實不符，也是個言行不一的問題。這可是中國黨的老毛病，說的一套，做的一套，而且自認一貫正確，極少注意總結經驗和汲取教訓，使歷史上犯過的錯誤一再重複出現。特別明

顯的是執行極左路線、錯誤地整人和殺人，事後一般都是隱瞞起來不再提起，或者以擴大化為託辭了事。一般還設為禁區，不准談論。這民族區域自治就是一個因諱疾忌醫付出過慘重代價的例證，看來今後還會忌諱下去，並繼續付出代價。如果我們的民族區域自治不是為了進行應付（不但國際共運中一直講民族自決，而且二戰後的民族獨立運動高潮也使民族自決原則成為普世價值，還被寫進聯合國憲章），而是像前面引證的胡耀邦所說，「實行真正的民族自治」，「自治就是自主權」，西藏的幹部和群眾「要充分行使自主權」，「保護你們民族的特殊利益」等等，那就大概不會有現在的西藏問題、新疆東突等問題了。即使在共和國前30年已發生和存在過，那麼，認真落實胡耀邦的撥亂反正並堅持下去和不斷完善，這後30年也會不再成其為問題了。當然，族際間的矛盾總是會有的，民族分離主義也是世界上較普遍的現象，但像現在西藏問題、新疆問題鬧得這麼嚴重卻並不多見。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前面說過的民族平等問題。由於中國黨接受共產國際狹隘的宗派主義特別是中國歷史傳統中華夷之分的大漢民族主義的影響，所以對少數民族不能平等相待，多有歧視情緒而少有照顧精神。這裏也只舉幾個特別明顯的例證。

中國的民族自治有名無實，主要是出於對少數民族的不信任。「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舊社會傳統，還影響著對少數民族的關係和族際問題的處理。這在組織路線和幹部政策上表現得最明顯，不但遠不如美國等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比當年蘇聯、南斯拉夫等社會主義國家更加狹隘落後。我們不只是要「黨管一切」，而且還要「漢人當權」。例如以前蘇聯也是實行一黨專政和以黨代政的，但它的各加盟共和國，黨的第一把手大體上都是該共和國的主體民族出身，黨委和政府成員也多由本地人組成，很少由中央和外地派來。少數民族幹部到中央工作都是擔任實職，而不是虛位。有的全黨和全國領袖就出身於少數民族，如斯大林、鐵托。這在中國，既沒有發生過，也不能想像。我們的做法是，少數民族中黨和群眾的領袖人物甚至老革命，一般都不能擔任自治區的黨

委書記，書記必須由中央派漢族幹部來當，黨委和政府中有實權的成員也多是外來漢人。對於少數民族中原來地位高、有威望和做出過重大貢獻的人，總還不放心讓他們在原地工作，而是要調來北京，安排以名為國家領導人的人大副委員長或政協副主席等虛職，如西藏的十世班禪、阿沛．阿旺晉美，新疆的包爾漢、賽福鼎等。其實，他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並不亞於派往當地的漢族領導和其他許多國家領導人，何況他們還有對本地區情況熟、和群眾為同文同族的優勢。美國人民能放心地選舉少數民族的非洲裔公民奧巴馬當總統，更不用說許多第一代移民就當大官了。可我們竟不相信長期傾向和追隨我們甚至是老黨員的少數民族幹部！這不是狹隘的大漢族民族主義又是什麼？

胡耀邦 1980 年視察西藏時提的三大政策，「免征、放開，走人」，這「走人」就是指把歷年進藏的大部分漢族幹部調回內地，西藏的工作主要靠藏族幹部。他贊成萬里提出的二八開，即藏族幹部佔 80%。如果真的照此辦理，從縣、地級直到自治區黨委，民族幹部在同級中佔絕大多數並真正有職有權，那就實現了真正的自治，這樣的領導構成也基本上可以行使保衛本民族利益的自治權了。可惜這些並未做到。當時也確實走了些人，但黨管一切和漢人當權的局面並未改變，後來反而加強了。

我們不僅在幹部政策上不相信少數民族出身的人，更嚴重的是對整個少數民族不信任，實行明顯的歧視，用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標準觀察和處理問題。例如，為什麼同一民族的香港就可以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對台灣還會更加放寬標準），不同民族的藏區就不允許「藏人治藏，高度自治」呢？為什麼港、澳、台可以實行「一國兩制」，而地處大陸的少數民族就只能和漢族「一刀切」，「跑步」進人社會主義？如果說對港、澳、台是由於情況不同，不得不作出讓步，那不是有點「欺軟怕硬」，拿原則做交易嗎？如果說這是出於地處大陸那些少數民族廣大群眾的要求，恐怕是沒人相信的，包括高級領導。因為藏人和其他許多少數民族原本不知道什麼是社會主義，後來搞的那一套都是搬來漢人地區的模式，強加給他們的。所以胡耀邦 1980 年 5 月視察西藏時就批評過

去西藏工作有錯誤，如前面所引，說：「根本問題是極左路線的破壞，在工作上硬搬內地的一套，搞「一刀切」」。「我的意見是放寬、放寬、再放寬」。萬里更直接了當地明說，「最好你是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的西藏。」

正是由於落實了放寬政策，乘了全國改革開放之風，特別是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和一些省市的對口援助，西藏的經濟發展特別是GDP的增長，要比全國平均數快得多，群眾生活也有了明顯改善和提高。這當然會使廣大勞動人民感到?尚意，尤其是那些50年前當過農奴的老人，嘗過當年的苦，更知道今日的甜。但就整體來說，藏人對於黨管一切和漢人當權的不滿並沒有減退，甚至還在加重。所以1989年春發生了拉薩動亂，還實行了一年多的戒嚴，但2008年又發生「三一四」事件。西藏形勢至今不穩，不能完全歸之於境外敵對勢力的顛覆滲透，主要還是由於我們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有問題。胡耀邦在十二大報告中說，「民族團結、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對於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來說，是一個關係到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提出：「我們一定要提高全黨對民族問題的認識。」此前和此後的事實都證明，不但全黨，領導上就對民族問題認識不夠，也沒有採用團結和平等的政策，而是主要用壓服和灌輸的辦法進行管理，都帶有強制性。這樣做的效果是不會好的，特別是對那些民族和宗教結合得緊密的族群和教徒，就更是如此。

我們長期從階級鬥爭的立場出發看待民族問題，也一直用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的觀點看宗教，所以對宗教總是不信任，總有一種近乎自發的排斥心理，不但要加以控制，還要按自己的模式進行改造。這當然只能引起他們的不滿和反對。我們又習慣於不從自己方面找原因，只知道強制教育和進行鎮壓。但是壓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矛盾就越來越激化了。這些辦法對極為鬆散的基督教都沒用，例如得到政府大力扶助的愛國教會就競爭不過地下的家庭教會」。這說明，作為人類精神現象的宗教，是不能單用提高物質生活、加強行政管理、以及進行政治教育，就能使信徒們接受控制和願意改造的。其實，非法參加「家庭教會」，並不是因為更窮，相反，多數倒是收入可觀和較有文化的人，其中還有越

來越多的高中級知識分子。控制和改造的那一套，對於教規嚴格、數百年的政教合一和幾乎帶有全民族性的藏傳佛教就更沒用了。（新疆一些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也有類似情況。）藏族中的佛教徒，是宗教信仰高於一切。不少信徒甘心情願做苦行僧，寧願傾家破產也要堅持一步一跪拜地去拉薩朝聖，這種虔誠豈是物質誘惑和武力威脅能動搖和改變的？解放已有60年，在這期間，不談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方面的改變，單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我們在藏區推行的各種矛頭直接間接指向宗教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運動可以說是從未停止過。頭30年無休止的折騰不用去說，後3。年治理和干涉宗教的運動也沒中斷過，只是形式有所變化，但並不手軟，在有些問題上還更強硬了，如強制批判活佛、對佛事活動進行限制、對寺廟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對僧侶信仰與活動的干涉等。但是效果如何呢？真應按胡耀邦的號召，來一個「再認識」，好好檢查總結一下了。

總的說來，60年來，我們黨在少數民族地區做了很多工作，也犯了不少嚴重錯誤。這恐怕是無人能反駁的。在經濟發展和生活水準方面，頭30年的停滯甚至倒退不再說它。後3。年，主要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都進入了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期。但是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說到底還是個人心向背問題。而涉及人心問題就不那麼簡單了。例如黨和政府給了西藏那麼多幫助和照顧，使他們過上了空前的好日子，但由於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有問題，你能說西藏絕大多數群眾（包括多數黨員和幹部）在心底裏是把共產黨和漢人擺在第一位呢，還是把崇拜佛祖和在世活佛擺在第一位？如果雙方有矛盾，發生衝突，他們會站在哪一邊？恐怕不能否認，多數群眾是心裏一直站在佛祖和活佛一邊的。不過由於歷史條件和道德風俗的影響，有些人表面上擁護前者，實際上內心和在關鍵時候或有利條件下還是站在後一邊。這樣看來，我們反倒培養了一批兩面派，還上了一些假裝積極的人的當。就是對於派往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幹部特別是領導人，也是用「左」的標準衡量。凡是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同情和保護少數民族利益、也敢說真話的人，總會

遭到懷疑，甚至沒有好下場。凡是照搬內地一套，按「左」的要求行事，只做表面文章，保持穩定，不出大事，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幹部警惕性高，加強控制和鎮壓的人，總是官運亨通，受到表揚和提升。說老實話，西藏和新疆一些地方，至今形勢緊張，不得安寧，不敢對外開放，沒有贏得民心，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壞在了這些人的手上。

根據胡耀邦在上世紀80年代上半期對民族區域自治問題提出的方針和部署，結合過去的實踐進行「再認識」，問題當然不只上面談到的這些。不過我們可以設想，如果能夠一直按他的指示精神去辦，也許少數民族地區早已形成安全穩定的局面，不會再出現什麼大亂子，中國也就真地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各民族團結友愛、和睦相處、互助合作的大家庭了。

應該認真落實胡耀邦有關的指示精神，歸納起來主要就是下面這幾條。

一. 尊重和信任少數民族，實行真正的充分的民族區域自治。做到這條的標誌是：

1. 實現毛澤東承諾的「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和胡耀邦提出的「不要照抄內地，也不要照抄中央」，按關於新疆問題的《第四十六號文件》規定，中央只抓國防、外交和內政否決權，其餘交給新疆、西藏等自治區自行處理，不合乎自治區實際的中央文件、法規等也可以不執行，不搞十一刀切」。

2. 自治區的黨政幹部必須按耀邦、萬里所提，縣以上民族幹部占80%。這應按級計算，即在自治區、地市和縣三級都各占80%，縣以下全為民族幹部。如果是全體幹部不分、上下合在一起計算，那就沒什麼意義了。比如自治區一級漢族幹部占主要地位和多數，又掌實權，那下面特別是縣級的比例有多大也都無所謂了。總之，耀邦的精神是大力裁減漢族幹部（即所謂「走人」），讓民族幹部在憲法的框架下領導本民族當家作主。

3. 作為國家主體民族的漢族，必須對兄弟民族平等相待，真心尊

重，誠懇幫助，不加歧視。凡進入自治區工作的漢人均須遵守自治區法規，受自治區管理。對原來定居和新進入自治區的外族人員，也應規定一些必要條件和守則，以限制盲流。

二. 實行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動自由。

1. 民主改革已破除了一些少數民族原有的封建農奴制和政教合一制，以後就應當認真執行政教分離原則，並制定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守則，不得違犯。如寺廟不得進行政治活動和干涉行政事務，宗教活動不得包含政治內容，政府不能對寺廟實行政治管理，不可強制組織學習等。

2. 按胡耀邦 1982 年 7 月和 8 月的嚴格批示，土改後的寺廟及其所屬土地山林由僧道自己管理，實行僧人治寺（也含讓脫產僧尼盡可能自食其力之意）。對喇嘛和阿訇等神職人員，按有關宗教規則和傳統進行管理，不得強迫還俗、強制改造和實行其他歧視。

3. 信仰自由適用於所有合法宗教，不得厚此薄彼、對此嚴對彼寬的不同待遇。

三. 民族自治區繼續進行改革，得遵守以下原則：

1. 所有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內容的社會改革，都須根據自治區情況，因地制宜，在取得本民族廣大群眾和大多數宗教上層人士的真正同意後，才可由試點到推廣。否則應當繼續等待。已有的改革，凡不適合當地情況，群眾又有強烈要求的，允許逐步改過來或進行其他補救。

2. 宗教習俗的改革更須十分慎重，不得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強制實施。包括胡耀邦提出改革某些極為落後的宗教陋習，如藏傳佛教的長途跪拜、穆斯林的割禮、自殘等，也要從教育著手，提高教徒們的覺悟，做到廣大群眾自願。

3. 胡耀邦主張的自治區對外開放，不限於對國內其他省市，也是對外國的開放。在西藏，他特別強調對印度、尼泊爾和其他南亞國家，要利用旅遊資源的優勢，大力吸引外國人來藏旅遊，在經濟上也為中國打開了一個西南大門。在新疆，他更強調那裏的對外開放，提出要開創現代的絲綢之路。他反對在自治區搞閉關自守、暗箱作業，限制外國人旅

遊、參觀、採訪，特別是弄虛作假，欺騙洋人，連中國人的知情權也被剝奪。把本來是經濟快速發展，面貌Et新月異的自治區，弄成密不透風、極為神秘的圍城，那就太不合算了。所以我國的西藏、新疆等自治區，應該發揚成績，改正錯誤，向世界顯示出自己光明磊落和開放透明的精神、以及燦爛輝煌的歷史和令人羨慕的未來。這有什麼不好呢？

四．胡耀邦特別重視保護、繼承和發揚少數民族的文化，認為這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具體提出辦西藏大學，藏族學生要佔98%，規定進藏的漢族幹部要把學藏語列為必修課。這樣，藏人就不會有藏語被漢語代替（所謂漢化）之憂，西藏文化也會隨著世界和中國文化的發展而發展。他甚至提出漢族音樂不得在西藏佔主要地位，為主的必須是藏樂。其他如西藏歷史、文學、戲劇、醫藥等，也要發揚光大。至於文物古跡的保護和修繕，就更不用說了。

五．所有這些旨在使各民族團結友好、愛國家愛民族，使自治區和平穩定、繁榮開放的政策與措施，能夠實現的先決條件，還是整個中國的民主化。也就是經過政治改革，變成一個憲政法治的國家，否則沒有可能。如果在全國，仍然是黨管一切，自治區再加上一個漢人當權，那不但自治區會更為動盪，全國也是很難做到安全穩定的。

（2009年2月28日改完）

耀邦與知識、知識分子

——紀念胡耀邦逝世 20 周年

鍾沛璋

胡耀邦同志參加革命時是只有初一文化程度的「紅小鬼」，而從長征開始的戰爭年代，他總是一手拿槍、一手拿書，從不忘學習。60 年革命生涯的磨練，胡耀邦成長為一位通曉馬克思主義、知識淵博、經驗豐富的中國共產黨的傑出領導人和人民領袖。出身我國著名大學、通曉外語、黨的老宣傳部長陸定一，曾由衷地稱讚胡耀邦是「大知識分子」。耀邦的一生的確與知識、知識分子不可分離。

我認識耀邦是 1953 年他主持青年團中央工作之後。我在上海任《青年報》總編輯，到北京參加團的宣傳和報刊會議。我驚奇發現這位「身高不足五尺，其貌不揚」（耀邦自語），而且說話帶口吃的領導，作起報告來卻有極大的思想感染力。我聽他作的第一個報告，講的就是「學習是青年更加突出的任務」。

中國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造，我在《青年報》上發表《青年們，把青春獻給社會主義》的長文，《人民 H 報》全文轉載，引起耀邦注意，把我調到北京《中國青年報》工作。在以後的 10 幾年裏，我曾親聆耀邦的教誨。耀邦十分重視團的報刊工作。他經常把團報、團刊、出版社的領導和宣傳部長，召集到他家裏，及時傳達他參加的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和其他領導同志的講話，並親自出題目、談思想，指示如何做好宣傳。我曾按照耀邦出的題目，為《中國青年報》寫了多篇社論和評論文章。我還

曾協助耀邦連續起草了三屆團代大會的報告。在這些報告和文章中，號召青年學習，掌握知識，向科學進軍，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內容。

在連續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掃四舊」「狠批封、資、修」的暴行，使我國知識分子和文化知識遭到極大摧殘。粉碎「四人邦」後，百廢待舉。被迫停刊11年的《中國青年報》復刊後不久，耀邦就積極支持發表曾以手抄本私下廣為傳播，青年作家張揚描寫知識分子愛情故事的《第二次握手》，給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作家極大的鼓舞。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我國知識分子遭受一次又一次的災難，而在「文革」中，知識分子更被稱為地、富、反、壞、右、叛、特、資（走資派）之後的「臭老九」，被打入地獄的最底層。耀邦開始在中央工作後，就奮力把廣大知識分子從苦難中解救出來。他一方面大力推動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使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從「左」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大力推動改變長期以來黨對知識分子的極左政策。耀邦主持黨中央組織部工作時，就做了大量工作。他指出：「沒有知識分子四個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推翻舊世界，需要知識和知識分子；建設新世界，更需要知識分子，而且應當說，在我們這樣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能否掌握現代科學文化知識，是決定建設成敗的一個關鍵」「首先要改變對知識分子的看法，要把「臭老九」改變為與工人、農民一樣的「香老三」。」過去中央組織部只管中高級黨員幹部，從來不管知識分子。耀邦到中組部後專門成立了宣教幹部局，專管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並由中組部牽頭，中宣部、統戰部、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等13個單位參加，組建了知識分子工作聯繫小組，定期開會，協調解決各種問題，使堆積如山的許多問題，猶如冰雪遇到了春風，逐步得到了解決。耀邦還極大關心在「文革」遭到摧殘的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民主黨派，提出了「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使共產黨領導的愛國統一戰線，進人丫新的階段。

胡耀邦還以極大的熱情關注在「文革」中已被窒息只剩「八個樣板

戲」的我國文藝創作。他多次激情地向人們朗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的第一篇文章——《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的一段：「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是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耀邦要求：凡是因所謂「文藝黑線專政」、「30年代文藝黑線」、「四條漢子」、《海瑞罷官》、「三家村」、「黑戲、黑會」、「黑畫」、黑線回潮等等而被審查、點名批判、錯誤處理或受株連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在耀邦的具體指導下，成功地召開了有3200名代表出席的文藝界大聚會——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由耀邦審閱修改定稿的周揚題為《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報告，總結了建國30年文藝工作的經驗教訓。文代大會洋溢著團結奮進的激情，極大地推動我國文藝創造繁榮的新局面。

耀邦深感過去宣傳部門的弊端，把宣傳部門變成文藝界的「管教所」，設置了數不盡的清規戒律，還搞了許多帽子、棍子。這是文化專制主義。宣傳部門應該成為文藝界前進中的「服務站」。為此，還指導全國文聯黨組為黨中央起草了1982年第十一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認真貫行第四次全國文代大會精神的通知》。文件明確指出：文藝工作要堅定不移地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揚藝術民主，堅持「三不主義」，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切實保證人民有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的自由。文件重申不應違背客觀規律，憑個人意志獨斷行。

耀邦對新時期知識分子工作的指導思想，他所做的種種努力，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把耀邦看成是知識分子的知心人，卻遭到堅持極左思想領導的不滿和反對。

1982年，我被調到中宣部新聞局工作，按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積極推動全國新聞改革。當時中宣部也在中南海辦公，有機會見到耀邦同志。我看到香港報刊登載許多以胡喬木為代表堅持極左觀點的一些領導，對耀邦的攻擊活動，感到很擔憂。一次我帶了幾本香港刊物去見耀邦，想請他看一下。耀邦卻坦然明確地對我說：「我不看!」。有一次

去看耀邦，他正在案前思考，他說：「不要誇大文藝作品的作用，應該允許創作自由，不要把文藝創作看成洪水猛獸。」可以看出為了保護文藝創作自由，耀邦想了許多。

當時有幾位著名的作家和學者正受到來自上面的點名猛烈批判，使耀邦感到十分為難。

一位是部隊作家白樺，他創作的小說《苦戀》（拍成電影的名稱是《太陽與人》），描寫一位知識分子在「文革」中受盡摧殘，十分坎坷，他的女兒問他：「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吗?」這是處在困境中一句激憤的辛酸話，被左派抓住認為「叛國」、「反社會主義」。耀邦一方面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不好的作品，另一方面盡力使之降溫說理，以作者接受批評，而結束這場「文革」式的大批判。

一位是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作者通過尖銳揭露現實中黨內存在的腐敗，以表達對黨的「第二種忠誠」，引起有些領導的強烈不滿。耀邦曾試圖說服劉賓雁改報告文學為創作小說。

一位是北京大學著名政治學者郭羅基，是耀邦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中稱讚的「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偉大鬥爭中，湧現了一大批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善於思考問題，敢於發表創見的闖將」之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剛開過，郭羅基就寫了一篇題為《思想要解放，理論要徹底》，指名批判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耀邦曾看了三過，親自作了修改，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發表後被「左派」理論家認為是「徹底否定毛主席」的大毒草，耀邦自然也遭到強大壓力。郭羅基分析：「耀邦和我建立一種頗為特殊的關係。他對我很賞識。在某種壓力下，他又來批評我：批評之後就保護我。當泰山壓頂的時候，他又不保了。我倒了大楣，他則表達深情的關懷。」這種「特殊的關係」一直繼續到郭羅基被迫調離北京、被迫出國。胡耀邦「包庇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的罪名也就鐵定的了。

郭羅基後來在《耀邦精神不死》的長文中寫道：

耀邦如流水，常注我心田。

流水不止。耀邦一生不断追求。它推動我前進。

流水不腐。耀邦一生清正廉潔。它激勵我反腐敗。

流水無形。耀邦和人民打成一片。它召喚我愛人民。

耀邦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擔任黨中央的領導，雖然他心如流水，與人類現代文明的長河聯在一起，但上有老人「垂簾聽政」控制，中有長期形成的「左派」勢力的攻擊，處境十分艱難。儘管他無私無畏，一再反對帽子、棍子的文化專制主義，但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的帽子、棍子還是不斷向他壓來。雖然他與趙紫陽一起堅決剎住進行了28天的「清除精神污染」的「小文革」，但終究還是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作為一個重大罪狀，被迫下臺。

根據李昌同志向中央提出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議，耀邦在中央領導崗位的幾年中，曾對精神文明建設不斷進行探索和闡發，直到他下臺前，用半年多時間親自領導起草《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經過徵求兩千多人的意見，數易其稿，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討論，終於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獲得通過。《決議》明確指出：「黨在長時期內的重大失誤，就是沒有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仍然堅持階級鬥爭為綱，輕視科學文化建設，極端擴大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這個傾注耀邦巨大心血，有理論深度，又有極大現實指導性，原本可以動員和團結全國知識分子為之奮鬥的，堪稱為中國社會主義倫理學的《決議》，隨著耀邦下臺，被束之高閣，猶如石沉大海，從此無聲無息了。

耀邦被迫下臺，驚震了全國和世界，特別是廣大知識分子感到無法理解。一位與耀邦素不相識的楚辭專家，以陸游贈朱熹的詩句「民望甚饑渴，公行胡滯留」，書贈給他。耀邦讀了這個字非常感動，卻感到難以回答。直到一年後，他在煙台療養時，才把自己久久蘊積於心底的真情，化作古風詩篇，詩中寫道：

明知楚水闊，苦尋屈子魂。
不諳燕寒險，卓然傲蒼冥。
閉户驚葉落，心悲秋草零。
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極翻作豔陽春。

詩中表露了耀邦憂國憂民的屈子心態和對美好未來的期待和信心。

1989年1月，耀邦在他家鄉湖南最後訪問的地方是岳麓書院，留下最後的墨蹟是「尊重知識」，表達了他對千千萬萬中國同胞的最後囑咐和殷切期望。

耀邦偉大的一生，與知識、知識分子緊緊連結在一起，與人類文明的發展緊緊地連結在一起。

(2009年2月16日)

耀邦反對文化專制

——兼論開放報禁的必要

辛子陵

在紀念改革開放 30 年的時候，我們深深懷念胡耀邦同志。粉碎「四人幫」之後，在鄧小平、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耀邦是為改革開放大業揮斤運斧、披荊斬棘的開路先鋒。當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遇到強大阻力的時候，派他去當中央组織部部長；當「兩個凡是」像攔路虎一樣，橫陳思想領域，阻礙解放思想的時候，派他去當中央宣傳部部長。這兩個重大問題的解決，為國家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性轉變創造了前提。胡耀邦從 1980 年 2 月被選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這是有黨的主席和副主席體制下的總書記），到 1981 年 6 月被選為黨的主席，到 1982 年 9 月在十二大改變領導體制被選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總書記，到 1987 年 1 月辭去總書記，前後擔任黨的主要領導職務長達 7 年之久。由於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戴和支持，胡耀邦成為改革開放事業的肇始者和奠基人。

耀邦在恢復工作後就一直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發揚民主、言論自由、反對文化專制。他剛剛擔任中宣部長，就要求宣傳部不要去搞「把關、審稿、砍人家東西的事」，說「這是過去國民黨搞我們的」。他幾次向文化界人士推薦馬克思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說：「大家看馬克思講的多好啊！他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對文化專制主義。我們社會主義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為什麼要通過審查把它搞成清一色呢？我們

不搞審查。」①

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個《第二次握手》手抄本流傳事件。這是一部讚美知識分子，鼓吹科學技術的重要性，歌頌周恩來總理的愛情小說。作者張揚，19 歲。「四人幫」成員姚文元審讀後說這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張揚被捕人獄，「內定」死刑。《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出版社向胡耀邦反映此事，胡耀邦批示按冤案處理，知道受害者是知青，還指示將他的戶口遷回長沙，安排工作。張揚得以平反回城。《第二次握手》1979 年 7 月正式出版，兩三年內總發行量達 430 萬冊，並有朝、蒙、維、哈薩克等 4 種少數民族文字譯本。這部長篇小說的印數說明它受到了讀者罕見的歡迎。

胡耀邦為許多思想犯平反，但他無力從法律上、從制度上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這需要高層統一認識，修改法律，改變制度。

長期以來，特別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鉗制輿論，萬馬齊喑，眾口一詞，黨犯多大錯誤都是「偉、光、正」，領袖犯多大錯誤都是「萬歲、萬歲、萬萬歲」，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再遭受嚴重挫折，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慘痛的歷史教訓。改革開放 30 年了，經濟建設事業有了飛躍的發展，但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跟上，言論自由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紀念耀邦同志，我們要繼續反對文化專制主義，為中國人民的言論自由而鬥爭。這個言論自由是廣義的。《憲法學》公認的定義是：「言論自由，就是憲法規定公民通過 N 頭或書面以及著作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因此從廣義說，新聞、出版、著作、繪畫等自由也可以包含在言論自由之內。」②

① 何方：《胡耀邦导是四「五四」傳統的偉大繼承者》。

② 《憲法學》（高等學校法學試用教材），群眾出版社，1984 年。

我國新聞出版事業是怎樣由民主走向專制的?

在我黨取得全國政權以前，曾經代表各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向蔣介石國民黨爭取言論自由。1945 年 4 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要求國民政府「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①

建國前夕，1949 年 5 月周恩來在中南海召集文化工作幹部談話時曾明確表示：我們過去在山溝裏辦報，讀者對象是工農兵和幹部。入城後情況不同了……我們的初步意見是北平、上海這樣的地方，還可以保留幾家民營報紙。② 實際上，我們不但保留了數十家私營報紙，而且還批准創辦了幾家新的私營報紙。據 1950 年 3 月統計，全國私營報紙共有 58 家，分佈於華東、華北、中南、西南、西北、東北等地區。③

1949 年 9 月召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新聞界有 12 名正式代表和 2 名候補代表參加，其中私營報業代表人物有王芸生、徐鑄成等 5 人。新政協制定的《共同綱領》規定，「保護報導真實新聞的自由。」「發展人民出版事業」。

1950 年 3 月，《人民日報》發表系列文章，批評省和專署兩級政府的工作，為媒體做出了榜樣。文章揭露：1949 年平原省濮陽專署和聊城專署在秋季徵糧工作中，組織不善，計劃不週，使運糧農民與牲畜在冰天雪地中露宿數天，以致運糧農民的生活發生嚴重困難，牲畜亦缺乏照管，

---

① 《毛澤東選集》第 3 卷，1953 年版第 1087 頁。

② 陳銘德、鄧季惺：《新民報春秋》，405—406 頁。

③ 曾憲明：《解放初期大陸私營報業消亡過程的歷史考察》。來源：www.66wen.com

結果濮陽專署造成運糧農民死亡2人，牲畜死亡50頭；聊城專署共病傷14名農民，死牛57頭，傷牛58頭。3月9日發表《徹查濮陽運糧事件》的文章指出：「首先表示濮陽專署和該地中共地委沒有認真地考慮他們當前應當做些什麼」；「第二，這一事件又表示他們特別缺乏群眾觀點，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第三，他們還極端缺乏自我批評精神」。最後，文章指出：「平原省的人民政府和中共省黨委對於濮陽事件是負有一定責任的。他們應當認真負責地徹查濮陽運糧事件，應當使與這次事件有關的主要負責人員，在群眾中、在報紙上公開進行自我批評。對嚴重違犯群眾利益的分子必須適當處分，堅決執行紀律。對受害群眾應進行道歉並適當地補償他們的損失。」3月24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平原省委和省政府關於這一事件的檢討報告。

難能可貴的是，這一事件的發現和處理，不是中央幕後導演的，是媒體主動「出擊」，發現問題、揭露矛盾的。他們在評論中說：「我們的報紙既然是人民大眾的耳目喉舌，我們就有責任揭發錯誤，直至其公開接受批評，真正徹底改正錯誤為止」。那時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報紙是多麼好啊！

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專門下達了《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該決定指出：「因為今天大陸上的戰爭已經結束，我們的黨已經領導著全國的政權，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是很容易危害廣大人民的利益，而由於政權領導者的地位，領導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產生驕傲情緒，在黨內黨外拒絕批評，壓制批評……由於這樣的原因，中共中央特決定：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在人民群眾中，特別是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於我們工作中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決定最後特別提到：「黨外報紙和刊物在同樣的精神上採取同樣正確的態度批評黨的組織和人員時，黨也應當按照同樣的辦法給予應有的合作和支

持。」[①]

1950 年 12 月，政務院新聞出版總署召開第一次全國報紙經理會議，武漢剛報》副社長兼總編輯嚴問天等私營報業代表與黨報代表共同出席了會議。會上廣開言路，知識分子建言獻策，積極性很高。

1951 年 4 月毛澤東提出文藝要「百花齊放」,[②] 1953 年 8 月毛澤東又提出學術要「百家爭鳴」,[③] 文藝界和知識界歡欣鼓舞。

1956 年，新聞改革的呼聲很高，《人民日報》7 月 1 日改版社論，提出「《人民日報》是黨的報紙，也是人民的報紙」,「人民是報紙的主人」,「報紙是社會的言論機關」，主張「擴大報導範圍」，「儘量滿足讀者的多方面的要求」,「開展自由討論」。劉少奇還提出了新華社民辦、報刊競爭、競賽等設想。[④]

可惜好景不長。1957 年 4 月 30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邀請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知識界代表人物開談話會，動員大家幫共產黨整風。然後背信棄義，突然變臉，一個「陽謀」，一場反右派鬥爭，把八個民主黨派打癱瘓，把 55 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政治思想文化領域進入了寒冬。黨保護言論自由和與民主黨派共商國是的民主傳統從此中斷。

在「一邊倒」的大背景下，我們搬來了蘇聯新聞模式，開展大學《真理報》、塔斯社等活動，從管理體制到具體政策，都步步收緊。報導真實新聞的傳統，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民主作風，1956 年初步形成的百家爭鳴的空氣，都從報紙上消失了。1957 年 7 月 1 日毛澤東親自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宣告了民主黨派的

①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 19 冊第 127 −128 頁。

② 1951 年 4 月，毛澤東為中國戲曲研究院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③ 1953 年 8 月毛澤東與中國歷史研究委員會主任郭沫若談話時提出學術上要「百家爭鳴」。

④ 孫旭培:《論社會主義新聞自由》,《新聞學新論》，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年 7 月。

兩張大報——北京的《光明日報》和上海的《文匯報》的死刑，經過改組改制，成了副牌的《人民日報》。隨後，民營報紙及同人刊物被清除，政府部門管理新聞業的機構新聞出版總署被撤銷，新聞出版由黨的宣傳部門直接管理。從此，報紙失去了人民性，不再是「人民大眾的耳目喉舌」，進入了所謂「輿論一律」、黨報一統天下的年代。

「輿論一律」能禍國殃民到何種程度？

毛澤東為急於當世界革命領袖的野心所驅使，他拋棄了新民主主義建國理論，廢止了受到各階層廣泛擁護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急於廢除私有制，進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一個左轉彎，中國走上了以暴力為後盾的空想社會主義道路。接著發動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空想社會主義大實驗，釀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慘劇——餓死 37558000 人。[①]

在這個歷史時段，不僅社會被剝奪了言論自由，黨內也被剝奪言論自由，新聞出版工具長期被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極左權勢集團所操縱，哄騙蒙蔽人民，為空想社會主義鳴鑼開道，推波助瀾，起了特別惡劣的作用。

1956 年 6 月，周恩來總理提出反冒進問題，得到副總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支持。6 月 20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毛澤東大怒，先是遷怒於社長兼總編輯鄧拓。說「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

① 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澤東》上卷，香港書作坊 2008 年 6 月二版增訂注釋本，第 356 頁。

專門反「左」，而且是針對我的。」[1] 在一次召見報社中層幹部會議上，罵鄧拓「書生辦報，教授辦報，死人辦報。」[2] 鄧拓在巨大的壓力下，調轉方向，努力緊跟毛澤東。

1958 年 1 月南寧會議之後，毛澤東猛整周恩來，「大躍進」的空氣日益濃厚。《人民日報》接連發表社論，《鼓起幹勁，力爭上游》、《打破舊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從這時起，《人民日報》向「左」傾斜，為大躍進造勢。

1958 年 3 月 11 日，《人民日報》發表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的文章——《苦戰三月，改變全縣自然面貌》，同時配發《徐水創造了好經驗》的社論，推出這個極左典型，指出，徐水經驗可能發展成為一套領導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完整經驗。

為了興修水利，全縣打破了地界，建立了 93 個團、299 個營、1099 个連、3365 個排。有的鄉還根據勞動力的強弱和年齡的大小，組成「青年火箭排」、「壯年躍進排」、「婦女突擊排」、「少年先鋒排」。上下工要列隊，按口令行進，開工有戰前動員，收工有總結評比，從而實現了統一調配勞動力的大協作。

3 月 14 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寫了一份關於河北省徐水縣實現農田水利化情況的報告。3 月 21 日，毛澤東在看過陳的報告後批示：「徐水縣的經驗普遍推廣。」

儘管鄧拓拼命「左」傾，他還是被撤銷了《人民日報》的領導職務，6 月任命吳冷西為總編輯，8 月，任命吳冷西為社長兼總編輯。

1958 年 8 月 4 Et，毛澤東出巡視察他親自樹立的先進典型徐水縣。

為了迎接毛澤東的視察，在一個多星期之前，徐水縣委就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縣委把大部分勞力、車輛集中在鐵路兩旁和準備讓毛澤東看的地方，並且按照軍事編制，明確連、排、班負責人。路兩旁的莊稼

① 毛澤東把《人民日報》社論的摘要在南寧會議上印發，並加此批語。
② 張帆：《才子鄧拓》，海天出版社 1999 年，第 256－257 頁。

不准有雜草，地裏有人就得有紅旗。

在專列上見到來迎接的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時，毛澤東沒有想到竟是一位年僅33歲的年輕人。當得知縣委一班人小的二十二三歲，大的也不過三十三四歲，他笑著點頭說：「好，都是年輕人喲。」下午4點半鐘，毛澤東首先來到徐水縣南梨園鄉的大寺各莊農業社。他一到大寺各莊，就大步跨進社裏的俱樂部。俱樂部牆上懸掛的各種錦旗和獎狀，引起了他的濃厚興趣。毛澤東問南梨園子鄉黨委書記桂登科、大寺各莊農業社支書閻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今年的麥子收得好嗎?」李江生回答說：「很好！比哪一年都強。毛澤東又問：「每畝平均多少斤?」支書閻玉如答道：「754斤。」毛澤東笑著讚歎道：「不少啊！」隨後，毛澤東又問了秋作物的預計產量。

問了社裏的收成以後，毛澤東又問起全縣的收成。

張國忠回答說：「今年全縣夏秋兩季一共計劃要拿到12億斤糧食，平均每畝產2000斤。主要是山藥高產，全縣共種了春夏山藥35萬畝。」

毛澤東驚訝地說：「要收那麼多糧食呀！」這時候，他顯然是想起了張國忠在路上介紹的徐水的情況，就跟他們算賬說：「你們夏收才拿到9000多萬斤糧食呢！秋季要收11億呀！你們全縣31萬多人口，怎麼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

大家一時被偉大領袖問住了。張國忠答道：「糧食多了換機器。」

毛澤東說：「又不光是你們糧食多，哪一個縣糧食都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你的糧食呀！」

李江生說：「我們拿山藥造酒精。」

毛澤東說：「那就得每一個縣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麼多酒精啊！」他笑著看看大家。大家都跟著笑了起來。

張國忠也笑道：「我們只是光在考慮怎麼多打糧食！」

毛澤東說：「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哩！」很多人都在私下裏互相小聲說著：「主席看問題看得多遠，想得多周到啊！」

「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毛澤東笑著說：「多了，國家不要，誰

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

實際上，1957 年徐水的糧食畝產才剛剛 138 斤，其中夏糧畝產僅有 70 斤。

毛澤東和張國忠的對話，一位黨的領袖和一位縣委書記為秋後糧食多了發愁的對話，全是熱昏的胡話！這些熱昏的胡話上了報紙，成為全國的輿論導向。

鑒於周恩來被整的教訓，作為第二號人物的劉少奇，緊跟偉大領袖，8 月 6 日，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少奇同志關於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

8 月 23 日至 9 月 1 日，《人民日報》連載文聯副主席康濯寫的長篇通訊《徐水人民公社頌》，除了全面介紹了徐水全民皆兵、公社化、供給制、吃公共食堂等經驗，還宣佈了徐水將要發射的高產衛星：小麥畝產 12 萬斤，白菜一棵 500 斤，皮棉畝產 5000 斤，山藥畝產 120 萬斤……

康濯寫的通訊本來就夠「浪漫」的了，但他仔細閱讀報紙時，發現高產數字比原稿更「浪漫」，急忙打電話查問怎麼回事？得到的回答是，編輯部覺得他寫的數字太低，就直接打電話到徐水，把數字往高處加。[①] 這是吳冷西比鄧拓「高明」的地方，這符合毛澤東提出的「政治家辦報」的要求。

康濯又打電話問張國忠：「畝產萬斤糧食能達到嗎？」

張國忠回答：「是達不到。但是只有這麼喊，才能喊出大家的幹勁來。要緊跟形勢，不緊跟形勢就完蛋了。」

許多中下層幹部跟著吹牛撒謊，是被大躍進的聲勢逼的，跟著吹，將來完蛋，但眼下得彩頭；不跟著吹，馬上就完蛋。

在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後，徐水縣成為「大躍進」運動中的「明星縣」，成為風靡全國的「共產主義試點縣」。據統計，1958 年 3 月至 10

① 曾文經：《傳媒的魔力》，時事出版社。

月30日，先後有40多個國家、930多名外國友人和3000多個國內單位派人前來參觀。

《人民日報》繼續造勢。1958年8月27日，發表劉西瑞的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文章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穀子，這樣高產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一、兩千斤的根本沒有人提了。」

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中，1958年夏收之後，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全國各家報紙放出一個又一個「高產衛星」。僅榮登《人民日報》的就有：

6月8日，河南遂平縣衛星農業社小麥畝產2105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縣衛星農業社又有一塊2．9畝地平均畝產小麥3530斤。

6月21日，河南輝縣小麥畝產4535斤。

6月30日，河北安國縣小麥畝產5130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縣小麥畝產7320斤。

9月25日，青海柴達木盆地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小麥畝產8586斤。

《人民日報》報導河南省西平縣和平農業社小麥畝產7320斤時，被當地農民戳穿了騙局。「說實話受打擊的有一萬多人，打跑七千多人，打死三百多人！」① 政府造了假，老百姓沒有說真話揭穿的權力。運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把真話、實話消滅了。更大的吹牛造假的典型出現了。

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水稻生產要加油》的社論，催促南

① 《烏托邦祭》，蘇曉康等著，中國新聞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頁。

方的水稻生產省份也要像北方小麥生產省份一樣，放出「高產衛星」。

7 月 28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今年秋季大豐收一定要實現》：「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穫」，「沒有萬斤的指標，就沒有萬斤的措施」，「既然廣大農民決心高速增產，那就一定能夠高速增產。」

河南信陽縣雞公山公社的水稻，8 月下旬基本成熟。公社黨委於 8 月下旬連續開會，研究如何放出水稻高產衛星。公社黨委認為，能否放出水稻高產衛星，不僅取決於黨委的信心，而且也取決於黨委一班人的統一認識和統一口徑（所謂統一認識、統一口徑，就是對弄虛造假不能有任何懷疑，上報公佈後不能說三道四），這作為全體委員必須遵守的政治紀律。水稻高產衛星的標準，經過黨委研究確定，不能低於 45000 斤。28 日晚，公社黨委在新集大隊召開放水稻高產衛星動員大會。公社書記要求參加放衛星的全體社員，要統一組織，聽從社隊幹部指揮，不該問的絕對不問，不該講的絕對不講，有說三道四者按右傾論處。29 日早晨六時許，205 名社員，在社、隊幹部的組織下開始收割水稻。30 日下午，6.63 畝試驗田及其周圍 430 多畝水稻都集中統一堆放在 13 個打穀場中，日夜突擊打場，9 月 1 日中午 12 點打收結束。然後過秤計算產量。過秤結果共打稻穀 324375. 5 斤。這本是 436 畝的產量，雞公山公社黨委將其認定為 6. 63 畝試驗田的產量，（324375. 5 ÷ 6. 63 = 48925），得出畝產 48925 斤的衛星記錄，迅速向縣委報喜；然後，縣委報地委，地委報省委，省委報中央，中央登報廣播，宣佈又一顆「衛星」上天。

9 月 12 日，《廣西日報》報導，該區環江縣紅旗公社城管大隊已收的 1. 075 畝稻田，產量達到 130434. 14 斤。水稻畝產 13 萬斤，這是大躍進中吹牛造假的封頂記錄。

1958 年 8 月 25 日，農業部黨組向正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告：1958 年全國糧食總產量超過八千億斤。9 月 1 日發表會議公報時留有餘地，打了折扣，宣佈：1958 年糧食產量將達到六千億斤到七千億斤，比上年增長 60～90%；棉花產量七千萬擔，比上年增長一倍以上。

毛澤東對自己呼風喚雨造成的衛星競放的局面躊躇滿志。9 月 5 日，

他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

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裏舒暢，搞大躍进。這就是整風反右的結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產一倍（糧食），即有可能從去年三千七百億斤，增到七十幾百億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萬擔，今年大概有七千萬擔，可以超過一倍。煙葉可以超過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過半倍，這是不足的。麻類作物過去沒有注意，沒有抓緊。銅鐵可能翻一番……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億斤糧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萬五千億斤。明年也許不能搞這麼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馬喂之外，現在還沒有找到用途，也許會發生問題。但是明年總是可能超過一萬億斤。① 毛澤東昏昏然，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把大話說出去了，媒體向全世界公佈，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後果非常嚴重。秋收以後，當發現「衛星產量」都是假的，糧食根本沒有增產的時候，毛澤東傻了眼。他除了改變口風，搶佔正確路線的制高點，在武昌會議（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上開始反/左/外，為了自己的面子，毛澤東決心按各省虛報的產量跟第一書記們要糧食。於是，省委書記逼地委書記，地委書記逼縣委書記，縣委書記逼公社書記，公社書記逼生產隊長，交不出高指標的糧食來，就說他們夥同農民瞞產私分了。這個反瞞產私分，成為後來餓死人的主要原因。

三年大躍進餓死了37558000人。在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道路走至險關絕地、山窮水盡的日子裏，在饑荒萬里、伏屍千萬的恐怖歲月，黨不是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反而為掩蓋毛澤東的錯誤，製造了一個更大的謊言：三年自然災害。「三年自然災害」說，是黨中央授意製造的「輿論導向」，是為毛澤東掩蓋錯誤的一塊遮羞布。在餓死人最嚴重的1959年還想用強大的輿論把「人禍」壓下去。1959年秋天，《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地報導秋糧大豐收的消息：說江西取得了「亙古未有的大豐收」，農民「生活顯著上升」；河北「糧食超產一、二成」；貴州「玉米

①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379頁。

大面積豐收」；青海「增產一成到二成以上」；山東、安徽、江蘇「齊報秋糧豐收」。到 1960 年夏天，又報《從長江到黃河流域揭開農業大豐收的序幕》。到 1960 年(--)——」國慶日，才有高人指點，把餓死人的「人禍」轉嫁到「天災」頭上。《人民日報》國慶社論突然宣佈：「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自然災害。」接著又說：

我國農民永遠擺脫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饑餓、逃荒和死亡的歷史命運。

這篇社論告訴人們：糧食緊張，壓低定量是天災造成的；餓死人的事情一個也沒有，這是中央統一的宣傳口徑，不管聽到什麼，看到什麼，也得照這個口徑說話，否則就要犯下攻擊三面紅旗的大罪。經過一番鋪墊以後，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發佈八屆九中全會公報，宣稱：「在 1959 年的嚴重的自然災害之後，1960 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後因情況未見好轉，又順延一年，變成「三年自然災害」。

希特勒說：「利用報紙，可以使人民視地獄為天堂。」[1]「輿論一律」做到了這一步，但這是執政黨的成功呢？還是執政黨的墮落呢？「輿論一律」不是幫了共產黨，而是差一點毀了共產黨，我們今天應該有這樣的認識。

必須給人民言論自由，解除報禁

在我們頭腦中，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觀念，似乎報紙的根本任務，僅僅在於用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思想去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而忽略了毛澤東在栽了跟頭以後痛定思痛悟出來的那個真理：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毛是在總結自己，這裏所說的「人」是最高領導人。他在反省自己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根據一知半解的教條，輕率發動大躍進

---

① 轉引自 1943 年 9 月 1 日《解放日報》社論：《今天國民黨的新聞統制政策》。

闖下的滔天大禍。

假如毛澤東有蔣介石的寬容大度，允許王芸生的《大公報》繼續存在（且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派黨委書記），允許《大公報》「小罵大幫忙」，中共執政史上就不會有餓死 3755 萬人這件事情；毛澤東也不會一個跟頭摔這麼慘，毀掉了自己的一世英名。

在我們現在的政治體制下，報紙對人民是造福還是為禍，全憑最高領導人推行的路線是否正確，報紙本身無能為力。當一條錯誤路線像泰山壓頂一般貫徹下來的時候，新聞工作者在專制體制下面，再懂得真實性重要，也無法將真實新聞發表出去，更不能發表自以為正確的言論反對錯誤路線。鄧拓當時贊成周恩來的穩健的建設方針，所以才寫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但他頂不住毛澤東的「君父式」的批評，後來咬著牙「左」傾跟了一段，還是受到撤職處分。新聞沒有立法，要以最高領導人的興趣好惡為轉移，這個要害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認真的研究和解決。每當黨和國家重新走上正確路線，報紙以其真實的新聞和正確的言論重新贏得人民信任的時候，這個要害問題，也就是新聞管理體制和制度本身的弊病問題，就被掩蓋了。

在新聞出版方面，我們要大力恢復建國初期的寬鬆體制和民主傳統，恢復黨報的人民性。黨性和人民性統一的標誌，就是報紙像 1950 年那樣，成為「人民大眾的耳目喉舌」。統一於人民性，表明黨沒有不同於人民利益的自己的利益。如果統一於黨性，就表明黨有了離開人民利益的自己的利益。大躍進是毛澤東的想法，不是人民的要求。毛的意志統一了全黨，成了黨的路線，貫徹和維護這條路線，就是黨性。掌控輿論「牛耳」的鄧拓黨性不強被撤職，換上黨性強的吳冷西，為害就大了。黨性越強的地方餓死人越多，離人民利益越遠。這是黨的宣傳工作有諸多禁忌，愈來愈不能服眾、愈來愈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目前亟待改進者有三：

第一是宣傳口停止「拉偏架」，頌毛批毛受同等保護。

我們所說的出版言論自由，不止是評論電影名星和討論諸子百家的自由，首先是臧否時政的自由，是對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討論批評的自由。

大躍進失敗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黨的宣傳工作的基本任務就是製造「左」的謬論，歪曲事實真相，掩蓋毛的錯誤和罪行。五十歲以下的兩代人是在神話和謊言中成長起來的。在他們的腦海中，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共產主義天堂」，改革開放引進了資本主義的「污泥濁水」，把天堂污染了。為了從根本上打退「左」派的政治攻勢，打垮時時事事處處掣肘改革開放的「左」的意識形態，必須開放輿論，讓全國人民評論毛澤東的功過是非，瞭解歷史真相。

餓死 3755 萬人這件共和國最大的公案，黨和政府至今沒有向人民有一個負責任的、實事求是地交代，還不許人民討論。像楊繼繩的反映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專著——《墓碑》，竟不能在大陸出版，而不得不拿到香港出版。報紙上、網路上也不許人們發表揭露各地餓死人的真人真事的回憶文章。儘管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作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近年中央又表明了在適當時機重新評毛的意向，但書報檢查機關和網路「警察」沿襲「左」的傳統，以掩蓋毛的錯誤和罪行為己任，繼續壓制評毛的專著和文章的發表，頌毛的專著和文章卻一律開綠燈放行，以為這是在堅持「黨性」。否！這是給黨幫倒忙，是從根本上反對改革開放！

目前在中國，舊的話語權——毛澤東思想，比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來，其號召動員能力要強大的多，極左派正以「毛澤東思想」拉大旗作虎皮，迷惑動員群眾，進行瘋狂地反撲。標誌性事件是 2008 年 1 月魏巍論文集《新語絲》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公然反對建立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鼓吹「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① 與剛剛閉幕的十七大唱對臺戲。魏巍是極左派代表人物之一。臨終前留下遺囑，對(一)一七大上把鄧江胡思想作為獨立的理論體系，指導思想已經砍掉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表示不能容忍，把現任各級領導人列為「革命的對象，是黨內走資派和篡黨奪權的修正主義叛徒集團。」我反對魏巍的觀點，但不反對給他出書，按照憲法應保護魏巍的出版自由；但同時也應該保護楊繼繩的出版自由。只准頌毛，不准批毛，宣傳暴力社會主義的網站受保護，宣傳民主社會主義的網站被查封，好像又回到了姚文元在宣傳口當家的時代，這是不正常的。要創造民主平等、擺事實講道理的輿論環境。要解開相當多的群眾認為改革開放不如毛時代的心結，只有把毛時代的真相告訴他們。那些受蒙蔽的人，一旦瞭解歷史真相，知道了那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主義天堂」，是一個餓死過3755萬人的人間地獄，定會幡然醒悟。只有讓全黨同志講話，讓全國人民講話，重新評毛，不同的觀點交鋒，把魏巍提出來的問題辯論清楚，看看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毛澤東思想是怎樣「救」中國的？才能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打敗極左派，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取得主導地位。

第二是設置對立面，扶持民營報刊。

胡錦濤說：「我們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② 問題是怎樣知道民意呢？靠「黨性」極強的官方媒體是不行的。歷史的教訓是：施政者與評議者高度一體化，政府和媒體都姓「黨」，自己搭台唱戲，自己鼓掌

① 極左派作家魏巍的文集《新語絲》2008年1月由中國文聯出版社作為《晚霞文庫》叢書出版，該書鼓吹「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在第290頁上責問：「到底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理論應該不應該保留，你們徵求過全國人民意見嗎？」公然向胡錦濤挑戰。文聯<簡報>第2期，讚揚魏巍「心之誠，情之切，言之重，令人感動。」這股極左思潮不容忽視。

② 《胡錦濤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喝彩，是很難和民意溝通實現正確領導的。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大陸所有的報刊雜誌、廣播電視，從來沒有反映過真實的民意。黨和國家領導人耳邊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就既難發現、更難糾正正在發生的全局性的錯誤，這就是為什麼1958年浮誇風能一直刮到1960年春天，為什麼每年餓死幾百萬人的事情能連續4年發生，為什麼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壓制民意長達1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所謂「設置對立面」，就是開放報禁，扶持民營報刊，黨和政府為自己設置一面能客觀評價政績的鏡子。毛澤東在1957年4月說過：「我看每個省辦兩個報紙比較好，一個黨外辦，唱對臺戲。」① 就是這個意思。可能胡喬木認為毛說此話不是誠意的，在編選《毛澤東選集》第5卷時沒有選；但這話是正確的，是毛澤東思想中的民主性精華。

我國歷史上辦得最好民營報紙是《大公報》。1902年由滿族人英斂之創辦的《大公報》以客觀、真實、敢言著稱。1926年張季鸞接手後，在派系林立、軍閥爭鋒中提出「四不主義」的辦報宗旨：一曰不黨，不依附於黨派、軍閥和財閥，立場客觀公正；二曰不賣，報紙不搞有償新聞和評論，也不向社會收取一文錢的經濟贊助；三曰不私，報紙所發言論必取國民之公意，不代表少數人說話；四曰不盲，報紙不跟風，不盲從於各種時髦主張。這「四不主義」使《大公報》在強權林立的派系中和錢能通神的商業社會保持了文人論政的本色，不屈服，不媚俗，不虛偽，不偏激，不炒作、不盲從，如實記錄歷史，深刻反映民意。在那個國共兩黨尖銳對立的年代，毛澤東說只有這張報紙「把我們共產黨當人」，② 蔣介石則每天必看此報，而不滿國民黨自己辦的黨報。兩黨最高領導人都對《大公報》給以高度評價。在中國報業史上，還沒有別家報紙有此

---

① 胡績偉：《從華國鋒下臺到胡耀邦下臺》，明鏡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頁。

② 鍾沛璋、張博樹：《推進新聞體制改革重構現代新聞制度》。（鍾沛璋，1982—1986年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局長。張博樹，憲政研究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博士；本文是作者提交2008年6月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的「技術與制度：中國傳媒改革開放3。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論文。）

殊榮。

對《大公報》貶意的評論是所謂「小罵大幫忙」。任何獨立的民報，要想在社會上立足，必須取這種立場，這是它與執政黨的機關報和革命黨（或反對黨）的機關報的根本不同點。它不能對現政權持敵對立場，而又要對社會有所裨益，就只能是針砭時弊，反映民意，促進社會的改良。「小罵大幫忙」是說雖批評了政府但其長遠功效有利於政權的鞏固。這是民報正確的立場，是光明正大的立場，不應該被貶低，被譏諷，而應該受到社會的理解和尊敬。

胡溫新政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旗幟，要代表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利益，要建設和諧社會，尤其需要這種既不仰賴權力，又不仰賴資本，客觀公正、反映各階層、各界別、各民族聲音的民間報紙。開放報禁，准許民營報紙出版，是下情上達，瞭解社會動態，瞭解民心向背最實在的民主形式，最直接的民主渠道。

按現行新聞媒體的批准註冊登記制，要創辦報刊，必須由「主辦單位」經「主管部門」同意後方能提出申請，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或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新聞出版局審批。民營報刊沒有「主辦單位」和「主管部門」，則根本不具申請資格。顯然，必須改變這樣一種制度設計，民營報刊才能出現。

辦一份像《大公報》那樣的有水平、有威信、有操守的民營報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有一個成長的歷史過程。可考慮讓有條件的報刊轉型。目前最具備條件的，報紙是《南方週末》，刊物是《炎黃春秋》。如果讓這一報一刊徹底民營化，政府多扶持，少限制，最好是不限制，擺脫一切條條框框的束縛，他們一定會不辜負黨和政府的期望，不辜負社會的期望，為建設和諧社會架起溝通政府和民眾的橋樑。

第三是制定新聞出版法，新聞出版徹底擺脫人治。

我們學來的蘇聯新聞模式，在報刊上揭露和批評官員要經過審查批

准。現在發展到內部報導也要審批：凡涉及省上工作特別是省領導層問題的內部報導稿件，必須經過有關省領導審查。這一條規定就把對領導幹部的內部監督通道堵死了。儘管在規定中規定了各省領導對送省稿件有不同意見可提出，但不得扣壓，可是有誰願意把反映省上問題的稿件送給省上的當事人去審查呢![1] 現在不僅高級領導人不能批評，連縣級領導人也批評不得了。去年竟然發生縣委書記派公安人員進京抓記者的事情。因為一篇報導涉及遼寧省鐵嶺市西豐縣縣委書記張志國，西豐縣公安局以「涉嫌誹謗罪」為由對采寫報導的《法制日報》記者朱文娜進行立案調查。2008 年 1 月 4 日，被稱為「最牛的縣委書記」張志國派西豐縣公安局多名幹警，到北京《法制日報》社拘傳記者朱文娜，成了京城一大新聞。現在是當權者以言代法，言出法隨，報刊觸及他或不順他的心，就下令撤總編、抓記者；新聞工作者只能看當權者臉色行事。擺脫人治，制定新聞出版法已經是不容再拖了。

老報人馮英子寫過一篇雜文《孔狗江馬論》發表在 1998 年《書屋》雜誌第一期，說的是在揭露官員及其親屬腐敗劣跡問題上，我們的民主還不如國民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孔二小姐帶著叭兒狗坐飛機從香港飛往重慶，「重慶輿論譁然，全國也輿論譁然」，連乃父孔祥熙出錢辦的報紙也不得不抨擊一番。而江青在毛主席病重期間，竟然動用專列，帶子四匹駿馬，率領大小臣僚去大寨遊玩之事，在江青垮臺前，媒體絕對不敢揭露。當年輿論抨擊孔二小姐，國民政府新聞制度是允許的。我們說那是「資產階級假民主」。但「假民主」是真揭露，「使孔二小姐之流不能不有所顧忌。」正如馮英子所說的，「如果有一點起碼的民主，即使是那種揭露孔二小姐的假民主，那麼「四人幫」就不一定有孳生的溫床了。」

再不要用什麼「資產階級假民主」為我們自己的「無民主」做盾牌了。請問：美國揭露克林頓的性醜聞是真民主還是假民主？是真民主!

① 谷翔：《輿論監督對防腐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炎黃春秋》2008 年第 11 期。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其「特色」絕不能是為領導人文過飾非，那是「為尊者諱過」，是封建專制，不是無產階級民主，更不是真民主！

社會主義新聞出版法的立法基礎必須采追懲制，而不能再深文周納強化預防制。據法學家凌其翰的《出版法》[①] 一書介紹，所謂預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須受政府機關之干涉，在出版之後，仍須受法律之制裁」。所謂追懲制，就是「出版物既無須受檢查，亦無須求特准。且不必向行政機關呈報，自出版以至發行完全自由。惟出版物若有違法事實，自當於出版後依法懲治。」世界各國新聞出版法制的發展，走的是由預防制向追懲制過渡的道路。無疑，追懲制比起預防制是一個歷史性進步，給了新聞出版業較多的自由。英國早在1695年即廢除了預防檢查制。日本於1869年廢止預防檢查制。我國目前實行的書報審查制度，比英國落後300年，比日本落後140年。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有關部門就曾醞釀過新聞出版法的起草，後來被叫停。這件事情應該重新納入政治體制改革的議事日程。我們的新聞出版事業必須有法可依，有法保護。不能是哪位領導人或前領導人看到某一報刊某一篇文章不合自己的口味，就興師問罪。在民主國家，新聞工作者不受法律以外的權力的約束，上至總統下至普通官員都可以批評，被稱為「無冕之王」。在中國，新聞記者「無冕之王」的地位要樹立起來。再不能出現縣委書記追捕記者的醜聞。特別應該強調的是，我們要立的法，是保障新聞出版自由的法，而不是壓制新聞出版自由的法。我們制定新聞出版法的目的是為了切實維護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和對

① 凌其翰（1906—1992）法學家。上海市人。震旦大學肄業。1927年赴比利時留學。1931年獲布魯塞爾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上海《申報》國際評論員兼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國民政府外交部禮賓司司長，駐法國大使館公使。編著《出版法》。1949年10月參加駐法國大使館部分人員通電起義，1950年回國。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法律顧問，外交學院兼職教授，民革中央監委常委。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至七屆全國政協常委。主編《國際條約集》（1648－1971）。

公共權力機構的監督權。什麼時候我們有了這樣一部法，中國的新聞出版事業才真正進入了法治化的軌道。

新聞出版自由是社會的淨化劑，對官員的監督有特效。民主國家沒有「紀委」和監察部，就靠媒體監督。給媒體鬆綁，就能管住官員以權謀私貪污腐敗。媒體是把貪官們見不得人的事曝光的載體，也是上達中央的「通天」渠道。貪官最怕的無非就是這兩條，一是曝光，二是通天，這兩條的威力是其他監督方式不可替代的。我真不明白，若真反腐敗，為什麼放著全世界通行有效的方法不用，而又作秀創設反腐新機構？難道換塊牌子就加強了反腐力度？事實證明，中國特色的黨內反腐機構管不住黨內的官員，官員監督官員，等於用白貓監督花貓，是靠不住的，多年來「越反越腐」就是證明。真想反腐敗，就把對官員的監督交給群眾，交給媒體。希望中央以此表明反腐敗的誠意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

發展民營經濟是個大政策

林京耀

在改革開放中崛起和迅速發展的民營經濟，不僅在解決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和城鎮失業人群問題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而且在解構我國城鄉二元結構（雖然二元戶籍制度至今仍沒解決）和推動農村城市化進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30 年來，民營經濟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率每年都大幅度提高，近幾年其在經濟總量中已占到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由於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民營經濟（包括個體經濟）無立足之地，因此，雖然有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大背景，但民營經濟的起步仍十分艱難，非議、反對之聲不斷，有人通過各種所謂調研報告，企圖把民營經濟定為社會主義的「對立面」而扼殺在搖籃中。與歧視、反對民營經濟的意見相反，胡耀邦站在強國富民和滿足民眾的需要的高度，極力支援和提倡發展民營經濟。

1981 年 8 月 22 日，耀邦同志視察河北保定時指出，河北保定離北京、天津很近，交通方便，保定應利用這個優勢，把河北盛產的花生、芝麻、核桃、棗子、紅果等農副產品運到京、津去賣。他對地委第一書記邢崇智說：保定地區有些縣的人到北京賣農副產品，你們不要禁止，禁止了不利於搞活經濟。這 說的到北京賣農副產品的人就是農民或個體商販。「包產」到戶，農民有了多餘的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適應這種情況，城鄉的買賣活動出現了並且發展迅速，有人把從事販賣糧食和其他

農副產品的人稱為」二道販子」，對此，耀邦同志說：「什麼二道販子？是二郎神！農民手裏只有點糧食，不販賣糧食還有什麼好賣！應當允許長途販運，應當幫助農民出賣餘糧！」這樣旗幟鮮明地支持農民和個體商販販賣農副產品的活動，在當時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

調整農村經濟結構，發展多種經營，這是農民脱貧致富的重要途徑。按照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傳統模式，經濟結構調整也好，發展多種經營也好，其主體都應該是國營或者是集體的，即應該是姓「公」的。在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這種模式不斷地被突破。姓「公」已不再跟性「社」劃等號，姓「私」或姓「民」也不再跟姓「資」劃等號了。但突破這種模式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這需要衝破墨守陳規的思想羅網和「左」的干擾。在這一點上，胡耀邦是很清醒的，他針對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產業、行業，提出發展民營經濟的方針、政策和措施。1982 年 1 月，他就江西贛南地區發展柑桔生產問題致信江西省委書記白棟材，指出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贛南發展柑桔的方針，「不僅不應該採取以國營為主、集體為基礎、個體為補充的方針，也不應該採取以個體為主、集體和國營為輔的方針，而應該堅定不移地、腳踏實地以大力支持個體種植為主、集體專業承包發展種植為輔的方針。所謂大力支持個體種植，就是要迅速將社員住地附近的小塊荒坡、荒原、荒灘和田頭、水邊等小片空閒地固定給社員去種植，至少一定三十年不變。在這些土地上種植柑桔的經營、收入、出售等權利，完全要由社員自己支配，除土地所有權仍屬集體所有外，不應當再附加其他限制條件。」「只有採取這樣的作法，才能迅速地把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而採取這個方針，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絲毫不存在什麼危險性。在當前的情況下，辦什麼國營或集體柑桔場的方針，在我看來，是功倍事半的，是不可取的。」總之，「個體種植」是當前條件下發展柑桔生產的最好方針。

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後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專業戶，實際上就是當時民營經濟的主體，後來成為民營企業，許多民營企業家的第一桶金就是在這個時候獲得的。對農村專業戶，胡耀邦一直持支持和鼓勵的態度。

1983年2月8日，他在談到農村專業戶的發展問題時說，要引導專業戶、重點戶搞開發性的承包和開發性的投資，搞交通、荒山、荒田、荒灘、荒塘的開發，搞飼料公司等。1983年12月22日，在主持中央書記處討論審議《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時，他指出，為了保護和大力發展農村商品經濟，要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天上地上水上一起來，要保護專業戶，支持專業戶，發展專業戶。這裏把「個人」和「國家集體」並列，都要「一起上」，這是非常重要的。過了幾天，即26日，他又進一步指出，「當前，發展專業戶，發展小城鎮，就是個大政策。公安、糧食部門不要戶口卡得那麼緊，現在時代變了，有一部分農民逐步轉到集鎮去，這不亞於農業責任制。」這裏講的「大政策」非同小可，特別提到了「戶口」問題。雖然作為城鄉二元結構的標誌的二元戶口問題至今沒有解決，以至進城鎮務工的農民仍被稱為「農民工」，但畢竟可以跳出「農門」進城務工了，有些農民後來還成為民營企業家，這確是「生產力的又一個大解放」。除了發展養豬、養羊、養牛專業戶、專業大戶，還要發展運銷、經營專業戶，老百姓可以自己買汽車用汽車搞運輸，放手讓農民搞運輸，而不要搞規模大的官司辦運輸公司。1984年8月24日，在河北遷安視察時指出，發展農村多種經營，「重點是發展兩戶一體，少搞國營，不要一搞就是大鍋飯」。1985年2月10日，在視察雲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時說，「要搞鄉鎮工業，特別是家庭工業，聯戶工業，幾戶人家聯合起來搞，來得最快。你們這裏煤、錫、銻、錳、鎢、磷等礦藏那麼多，要放開，允許個體、鄉鎮辦礦，允許他們同外地聯合起來搞，採取自願的原則，省、州、縣都不要干涉，只要有必要的技術和行政的指導管理，收他的稅就是了。」簡明地說，發展包括個體經濟在內的民營經濟，「要放開」。

發展民營經濟必然會涉及雇工問題，當時有些人認為雇工多少個人以上就是私家營企業，就是剝削，而「剝削」是姓「資」的。1983年3月，在一次討論農村雇王問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力群說雇工要分清有沒有剝削，多少雇工算是小業主，多少雇工算是私營企業，要搞雇

工問題調查研究。針對鄧力群的發言，胡耀邦說：「這是從概念出發。」一語擊中了鄧力群們的要害。鄧力群們反對改革開放的許多立論，都是從既定的概念出發的。

在農村改革以後的一段時期內，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問題仍然是一個敏感的問題。1983 年 7 月 20 日，胡耀邦在視察甘肅慶陽地區時談到牛、馬、騾、驢、駱駝等大牲畜的所有制問題，他說，幾十年來，大牲畜「都要收歸集體，越收歸集體就越沒有。後來就變成私有，這個問題就解決了」。「牛馬騾驢駝，私有、運輸才能活。否則，就活不了。」「私有再加上販運才能活，兩都缺一就行不通」。也就是說，大牲畜這樣的生產資料僅僅允許私有是不行的，還必須讓所有者可以用這些生產資料去掙錢，獲得利潤，否則就活不起來。

在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以後的很長時期裏，人們工作、就業也分為三流九等，把到國有企業工作、勞動看作是最光彩的，因而千方百計、甚至走後門找關係進去，而到集體企業工作、勞動則被看作是次一等，不大光彩，不得已而為之。除國有、集體企業以外，其他地方即使有活幹，甚至收入也不低都被認為地位、身份低下不光彩而不願意幹，當時許多待業者並不真正是無業可就，而是本人不願意幹被認為不光彩的工作職業。針對社會上在就業問題上的一些陳腐觀念，胡耀邦於 1983 年 8 月 30 日在會見全國發展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安置城鎮青年就業先進表彰大會代表時發表了題為《怎樣劃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講話，他說，誰光彩，誰不光彩，怎樣區分光彩不光彩，「不能只看表面，只看招牌，不看內容，不看本質」。「從事集體和個體勞動同樣是光榮的，因為你們為國家和人民做出了貢獻。「凡是辛勤勞動，為國家為人民做了貢獻的勞動者，都是光彩的。什麼是不光彩的，什麼是最不光彩的？好逸惡勞不光彩，違反勞動紀律不光彩，違法亂紀最不光彩。」這篇講話為包括個體經濟在內的民營經濟的發展掃清了最後的思想障礙。

1986 年 8 月，胡耀邦在視察青海省時對當地黨政軍領導幹部說：「長期以來，我們的管理體制有一個嚴重的弊端，就是過於集中，統得太

死。」這是「總病根」。改革開放以前，排斥民營經濟，民營經濟沒有存在的空間，就是這個「總病根」造成的。30 年來，針對這個「總病根」，我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制定了有利於民營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的政策、法規。今後，民營經濟要進一步發展，使民營經濟在我國產業鏈的各個環節（除了特殊的環節）都有它的發展機會，還需要從體制上進一步改革，使民營經濟繼續健康發展，有更完善的機制環境。

胡耀邦在對外關係上的撥亂反正①

宋以敏

我們這裏所說的對外關係，是指對世界形勢的認識與判斷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國際地位有了顯著提高，人們都歸之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國內工作方針作了根本性的撥亂反正，也就是改「以階級鬥爭為綱」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當然是對的。但在對外關係上的撥亂反正，長期以來，人們卻提得不多，可能重視不夠。其實，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際上，這兩個撥亂反正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後者更為重要。因為對世界形勢的根本判斷，是我們制定對外和對內政策的基礎和前提。試想，如果我們一直認定，大戰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那還能放心大膽地埋頭于經濟建設嗎？正是在這個世界形勢判斷和對外政策的撥亂反正上，胡耀邦在當時中央領導人中是認識比較清醒、也提出得最早的一位，對我們黨和國家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在這方面極為豐富的思想和實踐，或被抹殺，或被歪曲，人們很難看到歷史真相。所以，進一步挖掘、研究和發揚這方面的寶貴遺產，不僅為了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且聯繫這些年的情況來看，更有迫切的現實意義。有鑒於此，在紀念他逝世2。周年的時候，我也就不揣淺陋，在這

① 本文引用胡耀邦的話均出自盛平主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

個問題上做點初步的梳理和探討，不知能否起到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為什麼要把胡耀邦上世紀 80 年代前半期在對外關係上的認識和工作，叫做撥亂反正呢？這是因為，至今的主流輿論，直到黨中央，從來都只承認我們國家，特別是毛主席，在國內工作中犯過「左」的錯誤。雖然極不徹底（國內問題上，胡耀邦的看法也和黨的主要領導人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有很大不同），但終究承認有錯誤，因此自然要進行撥亂反正。但是對世界形勢判斷和外交問題，黨中央，也就是它的主要領導人，在改革開放初期一個不短的時間裏並不承認犯過錯誤，因此也就不存在什麼撥亂反正問題。後來雖然不得不改變一些看法、對外交政策作相應的調整，但還是肯定過去，不提撥亂反正，或者加以淡化和回避。這表現在研究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期間，鄧小平就斷然否定了胡耀邦著重於總結經驗、汲取教訓的提綱和意見，而堅持重點為維護毛主席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旗幟，以及更多地肯定過去，特別是對國際和外交問題的完全肯定。例如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節裏，談到毛澤東對文革「的全局性的、長時期的「左傾」嚴重錯誤」時，卻又說，「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並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對照我國後來對國際事務的實際認識特別是在對外關係上的實踐，《決議》的這些論點還能站得住嗎？正是這種外交上一貫正確的論斷，使我國外交部在對外表態中才習慣於使用「我們歷來主張」、「我們的立場是一貫的」這類提法。這就很難講得通我們在各個時期都有的政策調整，特別是文革期間提出的「一條線」戰略和改革開放後在世界形勢判斷和對外政策上的根本性變化。而這種一貫正確說法和前後不同做法的兩相背離，只能以對研究討論設禁區來掩蓋。但這樣做，對自己來說，就無法認真汲取經驗教訓，使我國 60 年來極為豐富的外交實踐難以得到科學總結，上升為系統理論，有些情況甚至連做到自圓其說都不易；對外來說，會減弱我國一直在做的使別國對我國增信釋疑的工作效果，損害國

家的形象，給人留下我國對外不透明和不講真話的印象。

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論。改革開放初期的領導人中，胡耀邦就反對掩蓋錯誤，主張總結經驗，還歷史本來面目，從中汲取教訓，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只是由於他雖然處於總書記的崗位，卻受毛澤東思想和當時「老人政治」領導格局的制約，對重大問題的發言權有限，更不用說決策權了。在強調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則下，他的一些獨到見解和銳敏看法，就不能坦率提出和公開表白，只能講得很婉轉，甚至很隱晦。即使在內部或其他場合提出某些和鄧小平、陳雲等不同的意見，媒體也很少報導，更不會得到宣傳，所以也鮮為人知。例如對建國頭30年的錯誤，鄧、陳和中央的正式提法，都沒有提到路線高度，時間也控制在20年，更多地還是限於文化大革命。可胡耀邦卻多次提到過去犯了「極左路線」的錯誤，而且不限於文革，在十二大報告中就說要「對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傾錯誤進行全面清理」。但是，為了同中央保持一致，他的許多獨到見解，不但不得不講得極為含蓄，甚至往往還要附和兩句他並不同意的相反提法。例如他多次講過戰爭打不起來，但後來在十二大報告中還是不得不加一句鄧小平一再講的「世界大戰的危險由於超級大國之間的爭奪，而越來越嚴重」。雖然有這麼多的曲折和對不同意見的附和，不過只要我們進行較為深入系統的探索，特別是從同一時期和主要領導人對同一問題講話的對比中，就不難發現胡耀邦的敏銳思想和獨特見解。這方面最容易被埋沒的，也許就有他對國際形勢判斷和外交政策上的高瞻遠矚。這也是本文特別標明他在對外關係中進行撥亂反正的原因。

胡耀邦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勇於正視我國對外關係過去和現在所存在的種種問題，並及時進行調整和改變；在撥亂反正中，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政策的新依據、新原則、新方針，以及外事工作所應採取的新做法和應具備的新風貌。這是對中國外交的突出貢獻，值得我們，特別是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和進行外交工作的人員認真研究和學習。這裏就先對以下三個問題作點初步討論。

一. 對世界形勢和時代問題的新判斷

在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中，胡耀邦最早看出和平與發展是兩大時代特徵，認為世界大戰可以避免，主要潮流是發展而不是革命。

(一) 對時代特徵的判斷是國家對內和對外戰略決策的根本依據

關於時代問題，中國學術界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曾進行過長時間的熱烈討論，到 90 年代上半期才漸趨一致，這就是都認為和平與發展是我們所處時代的基本特徵。雖然至今還有人不同意和平與發展時代的提法，但是也不能和不敢否認這兩大時代特徵。既然如此，就很難說有個不由基本特徵決定的別的什麼時代了，再爭論也只能是抠名詞了。說「不敢」，是因為黨中央在 1987 年十三大報告中已正式宣佈「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也即時代特徵的提法。可此後又為什麼還有人不同意把時代特徵和時代結合在一起呢？這就很難說了。也許是由於固守列寧和各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提法，或者是受「「左」比右好」的傳統影響的緣故。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接受「左」派人士至今還堅持的這一提法，並且一直持續下來。由於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徵是戰爭與革命（列寧說，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所以人們也簡稱為戰爭與革命時代。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也是這樣說的。直到建國後頭 30 年，我們還更強調這一提法，當然也就按這一判斷制定自己的戰略方針了。這就是：對外，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對內，以階級鬥爭為綱，從不斷革命發展到「全民皆兵、準備打仗」，而且是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歷史已經一再證明，人們

也越來越看得清楚，這一判斷和決策，不但使中國喪失了一個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發展的黃金機遇，而且把國家推到幾近崩潰的邊緣。經過荒誕的文化大革命，全國從上到下才逐漸覺悟到，不能再這樣胡折騰下去了。

出路何在？除了在文革中的「四人幫」追隨者和少數不願放棄既得權益和思想極保守「左」派以外，全國上下在必須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這一點上很快就達成共識。這就又碰到了對世界形勢和國際環境的估計，也就是對時代特徵的判斷了。

集中搞經濟，人們的思想轉變比較容易，但改變對時代的判斷可就比較難一些了，因而需要經過一個時間不能太短的過程。特別是當年參與決策並長期積極執行的領導人，要他們改變過去堅持的觀點和否定自己的長期作為，那就更加困難一點。所以按鄧小平創立的「核心論」，以他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除胡耀邦（也許還有別人）外，主要領導成員在決定以經濟為重點之後，對時代問題的看法，是「戰爭與革命」還是「和平與發展」，就一時變不過來。陳雲恐怕對傳統論斷堅持了一輩子。因為直到1989年，他還針對和平與發展時代問題的討論，發表了《帝國主義本性沒有改變》的談話，說「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為此，鄧力群還專門組織北京思想界和學術界部分人士對和平與發展時代做了四次批判和討論的座談會（見何方：《論和平與發展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5月版）。就是鄧小平本人，作為以前的反修先鋒和這時的領導核心，大約文革後還經過了將近10年才逐漸改變了對時代特徵的觀點和判斷，而且還說得比較含糊。由於他是核心，所以只有他的變化才意味著黨中央的變化。黨的方針政策，特別是對外關係，也只能以這－N斷為根據，進行調整或改變。可見，鄧小平在時代判斷上的轉變對我們國家是多麼重要。這就值得多說幾句了。

對時代的判斷首先是對戰爭（鄧小平說，「我們講的戰爭不是小打小鬧，是世界戰爭。《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4頁）的看法，鄧小平是經

過了一個極緩慢的變化過程的。文革結束後頭3年，仍然堅持戰爭不可避免，還一再強調戰爭因素在增長。例如1979年7月18日，他在我國第五次駐外使節會議上明顯針對胡耀邦第一天的講話，講了一篇強調戰爭危險，強調「一條線」戰略思想的話。他說，「國際形勢比前一段更加動盪，戰爭因素更加增長，而且隨著形勢的發展，以後還要更加動盪，戰爭的因素還會不斷增長。現在公開議論戰爭的人多起來了，這不是無風起浪，戰爭的危險確確實實在增長。7「戰爭要來只能來自蘇聯，要立足於它早來，立足於大打；要採取「一條線」的思想，聯合兩霸中間的一霸，美國起碼是間接同盟軍；要肯定蘇聯叫社會帝國主義。」（轉引自《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這當然影響內外決策。所以那幾年，對內並未放鬆備戰，如大小三線的建設；對外，還提高了「反修」的宣傳教育，直到組織人員編寫《社會帝國主義論》；更加強調蘇修是戰爭的主要根源和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因而要進一步加強聯美反蘇的「一條線」戰略，以至導致以武力「教訓」越南。

那幾年，對國際形勢與對外關係，特別是戰爭與和平的看法，完全繼承文化大革命時的估計和做法，有些地方還提得更高了點。這集中地表現在胡喬木受命起草的《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一文中，這是一篇特長文章，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於1977年11月1日，佔了整整六大版（後來在為胡耀邦起草十二大報告時，喬木又對李慎之等人說，那篇文章是胡說八道）。

之後的三四年，鄧小平的看法逐漸轉變為戰爭有可能推遲，至於推遲的年數，從起初的三五年到不久後的10年，再到爭取20年或更長時間。就在他帶頭決定國內工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候，已經顯露出對國際形勢的估計和國內建設的需要發生了無法解決的矛盾。從他的許多談話中都可看出他內心由此引起的焦慮。例如他一再講要爭取10年、20年或更長時間的和平，使我國經濟有個大發展（直到1984年2月還對外賓說，「中國需要20年的和平，以便聚精會神地搞建設。」）另一方面又老講戰爭不可避免。那就正如他事後所說，整天誠惶誠恐的，怎麼能安

心搞建設？我們建設得好好的，等戰爭一打，一切不又完了。顯然，這種看法必須改變。從他自己修改審定過的《文選》看，他的變化開始於1984年10月10日同德國總理的談話。他說，「1974年你來訪問，我們曾經談到戰爭危險，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一點變化。」

完全改變，可能是1984年11月1日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講話。他說：「講戰爭危險，從毛主席那個時候講起，講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幫」後我們又講了好久。現在我們應該真正冷靜地做出新的判斷。這個判斷，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們能夠安安心心地搞建設，把我們的重點轉到建設上來。沒有這個判斷，一天誠惶誠恐的，怎麼還能夠安心地搞建設？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確定我們建軍的正確原則和方向。我們既然看准了這一點，就犯不著花更多的錢用於國防開支。要騰出更多的錢來搞建設，可以下這個決心。」對這一判斷的正式宣示，則是1985年6月4日他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主要談的就是對國際形勢判斷和對外政策有兩個重要轉變。第一個是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認識，「我們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第二個是改變了聯美反蘇的「一條線」戰略。此後，經過黨的十三大，和平與發展作為世界主題或時代特徵就完全定下來了，至今30多年再無變動，大約今後相當長時期都不會再變了。

鄧小平和以他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時代判斷和對外戰略的改變，當然是經濟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這一客觀需要的推動和實踐檢驗的結果，也是對國內外輿論和我們自己有關機構提交的科研成果的審視與採納（例如，1980年李一氓就提出和平可以維護，三個世界的理論站不住，應當承認蘇東各國為社會主義並和外國兄弟黨恢復關係；宦鄉也早提出應和美國拉開距離、對蘇調整關係的研究報告），更不排除對領導成員中不同看法的考慮。這裏要特別一談的首先就是胡耀邦的思路和提法。

（二）在中央領導人中最早提出戰爭與和平的新見解和新判斷

如同我們前面說過的，胡耀邦由於他的身份和處境，改革開放初期在國際形勢和對外關係上即使有新見解，如果同中央主要領導人鄧小平、陳雲等多少有所不同，也不會直截了當地提出，更不能大張旗鼓地宣講。但是從現在可以看到的材料，特別是盛平所編《胡耀邦思想年譜》中，就能發現，涉及和平與發展這兩大特徵，他有一系列早於其他領導人的談話和提法，而且是有系統的，並不是偶爾說過那麼一兩句。

胡耀邦早就不同意當時流行的所謂「兩霸相爭必有一戰，戰爭危險主要來自蘇聯」的說法。他也明確反對把蘇聯進攻我國看成發生戰爭的主要危險。1979 年 7 月 17 日，他在我國第五次駐外使節會議（也就是上引鄧小平講話的那次會）上說：「過去我們說蘇聯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變了，現在回過頭來看，可能我們那個時候研究得不成熟，提出的理由不充分。這個說法必須重新考慮。我們必須把蘇聯統治集團奉行的政策同它的社會制度區別開來。不然我們在外交政策方面和理論方面就站不住腳。」「蘇聯統治集團反華，20 年來亡我之心不死，但不等於他要搞亡我之戰。他要搞對華戰爭，進行亡華之戰，我覺得不容易。他的決心不容易下。同時，蘇聯人民以及相當多一部分幹部，對我友好之心未滅，希望同我們友好。單看領導集團亡我之心不死是不全面的。」他的這些完全正確的意見在當時的中央領導中並未得到回應。前引鄧小平在第二天會上的講話，更是對他的直接批駁。不管怎麼說，他們對戰爭的評估存在分歧，在當時已經完全顯現出來了。

胡耀邦也很早就注意不要在宣傳上老講「戰爭不可避免」、「打起來也不怕」、「全民皆兵，準備打仗」之類的話。認為這些話不但不符合實際，在世界輿論中顯得孤立，而且嚴重影響我們的國家形象。1981 年 3 月 9 日在中央書記處專談外事工作的會議上，他就說：「維護世界和平這

面旗幟，我們必須高高舉起。」由於胡耀邦對戰爭與和平問題早有明確認識，所以在鄧、陳等主要領導人和主流輿論還在不斷談論戰爭不可避免的情況下，他在十二大報告中已斷然指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維護的」。當然，由於中央領導對戰爭與和平問題還存在分歧，他對和平的觀點雖然成竹在胸，報告中也還須提得面面俱到一些。不過在國際問題研究界卻把十二大看成了分界線：在這之前的中央提法是戰爭不可避免（只能爭取推遲），之後已變為和平可能維護了。宣傳上，也從此顯著降低了戰爭威脅的基調，而主要是講和平了。

胡耀邦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提法，是自覺地出自對時代特徵的理解，就是說，這是他對時代認識的新觀點。因為，胡耀邦非常瞭解正確認識時代所涉及問題的重要性。例如 1985 年 7 月 15 日，他在中央黨校學員畢業典禮上作報告時就明確提到，「如何觀察形勢，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門大學問，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策略上的一個大問題。只有正確地觀察形勢，才能夠正確地決定奮鬥方向和方針政策。」

胡耀邦由於對戰爭與和平一直有這樣清醒的認識，所以在鄧小平提出世界存在兩大問題並正式宣告改變對戰爭的判斷和放棄「一條線」戰略之後，他就更加強了對和平與發展的強調和宣傳。例如 1986 年 6 月訪問英國期間，他在回答《大公報》記者的提問時就有針對性地說，「十幾年以前我們所提的「戰爭不可避免」，現在看來講得太絕對了一點。應該糾正這一觀點。」

（三）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支援世界革命問題上的撥亂反正

毛澤東是列寧主義者，歷來主張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革命勝利後，支援世界革命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到了晚年，他更進一步認為世界革命中心已移到中國，他也已成為世界革命領袖，支援世界革命也就更公開更積極了。鄧小平在文革前以及此後相當時期，都是毛

澤東對外路線的堅定支持者和積極執行者，特別是在反對「蘇修」的鬥爭中還受到毛的高度讚揚。毛後來對他的不滿主要是在國內問題上，文革後期重新啟用他時，講的理由之一就是他反修堅決、立了功。

事實上，中國對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支援世界革命的立場也一直都是公開的，多次表示我們為援助外國革命「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犧牲」。毛澤東 1975 年 7 月就曾對泰國總理克立說：「（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要求我，不要跟他們國家的共產黨往來。我說，不行呢，因為我也是共產黨。哪里有共產黨不支持共產黨革命的?」鄧小平在文革後的 1978 年 3 月 31 日，會見泰國總理江薩時也說，「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個問題極大。如果我們改變了這個原則，就等於在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面前放下了武器，連在意識形態上反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資格都沒有了，會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譴責。」（朱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外政策的調整》，2008 年《炎黃春秋》第 11 期，日期見《鄧小平年譜》。）

胡耀邦文革後的認識就截然不同。1977 年 5 月他在一次針對一份中央文件中稱「四人幫」是「正在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談話中，就曾對反對「蘇修」、支持世界革命的《九評》持否定態度，說，「現在看來，《九評》的基本方向是錯的，這個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國際根源。」他還問道：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領域，到底應該反對資本主義、反對修正主義，還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反對流氓無產階級?」他在十二大報告中也特別強調：「革命決不能輸出。」

根據列寧解釋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一是要一國無產階級利益服從全世界無產階級利益，二是取得勝利的民族要為推翻國際資本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這本身就是輸出革命，所以蘇共二十大後已不再多提。但中國黨的反修，卻首先從反對赫魯曉夫的「三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開始，因此特別強調堅持和履行國際主義，把支援世界革命的旗幟舉得更高，實際行動也更加有力。其實，在共產國際還存在的時候，蘇聯出於外交利益考慮已不再公開宣傳輸出革命，許多援助行動也轉入秘密。蘇共二十大，特別是蘇東劇變後，各國共產黨，除個別

小國小黨和「左」派組織外，都先後放棄了國際主義旗幟，甚至進行公開批判。中國黨也從十三大起正式放棄了這個口號，從此不再提起。但是真正的轉折還是在十二大。

為了不割斷歷史，保持一定的連續性，十二大報告中提了一句「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從來是我們處理對外關係的根本出發點」。但報告把國際主義解釋為「深深懂得中國民族利益的充分實現不能離開全人類的總體利益」，也提到國家間的相互援助，特別強調「革命決不能輸出」。這與列寧的解釋有天壤之別，也不同於馬克思所提「工人無祖國」。胡耀邦還把各國間的友好相處也納入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含義中，使兩者的結合不再同世界革命相聯繫，還與狹隘民族主義劃清了界限。他 1986 年 11 月 8 日出席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奠基典禮發表講話時就說過這樣一段話：「我主張世界上一切國家的青年都要熱愛自己的祖國。每個青年都應該把自己的一切和祖國的命運聯結起來。青年要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一切。當生育撫養自己的祖國遭受侵犯時，就應該奮不顧身地捍衛她。但是，這是否就是愛國主義最完整的標準呢？這還不夠。還要同別國人民和睦相處、友好合作這樣一種富有遠見的國際主義精神結合起來。」「如果中國青年只想到自己的國家好起來，而對我們現行的開放政策不積極，對同日本、同世界一切國家的青年講團結、講友好、講互助互利不熱心，那就夠不上是很清醒的愛國青年」，「歷史上有不少的人，因為只有狹隘的愛國主義，結果變成了誤國主義。我希望中日兩國青年從歷史經驗教訓中汲取智慧，把自己鍛煉成為充滿愛國主義激情同時又富有國際主義精神的高尚的現代人。」

在世界革命問題上撥亂反正不只是說說而已。這個時期中國在實際行動上也停止了對世界革命的援助。例如，鄧小平採納了李光耀的意見，中斷了同東南亞各國黨的關係，停止了對它們的各種援助，包括關閉馬、泰共在中國的廣播電臺、撤出為緬共創建的解放區中的中方人員等。再就是不但全面徹底終止了對越南的援助，也單方面廢除了一切援阿（阿爾巴尼亞）的協定，立即和全部撤出中國專家。整個對外經援數量也從

1970年代最高時佔我國財政支出7%左右，一下降到不足1%。

為了適應對外關係這一個重大戰略變化，即告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停止支援世界革命，胡耀邦早在1979年3月21日中宣部召開的有關對外宣傳會議的講話中就提出要改變對於對外宣傳的看法。他說，「宣傳國內的東西，目的究竟是什麼？過去講是為了「促進世界革命」，我看這是大話，現在不宜這麼提。」「我們要實實在在地規定我們對外宣傳報導的任務，不要硬去加上什麼「提高左派思想」呀、「爭取中間群眾」呀、「分化上層人士」呀……我們搞對外宣傳，主要的還是為了增進各國人民對我國的瞭解和友誼，為了創造有利於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國際條件，也包括盡可能有利於促進國際反霸鬥爭。」

以上這些都說明，胡耀邦對於作為時代特徵的戰爭、和平與革命的問題，早就有了清醒的和十分肯定的認識。這還可以從他以下的回顧中看出來。1986年7月20日在河北省委召開的承德學習會上，他就國際問題發表了長篇講話。他說，「和平與發展，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的這兩條政策和中國的論斷有沒有根據呢？對不對呢？我們要爭取長時期的和平環境，這有沒有根據？是否正確呢？我到日本去一看（按為1983年），得到了這個印象。這次又到西歐去一看，更加深了我的印象。」這個印象就是：「戰爭打不起來，世界大戰打不起來，這也是一個事實。簡單地說，就是想打的人不敢打，怕打的人更加怕打。少數人想打，想以武力來解決問題，但他們不敢打。從日本到西歐，對戰爭的恐懼，那是勝過我們中國人幾百倍的。個別人即使想打也是不敢打的，打一場世界大戰哪有那麼簡單呀。」由此可見，當人們還在談爭取戰爭推遲若干年的時候，胡耀邦早已對持久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了成熟的看法和更加肯定的信心。

（四）對另一時代特徵的發展問題早有深刻而全面的認識

除了和平代替了戰爭，新時代的另一重要特徵就是發展代替了革命。

胡耀邦對這一特徵的認識，從上述反對革命輸出和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思想中已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認識的「發展」，還不止人們說的主要指第三世界的發展，而是指全世界的發展，也就是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化。事實也正是如此。以建國後頭30年來說，論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貢獻，不管論質論量橫比豎比，都是西方出現了空前發展，南方即第三世界，除少數中小國家和地區外，大都沒有什麼發展。對此，胡耀邦有很好的說明。1986年7月20日在承德學習會上，他說，「亞非拉100多個國家，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三四十年以來，它們為爭取自己的獨立，鬥爭了幾十年的時間，但一般說來情況都不妙。民族獨立取得丫很大勝利，但經濟發展都不好，絕大多數國家情況不妙。」因此，不是抱怨西方的發展，而是如何從全球化的觀點出發，促進南方發展得更快一些。

胡耀邦在涉及發展問題時，總是立足於全球化，提倡全世界加強交流與合作；對第三世界，他提出自力更生和爭取外援，特別是大膽吸收西方的先進文化（物質的與精神的）和經濟援助。對中國，他強調對外開放。

胡耀邦對作為時代特徵的發展的認識和據此提出的決策意見，不僅同毛澤東要搞世界革命和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完全相反，而且同華國鋒時期局限於為把經濟趕快搞上去而提出並開始執行的對外開放也有質的不同。他認為，在這方面同樣必須對過去的認識和實踐進行撥亂反正。1982年1月14日，他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把對外經濟關係提到「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戰略問題」的高度，說：「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各民族之間經濟上的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逐步取代了原來的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狀態。近幾十年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種情況又有了空前巨大的發展。這是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今天對待中國的對外經濟關係，也決不應當忽略這一點。」「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要打開兩個市場——內市場和國際市場，要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建設的本領和發展對外經濟

關係的本領。」他要求大家「大大地開闊眼界，提高水平」，說，「我們絕對不能困囿於過去的狹小圈子裹，把自力更生曲解為閉關自守，孤立奮鬥。我們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把視野從國內範圍擴展到國際範圍，不但要放手地調動國內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國外一切可以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長，補一國之短。」他提出，「為了有效地吸引直接投資，需要一套開明的方針。第一是大中小項目一齊上，當前以中小為主，這樣見效快。第二是歡迎外國資本家、華僑資本家和港澳、台灣資本家一起來。第三是適當放寬政策，讓他有利可圖。」他對「一切從事對外活動包括對外經濟活動的同志」提出希望：「一定要從戰略上深刻地認識對外關係，特別是對外經濟關係的意義，敢於和善於跳到更廣闊的天地裹去，打開新的局面。」他還希望在最近幾年內就能打開局面。但是事情的發展並不如他想的那麼順利。所以他在 1986 年 7 月承德學習會上說，「我覺得我們在利用外資方面膽子小了。另外，搞合資經營或獨資經營，我看這些方面的膽子都不大。」

鄧小平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其實他自己就說是「摸著石頭過河」的，談不上有事先的全面考慮。但是他確實是我國推行對外開放的統帥。而且他承認在世界經濟和科學技術上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主導地位，因此對外開放也主要是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的開放。但他卻把對外開放只限於經濟技術範圍，還反對精神文明方面的所謂「西化」和「污染」，這就變成了半開放半封閉。他在談發展問題時，也往往把發展只歸結為南北關係問題，而且總是強調南方對北方國家的重要性。1985 年 3 月 4 日他會見 Et 本客人時的一段講話被視為是對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的經典表述，當時強調的就是北方離不開南方這一面。他說：「從經濟角度來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南方得不到適當的發展，北方的資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繼續窮下去，北方就可能沒有出路。」現在人們可以看出，他的這種傾向並不完全合乎客觀世界發展的歷

史事實。

胡耀邦是從全球化的角度看發展的。因此他理解的發展是全世界的發展。相比之下，南方過去反倒沒什麼發展，今後要發展首先得借助於對北方的開放。而且他說的開放，內涵也更全面，主張引進人類一切先進的東西，不要怕什麼腐蝕滲透。例如在前面所引他在 1982 年 1 月 14 日的講話中就曾提到，要有向世界學習的精神，「關於引進先進科學技術知識和經營管理方法，應當承認，我們腳踏實地地向世界學習不夠，下苦功夫不夠。在那次承德學習會上談到出訪西歐四國的情況時也說，那裏的大資本家爭相和我們做買賣，要「和我們建立感情，以後好做買賣，推銷他們的商品他們的產品。我們的同志不要僅從腐蝕這一個角度考慮問題，那就太簡單了。」

胡耀邦把對時代特徵的判斷運用到國內經濟建設的決策上。他提出了經濟快速發展戰略和政治體制改革、科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政策和措施。這些國內問題，過去已經談得很多很全面，我們這裏只舉出一個經濟翻番的例子，已足以證實他的遠見卓識。

胡耀邦提出經濟快速發展的戰略方針，是經過對時代特徵和當時國內外情況認真研究和深思熟慮的結果。有兩個例子可資證明。一是他首先提出 20 年經濟翻兩番。1980 年初，他就發展戰略目標問題向鄧小平提出：能不能設想從 1981 年到本世紀末的 20 年，把我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人均達到 800 美元的小康水平；他說，國際形勢有可能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只要我們的對外政策對頭，有可能贏得一個和平建設的和平環境。1980 年 8 月 26 日他和趙紫陽、姚依林、厉維中一起向鄧小平彙報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 ~ 1985）方案時曾對此有所討論。趙主張年增長4. 5%。鄧問，按這個速度，20 年能不能翻兩番？別人都回答不上來。只有胡耀邦說，20 年翻兩番每年平均遞增應當是 7. 2%，不能低於 6%，而達到了% 並不是不能實現的。鄧小平又問，如果5。年翻兩番呢？胡耀邦說，那是每年 2. 5%。在陳雲「退夠」（當時是得到鄧小平支持的）思想指導下，六五計劃定下了年增長 3. 7% 的指標。而事實卻是，1982

年增長率高達8.7%，六五計劃提前兩年達到指標。二是關於建立特區。他1980年1月去深圳和珠海進行實地考察時首先提出這個問題。他說，要在深圳搞個對外開放的窗口，窗口發展得好，就搞。中央1980年5月批准了在深圳等地建立特區。

二. 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國要奉行完全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關於建國後我國的外交政策，許多人在事後都概括為：「我國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實，這是極不確切的。這裏先不說能否稱得上和平政策就值得考慮。因為世界革命（反對和平過渡、主張暴力革命）同和平是不相容的，而且事實也是開國伊始就參加了朝鮮戰爭。後來更發展到反對提和平共處、和平競賽以及國際形勢緩和，號召和支持全世界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還要「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這哪里談得上和平的外交政策？不過這個問題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這裏要談的主要是胡耀邦在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上的撥亂反正。

提撥亂反正，就表明在這以前，也就是建國後頭30年，我國執行的不是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或者說外交上犯過原則性的，用過去的說法，就叫做路線錯誤。事實正是如此。頭30年還要稍多一點的時間，我們犯了長時期和全局性的，完全稱得上路線的錯誤。

曾當過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的遠東和中國問題專家賈丕才，在他的一本談中國外交的反華著作中，把中國頭30年外交分作三個階段，各為10年。第一個10年，也就是上世紀50年代，中國執行的是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60年代是全面出擊（打倒帝、修、反）和兩個拳頭打人（主要反「兩霸」）的自我孤立（自外於國際大家庭）政策。了0年代又變為聯美反蘇的「一條線」戰略。看來，賈丕才說的從表面上看也基本屬實。頭30年我們確實總是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兜圈子，當然談不上獨

立自主。「一邊倒」算不得獨立自主，這是很明顯的。「一條線」也不算獨立自主，這是鄧小干作了肯定的。他 1985 年 8 月 4 日總理吳奈溫說，「我們的對外政策有了一個調整。我們過去曾說建立「一條線」的反霸統一戰線。現在不搞那些，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見《鄧小平思想年譜》）。恐怕誰也不會特別挑出中間那段「夾攻中的奮鬥」為獨立外交。因為那段時期實際上是從靠蘇到靠美的過渡，甚至是「在夾縫中求生存」，哪能談得上獨立自主？

而且說我們過去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查無實據，無正式文獻可征，多是事後諸葛亮的說法。查正式文獻的情況則是，在國家的根本大法中，1982 年以前並未出現過這種表述。起到臨時憲法作用的 1949 年 9 月《共同綱領》，1954 年的第一個憲法，1975 年修正的憲法都沒有提。直到胡耀邦就對外關係進行撥亂反正以後的 1982 年，「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這個提法才鄭重地出現在黨的十二大報告和同年修改的憲法上。這一明確表述，標誌著我國外交政策進入了一個和過去截然不同的新階段。

（一）為什麼說建國後頭 30 年我國沒有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獨立自主外交要求，在事關國家根本戰略利益的問題上，對外事務只能由自己決定一切，不看外國的眼色行事，也不在外部的壓力下屈服和喪失原則。在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確認戰爭與革命為時代特徵時，它們有共同目標和共同道路，存在著一致對外的準則，還公認以蘇聯為首，相互間並不平等。因此，社會主義各國都不能各自單幹，對外尤其強調一致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我國不能奉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是很自然的。就是以後，也沒能時時處處堅持一貫宣佈的原則。例如我們一直堅持，外國要和我國建交，就必須先同台灣斷交，這是鐵定的一條，決不能讓步。但是 1964 年和法國建交時，就沒有堅持這一條。只是由於蔣介石沒

聽美國勸告，堅決反對「兩個中國」，在我國外交人員抵達巴黎後爭先主動宣佈同法國斷交，這才避免了一時出現「兩個中國」的局面。

如果有人把我國先是「一邊倒」後來又是「一條線」，說成由於這兩個決策都是由我們自己獨立自主地做出的選擇，因此仍然是執行了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那世界上就沒有一個不執行獨立自主政策的國家和政府了。為此，對這兩個問題還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說明。

1. 「一邊倒」就是自己不要獨立自主

在過去的國際共運中，各國共產黨接受蘇共領導，幾乎成了鐵的紀律。誰不聽列寧、斯大林和蘇共中央的話，就會被立即趕出教門。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納吉政權就是鐵證。不但毛澤東怕當東方的「鐵托」，文化大革命後期批鄧小平時有人也稱他為「鄧納吉」（意為搞復辟，倒不是指反蘇）。所以接受蘇共領導，對中共來說倒確實是一貫的。在延安時期，不但斯大林要毛澤東去重慶和蔣介石談判，毛雖然極不願意還是不得不去；連共產國際解散後做了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寫信給毛，干預中共事務，毛也只能表示完全接受季的指示，實在辦不到的還要再三解釋。這說明取得政權後的中共執行「一邊倒」政策是必然的，並不是有些人說的那樣，是由於美國僵硬的反共政策使司徒雷登失之交臂，或者因為劉少奇訪蘇時得到斯大林提供大量援助的許諾，才導致毛發表「一邊倒」的文章。這些說法也可能是由於對「一邊倒」內涵的瞭解不同。

現在人們把「一边倒」僅僅理解為外交政策，這就不對了。「一邊倒」的根本含義是接受蘇共領導和照搬蘇聯模式。這是所有正式文獻和全部歷史事實都證明了的。這裏只舉幾個例子簡單提一下。劉少奇 1949 年 6 月下旬至 8 月初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訪蘇，和蘇方商談建國後的大政方針。他在 7 月 4 日給聯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報告中說，「關於聯共（布）與中共的兩黨關係問題。毛澤東同志與中共中央是這樣認為的：聯共（布）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只是一個方面軍的司

令部。局部利益應當服從世界利益，因此，我們中共服從聯共（布）的決定，儘管共產國際已不存在，中共也沒有參加歐洲共產黨情報局。在某些問題上，如果中共與聯共（布）出現分歧，中共在說明自己的意見後，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布）的決定。」報告要求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對中國黨今後大政方針的全盤考慮「給予指示」，其中當然包括對外關係。報告說，「聯共（布）給予我們的指示和幫助，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迫切地需要這種指示和幫助」。對於這種自願接受外國領導的政策，當然談不上獨立自主。而中國又是一黨專政，所以自認作為下級黨的服從，自然也是國家的服從。

至於全部照搬蘇聯，這不但是毛澤東自己對「一邊倒」所作的解釋——「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而且建國後的全面學習蘇聯，幾乎是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對蘇聯模式的「克隆」。有的換了名詞，如蘇維埃叫人民代表會，最高蘇維埃叫人大常委，部長會議叫國務院等等。全國政協算是中國的特色，但那是歷史的產物，是黨的統戰工作，在政權系統上並沒有什麼地位，因而可有可無。有的連名稱也照搬，如經濟建設中的五年計劃，屬於上層建築中教育的大專院系調整和學科分類。意識形態方面就更不用說了，連生物學上誰不同意米丘林學說也會被打成反蘇甚至右派。什麼叫「一邊倒」？這才是「一邊倒」的要害。

既然接受領導，又受結盟關係的約束，外交上的亦步亦趨就是很自然的了。這就是赫魯曉夫後來提出在對外關係上要經常「對表」的原因。所以不能說，在朝鮮問題上，先同意金日成南進，後來搞抗美援朝，直到停戰和談，都是被迫的，是由於受到斯大林和蘇聯的壓力。既然自願服從，又有盟約義務，怎能談得上壓力和被迫？

不但在重大外交問題上如此，就是民間的國際活動也必須和蘇聯保持一致，包括世界和大以及工青婦組織等。可以舉一個例子。時任中國總工會主席的劉寧一，1956 年參加了世界工聯的一次會議，回國後給外交部幹部做報告。由於他講話向來幽默風趣，使聽報告者至今印象深刻，還能記得他講過的一些話。他說，蘇聯代表在會議上提出了一條中國並

不贊成的建議，他就問：是不是莫斯科的指示？回答：不是。又問：是不是（蘇聯駐當地）使館的意見？回答：也不是。劉寧一這就表示自己的態度了。他在報告中引用京劇《打漁殺家》上的臺詞說：既無聖上旨意，又無六部公文，憑著何來？就這樣把蘇方的建議給頂回去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這種過事先問莫斯科的態度如何，直到中蘇關係惡化後，情況才有所改變。

胡耀邦對「一邊倒」時期我國的處境也有以下的說法。1983年8月15日他對日本《每日新聞》社社長說：「從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們同蘇聯的關係是非常好的，比正常化還正常化，超正常化，是結盟的關係嘛！當時我們是無可奈何，我們是「一邊倒」。」

2.「一條線」戰略也不是獨立自主

關於這個問題，前面引證鄧小平的話已作了明確答復。這裏只對「一條線」的提法稍作說明。

同蘇聯的關係破裂後不久，中美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1973年毛澤東提出所謂「一條線」的戰略構想，意思是要使中、美、日、歐以及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國聯合成一條線，建立反對蘇聯的國際統一戰線。（只能推美國為首，不能想像當時的中國會奢望去領導美歐。）第二年，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就是為「一條線」戰略製造理論根據。鄧小平1974年在聯合國特別大會上的發言和上面提到的胡喬木主持起草的那篇文章，都是對這一理論的闡述和發揮。其公開說法就是：美蘇爭奪世界霸權必然導致世界大戰，爭奪態勢則是蘇攻美守，因此蘇聯是比美國更危險的戰爭策源地和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第三世界也要和第二世界聯合起來，反對第一世界，但不能同等相待，主要還是反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這個戰略和理論的實質，就是進一步開展向美國靠近、大力推行「聯美反蘇」的外交。

鄧小平、陳雲等主要領導人在文革後有好多年還繼承著毛澤東對美蘇爭奪的看法，看不到也不承認美蘇都怕打仗和它們為此謀求緩和與妥

協（批了多年的美蘇「假緩和」、「假裁軍」和把西方國家中的索南費爾特主義，即承認東歐與蘇聯關係現狀、主張對蘇緩和稱為綏靖政策，就是由此而來）。鄧小平認為美中既然都把蘇聯視為自己的主要敵人，美國當然就是我們反蘇的間接同盟軍。由於中美力量懸殊，在中美間一時建立起的反蘇戰略聯盟中，我們不能不為了反蘇而遷就美國，實質上就使我們在美蘇爭奪中幫了美國的忙。鄧小平提出並堅持的中蘇關係正常化三大障礙問題就可說明問題。頭一個障礙，在中蘇邊境地區和蒙古陳兵百萬，確有其事，只是我們把邊境地區擴大到了烏拉爾以東和中亞。至於第二和第三個障礙（即蘇聯支持越南人侵柬埔寨和出兵阿富汗），就很難完全成立了。第二个障礙，實際上還是把幫助紅色高棉放在了第一位的。我們設的這些障礙，都是在幫助美國牽制蘇聯。1979 年我們要出兵「教訓」越南，事先去給卡特政府打招呼，就是用實際行動向美國交了我們聯美反蘇外交的底。那時我們對美國有求於我的一面估計過高，對美國存在幻想，甚至以為它在台灣問題上也會讓步。這是胡耀邦 1981 年 3 月 9 日明確指出的問題。事實上，美國是利用我國同它聯合心切，在台灣問題上反而更加放肆起來。美國國會 1980 年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接著又提高了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性能和數量，使中美關係一度出現危機。為解決這一危機，雖有中美 1982 年簽訂的八一七公報，但售台武器問題反而越鬧越大。這些都說明了在十一條線」戰略下，我國無法推行獨立自主政策，所以鄧小平才有上引的明確解釋。

（二）新時期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提出者和規劃人

1. 首次使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得到正式定位

1982 年的十二大政治報告，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說明獨立自主外交就是：「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中國對外政策「有長遠的、全局的戰略依據，決不遷就一時的事變，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動」。1982 年修

正的我國憲法，也是第一次在國家的根本大法中莊嚴宣告：「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

胡耀邦並不回避過去外交沒有獨立自主這一事實。十二大以後，他多次談到與大國結盟的危害，還從正反兩面加以論證。1984 年 5 月 18 日，他在會見南共聯盟代表團時說，「對我們來說，同大國結盟有兩個不好：第一，中國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交往，而同大國結盟可能妨礙，或者至少影響我們廣交朋友；第二，它會妨礙我們抵制對方可能有的越軌行動，甚至還有可能給對方利用去反對另一些友好國家。這是我們總結過去幾十年經驗得出的結論，是受到全國人民支持的長期決策。」「我們特別注意要像珍視自己的獨立自主一樣，充分尊重別國的獨立自主權利。因此，我們決不干預別的國家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自己的對外方針。」1985 年 4 月 15 日訪問澳大利亞時，他也說，「結盟會妨礙交朋友，可能還會被結盟者所左右。」1986 年 6 月 11 日，他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演講中又說，「如果中國依附於某個大國，或同它結盟，不但使中國自己受制於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也有害於自身的發展，不利於世界和平與安定」。這是「經驗告訴我們」的，「因此，決定在對外交往中堅持獨立自主。」

2. 拋棄革命外交，奉行正常外交

胡耀邦 1981 年 3 月 9 日在中央書記處第九十次會議上發表的長篇講話，不啻是對幾十年外交經驗教訓的一個總結。這篇講話不再按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把世界各國劃分為敵、我、友三類，依此確認它們屬於聯合、中立還是反對的對象；而是要求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所有國家都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在這次講話中，他還系統地提出奉行完全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和具體方針，專門提到「過去「左」的幼稚，在這方面有表現。因此，奉行完全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不容易的。需要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無產階級政黨的冷靜的政治頭腦，需要在不斷的實踐中堅定我們的立場，豐富我們的經驗。」他為「奉行獨

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定出「必須做到的三條」，這就是「一，任何時候不依附任何外國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說，我們不跟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指揮棒轉。二，不受任何一種國際上的臨時事件所支配。國際上往往出現一些臨時事件，好像很嚴重。我們要冷靜考慮、冷靜分析臨時事件對我國的根本利益有什麼關係，但不受臨時事件所支配、所左右。三，不為國內外某種一時的情緒所蒙蔽，所激怒。不要為領導個人情緒所左右。遷就眼前事變就是機會主義。不要一將軍就跳，不要被來勢洶洶的環境和情緒所蒙蔽，所支配。要考慮國內外廣大人民的呼聲，但不受其蒙蔽和支配。」看來他的這次講話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以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都對他說，「你太大膽了，敢（把這次講話）印出來。」

胡耀邦的講話極有針對性。過去我們的對外關係受到毛澤東情緒的影響，可謂處處可見。不談他和赫魯曉夫的爭吵（在很大成分上是爭當世界革命領袖），導致中蘇關係從友變敵、蘇聯一下由社會主義變成復辟了的資本主義，甚至變成了法西斯，連蘇聯人民都不能「寄予希望了」。只以對我長期保持友好並在許多國際問題上（如朝鮮戰爭、參加聯合國等）支持我們的印度為例，也看得很明顯。想當年，我們同印度是多麼友好，兩國常喊的口號是「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即印中人民是兄弟）!」尼赫魯訪華時，上百萬人上街夾道歡迎，臨走時毛主席還吟屈原詩「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親自相送。可是沒過幾年，1959 年 4 月我們在西藏採取平定叛亂的行動後，在我國駐印度大使館和孟買領事館門前發生了印度示威群眾焚燒毛主席稻草人模擬像的事件。這引起毛澤東極大震怒，對外交部依據國際慣例起草的嚴重抗議照會文稿，他親自修改，不但第一次給印度戴上了「擴張主義」的帽子，還加了一段外交文書上少見的情緒化的話：「這件莫大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元首的事件是我國六億五千萬人民群眾極端地不能容忍的，必須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否則不可能甘休。如果印度當局的答復不能令人滿意，我們奉命申明，我國中央人民政府將向印度方面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不圓滿解決這個問題，中國奉命永遠不能停止，就是說一百年（記得原來的傳達是

「一萬年」）也不能停止。」（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印關係從此惡化。不久之後，印度就成了「帝、修、反」中「反動派」的代表國家，尼赫魯被說成是「半人半鬼」式的人物，胡喬木也寫了一篇署名《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這就使中印關係從友好變成敵對，至今也無法恢復到此前的水準。

(三) 對蘇聯、美國、日本和第三世界看法和政策上的撥亂反正

一談對蘇聯。

胡耀邦到中央工作後就一直為扭轉對蘇的敵視態度和兩國關係正常化而努力。他很早就明確提出不要把蘇聯視為敵國。1981 年3 月9 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對蘇聯「要去掉一點「左」的幼稚。」「不要使人們誤解我們同蘇聯整個國家相對立。不要赤白對立。」他提出同蘇聯廣大人民、同社會知名人士，儘量保持友好關係。要尊重他們的民族感情，尊重蘇聯人民的光榮革命歷史和文化遺產。他說，「不要把對立國家的人民當作敵人。過去「左」的幼稚，在這方面有表現。」他對外也不隱諱觀點。1983 年2 月20 日對日本記者說，「有人說中蘇兩國關係積怨很深，一下子難以消除，我不贊成這一看法。」

他還明確否定聯合被毛澤東歸為第二或第三世界的東歐各國反對蘇聯的方針。（毛澤東三個世界的劃分不能成為理論也表現在對東歐各國的不同分類上。他把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有時還有南斯拉夫，因為它是不結盟國家組織的發起國，劃歸第三世界，其餘都和英法西歐國家一樣，算成第二世界。）在1986 年7 月20 日的承德學習會上說，1984 年他曾擬出提綱托東德黨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謝萊斯給昂納克帶話，談中國黨對民主德國和東歐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有三個充分尊重，其中提到：「充分尊重你們同蘇聯幾十年建立起來的特殊關係 。（他對與會同志說，「要完全把東歐國家同蘇聯扯開，我們不要這樣想，也不要安這個心。」）「充分

尊重你們的內外政策，你們搞什麼內外政策，我們不會有意見，你們是根據你們的經驗、你們的國情確定的。」至於對蘇聯，他捎話給昂納克說，「如果蘇聯的領導人認為可以，也請你如實地向他們反映。」這可是我國主動的一次重要對蘇表態，和鄧小平堅持的去掉正常化三大障礙明顯不同。

胡耀邦也重視邊界地區的民間友好往來。如 1984 年 8 月，他到黑龍江考察時，去過黑河中蘇邊境地區，對那裏的領導幹部提出，「要和蘇聯人民講友好，兩國人民的友誼是永存的」。他要大家對蘇聯的中下級軍官和人民群眾主動地放手地做友好工作，還要大力開展邊境貿易。「南深北黑，比翼齊飛」的口號就是那次提出的。這個口號除表達了他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思想外，也表達了要同蘇聯友好相處、加強往來的期望。

二談對美國。

他反對同美國建立以「聯美反蘇」為基礎的戰略關係，主張對美國也要奉行完全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相互平等的正常關係。1981 年 10 月趙紫陽出席坎昆會議，是我國開始調整「聯美反蘇」方針的標誌。這是在胡耀邦同年 3 月 9 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講話的半年左右之後。這篇講話針對性很強地全面談到中美關係問題，表示不能把反蘇霸放到反美霸之上，更不可對美國抱有幻想。他說，「這幾十年來，美國實力有變化，有升降，但它的霸權主義本性沒有變化。」「美國對蘇聯的攻防關係有變化，但蘇美根本矛盾沒有變化，蘇美的根本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爭奪是不可避免的。蘇美關係愈加激化，美國就可能愈加有求於我們。如果矛盾不特別激化，日子更好過，美國對我們就會是不即不離，不會特別好。一旦蘇美矛盾激化，美國對我們最好的情況也不會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羅斯福那種情況。過於著急，希望過了，將來要失望。」「不要過分地寄希望於個別人物……美國政策上的變化是根據歷史的發展變化，並不是根據某個人的意志來的……美國對華政策有重大變化，但對華立場沒有本質變化。不要這麼看，說他在台灣要退出。」

他主張我國應當爭取同美國和平友好相處，是國家正常關係而不是结盟關係。1986 年 7 月 20 日在承德學習會上就說過，中美「是一種朋友關係，他們也說是朋友，不是盟友。」「要儘量爭取更多的朋友，對那些奉行錯誤外交政策的國家，要講究鬥爭策略和鬥爭藝術。」「為了爭取更多的朋友幫助我們，就要很好地研究對外經濟友好合作的問題。」

三談對日本。

胡耀邦在對外關係中從認識到實踐，言行最多的是關於對日本的應有看法和積極推進中日友好合作。聯繫到十多二十年來中日關係的起伏動盪，對他在這方面做出的貢獻就不能不多說幾句。

首先是他高度評價日本的發展，提倡向日本學習。1981 年 3 月 9 日在中央書記處的講話中，他說：「日本特別值得重視，它發憤圖強，不斷進取。」1983 年 12 月 9 日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組織的報告會上又說，「日本教育普及，技術先進，生產發達，經營管理水平高，應認真學習日本那些有益於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他提向日本學習和一些人熱衷於向新加坡學習，不同的原因，可能在於日本是所謂西方民主國家，又侵略過我們；新加坡則屬於權威主義，又是華人主導。

胡耀邦高度評價中日關係的重要性，在 1983 年 11 月訪問日本期間曾多次表示，「中日睦鄰友好關係長期穩定發展，必將更大地造福於兩國人民和子孫後代，並為亞太地區、全世界的和平，為 21 世紀的世界文明和人類進步，做出更加光輝奪目的貢獻」；「只要中日兩國能夠友好下去，戰爭（當指世界戰爭）就打不起來，亞洲和平就有了保證，世界和乎就增加丁很重要的力量。」1985 年 10 月 18 日他在會見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紀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雙方委員時又說，「我們兩國都把中日友好奉為本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是完全正確的。任何低估中日長期友好事業的想法和做法都是缺乏遠見的，也是錯誤的。」

他還一再強調要平等對待日本。在訪日期間，胡耀邦經常把中國和日本並稱為兩個偉大民族。即使對敏感的日本防務問題，他也表現出一

種平等相待的態度，說：「日本決定自己的防衛方針，我們沒有什麼意見。希望不要使自衛問題引起鄰國的不安，並嚴格把自己約束在自衛的場合。」他也不像有的領導人那樣過分強調中日歷史問題，引起兩國人民情緒的對立，而是很少談歷史，著重談友好，即使談到歷史，也講得比較全面。他在前引 1985 年 10 月 18 日的講話中說：「為了發展中日友好，我們兩國政府和人民都要正確對待兩國嚴重對抗的歷史。兩國長達半個世紀的對立，是由日本極少數軍國主義頭子造成的，不應由日本人民和現在的廣大朝野人士負責……當我們努力發展中日友好關係時，一方面不要使歷史上發生的對抗影響今天的合作，另方面也不應對製造中日對抗的罪魁禍首寄以同情，更不應縱容極少數人進行妄圖復活軍國主義的活動。」「兩國的歷史、現狀、利益和觀點都有所不同，當交往中遇到困難的時候，雙方都應顧全大局，謹慎從事，認真體察對方的友好建議和合理要求，力求避免做任何傷害對方人民感情的事。」「只要我們雙方都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中日長期友好的前景就是光明的。」他更不像一些人那樣狹隘，自己不談也不讓宣傳日本對中國建設提供的援助，而是公開表示感謝。例如 1984 年 3 月 18 日，他會見伊東正義率領的日中友好聯盟訪華團時就說，「投以木桃報以瓊瑤。這些年來日本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給予不少支持，我們是不會忘記的。」

為了兩國世代友好的目標，胡耀邦特別注意通過加強兩國青年間的交流，為下一代培植友誼和信任感。經中央的同意和批准，胡耀邦 1983 年訪問日本時宣佈 1984 年邀請三千日本青年來訪，同我國青年進行友好聯歡。這是一次取得重大成功的活動，現在又開始仿效。但後來在趕他下臺時，一些人竟然忘記自己曾表示過同意而以此批評他，這就實在太不應該了。

四談對第三世界。

胡耀邦除繼續表示我們堅決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外，還提出一些對第三世界的新看法。他不是把第三世界看成沒有多少差別的「一大片」，

而是如實地看到第三世界各國間的巨大差異，特別重要的是，認為它們的首要任務不再是反帝求解放，更不是聯合起來和我們一起反「蘇修」，而是集中力量儘快把本國經濟搞上去。提出第三世界今後重在共同謀求經濟發展。他在1986年7月的承德學習會上說，「今後對第三世界要多提供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幫助，主要是和它們共同總結經濟何以搞不上去的經驗。」在這年6月，他對訪華的佛得角共和國總統說，「要奉行適合自己國情的對外政策，搞和平外交政策，不搞軍備競賽，不要把自己國家、民族的命運綁在大國的車上，以減少國防費用。這有利於發展經濟，會受到人民的擁護。」還說，「國家獨立後要使廣大人民有就業機會、謀生手段，使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有所提高。要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國內各階層、各黨派、各種政治力量要和睦團結，政治上要實行民主。」對第三世界國家談這些問題，表明他衷心希望它們和中國一樣，努力跟上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

三. 在外交思想、外交業務和外交風格上的撥亂反正

（一）談「外交工作授權有限」

過去由於個人崇拜和高度集中，使外交工作事無巨細都得聽從或等候「最高指示」，極大地限制了外事部門和外事幹部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使之不能根據外交政策和應有的職權隨機應變、靈活處理，往往錯過時機、耽誤工作，還造成內部矛盾。連身為總理和分工主管外事的周恩來，對諸如國宴邀請名單和菜譜這樣的事都要寫上「請主席批示」上呈毛，其他較大的對外工作就更不用說了。1956年周恩來訪問印度，礙於尼赫魯和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的一再講情，他傾向於釋放一名在押美軍

間諜，發電請示毛。不料毛看罷大怒，親擬復電說，我們抓到的美國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越是尼赫魯、哈馬舍爾德說情我們越是不放。周恩來只好對尼赫魯表示拒絕和向毛作檢討。又如 1973 年基辛格第六次訪華，在告別宴會上提出再和周總理談一次。對所談問題周沒表態，只說要報告中央，遂立即打電話向毛請示，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覺」。而基辛格又要馬上登機回國，周不得已只好做了個對基辛格所提問題今後可繼續交談的表態。人們知道，後來這件事就被用來當了導火線，給病重中的周總理招來最後一場多次會議的大批判，連喬冠華也敢於給他帶上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

下面再舉個研究工作中寫內部報告，對國際形勢分析也不准提不同意見的一個著名例子。這就是毛澤東對外交部 1973 年上送《新情況》(第 153 號) 的嚴厲批評。這年的 7 月 4 日，他對張春橋、王洪文等說，「近來外交部有若干問題不大令人滿意，我說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都說此文不錯。我一看呢，也許我是錯的，你們貴部（指外交部）是正確的吧！不過與中央歷來的，至少幾年來的意見不相聯繫。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當，受他們的騙，以至上了他們的賊船……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這段話引起一系列的批判和檢查是不用多說的了。在這種體制和氣氛下，誰還敢提不同意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周家鼎：《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

周恩來根據他經過延安整風總結出的經驗（包括多請示、少做主，多檢討、少解釋，多聽話順著來、少提不同意見等），外交部一成立就確立下一條「外交工作授權有限」的原則，對上面這樣做，對下面也這樣要求。所以有關國際問題的研究，甚至連反映外國情況，都要強調「站穩立場」、「對口徑」，就是看是否合乎上面的看法和需要。這種國際形勢和對外關係的研究，也就越來越變成察言觀色、揣摩意圖，甚至可有可無，

進而成為多餘的了。果不其然，文革一起，所有這類研究機構最先解散，研究人員也都參加或接受批鬥，接著下放到幹校了。

針對這種情況，胡耀邦在外交上的撥亂反正，就首先從為周總理辨冤但也指出他的不足，實際上是開始對「授權有限」之說有所質疑。1981年3月9日，聯繫毛澤東在外交工作上對周恩來的一再無端指責談到外事工作必須改革時，他說，「外交工作的特點是外交活動，要提倡闖和鑽的精神。外交部培養了一批好翻譯和守紀律的工作人員。但沒有培養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當年周總理受到批評有四句話，對總理是不公正的。但是總理有時是過細了，外交人員要抓大事。外交部人才不足，知識不夠。外交人員不熟悉國內的政治歷史文化，不能很好地進行對外談話。要消滅外文文盲。對外宣傳工作很差，趕不上越南、台灣、南北朝鮮。出國的人太多，出國的人中應增加專家、學者。外交部給中央的東西太少。」1982年9月15日他在出席外交部召開的使館政治思想工作會議時又提到七十年代的四句詩，說「這是不公平的。應該改為：大事不敢講，小事必須送。如果不照辦，勢必打修正……「文化大革命」時，周總理大事敢講嗎？周總理不可能出修正，是要把他打成修正。外事工作應該有創造性。六十年代規定的細則，現在看來有的沒必要。有的繁文縟節的東西，不能再用。總理對工作要求嚴，對自己要求也很嚴，但不必搞那麼些繁文縟節。既有創造性又有生動活潑，不把自己束縛得死死的。」

他大聲呼籲必須改革外事部門卡得太死、嚴重影響工作的局面。1978年12月31日，他在中央宣傳系統所屬單位領導幹部會議上說，「在這方面（對外宣傳工作）也存在許多「禁區」、框框、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不看對象、對牛彈琴，效果甚差，笑話不少。我看這種狀況也要儘快改變。」1980年初，他有一個批示：「對外宣傳幹部水平提不高，外事工作的水平也很難提高，這是一個大問題，必須徹底解決。」1980年4月17日，他對有關部門說：「外事工作、經濟工作、宣傳工作都面臨一個改革問題，不改革，不適合需要。」

（二）強調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調查研究工作的重要

張聞天通過研究和實踐，早在建國初期就對外交業務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和建議。他的有關報告曾得到毛澤東、周恩來和黨中央的同意和批准，並轉有關部門和駐外使館參照執行。報告中首先指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是調查研究。胡耀邦無論是否知道或記得這件事，反正他對外交調研工作的重視是同張聞天一樣的。例如 1982 年 1 月 14 日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的，「我們一切外事部門，一切從事外事工作的同志，都要努力瞭解世界各國，特別是你所到的那個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的全貌。不僅要瞭解上層人物的動向，還要瞭解背景；不僅要研究這個國家的政治和文化，還要研究它的經濟和歷史。」這番話就就和張聞天當年說的一模一樣。

他特別注意發現有價值的新見解並用於決策參考。在中央領導層中，那麼注意閱讀和審批研究機構的成果，胡耀邦是罕見的一位。這方面的事例很多，只順便舉幾個例子。1979 年 8 月 29 日給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組的一個批示，是在他讀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報》所載《西德經濟專家古托夫斯基教授對中國經濟的看法和建議》之後寫的。1979 年 9 月 25 日，他讀了馬洪整理的關於蘇聯經濟改革材料後，寫的批語是：「轉一份給《理論動態》。對人家的東西一定要注意研究，並要拿出成果來。」又如 1982 年，宦鄉主持研究並署名、由戴倫彰起草的一篇題為《關於我國對外經濟關係發展總戰略的若干問題》的報告。胡耀邦看後寫了一大段批語，大意說，這是具有真知灼見的好意見，旗幟鮮明、不講情面地提出看法，值得認真研究，譽稱其為理論聯繫實際調研的典範。（趙紫陽的批語是，作為中央文件轉發到省軍級，並要外貿部和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研究討論）。

另外，胡耀邦還經常根據決策需要提出應該研究的國際形勢和對外關係課題。例如 1982 年 1 月 14 日他在書記處會議上就提出，「對於第三

世界國家的國內社會經濟政治狀況，我們至今很少研究，不甚了了，甚至可以說還處在一團混沌的狀態」；「對於支援第三世界國家的方針，包括經濟援助和經濟交往的方針，究竟應當如何具體執行，如何分別對待，需要過細地加以研究。」

(三) 強調向外國學習

胡耀邦大力批判過去的閉關鎖國政策，積極推進對外開放，因此特別強調向外國學習。他主張我們應該有海納百川的胸懷，珍視世界上一切文明成果，對於源頭在西方的先進文明，不僅不隔絕更不排斥，而且要主動學習，否則我們的思想就會僵化。1978 年 12 月 31 日他在中宣部系統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吸收前人文化的精華，研究了當前實際，從這兩個方面來的」；1983 年 3 月 13 日在紀念馬克思逝世 100 周年大會上也說，「一定要反對把馬克思主義同人類文化成果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的錯誤傾向，確立尊重文化知識的正確觀點。」

學習外國要有虛心的態度，不可妄自尊大，輕視別人的經驗。他在 1981 年黨成立 60 周年的紀念大會上說，「無論是人家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經驗，我們都要通過自己的分析，吸取其中有益的可供借鑒的東西。因此我們要在努力研究和總結自己經驗的同時，努力研究和分析別國、別地、別人的東西。」同年 10 月 9 日在紀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大會上講話，也說，「要儘量吸收外國一切對我們有用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1983 年 8 月 15 日他在接見日本《每日新聞》社社長時說，「不管對日本、英國、法國、德國、蘇聯、美國，我們都是念一本經：發展人民友誼，學習先進經驗。」他 1984 年 2 月 10 日與外交部一位領導幹部談話時說，「我們與世界差距太大了。」

胡耀邦主張走出國門，向外國學習。在 1981 年 3 月 9 日中央書記處議外事工作時，他專門提到外事工作「需要改進，向外國學習」的五個方面。其中第三條是：「出國訪問，要適當減少官方代表團，適當增加專

家、學者、黨外人士、少數民族、勞模出國訪問。」上引他 1979 年 8 月 29 日給《理論動態》組的批示說：「《理論動態》你們對這些問題議論嗎？政經教研室的同志能看到這類東西嗎？我們過去各教研室很少接觸外界。我看，也是處在桃花源中，甚至是在桃花源中的深部山區。現在要同外界往來，至少要在源邊搞點交易活動，否則，思想不是僵化，而是僵死！」

(四) 重視外交風格和禮貌

胡耀邦對關係到國家形象的具體對外活動也非常重視，要求有一個新的風貌，並且以身作則，表現出不亢不卑、尊重對方和友好大方的大國氣派。這方面他說的和做的內容都很豐富，無法細談，這裏只簡單提一下。

他在對外交往中，一再提倡講友好、講文明、講信義、講人情味，出發點都是同各國政府和人民改善關係、交朋友。1984 年 6 月 27 日，他會見參加第二次中日民間人士會議的日本外賓時說：「要實現中日長期友好，必須遵循正確的方針，採取正確的態度。所謂五講，就是一講友誼，不要把我們自己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內外政策強加給對方；二講兩利，如果只講單方面的利益，那麼友誼是不會長久的；三講信義，辦不到的不說，說了的就要辦，言必信，行必果；四講禮貌。五講紀律。四美就是行為美、品德美、語言美、風度美。」

對於一切不利於友好交往的行為，如不講文明禮貌、不講人情味等陋習，他可說是深惡痛絕，認為這是關乎國家形象和喪失還是贏得人心的大問題。他每談國際問題和外事工作，總會有這方面的話題。1981 年 3 月 9 日在談外事工作的書記處會議上，他就要求外交部工作要有政治眼光、外交藝術，出國訪問要尋求和平、尋求友誼、尋求知識，反對遊山玩水，要嚴格處分喪失國格的人。在 1986 年 7 月 20 日承德學習會上，他從黎筍去世、長征上臺我們發去唁電並派人去大使館弔唁這件事談起，

說這是個禮貌問題，儘管「我們同越南的問題能不能解開，能不能言歸於好，現在還看不出來。」他還舉了肯尼迪被暗殺後報紙上登出漫畫標以《肯尼迪啃泥地》，赫魯曉夫去世後報紙上報導的題目是《赫魯曉夫死了》這兩個例子，說「這些都叫做沒有國際禮貌，這樣做是不好的。」「在國際關係上，我們是要講禮貌的……凡是屬於國際禮節禮貌的，隨便丟棄，一定會喪失人心的。」1983 年 12 月 9 日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講話又說，「我們共產黨人不要給人「只講政治」「只談原則」的印象」，要「多交朋友，有點人情味，從極右派到左派，凡是主張同中國友好的，統統講交情、講友好，都可以交朋友。現在，在外交場合不交朋友，沒有點人情味不行。」

他反對在對外交往中經常擺出不可一世的架勢。1984 年 1 月 24 日，他在會見法國記者時說，「以我的觀察和親自參加國際交往的經驗來看，在國際交往中把自己看得絕頂聰明、無所不能，這種態度是非常不成功的。」

胡耀邦要求的這些，都有利於我國國際形象的改善，都會給我國外事活動增添光彩，就不用多說了。

最後，讓我們用胡耀邦的兩段有關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

一段是他 1982 年 1 月 14 日在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時講的：十一切站在歷史潮流前面的人們，要打開局面，就要有點眼力、魄力和毅力，並且要有一整套正確的戰略和戰術。否則就不可能打開局面，即使一時打開，也不能持久，不能取得徹底的勝利，甚至功敗垂成。」

二是他 1989 年 4 月 5 日在家裏同李鋭長談中關於外事問題的一段話：「外事問題。1982 年前，講聯美反蘇，徐（帥）不贊成。我做過兩次系統發言，外交講了十條，五項原則，獨立自主等。紫陽找我談，說太大膽了，敢印出來。東德昂納克來時，請他傳口信到蘇聯。我們兩人各講各的，但精神是一致的。蘇聯出兵阿富汗，是侵略別的民族，五年中陷人泥潭，罪名洗脫不掉。贊成意大利（共產黨）的提法，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我是老鼠上秤鉤，自己秤自己。當年於是傳來上面一句很厲害的

話：「你要樹立自己的形象。」」

用這兩段話正可說明，胡耀邦所以能為對外關係撥亂反正做出巨大貢獻，是因為他站到了歷史潮流的前面，具備非凡的眼力、魄力和毅力，並且有一套正確的政策思想和具體做法。他的貢獻，有些是我們今天外交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只是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有些沒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因此沒能收到應有的成效。這是他本人的遺憾，也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損失。

（2009 年 3 月 11 日完稿）

胡耀邦下臺的意識形態背景

——人本思想與黨文化的分歧

張顯揚

1987年夏天，胡耀邦下臺半年左右，一位友人去看望他，安慰他說，「您在人民心中是不會磨滅的。」他說：「我問心無愧，我的問題20年以後才能見分曉。」（盛平主編《胡耀邦思想年譜》，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下卷，第1322頁。以下凡引自該書的文字，都以這種方式加注：上或下，某某頁）

現在，20多年過去了。他的「問題」見分曉沒有呢？有的見分曉了，有的還沒有。政治上的是非功過，根本無需20年，當時就很清楚，現在更不用說了：「公道自在人心」！但是，有些事情還沒有見分曉，例如發生這樁公案的意識形態背景，就遠沒有弄清楚，許多發人深省的東西，都還沒有揭示出來。

今年是胡耀邦逝世20周年。弄清楚這個問題，把他獨特的意識形態取向發掘出來，予以發揚光大，不失為我們對他的一種紀念。

一. 鄧小平聲稱，他看錯了人了

胡耀邦，一個光明磊落，品德高尚，於人民有大功，於他的同僚有大恩的人，他們——其中有些人，例如薄一波、王鶴壽等，還是他在平

反冤假錯案中，下大力氣解救出來的，——為什麼那麼恨他，不僅要把他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推下去，而且非要把他搞臭不可？

據「生活會」上的「揭發批判」和後來一些高層人士的回憶，胡耀邦的罪名，主要是三條。一條是反「自由化」不力，一條是和陸鏗的談話，再一條是「贊成」鄧小平退下來。此外，還有什麼「拉幫結派」之類。胡耀邦心裏清楚：這都是強加的罪名。但是，為了顧全「大局」，為了黨的「團結」，也為了他的「家」，他主動寫了辭職報告，並且違心地、「大包大攬」地作了檢討。他以為這樣事情就結束了。令他後悔莫及的是，他們竟以他的辭職報告為藉口，違背組織原則，對他進行攻擊和污蔑，公然羞辱他，要把他搞臭。（下，1317、1324）為此，他非常憤懣。

下臺以後，他把在位前後 10 年間的全部講話、文章、報告、發言稿，集中清理出來，約數百萬言，花三個月時間，從頭至尾查了一遍。結果，「沒有查到原則性的錯誤」，他很感安慰。但是，他沒有去深思：自己說過寫過的東西，講過做過的事情，從意識形態角度看，和幾位超級老人以及參與整他的其他人之間，有沒有什麼相左的地方。由於沒有往這方面去想，他始終弄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那樣對待他。實際上，正是意識形態方面的的分歧，才使得他們那樣恨他：不僅把他當作犯了大錯誤的人，而且把他當作離經叛道的異端。

他沒有往這方面去想，是很自然的。在他心目中，他和他們同屬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大家都在一個屋簷下。區別只在於，他本人自律甚嚴，始終忠實於這個主義、政黨和領袖，而他們則不然：有的人口是心非，說是要廢除終身制，實際上嗜權如命，明明是自己裝模作樣提出來要下的，一轉眼，卻質問別人，「為什麼讓我下?」（下，1332）有的人背信棄義，出賣朋友，置幾十年至交于不顧，把朋友之間談談心，訴訴衷腸的「私房話」，當作「態度不端正」，在「生活會」上予以「揭發」。（下，1304、1334）這些醜惡行徑，他是看到了。但是，他只覺得他們這樣做很不正派，卻沒有把這些惡行和他們的意識形態背

景聯繫起來。其實，這正是他們所服膺的以「黨性」為標榜的黨文化使然。見利忘義，出爾反爾，趨炎附勢，落井下石，是這個黨文化在黨內鬥爭中很正常的表現。幾十年來，黨內鬥爭無數，有哪一次不是這樣對待不幸淪為鬥爭對象的人？何況，他不是別人，而是被認定為離經叛道之人。

另一方面，由於沒有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上升到意識形態高度去反思，他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心中，還深藏著一個與黨文化完全不同的以彰顯人性為指向的人本思想。這個人本思想，類似於一種潛意識，看似默默無聞，實際上一直在引領著他的思想和行動：或者對黨文化作出好意的、人性化的解讀，就像佛門弟子用普渡眾生的觀念，去解讀社會主義一樣；或者和黨文化發生齟齬，甚至對立，從而使自己陷人波蘭哲學家沙夫所說的「道德衝突」（見沙夫《人的哲學》，三聯書店 1963 年版，第 83 頁），並最終釀成悲劇。

這就是胡耀邦和他們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一邊是以彰顯人性為指向的人本思想；一邊是頑固而虛偽的黨文化。

胡耀邦如果細心一點，本來是可以看得出來的：他們加給他的那些「罪名」，都包含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和指責。所謂反「自由化」不力，本身就是意識形態問題，這是明擺著的。還有暗含著而沒有明說的。例如，他們把他的坦誠、親民、拒絕整人、富有同情心，等等，指責為「要樹立自己的形象」、顯示自己是「黨內開明派」。一個共產黨領袖，樹立開明形象，也算罪名嗎？這裹就包含著很深刻的意識形態分歧。在他們看來，共產黨的領袖，特別是奪取政權以後，應該和歷代皇上一樣，要喊「萬歲」，要俯視眾生，威嚴而不苟言笑，一言九鼎。胡耀邦與此不同，所到之處，和民眾打成一片，興之所至，舉手揮拳，全然沒有一點架子；接受記者採訪，有問必答，盡說實話；至於對「萬歲」之類，更是嗤之以鼻。一個視高高在上為正宗，一個以平等待人為原則。分歧的實質，在於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不同，說到底，是對待人的態度不同：究竟是把他們當作可以任意擺佈的芸芸眾生呢，還是把他們看作有思想

有人格的人?

1985 年 5 月 10 日，胡耀邦接受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採訪。鄧小平看到採訪記錄後，大為惱怒，對楊尚昆說：「陸鏗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子來反對我們」。「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下，1310）鄧小平這句話，披露了一年半以後發生的那場變局的秘密：問題不在於胡耀邦做錯了什麼事，而在於「胡耀邦這個人」。從意識形態角度看，胡耀邦和他們確實不是同道。

二、真誠的「人民主體」論者

胡耀邦的以彰顯人性為指向的人本思想的核心，是對人民群眾發自肺腑的敬畏和關愛。他是無條件地屬於他們的。他說過，一個人「不要把自己輕易地依附於什麼人，不要把自己輕易地綁在一個什麼車上」。但是，要「附屬於人民，歸根到底還是個人民，還是個人心。（上，122）又說：「共產黨人不能忘了人民這個主體，忘了人民要垮臺。今天不垮，以後也會垮。」（下 1352）又說，我們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都是人民自己的事業。「革命勝利以後，人民就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上，642）又說：「作為一個領導幹部，要時刻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切切實實幫助群眾解決問題。要走出辦公室，到群眾中去，調查研究，瞭解群眾的情緒，傾聽群眾的呼聲」。（上，162）

類似這樣的話，中共其他領導人也不是沒有說過。但是，說和說不同：胡耀邦這樣說，是表達自己真實的信念，說了是要照著去做的，而他們是說給別人聽的，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實際上，說的和做的往往相反，至少建國以後是這樣，這是我們上下兩、三代人都可以作證的。胡耀邦是一個真誠的「人民主體」論者，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轉移。他們則是「黨國主體」論者，或「權力主體」論者，一切以黨國的權力，實際是他們自己的權力為轉移。林彪——毛澤東唯一的親密戰友、被寫

進黨章的法定接班人——說過:「有權就有一切」。這句話，言簡意賅，深刻地揭密了他們的內心世界，為他們的黨文化作了非常精准的注腳。

胡耀邦擔任黨的總書記、主席以後，抓住一切機會到全國各地去調查考察，去貼近民眾，去感受他們的氣息，他想「走遍全國所有的縣」。（上，483）在位其間，除西藏5個、青海2個、雲南3個地區外，他踏訪了全國331個地區（州、市）；在1600多個縣（占全國2112個縣的四分之三）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他不顧年邁體弱，不分嚴寒酷暑，無論窮山惡水，荒漠高原，翻山越嶺，跋山涉水，走村串戶，訪貧問苦，深入調查，仔細考察。1980年到1987年的7個春節，有6個在基層，同人民群眾一起過。（上，578—579）他的心始終繫於人民群眾，特別是貧困的老少邊區的人民群眾。這在中共領導人中，是極為罕見的，甚至是絕無僅有的。有人不以為然，嘲諷說，「一個星期跑22縣，坐汽車嗚嗚走一圈就是了。」但是，群眾不這麼看。于光遠先生有一次去湖北來鳳，當地幹部對他講，胡耀邦同志不久前到過那裹，還講了不少胡耀邦在那裏的故事。于光遠先生認為，他不辭辛苦地走，對於他瞭解民情大有好處。建國以來沒有一個中央同志到過那裏，胡耀邦是他們見過的唯一的中央領導人。別的且不說，只說當地幹部、群眾知道黨中央還關心他們，就是一件值得讚揚的事情。（上，1308）何況，胡耀邦走訪基層，並非只是「嗚嗚走一圈」。「嗚嗚走一圈」是面上的調查，他還深入到點上去研究。他去世後，夫人李昭大姐回憶說，耀邦「當總書記，經常到全國城鄉調查，不是為了玩，也不是一般地瞭解情況（因為他是掌握很多情況的）；他走到一個地方，就出一個政策，推動全國工作。他到太行山調查後，看到人民很貧窮，感到對不起人民，就出了「扶貧政策」。他到東北調查後，就出了中蘇邊境貿易政策。」（下，1373）許多政策，都是在外地，在基層調查研究時醞釀出來的。對於胡耀邦的種種缺點錯誤，當然應該批評，實際上他們一直在批評。但是，對他不辭辛苦，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也要嘲諷一番，這就太過分了。這些人應該捫心自問，自己身居高位幾十年，除了蘇州、杭州，聽聽評彈，問問養豬，還到過幾個地方？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個人特點：他所關注的，是革命實踐中的實際問題，不是一般的理論問題。他是革命家、思想家，不是理論家。他的人本思想，不成體系，甚至連「人」這個人本思想的核心概念，都是借助於「人民」、「群眾」、或「人民群眾」這些普通的政治術語來表達的，但它絕對符合人本主義的基本精神。他所理解的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概念，更不是可以拿來自我標榜的符號，而是由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組成的實實在在的群體。所謂人民的幸福，人民的痛苦，都是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幸福和痛苦。他的這種思想，在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過程中，表現得最為鮮明：他強調，政策要落實到每一個人，不允許用「多數」或「大多數」這類空泛的言詞去搪塞。他說：「落實黨的幹部政策，要一個人一個人地解決，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解決，光說空話不行。」（上，411）他的「人民主體」思想，真正是以「人」為本的，是人本主義在當代中國條件下的獨特表現。

文化大革命後，人們從痛苦的反思中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國家和人民的關係；一個是「黨性」和「人民性」的關係。兩個問題的實質是，究竟黨國至上，還是人民至上？提出這兩個問題的目的，是人民群眾想為10己爭得一點權利，以避免「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災難重演。這兩個問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相當的尖銳性。胡耀邦從他的「人民主體」論出發，對它們都作了合乎民意的解答。

（一）「離開了人民，還有什麼國家?」

胡耀邦說：我們的同志一定記住，「我們共產黨要時時刻刻為人民著想，使人民富裕起來。只要人民富裕起來，我們就有辦法了。決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國家的利益對立起來，國家的利益離開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沒有意義的。試想，離開了人民，還有什麼國家 P」（下，845）

認為國家利益同人民利益相一致，這是傳統的黨文化觀念，是黨治

制國家自己創設的不容爭辯的說辭。問題是誰跟誰一致、怎樣一致？是人民利益在上，國家利益服從人民利益這樣的一致呢，還是國家利益在上，人民利益服從國家利益這樣的一致？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前者是民主主義，主張人民至上。後者是國家主義，主張國家至上；如果再把這種觀點塞到社會主義名下，那就是名副其實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這正是黨文化在制度層面上的核心理念。長期以來，我們所實行的，就是這種國家社會主義。為了給國家社會主義遮羞，為了蒙蔽人們的眼睛，「黨國主體」論者故意把二者的關係掩蓋起來：只講國家利益同人民利益相一致，不講誰的利益在上，誰跟誰一致。

胡耀邦的可貴之處在於，在一個黨治制國家裏，勇敢地、明白無誤地說出自己的觀點：「離開了人民，還有什麼國家？」毫不含糊地鼓吹民主主義，把人民置於國家之上。在中共黨內，除了胡耀邦，沒有第二個人表達過如此明確的民主主義思想。

（二）「離開人民性就不叫黨性」

「黨性」和「人民性」的關係問題，是胡績偉先生1979年3月在全國新聞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提出來的（當然，往早裏說，上世紀40年代延安時期就已經有這個問題了），他認為「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以後又作了進一步解釋和發揮，認為「黨性來源於階級性和人民性」。就為了這個「人民性」，胡績偉遭到胡喬木嚴厲批判。胡喬木認為「黨性來源於人民性」的觀點是錯誤的：「人民性」是一個「含混不清」的概念」。（見胡績偉《關於人民性問題與胡喬木的爭論》）

其實，「黨性」何嘗不是一個「含混不清」的概念？問題根本不在於概念是否清晰。真正使胡喬木不能容忍的是，在奉為至尊的「黨性」旁邊，胡績偉居然給按了個「人民性」，而且還是「黨性」的來源。這豈不是說，「人民性」是老子，「黨性」是兒子，「人民性」高於「黨性」嗎？這個問題的實質，同國家和人民的關係是一樣的：究竟是黨至上，還是

人民至上？說直白一點，是黨大，還是人民大？胡喬木顯然認為黨在人民之上，黨比人民大。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是什麼正經的理論問題，而是一黨專政國家所特有的意識形態問題。在多黨制民主國家，根本不發生什麼「黨性」和「人民性」的關係、「黨大還是人民大」這樣的爭論。那裏的政黨，哪一個敢把自己特殊的利益和訴求，拿來和人民的利益和訴求比高低？那樣做，還要不要選票了？只有在我們這裏，執政者無需人民的選票，才敢於肆無忌憚地製造這類「理論」，才會有胡喬木這樣的人，敢於對多少可以伸張一點民意的「人民性」概念，興師問罪。

既然發生了爭論，胡耀邦當然要表明自己的觀點。他說：「我們的新聞工作有很高的黨性。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離開人民性就不叫黨性。有時，在一件具體事情上，黨組織的要求同人民的要求也可能有矛盾，但那只是個別情況和某一具體問題，從黨的根本的性質來講，黨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黨性就是人民性。」（上，327）

「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這同樣是黨文化範圍內的傳統觀念，只是比前一個問題多了些「理論」色彩。真正有意義的，是「離開人民性就不叫黨性」，「黨性就是人民性」。這兩句話的意思，和上面所說的「離開了人民，還有什麼國家？」是一樣的：離開了「人民性」，還有什麼「黨性」？這就是說，「黨性」來源於「人民性」，「人民性」高於「黨性」，歸根結底，人民高於黨，而不是相反。顯然，胡耀邦的觀點和胡喬木的觀點是針鋒相對的，雖然用的都是黨文化的語言。胡喬木的黨文化觀念是正宗的、徹底的；胡耀邦的黨文化觀念是被「人民主體」論改造過的，實際上成了黨文化的對立面。

在胡耀邦看來，黨和國家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人民理所當然地應該在黨和國家之上。和胡耀邦不同，「黨國主體」論者，平時把「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喊得山響，一碰到「國家大還是人民大」、「黨大還是人民大」以及「黨大還是法大」這類問題，就原形畢露，毫不遲疑地把黨和國家置於人民之上。人民，在他們那裏不過工具而已。因此，一有什麼

奇思妙想，包括一步登天的妄想，就要「發動群眾」，就像工人發動一架機器一樣。幾十年來，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哪一個不搞「群眾運動」，哪一個不運動群眾？

這裏，我們來見識一下胡喬木這位理論家怎樣看待人民，是很有意思的。針對胡耀邦反對「個人迷信」的主張，胡喬木提出「反對迷信人民」。針對有人說「黨犯錯誤」，胡喬木說「人民也犯錯誤」。他說：「我所反對的就是把人民神化，眼前的例子吧，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今年（1980年）的預算。結果這個預算還是要修改，還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又說：「不是說反對迷信領袖嗎？我反對迷信人民。不能把人民當上帝。人民經常會犯錯誤。里根當選為美國總統，是美國人民犯了錯誤。」（上，556）這就是胡喬木對人民的看法。這裏除了捏造出來的什麼「迷信人民」、「神化人民」、「把人民當上帝」，以及一大堆違反常識的觀點，例如，把人代會和人民混為一談，把制度問題和認識問題混為一談而外，就是對人民的老爺式的蔑視和無端的嘲弄。這樣的人居然在號稱「人民共和國」的廟堂之上吆三喝四，真是莫大的諷刺！

順便說一下，當年胡喬木在社會科學院作報告，鼓吹他這套反人民的觀點，我是親耳所聞。事後，我在一個正式場合，對他的觀點，作了30多分鐘的批評。我的意思主要是說，「喬木同志的觀點，有背於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群眾的理論，而且也不合乎事實，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都沒有「迷信人民」、「神化人民」、「把人民當上帝」這樣的事實。」這就得罪了這位大人物，從此我在院裏的處境便可想而知。當然，這也不是什麼壞事。那時候，毛澤東剛死幾年，社會正處在迅猛的變化之中，許多事情都看不大清楚。他和另一位左王（一個院長，一個副院長）額外給我增添了一些觀察問題和思考問題的機會，使我對世事多了一份瞭解，從而比較早地從黨文化的迷夢中驚醒過來。這樣的機會，並不是人人都能遇到的。有人說過，誰接觸上層內幕早，或者挨整早，誰就覺悟得早。恰恰在這兩個方面，我都有幸沾了點邊。這大概也是一種宿命吧。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哲學史上的人本主義，例如費爾巴哈的人本

主義或人本學不同。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是一種哲學，是用來解釋世界，揭露宗教本質的。它的對立面是神學，或者也可以說，是神本主義，用他在《關於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中的話說，「神學的秘密是人本學」(見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教研室編《18 世紀末一 19 世紀初德國哲學》，商務印書館 1962 年版，第 524 頁)。意思是說，不是上帝造人，而是人造上帝：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願望和想像創造出來的虛幻的存在。費爾巴哈是哲學家，而且僅僅是哲學家。在他那裏，人只是他的哲學的出發點，具有解釋學的意義，並不是他要為之效力的對象。哲學世界以外、現實生活中的人，不是他所關心的。他的人本主義已經成為歷史。不過，有一句話是永垂不朽的，那就是他在《未來哲學原理》一書中所說的，「我是一點也不排斥人性的東西的人」。（同上，第 5 了 3 頁）這句話，今天聽來，仍然很感人。如果人人都努力使自己成為「一點也不排斥人性的東西的人」，那末，這個世界將會免去多少爭鬥、饑餓、殺戮、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流離失所的人道主義災難！

胡耀邦是一個「一點也不排斥人性的東西的人」。在這一點上，他和費爾巴哈有相通之處。但是，他的人本思想所包含的思想內容和社會功能，則和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不可同日而語。胡耀邦的人本思想，不是哲學，不是用人來解釋世界，說明歷史的，而是一種道德理念和做人的原則，是對人的合乎人性的看法和態度。胡耀邦生性善良，不是好鬥的人。但是，凡屬違反人性，不把人當人的事情，他都毫不含糊地與之鬥爭。這是他生平事業中最輝煌、最感人的篇章之

三．反對一切違反人性的東西

在我們國家，對人民群眾危害最烈、最可恨的東西，就是官僚主義、個人崇拜、終身制、封建主義，以及以這些東西為基礎的制度安排和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國人一生中遇到的煩惱、困擾和痛苦，主要不是

來自於私人領域，而是來自於公權力。官僚主義、個人崇拜、終身制、封建主義這些違反人性的東西，就寄生在這個公權力之中、並且以公權力的面貌出現，因而使人無可逃遁。胡耀邦深知這些東西的危害和人民群眾的痛苦，特別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以後，認識更加深刻。他在黨的最高崗位上這些年，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和這些東西作鬥爭。

（一）官僚主義，當官做老爺，把群眾當使喚人

胡耀邦平生最痛恨的是官僚主義：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不關心人民群眾的冷暖痛癢，頤指氣使，把人民當作可以任意使喚的工具。他說：官僚主義，「當官，叫高高在上，做老爺，把群眾當作下級，當作使喚人。」（上，234）他給官僚主義畫像：官僚主義「忘記丫自己的權力是人民給的，忘記了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的神聖職責，把自己主管的單位或地方視為獨立王國，獨斷專行，壓制民主，破壞法制，侵犯人民的民主權利和人身權利；或者做官當老爺，把自己主管的單位或地方變成一潭死水，無所用心，不關心人民痛癢，遇事不負責任，不分是非，對好人好事不支持，對壞人壞事不處理……」（上，386）

至於那些貪污腐敗、以權謀私的官僚，他更是痛恨有加。有一个地方的官員鋪張浪費，違反財經紀律，他嚴厲批評說：「把人民的錢拿來供自己和少數人享樂，這是什麼思想，這是歷史上的腐朽沒落的走下坡路的階級的思想，危害很大。凡是統治階級到沒落的時候，都是這樣。」「封建上升的時候也不是這樣。」（上，117）某市為了迎接一位中央領導，在半個城內戒嚴三個小時，群眾反映強烈。胡耀邦說，為了一個領導人的某種方便，竟然置人民生計於不顧！隨即在一份情況簡報上批示：「行為惡劣，無法無天」。每逢看到這類擾民行為，他都很氣憤。他堅決主張廢除那些助長封建意識的東西。他說：我們領導幹部，包括中央領導幹部到下邊去，不要那些前呼後擁、戒備森嚴的做法，也不要組織什麼群眾歡迎。」（上，465）他自己率先垂範，出門輕車簡從，不事張揚。對親

屬子女嚴格要求，從不利用手中的權力，為他們提供哪怕一點小小的方便。他兄長胡耀福去世以後，家鄉父老送一副挽聯，上書 24 個大字：「國中有典型，兩袖清風作赤子；天下無先例，一代皇兄當農民。」（上，500）這副挽聯，既是對胡耀福老人的深情悼念，更是對胡耀邦總書記廉潔奉公的的衷心讚歎。擔任主席、總書記以後，他下大功夫抓黨風建設，又是制定文件，又是發表講話，就是為了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貪污腐敗，以權謀私。令他悲哀的是，黨風不但沒有好轉，反而越來越壞。今天，如果他還活著，看到這個黨腐敗到如此程度，人民群眾怨聲載道，不知又該怎樣痛斥他們！

（二）搞個人崇拜，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復辟

胡耀邦反對個人崇拜，非常堅決，不僅揭露它的危害，而且提出一些防範措施。在 1980 年 11 月 19 日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談到個人崇拜，他開列四大罪狀，予以討伐：「搞個人崇拜這個東西，是我們黨的一大教訓。搞個人崇拜，第一，根本談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談不上實事求是；第三，根本談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復辟。可以說，危害之烈，莫此為甚。個人崇拜永遠不能搞了。」（上，555）此前，1978 年 8 月中旬，他出席並主持全國信訪工作會議，談到個人崇拜必然要搞封建復辟時，引司馬遷《秦始皇本紀》中的話說：「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言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上，221）「天下已亂，奸不上聞」這兩句，不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生動寫照嗎？他引歷史經驗，告誡全黨，個人崇拜搞不得。

為了制止個人崇拜借屍還魂，捲土重來，胡耀邦提出和支持三條措施：一條是，今後二三十年內，一律不掛現任中央領導人的像。一條是少宣傳個人，多宣傳人民。再一條是，堅決不搞終身制。他說：「我們過

去有一個觀點，誰當主席就永遠不能變。實踐證明，這個觀點如果不變過來，我們黨沒有希望。」（上，585）三條措施中，廢除終身制是最為關鍵的，他不僅贊成，而且身體力行。據他女兒滿妹回憶，他曾打算「成為黨內首先自覺退下來的一個」。可惜，這個願望未能實現。還沒有到該「自覺退下來的」時候，就被以莫須有的罪名給推下去了。

（三）人趁著頭腦還清楚的時候退下來是明智的

胡耀邦反對終身制是以「自然規律」為依據的。他說：「我相信自然規律。人老了，生理是會有變化的，身體和機能也都會發生變化。人都一樣。所以我在想，人趁著頭腦還清楚的時候，退出領導崗位和決策層是明智的。這對個人、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好處。」（上，131）

他說這個話的時候，是1977年。將近10年以後，1986年，鄧小平私下同他談進退問題，他表示「贊成」，說自己也要退下來。他這樣說，決不是一時頭腦發昏，而是出於對個人、國家、人民負責，不僅符合他率真的性格，而且符合他一貫的思想。後來朋友們為他惋惜，說他不該表這個態。他說，這是黨內兩個人交心，為什麼不說真心話呢？不幸的是，他說真心話，別人卻把他解讀為「有野心」，「要奪小平的位置，逼小平下臺」。（下，1317）真是胡說八道！他老人家連「家心」（保住自己的位置）都沒有，何來「野心？」

現在，我們國家終身制是沒有了，這是一個進步。但「變相終身制」還在，這就是指定接班人，甚至指定隔代接班人。指定接班人，就是權力私相授受，就是用另一種方式延續自己的權力。這比我國古代的太子制度、君主制國家的王儲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太子制、王儲制，也沒有指定隔代太子、隔代王儲的（有順位制度，但不能隔代指定）。因為有這個「變相終身制」在，退下去以後，照樣有人吹喇叭，抬轎子，仍然被稱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下臺了，怎麼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這究竟符合黨章，還是符合憲法？個人崇拜的陰魂不散，這種違反黨章

和憲法的做法，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不過，我相信，這種格局不可能延續太久，一個文明世界怎麼能容忍這等封建遺毒長期存在？

（四）肅清封建遺毒，一個是制度問題，一個是思想輿論問題

個人崇拜、終身制、家長制、一言堂，是專制制度最直接最赤裸裸的表現，其社會歷史根源就是封建主義遺毒。胡耀邦堅決主張肅清封建主義遺毒。

1979 年底，李維漢因病住院，胡耀邦去探望他。談到「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時，李維漢說：「文化大革命」歷時 10 年之久，據我看，關鍵在於封建餘毒在我們黨內、在我們國家實在太深了。我們黨領導民主革命，在政治上、經濟上是反對封建主義的，但在意識形態和傳統習慣上對封建主義思想遺毒沒有加以有力的清算和批判。結果有幾千年影響的封建主義思想遺毒被帶進了社會主義社會，帶進了我們黨內。等級制度、特殊化、官僚主義以及一言堂、家長制等等，「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胡耀邦對李維漢的看法深表贊同。他說，自己也考慮過這個問題，覺得「文化大革命」所以發生並延續 10 年之久，是黨內生活長期極不正常的一個必然結果，你點出了問題的根子，確實是封建主義遺毒在作祟。（上，454—465）他感到此事關係重大，建議李維漢向鄧小平直接談談。李維漢接受胡耀邦的建議，和鄧小平作了交談。

1980 年 6 月 10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政治體制改革。胡耀邦說，要從兩個根本問題上考慮肅清封建主義影響，一個是制度問題，一個是思想輿論問題。從制度上說：十月革命到現在 63 年了，從我們自己講也 30 年了，革命成功以後，黨沒有搞好，國家制度也沒有搞好，權力過分集中，終身制，鐵飯碗，能上不能下，這方面我們比資產階級差。這個問題必須從制度上下決心解決。思想輿論方面，我們沒有經過資產

階級民主革命的洗禮。資產階級民主同封建專制來比，是很大很大的進步。我們革命成功後，無形之中發展了封建的東西。我們現在的宣傳再不能搞封建這一套了，再搞下去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上，519）。

肅清封建主義遺毒，是一件意義重大而又非常緊迫的事情，關係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理論家胡喬木竟然極力反對。胡耀邦講話後10天，接到胡喬木來信。信中寫道：「對於批判黨內、政府內和社會上的封建主義思想殘餘問題，需要有慎重的準備。究竟反對什麼，糾正什麼，如何改革，需要明確規定，以免一轟而起，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甚至組織上的混亂。此外，對於實際解決（問題）幫助不大。現在只提反對封建主義，易放鬆反對資本主義的唯利是圖、損人利己和各種惡性腐敗現象，也不妥當。」（上，524）肅清封建主義遺毒，問題剛剛提出來，胡喬木就給它戴了一大堆帽子，按了一連串罪名，挖空心思加以阻撓。後來，這件事情不了了之，不能不說，胡喬木起了很壞的作用。

現在看來，李維漢、胡耀邦的講話，以及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都不是很到位，充其量只是提出問題，唱了個開篇。但是，即便如此，如果真正循著「清算封建遺毒」這個方向，去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那還是會有很大意義的。今天的中國，也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胡耀邦也不至於那樣下臺。他那樣下臺，是老人政治作祟，歸根到底，還是封建遺毒的危害。胡耀邦真可謂反封建不成反被封建害，「出師未捷身先死」！

四. 是人性論，但是並不抽象

胡耀邦讚賞馬克思的「赤子之心」，（下，1325）講究「將心比心」。（上，143）他在工作中，特別是在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中，講求「設身處地」為受害人著想。他時時刻刻用這樣的道德理念，鞭策自己，勉勵別人。

或許有人會說，這不是「人性論」嗎？是人性論。人性論反映人之為人的本性，是一種理論，又是把人當人看的一種態度。人本主義或人本學，就是發揮成哲學體系的人性論和人道主義。過去，為了否定它們，貶稱之為「抽象」人性論、「抽象」人道主義。那是受了獨斷論的意識形態——「階級本位」論，也就是絕對化了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的誤導，不承認人除了是某個特定階級的成員而外，還是或者首先是人類這個群體的成員；不承認各種社會身份，都是由人這個實體派生出來的。如果承認這一點，承認人都是人，都有人之為人的本性，那末，以這樣的人為物件的理論，是不應該貶稱之為「抽象」人性論、「抽象」人道主義的。

這就好比不能把動物學、植物學、生物學，貶稱之為「抽象動物學」、「抽象植物學」、「抽象生物學」一樣。除非不承認雞犬豕、馬牛羊、老虎獅子大象是動物；不承認蘿蔔白菜、花草樹木是植物；不承認動物、植物是生物。如果承認它們是動物、植物、生物，那就不能把動物學、植物學、生物學貶稱之為「抽象」動物學、「抽象」植物學、「抽象」生物學。事實上，也沒有哪一個頭腦正常的人，這樣來貶稱它們。可是，長時期來，恰恰就是這樣來貶稱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現在，好像已經沒有人公開否定人性論和人道主義了。但是，「抽象」這頂帽子並沒有摘掉。只要這頂帽子不摘掉，人性論仍然名不正，言不順。我認為，現在是該給它平反摘帽的時候了。

在科學上，抽象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沒有抽象，就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質；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沒有抽象，就不能用概念和語言來表達和交流。因此，凡是科學，形式上都是抽象的，人性論也是這樣，但是內容並不抽象。只有單純的感覺和絕對的個體，不需要抽象，也無法抽象，因而也不能言說。這是黑格爾早就說清楚了的。例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說到酸甜苦辣這些味覺。可是誰能告訴我們，什麼叫酸、什麼叫甜、什麼叫苦、什麼叫辣？它們是單純的感覺，無法抽象，所以不能言說。

一概否定抽象，無批判地把它當貶義詞使用，是對科學的一種誤解。我們不妨想一想，如果人性和人性論是「抽象」的，不能成立的，那麼其他科學不也是抽象的，不能成立的嗎？進一步說，哲學上的所謂「唯物論」、「唯心論」豈不是更抽象，更不能成立嗎？就說「階級性」吧，有人以為「階級性」是具體的，其實也是一種抽象，只是比「人性」抽象的程度低一些罷了。人有人性，物（包括人在內）有物性，這在耶穌紀年之前，哲學家們就指出來了。古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專門寫了一本書，名為《物性論》，用樸素而富有詩意的語言對人性、物性進行了生動的描述。他探討了靈魂和肉體，研究了山川大地，向人們證明，「自然用事物的始基（原子）創造一切，用它們來繁殖和養育一切，而當一件東西終於被顛覆的時候，她又使它分解為這些始基。」（見盧克萊修：《物性論》，三聯書店 1958 年版，第 5 頁）造就是用思維的力量，對萬事萬物進行抽象所得出的結論。

說到這裏，我不禁想起自己讀研究生時的畢業論文《費爾巴哈人本主義批判》。那裏簡直把費爾巴哈批得一無是處，凡是他說到「人」和「人性」的地方，我都大批特批。那時候，全國第三屆文代會開過不久，對外正在批判「現代修正主義」，國內理論界籠罩在一派極左思潮的毒霧之中，人性論、人道主義被認為是現代修正主義的理論基礎。現在回想起來，既慚愧又可怕，而且對不起這位在上帝面前勇敢地恢復了「人」的權威的哲學家。一個人，尤其是一個以哲學為職志的人，怎麼可以連人性都不承認？真是罪過！

當然，用人性去解釋世界、說明歷史是過於簡單了，歷史是不能單單用人性的善惡去解釋的。但是，離開人性也沒有歷史：參與歷史過程的人，哪一個沒有人性？在任何歷史條件下，為善為惡都是每個人自己的選擇；決定如何選擇的，有各種因素，其中就有人性這個因素。離開了人性，歷史將成為不可理解的東西。人類自從跨進文明的門檻以後，歷史過程的能動性，最終都被歸結為兩個東西：或者「上帝」（此處代指一切神靈），或者人。上帝有神性，人有人性。而上帝和神性，其實都是

人的創造，是人的心靈的需要，歸根結底，還是屬人的東西，是人性的一種表現。排斥和否定人性的原本的歷史，一定是血腥的歷史。排斥和否定人性的筆底的歷史，一定是偽造的歷史。如若不信，請看看我們這60年或近90年的歷史！

胡耀邦不僅把人當人看待，而且對人的「人民」身份，特別敬畏和關愛，他的人本思想是更加不能稱之為「抽象」人性論的。我可以說，這是我所見到的人本思想中最有特色的一種。無論唯物論的人本思想，還是唯心論的人本思想，急進的還是溫和的，都沒有像他那樣，把「人民」提到「主體」的高度，作為自己人本思想的核心。這是真正革命家的人本思想。

人本思想的對立面，是上面提到過的「階級本位」論。在階級社會裏，人當然是分為不同群體的，其中包括不同階級、不同階層；而且有好人壞人，有遵紀守法的人，有違法亂紀的人，還有違法犯罪的人。但是，不管什麼人，不管他們在階級歸屬上、政治上、法律上、道德上處於怎樣的地位，哪怕是非常負面的地位，畢竟還是人。胡耀邦認為，即使是非常負面的人，在給他們以應得的懲罰的同時，還是要把他們當人對待：不能侮辱他們的人格，不能剝奪他們依法所享有的權利。他說：「公安機關要搞得准，要改造人，逼、供、信，不光是對幹部，對什麼人都不能搞。對犯人都不能虐待。」（上，124）他認為，對待「文化大革命」中跟著「四人幫」犯了錯誤的人，也要這樣對待。對他們，「生活待遇一般不要變，不要一犯錯誤就降級降薪，對他們的家屬子女也不要歧視。」又說：「我堅持治你的病，你不認錯不行，毫不含糊，但對人不要侮辱，不是他的錯不要算在他的賬上，要耐心，對家屬子女不要歧視。（上，155）

按照「階級本位論」，人只是階級的化身，地主是地主階級的化身，資本家是資產階級的化身，工人是工人階級的化身，以及如此等等。就是說，人僅僅是階級的成員，而不是人類的成員，因而只有階級性，沒有人性。在這方面，毛澤東是最典型的，他是一個徹底的「階級本位」

論者。他的歷史觀可以稱為「階級史觀」或「階級鬥爭史觀」:「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造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24頁）他有一篇很著名的講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批判人性論，是這個講話的重要內容之一。他自問自答地說:「「人性論」。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是只有帶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27頁）

多少年來，我們一直把毛澤東這段話，當作人性問題上的經典之論，奉為圭臬，批判人性論，沒有不加引用的。實際上，這段話除了表明他是一個徹底的「階級本位」論者，不承認有「人性這種東西」而外，完全經不起推敲，邏輯上的混亂，簡直可與「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見《公孫龍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頁）相互媲美，根本不成其為理論。其中兩個決定性的論據:「只有帶階級性的人性」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都是獨斷論的，說通俗一點，都是自說白話。

第一，他不承認有「人性這種東西」，但又不願意承擔否定人性的惡名，於是就求助於詭辯。先是虛晃一槍，肯定有「人性這種東西」，接著就說:「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只有帶階級性的人性，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眾所周知，人性就是超階級的，人性是對人之為人的抽象，而不是對階級之為階級的抽象。不在階級之上進行抽象，就沒有人性可言。說「沒有超階級的人性」，等於說沒有人性。他就這樣把剛剛肯定的「人性這種東西」，偷偷地給否定了。抽象肯定，具體否定，是詭辯論者慣用的手法之一。

至於所謂「帶階級性的人性」，則完全是一個杜撰的、莫名其妙的說法。階級性就是階級性，人性就是人性。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階級性是以「階級」為對象抽象出來的概念，它反映的是「階級」的一般屬性;人性是以「人」為對象抽象出來的概念，它反映的是「人」的一般屬性。

兩個概念可以並存，但不能混合。「帶階級性的人性」和「帶人性的階級性」一樣，是不可理解的。誰能告訴我們，這種「帶階級性的人性」是什麼東西，是「階級性」呢，還是「人性」，抑或是「半階級性半人性」？這樣「獨創」的說法，本該有所界定，但他完全沒有界定，為的是使不可理解的東西顯得高深莫測。後來人們引用這句話，也只是引用而已，沒有人懂得它是什麼意思。

第二、為了進一步否定「人性這種東西」，他又說，「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資產階級主張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這三句話，看起來很雄辯，其實也是詭辯。「我們主張人民大眾的人性」這一句，留待下面再說。先說前後那兩句。首先，這裏所說的無產階級的「人性」、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都不能成立。說「某某階級的」，只能是「階級性」，不能是「人性」。把「階級性」說成「人性」，是偷換概念。其次，把「地主」和「資產階級」放在一起，除非為了敘述上的簡便，也是完全錯誤的。地主和資產階級是兩個不同的階級；作為「階級」，它們既沒有共同的「人性」，也沒有共同的「階級性」。「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這個說法，不僅否定了他自己的「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而且等於肯定了有「超階級的階級性」，明顯地犯了雙重錯誤。

第三、更加匪夷所思的是，他竟造出一個「人民大眾的人性」來！這個說法，更加明顯地違背了他自己的「只有帶階級性的人性，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的觀點。「人民」是一個歷史概念，這是他自己說過的。1942 年 5 月，他做這個講話的時候，正是國共合作、聯合抗日的時候。當時的「人民大眾」是怎樣構成的呢？是由諸多階級構成的，其中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有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主張抗日的那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還有其他主張抗日的團體和個人。這樣複雜的一個社會群體，怎麼會有共同的「人性」呢？說「我們主張人民大眾的人性」，等於說我們主張「超階級的人性」。不僅如此，這個說法還把他刻意要與之對立的「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也一

併「主張」進去了！

這表明，否定一個真理要比肯定一個謬誤困難得多啊！毛澤東要否定「人性這種東西」，說了半天，完全是一筆糊塗賬。我可以說，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說了些什麼。可是，就是這麼一筆糊塗賬，竟讓我們頂禮膜拜了六、七十年，豈不哀者？

「階級本位」論，只承認階級性，不承認人性，這是黨文化在意識形態層面的核心理念。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一個人只要被抹上負面的階級色彩，或負面的政治色彩，就再不被當人看待了，就要受到非人的對待。為什麼一搞政治運動，就會發生那麼多駭人聽聞的侮辱人、虐待人、折磨人、摧殘人，以至無端致人死命，而且還要牽連家屬子女、親戚朋友、同事同學這樣殘酷的事情？從意識形態上看，就因為只認階級，不認人，只講「階級性」，不講「人性」。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如果連人性都否定了、排斥了，那麼，憑藉手中的權力，還有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幹不出來？

「文革」結束以後，人們對幾十年的政治運動進行反思。這個反思是必要的。但是，很不夠，因為它只在路線層面上作了一點思考，什麼左呀，極左呀，形左實右呀，以及諸如此類，既沒有深入到制度的層面，也沒有深入到黨文化的意識形態層面。實際上，無論是路線問題，制度問題，還是意識形態問題，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怎樣看待人，怎樣對待人。不把人當人、不把人當目的而當手段的路線、制度和意識形態，都不是好東西，都會給人造成災難。

五. 三件大事見證其人本思想

胡耀邦在位7年，加上此前3年，前後10年，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做了大量工作，內政外交，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無不留下他的業績。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三件大事。一件是組織和推動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一件是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一件是發展生產，改善民生。三件大事，件件都見證他的人本思想。

（一）為萬千冤假錯案受難者改變命運提供理論支持

發動和領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是粉碎「四人幫」以後，撥亂反正的一個關鍵性戰役，具有重大意義。胡耀邦發動和領導這場討論，就是要打破「兩個凡是」的禁錮，把人們的思想從毛澤東和「四人幫」的極左的理論和實踐中解放出來，目的首先是為萬千冤假錯案受難者及其家屬落實政策、改變命運提供理論支持。這場討論，是在平反冤假錯案遇到極大阻力的時候揭開戰幕的。

當這場大討論進行了三個多月，在北京，在各省市自治區上層，已經大張旗鼓地展開以後，他又及時提出，「把討論擴大到實際王作中去」。他說：「真理標準」討論，不光是理論問題，而且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都存在這個問題。那個地方工作好不好，生產搞得怎麼樣，對人的處理是否正確，幹部誰有能力，文藝作品怎樣，都不能憑某某人的一句話，而要靠實踐來檢驗。」（上，212）「把討論擴大的實際工作中去」，就是把討論深入到人民群眾的生活實踐中去。他急切地想用實踐標準這個利器，去解決他們面臨的種種難題。上層討論也好，深入實際也好，胡耀邦想的都是為幹部、群眾消災解困，恢復他們作為人所應該享有的尊嚴和正常生活。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汪東興、胡喬木等人的態度。至於從理論上反對「實踐標準」，堅持「兩個凡是」的吳冷西、熊復等人，這

姑且不去說它。汪東興指責《人民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是「黨性不強」，「不聽黨的話」，甚至質問《人民日報》「代表哪個中央？要查一下！」（上，193）胡喬木則認為「真理標準」文章，「會造成黨的分裂」。這篇文章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黨校

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11 日《光明日報》公開發表。胡喬木 6 月 20 日趕到胡耀邦家 說:「真理標準這場爭論是黨校（胡耀邦時任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挑起來的，華（國鋒）主席已經不滿意了。再爭論下去會造成黨的分裂。我不同意爭論下去，要立即停止爭論，《理論動態》不能再發可能引起爭論的文章了。」（上，193 — 194）。《解放軍報》6 月 24 日發表第二篇分量更重的論述「實踐標準」的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以後，胡喬木再次來到胡耀邦家裏，說《解放軍報》發表這篇文章，「是主動發起攻擊，把事態搞嚴重了，把內部爭論公開化了，對此表示遺憾。」（上，194）

開展「真理標準」討論，胡耀邦是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特別是冤假錯案受難者的利益為依歸。汪東興、胡喬木則以是否「聽黨的話」、最高領導人是否「滿意」為是非，以「黨性」和「黨的團結」為藉口，壓制討論。至於這個討論對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解決人民群眾的苦難，有什麼意義，則全然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在這些人的頭腦裏，說好聽一點，只有所謂黨的觀念，實際上，也就是他們自己及其小集團的觀念，根本沒有人民群眾的觀念，說徹底一點，根本沒有人的觀念。這是人本思想和黨文化的一場尖銳的較量。

(二)「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如果說「真理標準」討論，主要還是為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改變人的命運提供理論上的支持的話，那麼，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本身，就直接關係人的命運了。為此，胡耀邦簡直把命都豁上了。

冤假錯案，堆積如山，令他痛心疾首。他說，1957 年開始的 20 來年，一個又一個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人才，「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更是弄得到處是冤假錯案，人人膽戰心驚。沒有被坑害的只能裝啞巴，甘當「白癡」，因為「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開

不如睡」，談不上還有什麼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和激情來充分發揮他們的真才實學。那麼剩下來的，則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鷹犬了！他說，這樣的社會，還能談得上什麼突飛猛進？這20多年在經濟上，為什麼我們會落在日本、韓國、新加坡後面？甚至連台灣、香港都趕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惡的界限搞混了，與我們原來的宗旨背道而馳。這些年為什麼求神拜佛的人越來越多？他引顧炎武的話說，就是因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訴之於神」嘛！他說：「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立志改天換地的共產黨人，竟也會像歷朝歷代封建統治者那樣，製造出大量的讓人有冤無處申的冤假錯案！」（上，88）

為了替受難者申雪冤情，解除痛苦，他下定決心，敢於擔當。他引但丁《神曲》中「我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詩句取譬：「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上，102）後來，他又引孔子《論語》中的話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又引李大釗的名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來勉勵所有參與平反工作的人。他自己則抖擻精神，廢寢忘餐，日以繼夜，爭分奪秒地工作。

他被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長以後，在一份材料上寫道，「組織部要成黨員、幹部之家。為了為千千萬萬的人民服務，要千辛萬苦，要橫下一條心，該堅持的一定要堅持，該挺身而出說話的一定要挺身而出，該表揚的一定要表揚，至於個人的成敗利鈍，一概不在話下。」（上，276）那時，每天來訪的達幾百人之多。他對警衛人員說，「對找到家來申訴的上訪人員，一律不要阻攔」。有些上訪者凌晨就登門等候，他一邊吃早飯一邊接待上訪間者。部裏還專門配備一位老幹部，負責處理來信，進行初閱、摘要，由他親自批示作復。在中組部一年零一個月裏，他批復的申訴信件達4000多件，光是批給幹部審查局的信件就有902封；領導中組織部直接辦理和復查130多名副省長、中央副部長以上幹部的大案要案。（上，264）在他的領導和推動下，從1978年到1980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290萬人；到1984年底糾正「文化

大革命」前的歷史遺留案件 188 萬件。復查改正錯劃右派 54．7 萬人，糾正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12．5 萬人（上，120）這些案子牵涉的人，不是幾百萬，也不是幾千萬，而是上億之多！

這些數字，令人振奮，也令人震驚：一個自稱為人民謀利益的黨，幾十年來竟在黨内外製造了如此龐大的冤假錯案！我不諳歷史，不知道哪個朝代，在短短幾十年内搞出這麼多冤假錯案來？而更加令人震驚的是，竟然還有那麼多大權在握的大大小小的共產黨官員，阻擾和反對給這些冤假錯案平反！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興，胡耀邦之前任中組部部長的郭玉峰，是兩個比較典型的人物。這樣的人物，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在在都有。可以想見，阻力有多大，工作難度有多大！

1977 年 10 月 7 日，《人民日報》發表胡耀邦組織和指導的《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一文，這是落實幹部政策的第一聲春雷。文章提出，要敢字當頭，敢於衝破阻力，敢於推倒四人幇一夥在審查幹部中所做的錯誤結論。一切強加給幹部的污蔑不實之詞，一定要推倒，顛倒的幹部路線是非一定要糾正。文章引起了熱烈的反響。而郭玉峰當天早晨聽到文章摘要的廣播後卻說：「簡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論！」當天刊登這篇文章的《人民日報》，他不屑一顧，随手扔進垃圾箱，連聲說「大毒草！大毒草！」（上，101）

汪東興在接見組織部核心小組成員時說：「這篇文章有錯誤，在適當的時候要糾正。」還說，「你們知道專案组是誰領導的嗎?」意思是他汪東興領導的，誰也動不得。（同上）他說到做到，死死把持中央專案組審查對象的材料，拒不交給組織部，組織部只好另起爐灶，從頭開始調查。他還說，「現在翻案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頭上來了，這還了得！」（上，109）他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兩個凡是」的聲勢，不准中組部召開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佈置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為了衝破他的壁壘，胡耀邦輪流召開省、市組織部門的小型會議，名日「疑難案例座談會」，號召「不願意亡黨亡國的同志，都必須挺直腰板與這種錯誤思潮鬥爭」。（上，144）他毅然提出「兩個不管」對抗「兩個凡是」。他說：「凡是不實之詞，凡

是不正確的結論與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不管是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簡單地說，就是用「兩個不管」的矛，去對付「兩個凡是」的盾。」（上，200）這是何等氣魄，何等的責任心！

一樣是共產黨人，一樣喊著「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口號，為什麼汪東興、郭玉峰們拼命阻撓和反對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而胡耀邦卻把這件事情看得比天還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可以說，因為那些人仍然堅持「文化大革命」的極左路線，而胡耀邦已經從這條極左路線中擺脫出來了。這當然不錯，但還遠沒有說到根子上。

極左路線從哪兒來？證諸歷史，沒有一次不是起因於對人的命運、人的生死禍福的漠視。毛澤東為了貫徹某種「主義」，或者反對某種「主義」，或者實現某種莫名其妙的「理想」，全然不顧人民群眾的死活，發動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推行一條又一條極左路線。一個「大躍進」，就餓死近四千萬人。1959 年，彭德懷「彭大將軍」在廬山會議上提出，要顧一顧人民的死活，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頭子，批得死去活來。實際上，凡屬極左路線，都是蔑視人，不顧人死活的，都把非人的東西置於人之上，把人置於非人的東西之下，因而都是違反人性，都是反人類的。

汪東興、郭玉峰們頑固拒絕和反對為冤假錯案受害者平反、落實政策，就是因為漠視人的命運，不把受害人的痛苦當一回事，和那幾個被批評為「見死不救，見冤不伸」的人，（上，247）一樣冷酷無情。這些人完全異化了，成了赤裸裸的官僚，一點人的感情都沒有，一點惻隱之心都沒有。胡耀邦和這些人不同，正如吳象先生所說，他是一個「大寫的人」。他對冤假錯案受害者幾十年的冤情和不堪忍受的痛苦，感同身受。他同情他們，關愛他們。他們的案子一日不得平反，他的心就一日不得安寧。一位觀察過那段歷史的歐洲友人，稱頌胡耀邦「真有氣魄，實在偉大！」他說：「任何國家任何領導人也沒有像胡耀邦這樣，一下能為數以百萬計的受害者平反，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道主義！」（上，

275）

他在組織部長任上，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工作做得那麼仔細、周到，對人的關懷，可謂無微不至。這裏舉幾個例子。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部長。19日正式到中組織部上班，對陳野平副部長說，你大膽地幹，有什麼事情我來承擔就是了。指出，一定要以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這是他用人本思想好意地、人性化地理解黨文化的一個典型。實際上，這裏跟什麼「階級」的感情沒有關係，有關係的，是「人」的感情——筆者）來做接待工作，對年老體弱走不動的老同志，可以用車接到部裏來談；患病在床的，我們應該主動拜訪，找上門去談，傾聽他們的意見。對那些來訪的蒙冤多年的老同志要讓他們坐在沙發上，沏上一杯茶；到吃飯時還沒有談完，就請他們吃頓便飯。一次談不完就談兩次、三次。（上，125）

1978年2月3日，和一位「文革」受害者在家過除夕。當談到他的平反時，胡耀邦說，你們單位平反落實政策是快的，從全國來看，該有多少萬需要平反的同志啊！可是，這其中的阻力和難處有多大，誰人知曉？這些仍在受苦的同志和家人，今夜的除夕，他們家能歡快起來嗎？這個問題，不論難處有多大，靠黨中央的支持，靠全黨的努力，必須要下決心解決且必須儘快地解決，不解決，我的心也不安，酒也喝不下去啊！（上，140）

1978年春的某一天，出席一個疑難案例座談會。談到座談會主題時，胡耀邦說：「在我們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為了革命走到一起來的，怎麼能夠委屈人呢？」又說：「我們中組部的同志，辛苦些，緊張些，哪怕政策落實得只快一天，就等於被落實政策的同志和他們的親屬少過「一年」的苦日子；因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話說人人都應該將心比心。我們在幹校是啥滋味？」（上，142）

1978年3月28日，出席吉林、北京等11個省市自疑難案例座談會。他在講話中說，黨中央關於落實幹部政策這個重大任務一定要貫徹到底，必須明確下來，不能含糊，不是可搞可不搞的任務。接著，他就什麼是

「貫徹到底」，定了4條標準，以後又對這4條標準不斷加以完善。談到年老體弱，不能分配工作的幹部時，他說，不安排工作的，退休、退職、當顧問的，必須在政治上、生活上把他們照顧好。特別是組織部門、幹部部門，逢年過節，要去看望他們，要把戲票、球賽票送到他們手上，文件要給他們看。不能搞得冷酷無情。（上，156—157）

1979年2月14日，胡耀邦在一位被「四人幫」迫害致死的老幹部遺孀的來信上批示說：「這封信有一定的代表性。這些同志死後雖然在政治上獲得了平反，但善後王作做得不夠完滿，應該實事求是地、合情合理地、補做一些善後工作。比如對這位同志她年紀大了，又有病，我看她的處境是很淒涼的，心情是很悲哀的，因此，我們應該去看看她。」（上，315）

這樣的事情簡直難以計數。僅從以上幾例，便可看出，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真正是嘔心瀝血，不遺餘力。他說的話，作出的批示，佈置的工作，樁樁件件，都表現出對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同情、關愛和高度的責任感，充滿人情味。當改正右派突破5。萬時，有人慌了，說「這樣改，太多了！」胡耀邦回敬他說：「當年猛抓右派的時候為什麼就不嫌多！」（上，220）一個嫌救人太多，一個恨害人太多。一個想的是所謂「黨的形象」，一個想的是受害人的痛苦。兩種立場，兩種道德，形成鮮明對照！

作為人本思想者，胡耀邦的道德風貌，還表現在遭人迫害而不計前嫌。

最典型的，是為劉瀾濤平反。1964年11月16日，胡耀邦任職陝西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到任後，他敏銳地發現，陝西四清運動過火，打擊面寬，抓人多，開除黨籍多，開除公職多，廣大幹部群眾心情緊張，生產形勢十分嚴峻。他與省委研究後，採取果斷措施，糾正這些過火做法，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熱烈歡迎。不料，卻遭到劉瀾濤為首的西北局和陝西省委的嚴厲批判，直批得他突發大腦蛛網膜炎，醫生說有生命危險，才被搶救住進醫院。1965年6月20日，他搭乘葉劍英元帥的軍用專機回京。

臨登機時，葉帥說：「耀邦走吧！這個地方不好搞啊！」一到北京，他就住進醫院。（張顯揚、單史義、王銶編撰《胡耀邦年譜長編》（上），香港世界科學教育出版社第481頁、487頁）

劉瀾濤「文革」中在劫難逃，也被打倒了，「文革」後成了平反對象。談到他的平反，胡耀邦說，人家在「文革」中吃的苦也不少。況且整人的人自己挨了整，一定會從中吸取教訓的。以前的事一律不許再提。他指示，把劉瀾濤接到北京治病，要抓緊時間為他平反。胡耀邦不僅為他平了反，而且，推薦他擔任中央的重要工作。胡耀邦擔任總書記後，劉瀾濤到家裏當面賠禮道歉。胡耀邦說，「這件事我早就忘了」。（上，276）「早就忘了」，當然不是從記憶中消失了，而是融化在他那博大寬厚的人道主義胸懷中了。

（三）「治國之道，富民為先」

發動和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主要是為民消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則主要是為民造福。

1980年2月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後，尤其是在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以後，他的工作重點逐漸轉移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面，下基層調查研究的時間也越來越多。

胡耀邦看到建國幾十年，廣大人民群眾還這樣貧窮，感到難過和愧疚，責任重大。一次，他在同福建省委書記項南談話時說：「過去六年我們完成了撥亂反正，今後五年用一句什麼話概括呢？過了若干年，人們如何評論我們，經濟搞不上去，人民生活不能改善，我們交代不了！」（下，754）

搞了幾十年，人民還這樣貧窮，決不是個別方針政策出了問題，而是「治國之道」有問題。問題就在兩個「窮」個字上，一個叫「窮過

渡」，一個叫「窮折騰」。因此，文革結束以後，中央決定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實現「四個現代化」為目標。胡耀邦完全擁護這個轉變。但是，作為一個人本思想者，他不滿足於這些公文式的提法。為了使人民群眾易於理解，更為了使經濟建設的成果真正落到人民群眾身上，他用「治國之道，富民為先」（下，1208）八个大字，對這個歷史性的轉變作了通俗易懂的概括。他說：「社會主義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物質極大地豐富起來，使國家和人民儘快地富裕起來。如果社會主義窮得要命，誰幹社會主義?」（下，992）又說：我們要求各級幹部、全體共產黨員都要認識到：儘快地使人民富起來，這是我們黨的根本主張。「人民富裕不了，我們還搞什麼四化?」這個「富民為先」的思想，很快形成為「富民政策」，受到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的衷心擁護。

為了落實「富民政策」，他走到哪里，都大念致富經，鼓勵開展「致富大討論」。他說：「我們考慮問題的條條思路都要集中在使國家和人民較快富裕起來。這是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我們的組織、宣傳、教育、計劃、財政、稅收、政法等部門都要為這個中心服務。我們講統一思想就是要統一到這一點上來。」（下，1089、1090）

他對人民群眾的民生問題想得很多、很細。1982 年 9 月，他去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視察，和那裏的幹部談話說，解放 3。多年了，我們國家還有彝族、苗族、布依族、瑤族等少數民族的住房條件沒有多大改進。十二大以後，應該著手逐步解決這個問題。人民的衣食住行，油鹽柴米醬醋茶，我們都要想一想，考慮考慮。應當動員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和廣大幹部，都來關心和解決這個問題。他鼓勵州委幾位彝族領導幹部解決群眾生活問題，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你們當了官，可不要忘記自己的同胞啊!」（下，797）

為了使人民群眾儘快富起來，他在發展多種經營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單打一的種糧食，農民富不起來。1981 年 12 月 25 日，他同甘肅省委書記馮紀新談話，專門就甘肅的多種經營問題，作了深入的討論。他說，甘肅土地遼闊，有發展多種經營的廣闊天地。從目前情況看，甘肅的耕

地還可以作些調整，多搞些經濟作物，不要老盯著現有耕地抓糧食，光靠抓糧食，改變甘肅的面貌比較困難。他說：要搞多種經營，就要下狠心長期堅持下去，一抓幾年，連續抓，長期抓。你們可以種植棉花、烤煙、甜菜、藥材等，同時還可以多搞一些乾果，如核桃、杏仁、紅棗等。他還建議他們大抓植樹、種草，發展畜牧業，重視農副產品和土特產品加工。為此，他特別建議他們，要重視用現代科學知識去武裝幹部，教育幹部放開眼界，開化思想。（上，694、695）

早些時，他去江西考察，對吉安地、市負責幹部說，多種經營只要發動廣大群眾因地制宜地發展，門路是非常之多的，要善於利用各地的丘陵、山地、水塘、海域。他總結了種植業、養殖業、採集事、手工業、服務業五個方面，每個方面列舉 10 項，共 50 個大項，200 多個小項。（上，570）他真是為他們想得仔細、想得周到。即使專門吃農業飯的人，也未必能這樣。顯然，他是有備而來，事前作了大量研究。

至於他主持制定的幾個農業問題的一號文件，倡導和支持光彩事業，發展個體經濟，制定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等等，同樣盡了極大的心力。這裏，我主要不是來說，胡耀邦對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所做的貢獻，而是說他的人本思想在這方面的體現。胡耀邦對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民造福，真正是全心全意，全力以赴。

他下臺以後，仍然不改初衷，外出考察，一如既往地宣傳他的「富民為先」的主張。例如，1988 年 5 月，去河北易縣考察，和縣裏幹部談話時說：「國家要富強，要建立在人民富裕的基礎上。農民負擔一些必要的費用必須適當，要在生產增長的基礎上。群眾富了就千方百計挖群眾的錢包，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下，1338）他主張，生產發展了，成果首先應該歸人民。他反對擠兌人民群眾，挖他們的錢包。

六．他是去世後被重新發現的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是一個藏量頗豐的寶庫，但至今沒有被充分發掘出來。這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話語方面的原因。他和我們大家一樣，生活在黨文化的話語系統裏，受到這個話語系統的包圍和支配。因此，他的人本思想，其中包括「人」這個核心概念，不可能直截了當地加以表達，只能涵蓋在「人民」、「群眾」、「人民群眾」這些概念之下。再一個，是身份方面的原因。作為共產黨的官員，而且還是一個大官，他不能不受到黨員和官員雙重身份的制約。因此，在他的文章、報告、談話、批示中，特別是在他主持起草或定稿的文件中，官方意識形態的概念和術語，諸如「領導」、「专政」、「四個堅持」之類，出現的頻率，不比其他人少。三則是，在一些問題上，他仍囿于黨文化的藩籬。正因為如此，他的人本思想是不完整、不成體系的，有時還自相矛盾。例如，他說過「無產階級專政最文明」。（上，146）他這個話是在批評「一提專政就是鎮壓，一提鎮壓就是殺、關、管」時說的，本意是希望這個專政文明起來，因而明顯地是一個「應然判斷」，而不是一个「實然判斷」。但是，不管怎麼說，他對無產階級專政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事實。實際上，只要是專政，包括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主義者聖茹斯特、馬拉和巴貝夫的「革命專政」，都不是文明的，無產階級專政尤其如此。列寧說得明白：「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拘束而直接憑藉暴力的政權。」（見《列寧全集》舊版，第10卷，第216頁）十月革命以來，社會主義各國的歷史經驗表明，無產階級專政確如列寧所說，是一個無法無天（用毛澤東的話說，叫做「和尚打傘」）的政權。這樣的政權怎麼會文明呢?

由於這樣三個方面的原因，如果不仔細加以鑒別和分析，不從他的實際傾向上去體察，並把他與他的同僚加以比較，他的人本思想，便難

以凸現出來，而為人們所理解。所以，他生前的形象，充其量只是比他的同僚開明一些，多一些人情味，多一些民主作風，待人接物比較熱情，好打交道，而不是本質上和他們不同道。

直到198了年1月，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從總書記的位置上趕下臺，特別是1989年4月，在鬱鬱寡歡中離開人世，隨後在全國各地，尤其在北京，掀起驚天動地的悼念活動以後，人們才從他的生平事蹟，為人處世，以至音容笑貌中，逐漸認識到，胡耀邦在中共黨內是一位與眾不同的偉人。他正直，善良，關心民間疾苦，同情弱者，有使命感，是一個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人。即使自己身處逆境，仍然關心別人的命運。他逝世以後，許多人回憶說，當年身負冤案，去找同樣身負冤案的胡耀邦訴苦談心，得到他真誠的同情和鼓勵，使他們深受感動和教育。

對於許多人來說，胡耀邦是去世後被重新發現的。人們本來只知道他是「紅小鬼」出生，是革命家；原來，他還是人本思想者。他力圖把兩種身份統一起來。對他來說，這並非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而是自以為「可為而為之」。實際上，哪里統一得起來？每當兩種身份發生矛盾，他都非常尷尬，非常為難。這在應對「軟弱渙散」的批評，應對「清除精神污染」的惡浪，以及後來更加猛烈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暴中，情況都是如此。一方面，在幾位超級老人虎視眈眈的監視之下，外加那兩個左王上竄下跳，搬弄是非，製造事端，他不得不作出一些姿態；另一方面，又必須設法把鬥爭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以免影響改革開放的大局，並保護那些被批判的人。這就陷入了上面所說的「道德衝突」：黨命不可違，人心更不可違。他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終於導致下臺的結局。

胡耀邦是一個忠實於信念的人。為了共產主義理想，他貢獻了畢生精力；為了實踐行他的人本思想，他不惜扮演悲壯的殉道者的角色。人們重新發現了他，也就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他。以「階級本位」論為指導的黨，怎麼能容得他的人本思想？為此，他丟了烏紗帽，一定意義上，也丟了性命。令人不忍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後，他也沒有明白，一個共

產主義者，為什麼不能同時是人本思想者？他忘記了，在共產主義和人本思想者之先之間，隔著一個黨，就像在天堂和基督徒之間隔著一個教會一樣。原本的共產主義即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在其理想層面上，是包含著人本思想和人道主義的；而他所屬的黨，則是以排斥和否定人本思想和人道主義為其意識形態前提的。他被推倒以後，希望當局給他做一個公正的結論。實際上，這樣的結論，只能由人民來做，當局怎麼會做呢，他們怎麼能置黨的意識形態前提於不顧？

「我死了，不想去八寶山。」（下，1373）胡耀邦在和夫人商量後事時，這樣說過，這是一句非常激憤的話，說明他對身後之事有一種冷峻的思考。對身後之事的思考，也就是對生前之事的思考。他決心實行某種決裂。他不願意死後和那些人為伍。這說明，他生前也就是當下，已經和他們分道揚鑣。這種決裂當然是有限度的，只是和那些人決裂，並不是和黨、和他為之奮鬥的共產主義理想決裂。在他看來，這些人違背了黨的宗旨：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共產黨員，尤其是它的領導人，怎麼可以把黨和國家置於人民之上，怎麼可以只講階級性，不講人性？他認為，他和他們的分歧，本質上是他們和黨的旨宗的分歧。他沒有錯，是他們錯了。可以想見，糾纏在這樣的思想死結中，胡耀邦生命中最後那兩年多時間，內心該有多麼悲憤！

在時代交叉點上，在人的命運被當作某種主義或制度的人質的情況下，扮演悲劇角色，要比扮演喜劇角色崇高而有震撼力。在這個意義上，胡耀邦不僅偉大，而且榮幸：他是一個時代的代表，一個即將回歸人性時代的先知先覺。今天，人們早已不把他當作一位受屈的共產黨領袖來看待，他為之奮鬥的共產主義理想，也已經失去往日的光輝。大家敬仰他，愛戴他，因為他是一個高尚而善良的人，一个真正的好人。他的聲望，他的形象，下臺後比在位時更高，死後比生前更高。這樣的人，要是在古代，是要給他建廟塑像，尊為胡公，領受香火的。現實越污穢、殘酷、不通人性，人們越敬仰他，懷念他。他將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七. 可以不做事，但是還要做人

為了更好地理解胡耀邦，追蹤一下他的心路歷程，也許並非多餘。

1989 年 1 月 6 日，胡耀邦在湖南省委一個招待所會見一位作家。談話臨近結束時，他神色凝重，目視前方，輕聲地說：「我可以不做工作，但是，我還要做人。」（下，1362）

「還要做人」，四個字，擲地有聲，道出了一個人本思想者一生的人格追求：不管位高位低，順境逆境，都堅持「做人」；現在下來了，做不了什麼事了，但「還要做人」。在他看來，「做人」是人生頭等大事。所謂做人，就是堅持正值、善良、熱愛人民，有同情心這樣一種道德理念和為人處世的原則。

胡耀邦一生，有四樣寶物與他相伴，幫助他從一個苦孩子成長為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一代共產黨人的領袖，一個悲天憫人的人本思想者。這四件寶物是，出身、經歷、讀書、思考。

胡耀邦是從貧困山區走出來的苦孩子。像許多普通人一樣，到了晚年，他也常常回憶自己的身世。一次，他和子侄們談起家庭往事：「我的老爺子是靠做苦力挑煤（擔腳）養大我們的，我的石姐沒日沒夜織麻攢了兩塊銀元供我讀書，我至今還記得。我老爺子他老人家因長期擔腳，兩隻肩膀腫了兩個好大繭包喲。」說著說著，淚水就湧出來了。（下，1350）還有一次，他去湖南長沙，和隨行的侄女談起自己的經歷：我是不滿 15 歲時就兩次跟隨紅軍。第一次被沖散了，第二次是在（1929 年）11 月 8、9、10 日才走成，離家時，你婆婆哭送至大橋邊。我當時是眼見政府腐敗、政治黑暗，你石姑媽受欺凌，我感到很悲憤，於是跟隨彭豐同志走了。」（下，1349）

參加革命以後，他經歷了艱苦卓絕的對敵鬥爭，同時也經歷了殘酷的黨內鬥爭。小小年紀就被打成 AB 集團，差點兒被送上不歸路。以後又

經歷了延安整風時候的「搶救運動」，1957 年的反右派鬥爭，1959 年反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目睹了許多革命戰友屈打成招，被定成國民黨特務；目睹了許多優秀的青年才俊，其中包括他在團中央時的多名屬下，被打成「右派分子」；目睹了彭德懷元帥的悲情，堂堂一個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一夜之間成了「反黨分子」。5 年以後，1964 年，他在陝西省代理第一書記任上，又無端地挨了劉瀾濤的批判，直批得大腦犯病。「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麾下「一群瘋狗」（「四人幫」。上，155）瘋狂迫害幹部、群眾。落入他們手中的人，一無例外地遭到殘酷鬥爭，身心備受摧殘，人格遭到侮辱。包括國家主席、共和國元帥在內的大批無辜的人，死於非命。他自己也歷盡磨難，一日批鬥數次，能苟全性命已屬萬幸；

他經歷了太多的不幸和痛苦，內心不斷受到震撼，漸漸形成了關心人的命運，同情遭遇不幸的人這樣一種思想感情。他常常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誡大家，不能搞過火鬥爭，對犯錯誤的同志，搞穩一點好。他說:「我很小參加革命，當時 18 歲，被人家誣為 AB 團，被逼供信，真是舉目無親。我對這件事情印象深得很。一個黨內鬥爭，一個社會鬥爭，都有深刻的教訓。」（上，568）一次，和來訪的客人談起整人的問題時，他說，在這個問題上，自己覺悟得比較早。他反復強調，「要實事求是，不要整人。」（上，218）他對兩種人特別關心和同情：一種是貧苦農民；（下，1360）一種是在政治鬥爭中被冤屈的人。（下，1350）這和他的出生經歷顯然有直接關係。

出身經歷，對於胡耀邦形成自己的人本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僅僅有這樣的身世，還不足以造就他那樣的思想品德。痘其中，多讀書，勤思考，至關重要。

胡耀邦參加革命前，只讀過半年初中，但是，他好學深思，博覽群書（據李銳先生說，《博覽群書》那個刊名就是胡耀邦題字的）終於成為一個能詩善文、長於演說的大知識分子。他讀馬列的書，也讀《聖經》，讀洋裝書，也讀線裝書，各個知識領域，都儘量涉獵。讀書是他一生的

愛好，是的他生活方式。即使在「文革」那樣的動亂年代，他也堅持讀書。他說：關「牛棚」也是一種鍛煉，靠邊站了，正是讀書的大好時機。「文革」中他總結了 12 個字的讀書經：「靠邊站，別閑著，多讀書，想問題。」。（上，186）

1969 年胡耀邦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團中央五七幹校勞動，分配給他幹的活是去 70 里外用架子車拉石頭、遞磚送泥，或是曬場扛麻袋。黃湖農場地勢低窪，雜草叢生，一到夏天，氣溫驟升，悶熱難熬，氣壓低得使人喘不過氣來，成堆成團的蚊子，用大芭蕉扇子都趕不走。軍代表向他們「鄭重」宣佈過，以後你們就在黃湖安家落戶，世世代代為農了。在這嚴峻考驗的情況下，一些同志灰心了，認為這一生完了。胡耀邦卻不然，仍擠時間認真讀書。他用陳老總（陳毅）的詩句鼓勵自己：「莫道浮雲終蔽日，嚴冬過盡綻春蕾。」（上，404）讀書，使他智慧，堅強，生活充實，工作如虎添翼，精神境界不斷提高。

1987 年，下臺以後，他仍堅持每天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當讀到第 21 卷「卡爾·馬克思在科倫陪審法庭面前」一書序言時，被兩段話深深吸引了，他把它們抄了下來。其中一段說：「對歷史事件，不應當埋怨，相反地，應當去理解它們的原因，以及它們的還遠遠沒有完全顯示出來的後果。」他認為，「這是馬克思的一個重要觀點，一種歷史現象的發生，要尋找根源，發現隱藏在事物後面很深的東西。」接著他舉了「文革」這件事，末了又說，「對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觀」。看得出來　他一邊讀書，一邊思考，時刻感覺到胸中那沉重的塊壘。可惜，沒有一本書，可以解開他的心結。直到去世，他也未能找到「自己事件」的根源，發掘出「隱藏在事物後面很深的東西」。現在，他已經作古，這件事情只能由後人來做了。

胡耀邦是一個善於獨立思考的人。他曾經不止一次地說過，「學習要獨立思考，不用聽什麼風。」（上，52）他讀馬列的書，但不迷信馬列。他說：「不能把馬列主義看成是迷信的東西、宗教的東西，（否則）很危險啊！」（上，212）「文革」結束以後，他在理論方面的勇氣和才能，得

到了比較充分的發揮，對幾十年來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作了深人的思考。

他是中共黨內最早起來批判「兩個凡是」的人。「兩個凡是」的標準文本是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提出來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但是，「兩個凡是」的主張早就出臺了，胡耀邦看出，這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1977年1月1日、2日，連續兩天，他和來訪的朋友談話時，就進行了批判。他說，現在的問題是，只要是毛主席說過話的、點過頭的、畫過圈的，都要一切照辦，都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繼續「批鄧」、繼續「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在這種情況下，你要出來工作，就得說違心話，做違心事。他說，我才不幹哪！與其去做違心事，不如在家抱兒孫吧！(上，38)

「文革」中，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一個壓倒一切的口號，多少坑國害民的事情，都是在這個口號下進行的。1976年11月3日，胡耀邦在和一位朋友談話時，明確指出，中國從來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復辟資本主義，要復辟只能復辟封建主義，搞法西斯專政。對於「四人幫」的罪孽，他也不糾纏於什麼左呀、右呀、形左實右呀，而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有「兩大政策」，一是愚民政策，把思想、理論搞亂了；二是恐怖政策，大辦兩個「工廠」，扣帽子、打棍子，任意迫害好人。(上，31) 這就把他們的專制主義、法西斯專政的面目一下子揭露出來了。

他對赫魯曉夫和中共「九評」的看法，也比較客觀，而不再重複過去的老調。他說：1957年，(毛) 主席的鋒芒轉了，從反「左」，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下轉到反右，對準了資本主義，對準了鐵托、赫魯曉夫。到寫「九評」時他就轉不回來了。赫魯曉夫這個人是不大好，批斯大林也批得不深，但主席開始還是肯定他批斯大林是「揭了蓋子」。後來全盤否定赫魯曉夫，給教條主義，給林彪、康生這些人開了綠燈。

現在看來《九評》的基本方向是錯誤的，這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國際根源了。（上，55）粉碎「四人幫」不過半年，思想理論方面，基本上還是「文革」時流行的「反修防修」那一套。胡耀邦能這樣看待赫魯曉夫和「九評」，真可謂大智大勇了。

1978年9月9日，他和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組開會，談到經濟問題。他說，經濟問題很多。如農業，理論上沒有搞清楚。把個體農民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是很大的錯誤。如果個體農民就是資本主義，那不是說幾千年就是資本主義？他由此回顧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並聯繫南斯拉夫和蘇聯的情況，指出，我們從1955年開始，把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提得太高了，以為合作化了，不管內容怎樣，就是社會主義。只要是單幹，不管內容怎樣，就是資本主義。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55年以後，一直高喊割資本主義尾巴，剝奪農民。他明確指出，個體不等於資本主義。個體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只能是引導的方法。（上，216）胡耀邦講這個問題的時候，列寧關於「小生產每日每時產生資本主義」的論斷還深深地禁錮著人們的頭腦呢。

同年初夏，他在和一位來訪的客人談到我們這個民族不自由的生存狀態時說：禁錮我們這個民族創造力的，一個是精神枷鎖，什麼「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直到「兩個凡是」，都是教條主義。還有一個是「組織枷鎖」，歷次政治運動積累起來的冤假錯案，各種錯誤的組織結論，把幹部知識分子壓得抬不起頭來。他們的親屬、朋友，被剝奪了擔任適當工作的權利，無法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麼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呢？」（上，56）

胡耀邦在讀書思考的時候，非常自覺地用美好的、高尚的東西，來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例如，讀《愛因斯坦文集》序言時，他感悟到，愛因斯坦「有一種獨特的精神力量、思想方法。他主張獨立思考。我們要從偉大科學家那裏吸取一點營養，吸取一點思想要素。」（上，176）又比如，一次出席民盟中央的迎春茶話會，胡耀邦說到張瀾先生。他說，

張瀾先生有兩條是值得欽佩的，第一條，他有很高尚的精神，這就是他的頑強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條，他有一個很優良的氣質，就是他有強烈的正義感。（上，474）

胡耀邦就是這樣一個人：一生都在完善自己的人格素養，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無愧於人民、無愧於天地的人。從黨文化的環境裏生長出胡耀邦這樣的人，的確可以說是一個奇跡；但是，從他的出身、經歷和永遠向善的自覺努力來看，成為這樣一個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華民族是一個缺乏民主、自由、人權和人道主義傳統、而封建主義流毒很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這份人本思想遺產，顯得格外珍貴。它對於我們沿著由普世價值鋪就的世界文明大道，進行現代化建設，尤其是進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現存的政治制度是按照黨文化，即「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建構起來的。這樣的政治制度，和以專制主義為核心的封建主義遺毒互相適應，互相促進。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義，正是改革這種政治體制的最好的指南：它們既是「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的對立面，又是封建主義遺毒的強大的消毒劑。

（2009 年 1 月初稿，2009 年 2 月定稿）

一位偉大的民主主義者

——紀念胡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

杜　光

胡耀邦離開他所熱愛的中華大地已經20年了。20年來，雖然有些人刻意掩蓋他所建樹的偉大業績，淡化他在人們心中的光輝形象，但是，歷史是不容抹殺的。誠如他的夫人所說：「你活著想著人民，你死了人民想念你。」生前想著人民的人，人民是不會忘記他的。胡耀邦在掌握著中國政壇牛耳的近10年裏，以他英勇無畏的膽識和大公無私的精神，主持了平反冤假錯案和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把中國社會從「六人幫」（四人幫加毛、康）的專制陰影和「兩個凡是」的精神枷鎖裏解放出來，為改革開放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把中國重新引上了民主主義的發展道路。胡耀邦是100多年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偉大的民主主義者。

于光遠在為《胡耀邦傳》撰寫的序言裏，因為胡耀邦追悼大會上黨中央的悼詞中沒有把他稱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感到憤憤不平。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個人的蓋棺論定，不是悼詞或文件就可以裁決的。康生的悼詞裏不是稱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嗎？不出幾年就被推翻掉了。除了極少數喪心病狂地為「六人幫」翻案、妄圖再次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毛極左派外，現在還有誰承認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呢？毛澤東去世已經30多年，棺雖已蓋，論卻未定。這是因為，裁定一個人在世時的功過是非，根據的是他畢生的實踐，而實踐活動的錯綜複

雜，加上某些蓄意的掩蓋與偽造，使後人難以作出準確的判斷。對毛澤東的評價更是如此，只有還原歷史真相，對他的歷史進行全面的分析，才有可能最後論定，給出恰如其分的歷史評價。

胡耀邦的情況則不同。他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從來不隱瞞或美化自己的所作所為。朱學勤在為《中國傳媒風雲錄》所寫的代序裏，說胡耀邦「是一個罕見的陽光型的政治家」，「滿身透明，滿身陽光」，言簡意賅地道出了胡耀邦的特點。綜觀他的革命生涯，在文化大革命謝幕後的10年裏達到光輝的頂點。他的卓越功勳如日月之昭，人所共見，並且永遠銘記在中華民族兒女們的心坎上。

但是，如何從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高度，來觀察胡耀邦的傑出貢獻的性質，仍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在他逝世20周年之際，我願就這個問題略陳管見。

一. 真誠的共產主義者首先應該是真誠的民主主義者

中國100多年來的歷史，是一部曲折複雜的、至今還沒有完成的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革命史。撥開歷史的迷霧，我們不難發現，從洋務運動到現在的100多年歲月裏，充滿著民主主義同專制主義的矛盾與鬥爭。在這個歷史時期裏，登上政治舞臺的人物，都不能不在這個矛盾面前作出自己的選擇，並在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的鬥爭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展露自己的真容。所以，評價這個時期的歷史人物，都應該把他們放在這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下，揭開各種各樣的粉飾和偽裝，從他們對民主主義還是專制主義的取捨抉擇裏，記錄下他們的所作所為，E這個基礎上，作出褒貶臧否的結論。

我說胡耀邦是偉大的民主主義者，根據的是他的實踐，是他對社會和歷史所作的巨大貢獻的性質，而不是他的理念。就他的理念來說，他

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一個真誠的共產主義者。真誠的共產主義者都是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但是，由於他所處時代的社會生產發展水平和文明所達到的程度，遠遠不具備孕育共產主義和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的條件，因而在實踐上，他就不能不是一個真誠的民主主義者。因為，就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實踐活動的客觀效果來說，要實現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推進民主主義。毛澤東說：「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毛澤東選集》直排本第3卷第1083頁）這是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至理名言。民主主義是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歷史長河，不完成民主主義的航程，就不可能到達社會主義彼岸。可惜，毛澤東自已違背了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至理名言」，在民主主義的道路上剛邁出幾步，就拋棄民主主義，硬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甚至發動「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結果只能使社會倒退，人民遭殃。這就從反面告訴我們，真正要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而奮鬥，首先就要為民主主義而奮鬥。從這個意義上說來，真誠的共產主義者，首先應該是真誠的民主主義者；離開民主主義，背叛民主主義，實際上意味著離開了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背叛了社會主義的理念。這個規律，對於所有真誠的共產主義者、真誠的社會主義者，都是毫無例外地適用的。問題在於，民主主義的實踐怎麼會以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為旗幟的呢？

為了更好地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進行分析：一是世界範圍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是中國近100年來的社會現實及其發展。

二. 從共產主義向社會主義轉換的歷史回顧

馬克思1858年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裏指出：「無論哪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

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5 頁）這一段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精華，是科學社會王義全部學說的出發點和理論基礎。它甚至還可以用來衡量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價值和失誤所在。馬克思在理論上的某些不當之處，都可以歸結為違背了他自己發現的這個真理。

馬克思、恩格斯在青年時代投身於改造客觀世界的革命活動的時候，正逢歐洲各種社會主義思想廣泛傳播，社會主義成了思想理論界的時髦，各種觀點都以社會主義相標榜。「在 1847 年，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的運動，而共產主義則是工人階級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408 頁，又見於第 22 卷第 66 頁）為了使自己的理論思想同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劃清界限，他們把自己的理論體系叫做共產主義，並且參加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活動。

但他們並不是共產主義學說的首創者。在他們之前，共產主義學說已經頗為盛行。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裏就談到，法國 18 世紀的摩萊里、馬布利的著作，「簡直就是共產主義的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21 頁）。在 1843 年寫的 Ck 陸上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裏，他全面介紹並論述了共產主義在法國、英國和德國的傳播和影響。他認為共產主義「是以現代文明社會的一般情況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結論」。當時「在法國，就有 50 多萬共產主義者」（同上，第 1 卷第 575 頁）。文章還提到：1830 年革命失敗後「以巴貝夫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在法國各大城市的傳播，以卡貝為首的伊加利亞學派——共產主義派，法國共產主義和英國共產主義的區別，「德國共產主義創始者」魏特林等等（同上，第 576 頁、580 頁、582 頁、581 頁、586 頁）。魏特林 1842 年發表的《和諧與自由的保證》，被馬克思讚揚為德國無產階級的「史無前例的光輝燦爛的處女作」（同上，第 483 頁）。

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學說是對這些共產主義先驅者的理論思想的繼承與發展。這些共產主義者主張廢除私有制，實行公有制。如摩

布利認為「私有制是財產和地位不平等的起因，從而也是我們的一切罪惡的基本原因」（《馬布利選集》，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5。頁）。魏特林提出「共有共用制」，認為「必須要求一切人的自由」，「這種自由只有用取消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用廢除金錢恢復地產的共有共用才能達到」（《和諧與自由的保證》，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237頁）。這些共產主義者雖然為未來的社會制度提出許多設想，但一般都不贊成暴力奪取政權，如德薩米就明確表示：「共產主義沒有使用暴力和強制的任何意向和任何必要。」（《公有法典》，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256頁）法國伊加利亞學派「在報刊上也聲明反對暴力革命和秘密團體」（《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1頁）。

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學說，在他們1848年發佈的《共產黨宣言》裏作了最完備的闡述。他們指出：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本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共產黨人的理論則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即「消滅那種以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沒有財產為必要條件的私有制」，並且公開宣告：共產黨人的目的「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有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同上第4卷第479頁、480頁、482頁、504頁）在後來的一些著作中，如1851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和1871年的《法蘭西內戰》裏，馬克思都闡述了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思想。（見同上第8卷第216頁，第17卷第355頁、642頁）

但是，革命運動的屢遭挫折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使他們對共產主義這兩大內涵的理解，發生了大幅度的變化。

在《共產黨宣言》裏，馬克思恩格斯曾經宣告，無產階級將「運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同上第4卷第491頁）。但隨著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別是對信用制度和股份制的深入研究，馬克思發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其本身範圍內的揚棄，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括私有制度）有可能和平地轉變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而不需要用暴力去摧毀。這個認識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馬克思在1856年撰寫

的文章裏曾說：「在工業上運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標誌著現代各國經濟生活中的新時代。」（同上第 12 卷第 37 頁）在 1858 年的文章裏，進而談到：「它們是發展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強大杠杆」，「它顯示出過去料想不到的聯合的生產能力」，「它們對國民經濟的迅速增長的影響恐怕估計再高也不為過的。」（同上第 610 頁、609 頁）可見，馬克思在 50 年代已經察覺到股份公司對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巨大作用，但還沒有從生產關係的角度去考察。到了 70 年代，經過對資本的深入研究，才意識到股份公司和它賴以產生的信用制度的重大歷史意義。他在《資本論》第 3 卷裏指出：信用制度是「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揚棄了資本主義的私人性質，它本身，但也僅僅是就它本身來說，已經包含著資本本身的揚棄。」「毫無疑問，在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聯合起來的生產方式過渡時，信用制度會作為有力的杠杆發生作用。」（同上第 25 卷第 499 頁、686 頁）談到股份公司時，他說：股份制度「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資本「在這裏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同上第 496 頁、493 頁）他還明確地指出：股份制度是「資本在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通向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過渡點」，「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同上第 494 頁、496 頁、498 頁）馬克思的這些論述十分明顯地表明，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其自身範圍內產生著否定自己的因素；「它越是擴大」，「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而不需要通過暴力。這是對暴力消滅私有制的共產主義理論的否定。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致力於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宣傳和實踐。馬克思 1864 年在為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的成立宣言裏公開宣告：「奪取政權已成為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13頁）直到1879年，他們還在給倍倍爾、李b克內西、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裏，批評赫希伯格、伯恩斯坦和施拉姆在文章中宣揚「不打算走暴力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決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同上，第17卷第184頁）但是，畢竟是形勢比人強，工人運動趨於低潮的現實，促使他們把目光轉向暴力以外的途徑。1881年，法國魯貝城和科芒特里兩地市議會由於工人佔議員多數，通過了有利於工人的提案。恩格斯為此發表文章《兩個模範地方議會》，希望英、德等國工人也能「變成國家中的現實力量」。（同上，第17卷第295頁）馬克思去世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的不斷勝利，更使恩格斯的思想向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權傾斜。188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帝國議會選舉中獲得1，427，298張選票，35個席位，恩格斯認為「這次選舉真正開創了德國歷史的新時代」。（同上，第22卷第4頁）同年9月，他告誡德國社會民主黨，即使被取締也不應「修築街壘，訴諸武力」，因為「暴動的結果毫無疑問會失掉二十五年來佔領的一切陣地」。（同上，第92頁）1891年他還明確地指出：「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法、英、美）……」。1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同上，第22卷第273頁、274頁）

這些事實充分表明，無論是奪取政權，還是消滅私有制，暴力革命都已經不是唯一的選擇。暴力革命固然是誕育新社會的產婆，但是，如果孕育新社會的舊社會遠沒有到達預產期，暴力是不可能接出活生生的嬰兒的。以人來作比方，胎兒只有兩三個月，產婆硬要把嬰兒拽出來，這個小生命還能活得成嗎？甚至，舊社會的母胎裏根本就沒有懷孕，作為產婆的暴力革命卻武斷地認定胎兒已經在母胎裏發育完成，一定要剖腹取兒，其後果我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不但得不到新生兒，而且母體也將遭到嚴重的損害，健康狀況一落千丈。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遠沒有達到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程度，共產主義就更不用

說了。所以，共產主義所主張的暴力奪取政權和暴力消滅私有制，不能不在事實面前讓步。

與消滅所有制和奪取政權的暴力方式向和平方式轉換同步，作為理論旗幟的共產主義也逐漸向社會主義轉換。這個轉換的標誌，一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關於共產主義兩個發展階段的論述，一是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1848 年的歐洲革命高潮退潮後，各國都開始了工業化的高潮，「隨著與二月革命相聯繫的工人運動退出歷史舞臺，《宣言》也退到後面去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64 頁）1864 年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後(1874 年解散)，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到了 1887 年，「大陸社會主義已經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佈的那個理論了。」「現在，它無疑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帶國際性的著作。」（同上，第 65 頁）《共產黨宣言》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文獻，不是沒有原因的。當然，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經常是通用的。如恩格斯也曾多次把《共產黨宣言》說成是《共產主義宣言》，說這個宣言標誌著兩大社會主義派別——魏特林的空想共產主義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派的融合。（見於同上第 288 頁）當年馬克思恩格斯為了同社會主義的各個流派區別開來，把自己的思想稱為共產主義，現在為什麼又回到社會主義上來呢?

馬克思在 1875 年寫的《哥達綱領批判》裏，首次提出了共產主義劃分為兩個階段的思想。他認為，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由於它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帶有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奉行的仍然是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在這裏，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一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21 頁）（這個分配原則後來被列寧簡稱為「按勞分配」）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已經消失，勞動成為人們的第一需要，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

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同上，第23頁）

馬克思為什麼要把共產主義分為兩個階段？我認為可以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來探討。

經過近30年的工人運動的實踐，證明共產主義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把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理念作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旗幟，無助於這個運動的發展。把它劃分為兩個階段，把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而出的社會稱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拉近鬥爭目標和現實之間的距離，更容易為工人群眾接受。

至於理論上的原因，我們可以從恩格斯的《社會王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得到啟發。恩格斯在這部著作裏說明現代社會主義的內容，來源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兩大階級的階級鬥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以往的社會主義，既同唯物主義歷史觀不相容，不瞭解每個時代的經濟結構是法律設施、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觀點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的現實基礎，又不明白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工人被剝削的秘密。他們儘管義憤填膺地反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卻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對付這種生產方式。「問題在於：一方面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聯繫和它對一定歷史時期的必然性，從而說明它滅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這種生產方式內部的一直還隱蔽著的性質」「這已經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而完成了。」「這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餘價值揭破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於馬克思。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科學」。（同上，第20卷第30頁）

一個值得玩味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在歷史唯物主義和剩餘價值被發現以後才發展成為科學，在此以前的社會主義，都帶有某種空想的烏托邦的性質。那麼，共產主義呢？固然，歷史唯物主義在《共產黨宣言》裏已經有所表現，但是，闡述剩餘價值學說的《資本論》，卻是70年代才出版的。在剩餘價值理論被發現以前，共產主義是科學的，還是空想

烏托邦式的？答案是不難找到的。

正是由於實踐上和理論上的這兩個因素，馬克思恩格斯（特別是恩格斯）在 70 年代以後談到他們的學說和從事的活動時，更多地是用社會主義來概括的，因為科學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同上，第 308 頁）；有時說及共產主義時，也是作為社會主義的同義語來表述。但這兩者的差異還是十分明顯的：就理念來說，共產主義對於社會發展前景的描畫，更多烏托邦的色彩；社會主義則是從資本主義的現實條件中可以預測到的。就實現理念的途徑來說，共產主義主張暴力革命，認為無產階級的兩大目標——奪取政權和消滅私有制，只有通過暴力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卻不排斥非暴力的可能性，認為無產階級可以通過議會取得政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發展，有可能通過它的自我揚棄，過渡到社會主義所有制。兩相比較，社會主義更符合於當時歐洲工人運動的需要。這就是為什麼理論和運動的旗幟，逐漸由共產主義向社會主義轉換的歷史背景。雖然《共產黨宣言》在世界上廣為流傳，有的版本甚至以《共產主義宣言》為書名，但工人運動的理論興趣卻已經轉到社會主義上來了。耐人尋味的是，歐洲各國在七十年代前後成立的馬克思主義工人政黨，如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工人黨、意大利勞動社會黨、匈牙利社會民主黨、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等，都以社會民主或社會主義命名，卻沒有一個自稱是共產黨或共產主義黨的。這個歷史事實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可見，由馬克思恩格斯開創的革命運動，在 19 世紀的最後二三十年裏，主要是以社會主義為旗幟的，共產主義已經逐漸隱退到歷史的後臺去了。

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旗幟以社會主義取代共產主義，是符合於事物發展規律的。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裏指出：「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麼程度。」（同上，第 20 卷第 585 頁）十分明顯，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根據當時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可以對取代資本主義的未來社會進行一些

推測，作出社會主義的理論概括，而關於更加遙遠的共產主義，就免不了帶有烏托邦的成分而不切實際。這大概就是19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主義興旺，而共產主義被冷落的原因。

還需要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在四十年代後期提出他們的共產主義理念時，歐洲各國除英國外，大陸國家的工業都很不發達。在工業落後的條件下出現的殘酷剝削，工人階級的悲慘生活，激起了這兩個年輕人的義憤，促使他們提出徹底改變舊秩序的共產主義。我們閱讀《共產黨宣言》，既為那些入木三分的深刻分析所折服，也因那些慷慨激昂的熱情陳訴而感動。《宣言》體現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意圖解放全世界的廣闊胸襟和人道主義情懷。它的崇高理念令人感佩，但在實踐上卻難免流於空想。因為他們的理論認識，按照前面恩格斯所說的規律，遠遠超出了他們所處的時代條件。特別是了。年代以後，歐洲大陸各國普遍實現工業化，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與此相適應，工人運動進入低潮。這個客觀形勢也是導致共產主義的宣傳趨於冷落，而被社會主義的宣傳取代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 共產主義的幽靈來到世界的東方

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逐漸隱退後，時隔40多年，卻出現在東方的俄羅斯和中國，並且使20世紀的世界歷史，帶上濃厚的共產主義的色彩——當然是東方化了的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出現在東方是有一個歷史過程的。

俄羅斯最早傳播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團體，是普列哈諾夫在1883年成立的「勞動解放社」。它在1884年和1887年曾經兩度擬訂俄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準備仿效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俄國建立社會民主黨，但沒有實現。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年輕的列寧先後在薩馬拉和彼得堡組織馬克思主義小組。1 985年，他把彼得堡的20來個馬克思主義工

人小組聯合起來，成立「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從事於社會主義的宣傳。

列寧早期為無產階級提出的口號是「社會民主主義」。他認為「無產階級的反抗思想一旦覺醒，就必然會納入社會民主主義的軌道之中」。(《列寧全集》第1卷第274頁）「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成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者，堅決反對專制制度的戰士，而不會作任何讓步妥協。」並且指出，社會民主主義者應當始終堅持「社會主義任務和民主主義任務的不可分割的聯繫」，在宣傳科學社會主義的同時，也要廣泛宣傳民主主義思想。(同上，第2卷第289頁、280頁、285頁)

1898年3月，彼得堡、莫斯科、基輔等地鬥爭協會的代表在明斯克舉行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決議和宣言，宣告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成立。列寧次年在《我們的綱領》一文中說：「我們完全以馬克思的理論為依據」，「這個綱領的實質就是組織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領導這一鬥爭，爭取達到最終目的——由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和組織社會主義社會。」（同上，第4卷第186頁、188頁）在這裏，1899年的列寧認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最終目的」是「組織社會主義社會」，而不是共產主義社會。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在《我們的當前任務》一文裏，他說，社會民主工黨是「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體，它的任務是賦予自發的工人運動以明確的社會主義理想。」（同上，第4卷第193頁）1903年7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明確規定：最高綱領是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最低綱領是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可見，在那個時候，共產主義並沒有進入這些社會民主黨人的視野。

進入20世紀後，列寧繼續宣傳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如他認為「社會民主運動的偉大鬥爭」有三種形式：政治的、經濟的、理論的；「社會民主主義學說是由許多偉大的社會主義者創立，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拒絕積極參加現時的政治實際生活，是無政府主義者的策略，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策略，7（同上，第6卷第336頁、390頁、469

頁）在1904年寫的《進一步，退兩步》裏，列寧根據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表決情況，把代表分成四派，他自己屬於「革命的社會民主派」，其他三派則是大、中、小的機會主義派（同上，第7卷第329頁、331頁）但是，他在宣傳中沒有忽略對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作出明確的區分，指出「無產階級的黨卻必須嚴格地區分民主主義要求和社會主義要求」。他在1905年寫的兩篇文章中，分別批判馬爾丁諾夫和普列哈諾夫「把民主主義變革同社會主義變革混為一談」。（同上，第6卷第449頁，第8卷第65頁、360頁）他過了不久還說：「爭取土地和自由的鬥爭是民主主義鬥爭，消滅階級統治的鬥爭才是社會主義鬥爭。」（同上，第10卷第23頁）

在這一時期的宣傳中，列寧還指出「民主主義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同時強調無產階級應該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劃清界限：「無產階級不應當輕信一般的民主主義口號，而應當提出自己的徹底無產階級民主主義口號與它們相對抗。」「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必然要使它成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者。」「無產階級應當在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內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鬥爭。」他還提出「實行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同上，第8卷第485頁，第9卷第35頁、36頁、45頁）

在接下來的年月裏，列寧似乎絕口不談社會民主主義了。他不斷地談社會主義，談階級鬥爭，談民主專政，談暴力革命，不斷地批判與他政見不一致的各個社會主義流派，仍然很少談共產主義。據我的也許不很準確的查檢，在十月革命前的20多年的列寧著作裏，談到共產主義的只有兩處，一處是1902年在《政治鼓動和階級觀點》一文中引證《共產黨宣言》時說：「共產主義者必須支持一切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同上，第5卷第307頁）另一次是在1917年的《國家與革命》裏介紹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的兩個階段和消滅國家等問題時，有好幾次談到共產主義。

可見，列寧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20多年的時間裏，致力於宣傳社會主義，卻基本上沒有提到共產主義，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列寧在

許多著作裏明確地談到俄國革命的民主主義性質，認為無產階級應該成為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者，並且把社會主義列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最高綱領。在這種情況下，共產主義當然只能东之高閣。但是十月革命的輕易取得勝利，卻改變了這個狀況。共產王義幾乎是突然地被提到宣傳的顯著位置，重新成為社會主義的革命旗幟。作為這一轉變的標誌性事件，是共產國際的建立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

1914 年爆發的世界大戰，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帶來重大的轉折。德國、法國、比利時等國的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採取了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的立場，有的提出「保衛祖國」的口號，有的在國會裏投票支援軍費開支預算，有的還參加了戰爭内閣。列寧 1914 年在《革命社會民主黨在歐洲大戰中的任務》一文中譴責說，第二國際的「大多數領袖背叛社會主義的行為，意味著這個國際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產」，認為這是「社會主義中的資產階級思潮」（同上，第 21 卷第 2 頁）在這種形勢下，列寧開始考慮重建國際的問題，並且提出了「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内獲得勝利」的思想。（同上，第 321 頁）對戰爭的不同態度，導致第二國際的分裂。在德、法、意等國，都有一些不同意第二國際方針路線的國際會員，他們離開國際，重組共產黨。這為共產國際的建立，提供了組織和思想上的基礎。

在 1917 年 4 月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七次代表會議上，列寧提出了舉行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的設想。接著，在 1918 年 3 月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列寧作了關於修改黨綱和更改黨名的報告，他在會上宣告：「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已經開始了。」（同上，第 27 卷第 20 頁）大會決定把黨的名稱改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1919 年 3 月，在莫斯科召開了世界各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選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即第三國際。

從此以後，共產主義的口號就頻頻出現在有關的文獻上。以列寧的文章為例，前面我已經提到，在十月革命前的 20 多年裏，列寧只在引用

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時，有兩次提到過共產主義。而在改名為共產黨後，根據我不完全的檢索，僅僅在1919年一年裏，列寧在文章中提到共產主義的地方就有30多處，包括「共產主義」、「共產黨人」、「共產主義革命」、「共產主義建設」、「共產主義方針」、「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等等說法。這個非常明顯的對比，是很能說明問題的。為什麼已經被冷落了三四十年的共產主義，會突然被提到如此顯赫的程度？它那些以暴力為特徵的學說，為什麼會受到俄國革命者的推崇，被他們樹為旗幟，作為自己的政黨名稱，並且在全世界強力推行？這些問題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四. 中國革命的抉擇：從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我國從清朝後期的洋務運動開始，經過戊戌政變，到辛亥革命，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以強盛的資本主義國家為榜樣，苦苦探尋著國強民富的途徑。思想界政治界主要是在民主主義的範圍內尋找出路，艱苦跋涉。我們可以從清末的《憲法大綱》、《十九信條》和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天壇憲法草案》、《中華民國約法》等這些憲政大法裏，看出民主主義的革命成果。但是，與民主主義廣泛傳播的同時，一種新的思想體系也開始從歐洲和日本傳來，這就是社會主義。中華民國成立後，經歷了袁世凱的獨裁統治和軍閥混戰，社會離亂，民不聊生，人們更渴望著能從社會主義裏求取救國救民的方略。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最初是以平均主義的面貌出現的。上世紀末主要由外國傳教士編譯出版的一些書刊，都以「均有無，等貴賤」、「貧富均財」、「平分產業」、「四海之內皆兄弟」等來解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這些書刊發行範圍較小，影響不大。

進入20世紀後，中國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傳播的高潮，這是同日本的社會主義高潮分不開的。

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日本在19世紀的70年代就開始出現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1882年，標榜社會主義的「東洋社會黨」宣告成立。1901年，片山潛、幸德秋水等籌組社會民主黨，被禁止後又成立「社會主義協會」，他們舉行講演，辦刊物，出小冊子，堅韌不懈地宣傳社會主義。盛極一時的社會主義思潮，強烈地影響了許多在日本的中國人、梁啟超、孫中山都以社會主義者自許。如梁啟超在1900年的文章裏宣稱「社會主義必將磅礴於二十世紀也明矣！」孫中山在1903年也表示：「社會主義，乃弟所極思不能須臾忘者。」（《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第27—2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那個時候介紹社會主義最有力的是一些留日學生。在世紀之交，許多青年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出路，紛紛前往由於發展資本主義而一躍成為東方強國的日本去留學，1906年的留日學生將近1萬人。其中不少人熱衷於閱讀介紹社會主義的書刊，參加日本社會主義者舉辦的講演會、討論會，有些留學生還從日文譯介社會主義著作，送回國內出版。一些在日本出版的中文報刊也經常發表介紹、討論社會主義的文章，運回國內發行。這些書刊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上海和內地的報刊也時有倡言社會主義的文章出現。如曾經留日的馬君武1903年2月15日在《譯書彙編》上發表《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認為「社會主義誠今世一大問題，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內，不可不研究也」。（《現代中國政治思想流派》上卷，第65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

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潮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我們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術語，如生產力、生產關係、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唯物史觀、剩餘價值等等，都是沿用日本人提出來的概念。

1908年，日本政府取締社會主義組織，生氣勃勃的社會主義運動在嚴厲的打擊下一蹶不振，但社會主義在中國卻繼續得到廣泛的傳播，從

日本和歐洲歸來的知識分子積極鼓吹社會主義。1911年，江亢虎在上海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他在回答宋教仁等對社會主義的責難時說：「中國今日或尚非社會主義實行之時代」，但「確是社會主義鼓吹之時代也」。（《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第63頁）同年11月5日，他發起成立「中國社會黨」，一年以後就發展到300多個支部，20多萬黨員。（同上，第65頁）1912年初，從中國社會黨分裂出來的一些工人成立「中華工黨」，吸收工人參加，不出一年，就在14省建立支部，黨員也達20萬人。同年11月，又有一些激進分子脫離中國社會黨，另組「社會黨」，申明以「純粹社會主義為宗旨，以消滅階級、實行共產、教育平等、尊重個人、破除界限（無國家、無家庭、無宗教）為綱領。」（同上，第75頁）這就具有明顯的無政府主義色彩了。

孫中山對中國社會黨的活動極為支持，並且致力於宣傳社會主義。他自認「余實為完全社會主義家也」（同上，第79頁）他把當時的社會主義派別分為兩類，一為共產社會主義，即無政府主義；一為集產社會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他認為「共產主義本為社會主義之上乘」，「人在社會之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郅治之極，政府遂處於無為之地位，而歸於消滅之一途」。但人們今日達不到這個水準，只能主張集產社會主義，即「集種種生產之物產，歸為公有，而收其利」，逐漸達到「幼有所教，老有所養，分業操作，各得其所。我中華民國之國家，一變而為社會主義之國家」，此真「自由平等博愛之境域也」。（同上第89頁）

但總的說來，這個時期的社會主義思潮是比較膚淺而混亂。如有人竟認為「社會黨者，合孔孟之大同，老莊之無為，墨子之兼愛，以及耶氏釋迦之度世主義者也。」（同上第了2頁）

1913年7月，袁世凱查禁中國社會黨、社會黨和中華工黨。中國社會黨北京支部領導人陳翼龍、社會黨領導人沙淦、中華工黨領導人徐企文以「潛謀不軌」的罪名先後被殺，成為因在中國傳播社會主義而英勇獻身的第一批先驅者。同年8月，孫中山也因反袁失敗東走日本。於是熱氣騰騰的社會主義運動迅速冷卻，報刊上鼓吹社會主義的聲音也趨於

沉寂了。

在社會主義進入低潮時，比社會主義更加激進的無政府主義卻開始活躍起來。最積極的是1907年曾因暗殺廣東都督岑春煊和水師提督李准而被捕入獄的劉師復。他批判江亢虎和孫中山把社會政策混同於社會主義，「以此言社會主義，直南轅北轍耳。」特別有意思的是他對孫中山的「公有即國有」的批判。孫中山說：「公有即國有，國為民國，國有何異於民有！」（同上，第90頁引《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25頁）劉師復說：「所謂資本公有者，乃取回生產機關，操之勞動者之手，由勞動者自使用之，非如國有事業，以國家為資本王，勞動者服役於國家，無異於其服役於工廠主比也。」「社會主義之資本公有，即生產機關操之直接生產者之手之謂，使資本之勢力無可以表現者也。國有營業，則仍借生產機關以剝奪勞動者之利益，而資本勢力反益膨脹者也。」（《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上冊，第28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這位社會主義先行者在95年前就把「公有」、「國有」的概念分得清清楚楚，而今天的主流指導思想卻依然恪守「國有即公有」的陳說，真令人哭笑不得！

為使自己的社會主義區別於其他社會主義，劉師復提出了「無政府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旗幟。1914年7月，他在上海創立「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明確宣佈「滅絕資本制度，改造共產社會，且不用政府統治」，以「求經濟上及政治上之絕對自由」。（《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第108頁）在宣傳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同時，他還積極支持工人運動，主張組織工團、工會，舉辦平民學校，以「結團體，求知識」。他為宣傳和實踐無政府共產主義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財力，積勞成疾，無錢醫治，於1915年逝世。

1916年袁世凱去世後，社會主義開始在中國復蘇。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的機關報《民國日報》又開始了對社會主義的宣傳，中華工黨和無政府共產主義的「民聲社」也恢復活動，江亢虎從美國回來，建立「社會主義講習會」，為建立政黨作準備。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傳來，更促成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的新的高潮。雖然一些報刊起

初報導多極言其混亂和恐怖，但隨著蘇維埃政權的鞏固，中國知識界對十月革命逐漸從懷疑、非議，轉而採取肯定、支持的態度。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李大釗等，則由民主主義者迅速轉變為社會主義者，熱烈稱頌俄國革命，並且很快成為共產主義者。

但就整個知識界而言，社會主義仍然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那些以社會主義自許的人，多數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就是抱持各種各樣改良思想的人，其中甚至還有令人齒冷的投機政客。惲代英1919年在《少年中國》第2卷第1號上發表的《社會主義論》裏說：「其實社會主義這名詞本體便向來沒有什麼精確的界說，高到安那其布爾什維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稱道，都有些可以合於通行的所謂社會主義的派別與意義敘述出來。」

就在各派社會主義爭妍鬥勝的時候，一股強大的共產主義潛流正在中國社會湧動。

1919年4月陳獨秀、李大釗在他們創辦的《每週評論》上發表了《共產黨宣言》的節譯稿，《新青年》和《晨鐘》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北京上海的一些報刊也開始譯載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學說。1920年，在中國各地湧現出許多研究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團體。「所謂革命的社會主義，在這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倡言暴力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列寧主義。」（《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第160頁）

1920年5月，俄國共產黨遠東局派維經斯基到北京上海。在他的推動下，成立了包括陳獨秀、李大釗在內的「社會主義者同盟」。同年8月，正式建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有些地方也自發地成立共產主義小組。當時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等，提出要走俄國革命的道路，組織共產黨，實行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1920年11月，陳獨秀起草《中國共產黨宣言》，明確宣佈，「要像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一樣，根本剷除現在的資本制度，消滅私有制，實行共產主義。」（同上，第172頁）1921年1月，陳獨秀在廣州發表演說，肯定「中國只能採取主張階級戰

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主義。」

在共產主義思潮洶湧澎湃之際，主張改良的社會民主主義也有很大發展。1920 年 9 月，梁啟超、張東蓀、蔣百里、張君勱等擬定《公定之趨向》16 條，提出政治民主、經濟平等、思想自由、勞動至上等主張。接著，梁啟超創辦的講學社邀請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講學，在上海、南京、長沙、北京等地做了 10 幾次講演。羅素公開聲明他相信社會主義，但是，「社會主義需要產業發達、人民知識水平提高、以及國家具有行政高效率，而中國目前狀況與此全然不同。」因此，他主張在中國推行「基爾特社會主義」，即「行會社會主義」，「通過提高產業工人知識和組織能力的辦法，和平的演進到全國範圍的社會主義。」他還認為中國「若想實現社會主義」，首先「不得不提倡資本主義」。（同上，第 175 頁）

羅素的社會主義主張對中國的知識分子頗有影響。如張東蓀提出，應把資本主義「認為當然之階段，與其拒之，不如希其速來」；彭一湖也說：「社會主義是走的，不是跳的。」「資本主義恐怕是必經的階段」；范壽康甚至認為，今天「我們在在資本主義的發達上盡一分力，我們就接近社會主義一分」。（同上，第 176 頁、177 頁）他們都肯定社會主義必然要代替資本主義，但那是未來很遙遠的事，不應人為地越過資本主義。這些明智而清醒的判斷，完全符合於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但長期以來卻被我們批判為反馬克思主義的改良主義、修正主義。這是多麼令人難堪的是非顛倒啊！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標誌著革命知識分子以共產主義取代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把它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從而開闢了一個歷史轉折的新階段。在歐洲已經隱退了三四十年的共產主義，成為插在中華大地上的一面旗幟，飄揚了 80 多年。對於中華民族來說，這個歷史性的選擇是福？還是禍？尚有待於進一步的探討。人民將會作出應有的結論。

共產主義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宣傳中取得主流地位，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標榜共產主義的第三國際和俄國共產黨（布）對中國共產黨的干涉和援助。在共產黨成立前，陳獨秀曾主張把這個黨取名為獨立自主的

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但最後還是屈服於俄國共產黨的壓力，定名為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經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表明「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這顯然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綱領。而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更使這個幼年的黨無法擺脫共產主義的束縛。綱領第四條提出「聯合第三國際」。（《中國共產黨章程彙編》，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編印，1985年版，第1頁）二大進一步通過《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頁）1928年7月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第一章第一條甚至還宣佈：「（一）定名：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中國共產黨章程彙編》，第3了頁）

中國共產黨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處在第三國際、實際上是俄國共產黨（布）的影響和控制之下，這是在當時主客觀條件下難以避免的必然抉擇。自洋務運動以來，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一直在探索強國富民之路。他們從歐洲和日本接受了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企圖從中發現救國的最好方略。在那個時期裏，各種思潮相互激蕩、各個學派相互駁難，他們圍繞如何擺脫國家的既貧且弱的狀態，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提出形形色色的解決方案，使我國的思想理論界空前活躍，異彩紛呈，在中國思想史上留下了絢麗的記錄。但是，這一切都只是停留在理論探討的範圍，沒有實踐的條件和機會。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以最具說服力的實踐，給中國人民提供了共產主義的樣板，使所有空洞的理論黯然失色，吸引著中國最激進的知識分子向它靠近。1920年4月，中國報刊發表《蘇俄對華宣言》，這個宣言宣佈廢除沙皇政府同清政府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這使中國知識分子受到極大的震撼，大家認為這個宣言可以說明俄國奉行的主義是合乎正義、合乎公理的。於是，以共產主義為旗幟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了。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十月革命並不是一次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革命或共產主義革命。它打斷了俄國的民主主義進程。由於反對皇權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民主革命沒有完成，革命不能不向它的對立面轉化，在經過短暫的紛擾和混亂之後，共產主義竟異化成為新型的專制主義。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以俄為師」、亦步亦趨的結果，也不能不走上同樣的道路。

五. 新民主主義的歷史命運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雖然至今 80 多年來一直高舉共產主義的旗幟，但在路線方針的選擇上，卻與共產主義大異其趣，進行的主要是一些具有民主主義性質的活動。一大通過《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黨成立後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運動。除領導工人運動外，幼年的共產黨還致力於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農民運動。1922 年 7 月二大發表宣言，提出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是「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 17 頁）在最低綱領裏，已經包含著新民主主義的雛形；最高綱領卻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

根據共產國際的命令，中共三大通過決定，要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1927 年國共分裂後，1928 年 6 月在莫斯科召開了中共六大，通過《政治決議案》，指出中國的社會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現在階段底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且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綱領。（同上，第 67 頁）於是，共產黨的活動重心轉入以發動農民戰爭、建立蘇維埃政府為主要形式的武裝割據。1934 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開始長征，1935 年 10 月

到達陝北，11月發佈《抗日救國宣言》，黨的活動重心逐漸轉到抗日戰爭。在這個歷史時期裏，談不上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最多只能說是民主主義，或者，加上實用主義——如何消滅敵人，保存自己。

抗日戰爭開始後，中國共產黨逐漸形成比較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

早在1922年二大召開之前，6月15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提出建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的雙重壓迫。（同上，第16－17頁）六大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些在第三國際指導下制定的方針，雖然帶有明顯的列寧主義的痕跡，但基本上是符合於那個時代的中國實際情況的。列寧在1905年寫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裏曾指出：「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是極其有利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來，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要比對資產階級更加有利。」「無產階級應當在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内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鬥爭」，而為了保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革命無產階級的政策和口號應當是「領導全體人民，特別是領導農民來為完全的自由，為徹底的民主革命，為共和制度奮鬥!」（《列寧全集》第9卷第34頁、36頁、45頁、99頁）這應該是中國共產黨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最初的源頭。楊奎松說毛澤東在1945年的一些看法，「很大程度上參考了列寧的這篇著作」，（《毛澤東為什麼放棄新民主主義》，見於《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70頁）不是沒有道理的。

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認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革命的任務，「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毛澤東選集》直排本第2卷第601頁、607頁）毛澤東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裏，對新民主主義作了這樣的表述：「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

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同上，第636頁、638頁、639頁）在五年後的《論聯合政府》裏，毛澤東對新民主王義又有新的論述：「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需要「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同上，第3卷第1083頁、1084頁)

把新民主主義歸為「世界無產階級社會王義革命的一部分」，「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顯然都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硬傷。更致命的是毛澤東把新民主主義放在共產主義的體系裏。他在《新民主主義論》裏說：「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已經或快要進博物館了，「惟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同上，第657頁、670頁）但是，什麼是「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呢？恐怕毛澤东自己也不甚了了。從後來1958年發動大躍進，企圖先於蘇聯實現共產主義，「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架勢來看，他的共產主義，只不過是楊獻珍譏諷的「叫花子共產主義」罷了，要這樣的共產主義去指導新民主主義，就註定了新民主主義必敗無疑的命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意味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發佈的《共同綱領》，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上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人們期待中國

共產黨履行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諾言，領導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同上，第 3 卷第 1076 頁，又見於第 1048 頁）但是，就在這個問題上，卻隱含著一個人們不易察覺的危機。《共同綱領》記載著「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0 這裏，「自由」被換成了「和平」，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共產黨掌握政權之後畏懼自由的陰暗心理。這種陰暗心理在近 30 年來更突出地表現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而憲法規定的公民的各項自由權利迄今未能兑現，也同這種心理狀態有關。

毛澤東在 1953 年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推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扼殺了新民主主義的發展。按照毛澤东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裏的論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同上，第 2 卷第 622 頁）那麼，中國的民生主義革命為社會主義革命做好丁必要準備嗎？顯然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完成民主主義革命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展開。而完成民主革命，意味著經濟上有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水平，政治上消除了封建主義專制主義的影響，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文化上具有與現代文明相適應的多樣性和自由度，社會上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相對平等的公民社會。1953 年的中國，距離這個狀態還很遠很遠，怎麼能侈談社會主義呢？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述，新的生產關係，在它賴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母胎 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在絲毫也不具備基本條件的情況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就如同要對沒有懷孕的婦女剖腹掏取嬰兒一樣，結果不但沒有嬰兒，而且傷害母體。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如此。革命的結果，建立起來的是一個全面壟斷的社會：經濟上壟斷生產資料所有權，政治上壟斷全部政治權力，文化上壟斷真理裁判權，在社會領域壟斷公民的自由權利。以社會主義為名的革命，不是向社會主義前進，而是從民主主義倒退，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復辟，是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獨裁統治。

通過時間和空間的座標來透視 60 年來的中國歷史，我們不難發現，

在這個不算漫長的歲月裏，充滿著民主主義和專制主義的鬥爭。由於專制主義的空前強大和帶有濃厚理想主義色彩的政治宣傳的欺騙性，在民主主義同專制主義的對抗和鬥爭中，最後總是以民主主義的失敗而告終。就體制內部來說，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分歧，對工會工作中的工聯主義的聲討，對公私企業同等納稅的批判，關於合作化「上馬」、「下馬」的爭論，對反冒進的責難，從廬山會議發端的反右傾機會主義，等等；就整個社會來說，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對胡適的批判，胡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和反胡風，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和反右派，等等，直到文化大革命，專制主義都以絕對的優勢壓倒民主主義。

在專制主義一次又一次取得勝利的凱歌聲中，出現了社會階級的新的分化，產生了兩個被剝削被壓迫階級：一個是農奴階級，他們被剝奪生產資料所有權後，緊緊地被捆在人民公社的枷鎖裏，沒有勞動的自由；他們以剪刀差、高徵購的形式為國家提供了工業化的資金積累，自己卻陷於饑寒交迫的困境；在大躍進造成大饑荒的日子裏，連到外地乞討的自由都被剝奪，以致死於非命者達3600多萬人。另一個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是隨著歷次政治運動而不斷擴大的賤民階級，即所謂「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家人。他們不但在政治上受歧視，而且在就業、上學、出行、遷徙、婚姻、交友、通信等等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剝奪了應有的自由權利，成為社會最底層的名副其實的賤民，備受摧殘。

粉碎四人幫後，民主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對抗和鬥爭的形勢大為改觀，經濟上民營企業迅速發展，奄有半壁江山；政治上農奴階級和賤民階級擺脫了被剝削被壓迫狀態，得到了解放；文化和社會領域的緊張氣氛有所緩和，相對於前28年，自由度、平等度都有所提高。總之，反壟斷反專制的民主主義革命正在穩步推進。雖然專制勢力仍十分強大，民主主義力量屢遭打擊，但社會畢竟在曲折地、緩慢地發展著。在這個歷史進程裏，胡耀邦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六. 偉大的民主主義者胡耀邦（上）

胡耀邦從 1930 年 15 歲時參加革命，到 1989 年逝世，始終認為自己是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革命者，這是可以理解的。千千萬萬共產黨員在加入共產黨的時候，都宣誓要為共產主義而奮鬥。但是，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卻規範了他們的革命鬥爭，只能是民主主義的。推翻蔣介石獨裁政權，土地改革，以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都是民主主義性質的。所以他們就理念來說是共產主義者，而就實踐來說，卻不能不是民主主義者。胡耀邦當然也不例外。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的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新民主主義的時代。共產黨在這個時代的歷史任務，應該是運用已經取得的政治權力，領導全國人民，繼續推進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主義革命，實現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國家的諾言。胡耀邦正是本著這個精神工作的。

1950 年 2 月，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共川北區黨委書記，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在川北行政公署正式成立時，他率領公署全體工作人員舉行就職典禮，並且鄭重宣誓：「我們以至誠向川北人民宣誓……為徹底實現《共同綱領》和建設人民的新的川北而努力奮鬥。」（《胡耀邦傳》第 1 卷，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2 頁）在共產黨執政的歷史上，這大概是政府領導人宣誓就職的唯一事例。固然，宣誓就職僅僅是一個形式，但他體現著就職者對人民的承諾和履行職責的保證，這就使這種形式具有了某種鄭重的甚至是神聖的意義。民主的政治制度是賴有許許多多的具體形式才得以維持的，宣誓就職正是一個重要的民主形式。不知道胡耀邦的這個舉動是從哪里得到啟示的，但從這個小小的事例中，卻可以看到他的民主主義素質。

胡耀邦十分重視人民代表會議的作用。他對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提出

兩條要求：一是認認真真發揚民主，一是切切實實解決問題。在1950年6月召開的川北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上，他親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約》，宣稱：我們是人民公僕，只能站在人民之中，不能站在人民之上，要密切聯繫群眾，隨時傾聽人民的呼聲，監督政府工作，等等。對於群眾的批評，他提出三條原則：一要熱烈歡迎，二要堅決保護，三要負責查明處理。(同上，第180頁、183頁)

在川北行署領導人員的配置上，也可以看出胡耀邦建設民主政府的良苦用心。29名行署委員，有15位是非黨人士，教育廳廳長是民盟成員，商業廳廳長是資本家，工業廳廳長由起義將領、行署副主任裴昌會兼任，交通廳廳長是從三台縣文教科科長任上直接提拔上來的青年幹部。(同上，第185頁、188頁、191頁)

經過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後，中國社會在官方的宣傳裏被宣佈為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但是，由於建立起來的是與社會主義毫不相干的對社會的全面壟斷的制度，實際上卻是由民主主義社會倒退為專制主義、極權主義的社會。貫穿於這個短暫的歷史時期的，是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的矛盾與鬥爭。胡耀邦作為忠誠的共產黨員，衷心地歡迎「社會主義」的到來。雖然出於對毛澤東的敬仰和信賴，他認真地執行著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但在領導工作的實踐中，卻一再地表現出他的民主主義傾向。

1957年春，社會各界知識分子響應「幫助黨整風」的號召，對黨政機關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進行批評，有些還提出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口號，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社會主義改造」後民主主義反對專制主義的第一波高潮，因為這些批評和意見、口號帶有反封建反專制的性質。這個民主主義的高潮很快便轉變為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反右派運動」。運動開始時，胡耀邦在7月16日率團赴莫斯科參加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他對國內反右派的形勢十分關心，9月間回國時路經新疆，烏魯木齊就給團中央打電話，得知團中央已打出不少右派，《中國青年報》100名工作人員中，打出了17個右派分子，還有好幾個尚在待劃

之中。他大為吃驚地說:「損失慘重啊!」連忙指示立即剎車,等他回去再說。回到北京後,他才發現大勢已定,自己無能為力。為此,他心中一直不安,曾多次在不同場合檢討自己對青年幹部關心不夠,幫助不夠。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上書為民請命,是民主主義對專制主義的直接衝擊。專制獨裁的毛澤東惱羞成怒,依仗他的威望,挑動與會者圍攻彭老總。胡耀邦雖然同情彭老總,但懾於會上一面倒的形勢,不得不在小組會上作一次表態性的發言,表示擁護毛主席講話,擁護「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毛澤東本來對胡耀邦比較器重,看了他在小組會上的發言,對他的消極態度非常不滿。胡耀邦後來曾對人說:「廬山會議後,主席有一兩年不大理我,我坐了冷板凳哩!」(同上.第305頁)

1962年7月,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兼湘潭地委書記。赴任以前,他參加了7月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和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在前一個會上批判了「單幹風」和「翻案風」。單幹風是指有些基層幹部和農民對土地被壟斷和勞動受限制十分不滿,私自實行包產到戶,得到鄧子恢等領導人的支持;翻案風是一些在政治運動中受到傷害的幹部和群眾,包括彭德懷在內,提出申訴,要求平反。這些動向正是呼求民主主義的反映,毛澤東則認為這些都是階級鬥爭的表現,所以在十中全會上大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胡耀邦到湘潭上任時,首先就面臨著貫徹反單幹、反翻案和大抓階級鬥爭的任務。他清醒地應對這些難題。團省委書記向他彙報時,他說:「現在有個情況,有些人對任何問題都提到階級鬥爭上來看,比如有些大學生不服從分配,也說是階級鬥爭問題。不能這樣簡單看問題,要具體分析。對青年要循循善誘,鼓勵他們前進。」(同上,第354頁)1963年1月,他到瀏陽檢查工作,發現全縣14132個生產隊,有7298個隊實行著各種形式的分田單幹,占51.6%。怎麼辦?反對單幹風,是毛澤東親自佈置的,不可違抗;但包產到戶又確實是有利於生產發展和農民生活的,下令禁止就違背群眾利益。在這種兩難的境況下,許多地方的領導人根

本不考慮農民利益，雷厲風行，嚴禁單幹，對於支持包產到戶的幹部則進行批判鬥爭。胡耀邦卻不同，他一方面提出「堅決扭單幹，認真辦集體」；同時又強調，糾正單幹的方法要講究，步子要穩妥，不能強迫命令；如果有些農戶經過再三說服仍然堅持包產到戶，也應該允許。由於他的靈活通融，許多農戶得以繼續包產到戶。「後來，大約 30% 的生產隊堅持包產到戶，個別地方搞了「明集體，暗單幹」。」（同上，第 328 頁）

胡耀邦在五六十年代的領導工作中，最值得稱道的是他在陝西解救了大批被迫害的幹部和群眾，把當地的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到發展生產上來。可是他自己卻受到嚴酷的批判鬥爭。這是一幅因糾正專制主義所造成的惡果而遭到專制主義迫害的鮮明的歷史圖景。

1964 年 11 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為西北局第三書記兼陝西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當時全國處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高潮，陝西還要加上「肅清彭（彭德懷）、高/高崗）、習（習仲勳）反黨集團流毒」，被認為是階級鬥爭格外激烈的地方，大批幹部和群眾被批鬥、被抓捕、被懲辦。在省委試點的長安、西安、西鄉三縣，1964 年逮捕 6 千餘人，拘留 5 千餘人，被「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660 多人，受其中一種處分的 4500 多人，自殺身亡的 364 人。長安縣的正副區委書記、和區長有 45% 受到處分，大隊黨支部書記 76% 被撤換。西安市一度打出 9 千 5 百多「投機倒把分子」。陝南縣連上山砍柴、到集市賣雞蛋、進城當保姆的收入也被說成是剝削收人，要退賠。胡耀邦初來乍到，不便過多干預，但捕人和「雙開」過多、奪權鬥爭的打擊面過寬的現象，使他感到，必須首先剎住這種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趨勢。根據他的建議，省委、省政府作出了「三個暫停」（捕人暫停，雙開暫停，面上奪權暫停）的決定，遏止了運動中的迫害狂潮。（同上，第 361 頁、362 頁）

為了把幹部和群眾的注意力從階級鬥爭轉到生產上來，胡耀邦 1965 年 2 月 12 日在安康地區幹部會議上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要放得更大一些，不要追究瑣碎的小事；在領導生產方面要放得更寬一些；在經濟政策方面要搞得更活一些。他提倡活躍集市貿易，組織短途運輸，在發展手工

業的基礎上發展地方工業。這些思想，反映了他為使農民擺脫階級鬥爭的干擾，致力於發展生產而做出的努力。

2月13日晚上，胡耀邦起草一份《電話通訊》，就八個方面的方針政策問題，提出指導性的意見，經省委書記處的書記們同意後，由省委辦公廳以電話會議的方式發到各地縣。不料《通訊》中關於解放幹部的四條政策，竟被西北局領導人認為會引起「翻案風」。西北局從3月10日起召開書記處擴大會議，一連幾天對胡耀邦進行批判，群起圍攻，上綱上線。3月I7 Et，胡耀邦突發大腦蜘蛛網膜炎和肺氣腫，住院兩個月。出院後又在5月31日開始的省委工作會議上繼續受到無理的批判。會議期間，葉劍英、張愛萍、張宗遜等到西安視察，以治病為名把胡耀邦帶回北京。他人不在了，可是對他的批判還在進行，甚至還打出「胡趙（趙守一）李（李啟明）反黨集團」，一些支持他的幹部繼續受到長期的批鬥與折磨。

胡耀邦在陝西的百日奮鬥、百日挨批，典型地反映了共產黨內的專制勢力對黨內的民主主義力量的打擊和摧殘，是如何地不講道理，不擇手段。

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特色專制主義的登峰造極的發展。個人獨裁和專制極權，在這10年裏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任何抵制文化大革命、消除它的惡果的行動和措施，都具有反極權反專制的民主主義性質。

1973年鄧小平被重新起用。1975年1月，他被十屆二中全會選舉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接著，又被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為國務院排序第一的副總理，在周恩來患病期間，主持國務院的工作。他一旦大權在握，就雷厲風行地著手整頓被文化大革命破壞得支離破碎的社會秩序。7a，胡耀邦被派到中國科學院負責領導整頓工作。他在經過短暫的調查後，立即組織起草《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彙報提綱）》。在這個提綱中，他批駁了四人幫所謂中國科學院「長期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的謬論，肯定建國以來科技事業的偉大成就和科技人員的貢獻，提出「科學

技術也是生產力」、學習外國先進科學技術、劃清學術問題和政治思想問題的界限、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等整頓意見，指出學術的是非要通過科學實踐來解決，不能用行政命令的辦法輕易下結論。提綱還擬訂了「科技十年規劃輪廓」，勾畫出科學技術的發展圖景。胡耀邦在8月17日向鄧小平報送提綱第三稿時附信說：「這一個月我是把全部精力放在這個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話，是拼了一點老命的。」鄧小平讓胡喬木組織于光遠等把提綱的口氣改得緩和一些，題目改為《科學院彙報提綱》，是為第四稿。接著，9月28 E1改出第五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偉三人的名義上報。

邓小平本著「以三個指示為綱」的精神組織起草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和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學院彙報提綱》，加上國家計委起草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幾個意見》，是鄧小平全面整頓的路線圖，雖然文件裏沒有一句話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實際上是挑戰文化大革命的宣戰書，是向著專制極權施放的三發重磅炮彈。它自然引起了專制極權勢力的反撲。11月裏，四人幫借劉冰給毛澤東的兩封信發難，批判「右傾回潮」，指責三個文件「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背道而馳」，把它們說成是「三株大毒草」，印發全國批判。

文化大革命後期鄧小平所主持的全面整頓，是一次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的大會戰，激烈交鋒的結果，是民主主義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但是它留下的遺產是抹殺不了的。它使全國人民看到了希望，特別是所謂的「三株大毒草」在全國發行，擦亮了廣大群眾的眼睛，讓大家能夠分清是非，知道真理在哪里。這對於日後的改革開放，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七. 偉大的民主主義者胡耀邦（下）

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幫後恢復工作的10年，是他作為共產黨領導人和民主主義者的最輝煌的10年，在這10年裏，他為中國的民主革命作出了

無與倫比的傑出貢獻。李銳在為《胡耀邦傳》第2卷所寫的序言裏，說他是「真正扭轉乾坤、推動歷史前進的人」，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先鋒人物」。(《胡耀邦傳》第2卷，2008年11月徵求意見本，第9頁）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繼孫中山之後的最為偉大的民主主義的實踐者。

1977年3月，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中央黨校的日常工作。在此後九年零九個月的歲月裏，他的工作崗位從中央黨校副校長到中共中央總書記，他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責任感和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為中國的民主革命，開闢了一個嶄新的局面，建立了輝煌的業績。特別是他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和推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為改革開放打下了牢靠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他的遺澤長留人間，永垂青史。

平反冤假錯案和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都是從中央黨校發端的。

中央黨校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胡耀邦到中央黨校蒞任後，發現許多人怨憤不平，知道這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不是中央黨校一家如此。但他只能管中央黨校的事情，要在全國範圍內發揮作用，就需要在輿論上下工夫。因此，他一方面部署為中央黨校過去蒙冤的人甄別平反；同時，組織黨校教師撰寫《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197了年10月6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以整版篇幅發表了這篇文章，產生了巨大的反響。接著，他又囑人寫出《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落實》，在1978年1月27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造就為平反冤假錯案作好了比較充分的輿論準備。

即使是中央黨校的案件，甄別起來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有的人認為只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才需要甄別平反，文革以前的案件，有些是毛主席親自定的，不能平反。胡耀邦說：「我看不管是什麼時候定的，不管是什麼情況下定的，不管是什麼人定的，只要是錯了，就要糾正，就要平反。」（同上，第34頁）在他和馮文彬的推動下，中央黨校對多年積聚的163個案件和1385人的問題，逐一進行甄別平反，妥善處理。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決定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

兼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他在正式到任的第一天，就在中組部的全體人員大會上說：我們面臨著「積案如山，步履維艱」的局面，復查每一件冤假錯案並落實蒙冤幹部的政策，是我們組織部門義不容辭的責任。他成立專門接待來訪申訴者的接待組，要求組織部成為「黨員之家」、「幹部之家」。他說，組織部的幹部「一要有個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自覺性，二需要一種公道待人的好風氣，三要有一股剛直不阿的正氣」。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只要有可能就親自接待來訪者，批閱來信。據統計，他在中組部的一年時間裏，共批了 4 千多件來信。（同上，第 53 頁、52 頁）

由於既得利益者的阻撓和因循傳統的習慣勢力的顧慮、抵制，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遭遇了強大的阻力。胡耀邦堅持實事求是的基本方針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披荊斬棘，迎風破浪，開闢了勝利前進的道路。他一再強調：「經過對實際情況的調查核實，凡是不實之詞、不正確的結論，不管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在 1978 年 9 月召開的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上，他再次宣講了「兩個不管」的原則。會議的主持者竟然下令在會議的簡報上刪去了這「兩個不管」，當時的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甚至把胡耀邦叫去，狠狠地批評了一通。（同上，第 61 頁、62 頁）但是，由於這「兩個不管」適應了當時客觀形勢的需要，滿足人們對於平反冤假錯案的期待，所以它仍然能夠突破某些當權者的干涉阻撓，不脛而走，傳遍全國，成為平反冤假錯案的強大武器。

在眾多的冤假錯案中，對「右派分子」的改正具有特殊的意義。1957 年，許多知識分子回應「幫助黨整風」的號召，提出大量批評建議，批評的矛頭主要指向專制性的方針政策及其不良惡果，建議則呼求民主自由，因而就這些批評建議的性質來說，有著明顯反對專制主義的民主主義傾向。在毛澤東自翔為「陽謀」的大鎮壓之下，55 萬餘（一說 300 萬餘）的知識分子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列入第五類人民公敵，即所謂「地富反壞右」。20 多年來，他們被迫勞動改造，在社會最底層

忍辱含垢，許多人在超常的體力勞動和饑餓的雙重折磨下死於非命；他們的家屬也備受歧視，在社會生活中淪落為處處被另眼看待的賤民。他們是民主主義反對專制主義的搏鬥中的失敗者、受難者，為他們改正平反，不僅具有伸張正義，還以公道的道德價值，而且意味著承認 20 多年前的那場民主主義運動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使所謂「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的飾詞，成為千夫所指的笑料。

胡耀邦通過會議說服、典型開路、輿論宣傳等方式，突破重重阻力，終於使 99．999% 的右派分子得到解放，恢復名譽。在這項艱巨的工作中，有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就是排除甄別案件的傳統做法，不搞典型試點，內查外調，而是由各單位成立專門的辦公室，在檢查當年的反右材料的基礎上，直接作出決定。這就大大加快了工作進程。特別是公安部、中央黨校、最高人民法院在短短幾個月內就完成必要的手續，改正本單位劃的全部右派，給全國樹立了榜樣，更有力地促進了這項工作。有的人擔心全部改正，是不是太多了。胡耀邦義正詞嚴地說：「是錯的就要改正，不管有多少！當年猛批「右派」的時候，怎麼不嫌多啊！」（同上，第 77 頁）簡簡單單幾句話，充分表現出這位偉大的民主主義者的英明、果斷和正氣凜然的大無畏精神。

在胡耀邦的領導和推動下，「全黨持續不懈地進行了三年多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不僅完全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無數冤假錯案，而且還糾正了「文革」以前乃至建國以前的許多冤假錯案，其規模之大、影響之深是前所未有的。」據中組部 1983 年 7 月的關於全國組織工作座談會的報告，這幾年「清理「文革」中發生的案件達 30 萬件之多，復查建國前後的歷史遺留案件更達 110 萬。結果使 300 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得到了平反糾正，47 萬多名共產黨員恢復了黨籍，上千萬無辜受株連的幹部和群眾得到了解脫。」（同上，第 82 頁、83 頁）

平反冤假錯案的順利實現，不僅解放了數以千萬計的賤民，使他們可以挺起腰杆、揚眉吐氣地成為平等的社會成員，從而，消滅了賤民階級作為階級的存在，剷除了不平等的社會根源，而且挽救了中國共產黨

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重新建立起執政合法性的社會基礎。這是民主主義的偉大勝利。為什麼這樣說呢？從前一個成果的意義來說，把千千萬萬受專制主義打擊、壓迫的賤民從社會底層解放出來，是對專制主義的最實際、最有力的揭露、批判與反擊；從後一個成果的意義來說，它為共產黨反思歷史、糾正錯誤，進而實現民主化，提供了鮮明的實例（可惜後來的發展卻離開了這條道路）。這一切都應該歸功於胡耀邦，沒有他的睿智、決斷、果敢，沒有他的雷厲風行、義無反顧，這個歷史性的工程是不可能這麼迅速、徹底、全面地完成的。

胡耀邦的另一個重大貢獻是推動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對於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人們比較多地注意《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所起的作用，這同媒體報導的側重有關。我在這裏只是從胡耀邦如何推動思想解放運動的角度作些回顧。

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中央黨校早在 1977 年就開始了。在 12 月 10 日討論黨史教學計畫時，胡耀邦就指出：「評價文化大革命要看實際結果，要由實踐檢驗，而不能依據哪個檔、哪個人的講話。」在他的直接指導下寫出來的《關於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若干問題（草稿）》，明確提出：「路線的正確與否，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要由實踐的結果來證明。」「今天，我們已經有條件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辨明這幾次路線鬥爭的是非，把扭曲的歷史真相恢復過來。」這個草稿在胡耀邦指導下數易其稿，最後經胡耀邦審定，作為黨史教學的「討論提要」，發給全校 8 百多學員和幾百名教職員，熱烈討論了 10 天。由於這些學員來自全國各地，這個草稿很快就被他們發回本單位，擴散到全國，為真理標準問題的全國大討論，做了很好的鋪墊。可以說，在全黨全國範圍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中央黨校討論黨史的十分自然的擴展與延伸。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於 1978 年 5 月 11 日、12 日先後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發表後，首先激起了一些忠於毛澤東的當權者的強烈反響。吳冷西 12 日晚上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打電話，說

厲指責「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澤東這面紅旗，是很壞很壞的。」汪东興也在17日說「這篇文章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政治上是砍旗。」胡喬木甚至在6月20日跑到胡耀邦的家襄，對他說：「真理標準這場爭論是黨校挑起來的，再爭論下去，會造成黨的分裂，要立即停止爭論。」（同上，第92頁、93頁、98頁）中央宣傳部、《紅旗》雜誌的領導人也發表意見，採取措施，批判、抵制這篇文章的傳播和討論。

面對聲勢洶洶的責難，胡耀邦胸有成竹，冷靜應對。他一方面繼續組織發表文章，從理論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幾個月裏，經他精心組織安排，發表了11篇與此有關的文章，如6月24日在《解放軍報》上發表了吳江寫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6月3。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阮銘的《歷史潮流滾滾向前》，9月10日發表了王眾武的《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要經受實踐檢驗》；另一方面，他讓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孟凡密切注意各方面的反應，及時提供報刊上的有關文章和各地的動態，同時，建立黨校與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光明日報社的聯繫制度，形成理論界和新聞界的緊密合作。

《實踐》一文得到了葉劍英、鄧小平的贊同，他們分別在5月29日和6月2日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明確表示支持。各地黨政機關和理論工作者不顧中宣部的禁令，紛紛舉行討論會、座談會，討論真理標準問題，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種種謬論。從6月25日到11月10日，四個半月裏，有20個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表態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根據葉劍英的提議，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2月16日至3月27日休會），在北京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參加者有理論、思想、新聞、文藝等各界人士160人，三中全會後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長的胡耀邦負責籌備並主持了這次會議。從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趨勢來看，這次會議無疑是繼續解放思想、深化理論認識的重要步驟。胡耀邦在會議第一天的「引言」裏為會議定了方向：「要從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從小生產的習慣勢力中解放出來，從各種官僚主義

的「管、卡、壓」下面解放出來，衝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充分地發揚理論民主。」周揚在胡耀邦作了引言後傳達鄧小平的意見：「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同上，第114頁、115頁）

會議參加者踴躍發言，對黨的路線方針和理論指導思想，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社會主義改造、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共產黨的領導體制、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毛澤東的唯意志論、個人迷信等等，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和批判。這就為進一步的思想解放，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但是，黨內的專制守舊勢力卻無法容忍這個發展勢頭。胡喬木認為會議「否定社會主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馬列主義，否定毛澤東」，形勢比1957年「反右」時還要嚴重。這些思想解放的反對者充分利用了當時國內外的一些事件，如：有些地方出現的集會、遊行、請願、演說，甚至衝擊黨政機關；在波蘭則有「團結工會」事件。他們蠱惑人心，遊說煽動，設法破壞。鄧小平本是具有兩面性的人物，他既有傾向民主的一面，同時，作為已經居於高位的既得利益者，更有強烈的維護專制主義的一面。在這個思想解放運動深入發展的關鍵時刻，由於胡喬木等人的蠱惑和國內外形勢的影響，他的專制性戰勝了民主性，對思想解放運動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二階段在3月28日復會，鄧小平在30日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提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大出胡耀邦和其他與會者的意料之外。他們本來希望他的講話能夠推進思想解放，使會議進一步深入發展。不料他卻大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堵住了思想解放的閘門。這樣一來，原定的大會討論就無發繼續了，因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像四根棍子懸在人們的頭上，使大家感受到巨大的威脅。於是，會議用3天時間討論鄧小平的報告，不再安排討論其他問題。原來計劃由胡耀邦做總結，也改成「結束語」。虎頭蛇尾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就這樣草草結束了。胡耀邦在「結

東語」裏不無遺憾地說：「我們這次會議究竟開得怎麼樣？最保險的辦法還是讓歷史去檢驗。」（同上，第132頁）

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發表到理論務虛會第一階段，是民主主義向專制主義展開大討伐、並取得節節勝利的輝煌時期。毛澤東獨裁統治下的專制主義，從理論思想到政治體制，都受到了初步的揭露和批判。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第段，本來可以乘勝追擊，徹底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反動本質，幫助共產黨員和廣大群眾從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的精神枷鎖裏解放出來。但這個趨勢卻被四項基本原則鬧住了，雄厚的專制主義勢力終於又一次地壓倒了民主主義。

雖然如此，民主主義在思想解放運動中所取得的初步勝利，仍然在我國的社會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它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工作重點轉移和改革開放，奠定于思想的理論的基礎。這個歷史性的功勳和光榮，應該歸於胡耀邦，他是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指揮者，是當之無愧的主帥。

粉碎四人幫後，在毛澤東獨裁統治下形成的兩個被剝削被壓迫階級得到解放，是民主主義的偉大勝利。其中，賤民階級的解放有賴於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錯案，農奴階級的解放則主要是農奴自己奮起衝破人民公社的串籠，奪回勞動權利，當自己的家，作自己的主，從而，開啟了改革的門戶。去年紀念改革開放啟動30周年，人們都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說成是改革開放的起點。其實，真正的起點是農奴們的包產到戶。胡耀邦支持這個民主主義革命的新起點，在官方承認並進而推動包產到戶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0 1980年2月，他推薦支持包產到尸的萬里擔任主管農業的中央書記處書記。接著，在討論《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幾個問題》時，他和萬里、杜潤生商議，把「不要包產到戶」，改為「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的地方，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尸，也可以包幹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最後，這個材料以1980年第七十五號

文件的形式發到全國，這意味著官方對包產到戶的認可，使包產到戶成為一種合法的權利，使整個農奴階級轉變成為自由勞動的農民。

在改革問題上，胡耀邦是全面改革的促進派。他 1983 年 1 月在全國職工政治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說：「改革的總方針應當是：從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堅決而有秩序，就是經過深思熟慮，實事求是，有步驟地進行，並且經過典型試驗。而不是猶豫不前，老是被動。」（同上，第 107 頁）

胡耀邦這個主張全面改革的高瞻遠矚的講話，正好觸到了反改革派的痛處。胡喬木不但不許新聞單位宣傳胡耀邦的講話，而且挑動陳雲，發起了一場推翻胡耀邦的政變。在 3 月 17 日的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的會議上，陳雲對胡耀邦提出 10 點批評。胡喬木和鄧力群會後立即到兩個新聞界的會議上，把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向來自全國的新聞工作者傳達。同時又提出立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胡耀邦的問題，準備把他轟下臺來，胡喬木甚至跑到胡耀邦的家裏，假惺惺地說：「你不當總書記，還可以幹別的，我們友誼長存。」仿佛他已經勝券在握，胡耀邦馬上就要下臺了。幸而習仲勳等發現這個不正常的動向後，及時向中央常委報告，趙紫陽、葉劍英、鄧小平出而干涉，才挫敗了這場政變陰謀。這個驚心動魄的事件，反映了改革與反改革的鬥爭，即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的鬥爭，是何等尖銳，何等複雜。最後的結果，胡耀邦的位置雖然保住了，但全面改革的主張，卻再也無法貫徹。

胡耀邦是組織觀念很強的共產黨員，在近 10 年的領導工作中，由於傳統觀念的束縛，兩個老人（鄧小平和陳雲）的挾持，他在說話和處理問題時，不能不經常違背自己的意願。但在許多原則問題上，他總是堅持自己的立場，表現出明顯的民主主義傾向。如：

他支持經濟界的意見，認為應該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把企業辦成

獨立的經濟實體，企業經營由市場調節。

他重視發揮知識分子的積極作用。在1980年他擔任中組部長的時候，多次召開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座談會，批判有些人還是用團結教育改造的舊方針來對待知識分子。在1983年的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紀念會上，他大聲疾呼：「我們一定要造成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風氣，並且採取切實措施，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把這看成是「基本建設」，並且是「最基本的基本建設」。」

在同民主黨派的關係上，他提出「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補充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

對於文藝工作，他提倡不搞審查，而以評論、批評來取代。1981年鄧小平親自指揮批判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解放軍報》發表文章，高調批判。胡耀邦力求使批判降溫，用一篇口氣溫和的文章，把批判結束下來。1984年12月，在談到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文件時，胡耀邦說：「創作應有充分的自由，有廣闊的天地，可以有獨特的風格，有獨特的題材。」

1983年，周揚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大會上作了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報告，胡喬木、鄧力群借此發動了一場「反精神污染」的大批判，周揚的人道主義和異化，胡績偉的人民性問題，《人啊，人》等文藝作品，以至雇工、販運、燒香、跳舞、聽音樂、看外國小說、穿裙子、梳辮子，等等，都成了「精神污染」。這是一次反對改革、反對理論進步、扼殺民主主義萌芽的政治運動。胡喬木就說：「精神污染問題，不止是思想問題，而且是現實的政治問題。」人們驚呼：「文革又來了嗎?」面對明目張膽地破壞改革的狂潮，胡耀邦和趙紫陽聯手抵制，使這個倡狂了28天的「小文革」無疾而終。胡喬木、鄧力群等人想把「反精神污染」引向「現實的政治問題」的圖謀，終於沒有得逞

胡耀邦的這些民主主義傾向，無疑是同力求維護專制極權制度的政治勢力互不相容的。1986年北京和幾個大城市的學生運動蜂起，學生們要求民主、自由、人權，反對一黨專政，許多老人主張嚴厲鎮壓，胡耀

邦卻提出要「冷處理」，對學生和一些推崇自由民主的知名人士採取寬容的政策，被老人們斥為「反自由化不力」，成為「自由化的保護傘」，在一個不明不白的、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黨法的所謂「生活會」上，胡耀邦受到一些喪失理性的老人的圍攻，被迫辭職。

胡耀邦的被迫辭職，是中國民主主義的重大損失。兩年半後，主張改革政治體制的趙紫陽也被逐出政壇，更使民主革命進程發生逆轉。但是，民主主義的火種是不會熄滅的。

八. 簡短的结束語

胡耀邦是一位真誠的共產黨員，他相信自己一生都在為共產主義而奮鬥。但在客觀上，他為之窮盡畢生的聰明才智，獻出全部精力以至生命的事業，卻是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在中華大地還籠罩著專制主義的迷霧的歷史時期裏，任何一個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都不能不屈從這個不可違抗的歷史規律。所有真誠地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革命者，大概都處於這樣的歷史錯位之中。

共產主義在沉寂三四十年後再度出現，而且出現在世界的東方，這確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和不幸。這個時候，東方世界的資本主義還處在萌芽狀態，不論是俄羅斯，還是從俄羅斯接過共產主義火炬的中國，都遠比歐洲落後。長期的封建專制主義傳統，彌漫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貧窮和愚昧把人民死死地捆縛在專制主義的祭壇上。如果說，19 世紀 40 年代在歐洲出現的共產主義，由於缺乏應有的社會經濟條件而不得不流於空想烏托邦的話，那麼，在更加落後的東方，舉起共產主義的旗幟來引導革命，就顯得更不合時宜了。也許，歷史的諷刺就在於，越是貧窮落後的國家與民族，企圖改變落後面貌的善良願望就越發強烈。因而，在理念的選擇上，很容易趨向於雖然高不可攀、卻被認為是有可能迅速達到的目標。於是，通過暴力來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就成為革命家

的最佳選擇。但是，由於根本不具備實現這個理念的客觀條件，結果不能不跌落在更加落後的泥坑裏。共產主義並沒有把俄羅斯和中國帶進天堂，卻引出了專制主義的魔王。在這個歷史事實裏，滲透著多少血和淚的教訓啊！

當然，為崇高理想而奮鬥犧牲的精神是值得稱頌的。古今中外，無數仁人志士為了堅持自己的信念、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奔走呼號，浴血戰鬥，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壯烈淒美的活劇。當共產主義在西方和東方兩度掀起傳播和實踐的高潮時，許多真誠的共產主義者為了實現這個崇高而虛幻的理想，拋頭顱，灑熱血，寫下了一首又一首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他們為尋求社會的美好未來而奉獻自己的崇高精神，永遠值得後人欽佩和敬仰。但是，共產主義目標畢竟只是一個混雜了幻想和理念的「太虛幻境」，它實踐的結果，或是向民主主義前進，或是朝專制主義倒退，往往不是人們的主觀願望所能左右的。後人只能根據他們實踐的結果，來判斷他們的是非功過，對胡耀邦也不例外。

胡耀邦的輝煌一生、特別是他在當政的 10 年的實踐表明，他是一位偉大的民主主義者。他為中國的民主主義事業所作的貢獻，足可與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相媲美。

偉大的民主主義者胡耀邦永垂不朽！

(2009 年 2 月 24 日完稿)

歷史實踐嚴酷檢驗馬克思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

——為紀念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而作

王家典

耀邦同志逝世20年了。作為一介人文科學工作者，我在無產階級專政體制下生活工作了整整一個甲子，歷經了它的建立、輝煌、衰落、瓦解和改革的過程，是它的一個歷史見證人。我以切膚感受，回顧耀邦同志在粉碎四人幫後，為實現終結中國歷史上一個最野蠻、最暴虐、最恐怖的舊時代和開創當代中國改革開放新歷史時期的歷史轉變，給中國人民、中華民族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我不禁潸然淚下，深深感動。這段歷史，人們一定要永志不忘啊！

開創歷史新時代：「政治賤民」大解放和全民思想大解放

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他為人正派、老實、寬厚，領頭粉碎四人幫，但卻囿於其權力依賴於毛澤東的授受，繼承了他的政治遺產，遂決心繼續實行毛澤東思想政治路線。1977 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時稱兩報一刊，作為中共中央喉舌，聯合發文代表著黨中央重要政見的宣示）發表了一篇社論《學習文

件抓綱要》，宣告了「兩個凡是」主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華國鋒決心執行毛澤東思想政治路線的公開宣告。8月12日，華主持中共十一大，進一步制定了「兩個凡是」思想政治路線的方針政策。華國鋒「兩個凡是」的思想路線，引起國人對中國前途的憂慮和迷惘。中國處在十字路口：廣大民眾殷切期盼結束毛澤東思想政治路線，開創自由民主新時代；華國鋒卻宣告繼續實施毛澤東思想政治路線，頁示了中國前景的窮途末路。

耀邦同志密切觀察和思慮中國政局發展。在粉碎四人幫後，他向葉劍英提出國策建言：「人心思定。停止批鄧，人心大順。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了花。」人們讚譽為當代「新隆中對」。1977年3月，他擔任中共中央黨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長。12月，他又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同時兼管黨校工作。他運用這兩個工作崗位的優勢，策劃領導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又組織實施了全國冤假錯案平反和地、富、反、壞、右分子摘帽改正。這兩項工作，對實現我國終結毛澤東舊時代、開創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歷史轉變，產生了決定性關鍵作用，對中國人民、中華民族作出了偉大歷史貢獻，應彪炳史冊。

先說「政治賤民」的平反、改正、摘帽。當時，全國冤假錯案，堆積如山，急待平反，阻力重重，步履維艱，民憤洶洶。他到組織部後，以「下油鍋」精神，披荊斬棘，排除萬難，撥亂反正，清理平反，操勞不息。他堅定主張：「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批的，都要實事求是的改正過來。」他提出這「兩個不管」打破了「兩個凡是」枷鎖，又親手突破100個重大案件，迅速推動全面工作，使全國冤假錯案陸續平反。成果突出顯著：200多萬走資派平了反，552877右派分子改了正，440萬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摘了帽，70多萬資本家恢復了工商業者、勞動者的身份，還有他們的子女也都變更了剝削階級出身成

分。原來，在毛澤東專制獨裁時期，連續不斷地發動暴風驟雨的階級鬥爭，以「剝削階級」有罪和「反毛澤東思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無產階級專政」、「反人民」、「反革命」等等的罪名，把幾千萬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戴上法理的「帽子」，成為專政對象，永世不得翻身。這就產生了：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叛徒分子、臭知識分子，等等。他們被戴上這些「帽子」，就成為帶有種姓身份制性質、被長期而穩固地壓在社會底層的「政治賤民」。他們在被法理化（有一系列政策法令規定編織而成的社會網絡）和倫理化（通過文化教育各個意識形態領域在全社會煽動階級仇恨）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中遭受著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他們及其後代一律被打入社會另冊，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各個層面，都飽受著嚴重的露骨的歧視、壓迫和虐待。連續不斷的、全社會規模的、暴風驟雨的階級鬥爭，對「政治賤民」實施了反人性、反人道主義的殘暴專政，導致了「紅色恐怖」暴力肆虐，甚至釀成階級屠殺慘絕人寰的悲劇，造成了數以千萬計的人喪生，數以億萬計的人遭到人身折磨和精神蹂躪。這些血跡斑斑的暴政是這個時代最突出的特徵，成為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最野蠻、最暴虐、最恐怖的歷史時期。給這些「政治賤民」平反、改正、摘帽，就是解除黨和無產階級專政套在他們身上的政治枷鎖，使他們得以永遠擺脫被專政的悲慘地位，真是蒼生被救於水火、賤民被解於倒懸。毛澤東把人變成鬼，耀邦把鬼變成人。這是一場真正人道主義的，震撼人寰鬼神，感天動地，把受難者從水深火熱災難中拯救解放出來的、偉大的、人的解放運動。耀邦同志做了人類歷史上一件功德無量、永耀史冊的偉大壯舉。

耀邦同志的這一重大貢獻，還另有一層重大政治意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中，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構成了它的基本思想。按照這一理論，在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必然存在著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進行暴力統治和鎮壓，直至把他們完全消滅。這個過渡時期的時限，據說要全世

界都實現共產主義才能到頭。在過渡時期，斯大林和毛澤東都堅持：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是越來越尖銳，越來越激烈。毛澤東更認為，必須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文化大革命也必須七、八年要搞一次。毛澤東實施這一思想政治路線，是以那些「政治賤民」在法理上被認定為專政物件的存在為前提、為社會基礎的。現在，「政治賤民」摘帽改正平反了，法理認定的專政對象也就沒有了。耀邦同志以釜底抽薪之術，摧毀了毛澤東實施以階級鬥爭為綱、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現實基礎。再說，無產階級專政和它的專政對象是一個矛盾對立的統一體。沒有了專政對象，專政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專政對象消失了，無產階級專政存在的基礎瓦解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應該說，無產階級專政對象——「政治賤民」的解放，應該成為無產階級專政消亡的前提和基礎。這本來應該是無產階級專政存在和發展的應有主義。但是，有一個鐵腕人物說，還「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不動搖，甚至列為黨的基本路線的組成部分而入憲。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約5。年以至100年，都不變！真是匪夷所思，不可理喻。

還要指出一點，「右派分子」的改正曾遭到巨大阻力，也是來自那個鐵腕人物。他當年曾是反右鬥爭第一線總指揮，現在仍然堅持「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為了證明他的正確，有些頭面右派人物（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等，還有當年中國人民大學年輕女學生林希翎），都被保留了下來，不予改正。但是，在耀邦同志大力推動下，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大勢所趨，螳臂豈能擋車，右派改正達到了99．99%以上。民眾不禁提出質疑：這99．99%的擴大化難道是正確的、必要的嗎P這個質疑表達了民眾的公論，民心所向，任何鐵腕人物都不能一手遮天了。

再看真理實踐標準大討論。耀邦同志一到黨校，就著意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放在了思想路線的清算極左、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為此，他

創辦了三種刊物：《理論動態》、《中央黨校校刊》、《中央黨校簡報》，眾了一批理論骨幹。《理論動態》成為重心，連續地組織並刊發了廣大部、思想理論界廣泛關注的重大問題的文章：《「繼續革命」問題的討》、《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毛主席的幹政策必須落實》等，旗幟鮮明，有很強的時政針砭性。該刊逢五逢十版，開始只印幾百份，非公開發行，只發至中央領導和黨校學員人手份。黨校學員與全國黨政機關有廣泛聯繫，影響迅速擴大，僅幾個星期便增加到了幾千份，成為思想理論界關注的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的旗幟。時任人民日報總編的胡績偉，具有敏銳政治嗅覺和崇高道義責任感，站在當代思潮的制高點，以「追求真理，實事求是」為報訓，積極配合了《理論動態》，以整版版面登載了他們的文章，架起了連結《理論動態》和社會公眾之間的思想橋樑，極大地擴張了《理論動態》的影響力。

1977 年 10 月，黨校依據葉劍英提議開展中共第九次（反劉少奇）、第十次（反林彪）、第十一次（反「四人幫」）路線鬥爭史研究。它提供一面鏡子，文化大革命是非判斷的各種觀點都尖銳地折射了出來。耀邦同志在主持這一課題研究中，觀點明確，旗幟鮮明，堅持主張：「對文革的歷史，不要根據哪個文件，哪個同志的講話，不能照抄照搬現成的東西，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要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辨別是非的唯一標準，否則就不是科學態度，不是研究了」。他旗幟鮮明地說：「文革的實踐是錯誤的」。在《關於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若干問題》第二稿中，對耀邦同志的上述指導思想作了這樣的概括和表述：「應當以實踐為檢驗真理、辨別路線是非的標準，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路線正確與否，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要由實踐的結果來證明。」實踐標準的觀點已表達得十分清楚明瞭，成為後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的先導。

這種從中央黨校發起、反映時代要求的思想，很快就向社會擴散、發酵，同類文章陸續在報刊上露面，對立思想觀點開始交鋒。黨校理論家孫長江著手撰寫定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準備

投入論戰。1978 年 3 月，剛從中央黨校結業的楊西光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寸巴組稿南京大學哲學教師胡福民的《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交給了《理論動態》，要求先在《理論動態》上發表。耀邦同志決定由《理論動態》、《光明日報》和作者共同進行修改。以孫長江和胡福民兩稿的組合為基礎，經過反復修改成文。5 月 8 日，耀邦同志定稿。

耀邦同志意識到，這篇文章的發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也有很大政治風險。為適應黨和國家通行的慣例，發揮這篇文章的戰鬥作用，他們制定了具有策略意義的文章署名和發表程序。10 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理論動態》上發表。11 日，《光明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署名全文刊登。12 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都在頭版全文轉載。新華社也向全國發了通稿。這一程式，大大減少了政治阻力，最大化地擴大了影響力。文章以一個一般人都能把握的簡單、明瞭、易懂的哲學常識命題，與「兩個凡是」形成尖銳對立，成為突破口，鮮明地打出了反對「兩個凡是」思想路線的旗幟，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這實在是一個令人驚詫的智慧之作。

文章發表後，這場思想路線鬥爭，迅速成為全國輿情中心。葉劍英、鄧小平、羅瑞卿、方毅等，相繼表示支持。全國 29 個省、區、直轄市領導，繼甘肅宋平、黑龍江楊易辰、遼寧任仲夷領先表態支持之後，紛紛表明態度，贊同文章觀點。全國報刊也紛紛發表著名哲學家和學者文章，起而響應對「兩個凡是」的批判。一時形成了熱烈討論的高潮，實踐標準的命題也隨之成為當代社會流行的思潮。這場全國大討論，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內改革派對毛派守舊勢力之間進行的一場政治鬥爭。但在這一鬥爭中，華國鋒表示了克制和寬容，沒有作出重大動作，僅僅指示中宣部和《紅旗》雜誌社「不介入」、「不表態」。汪东興等「兩個凡是」的實權派，雖然反映強烈、屢有動作、妄圖壓制，但卻無能作出任何有效的反擊對策。這場鬥爭，進行得既熱烈、又保持著黨和社會相當的穩定，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特別是建國後的路線鬥爭史上從來未有過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個進步。對這一進步，我們在感慨之餘，也不能

不坦然表露我們對華國鋒同志寬容大度的敬意。再說，粉碎四人幫、結束批鄧、平反冤假錯案、真理標準大討論與工作重心轉移這些實現歷史轉變決定性的關鍵舉措畢竟都是在他主政下實現的。

這次真理實踐標準的大討論，有巨大的收穫和深遠的意義。「兩個凡是」的思想觀點，在全社會遭到了沉重的批判打擊，在黨政軍體制中完全失去了主導地位；真理實踐標準的觀點深入人心，成為時代思潮，民眾歡欣鼓舞，湧動著強烈的變革的期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神化地位，在潛意識裏開始動搖。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一切「偉大」和「文革」開始進入人們反思批判的視野。徹底批判和否定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大門也隨之打開。牢獄大門一旦打開，枷鎖一旦打碎，囚徒們就會勇往直前、再也不會回首地沖向自由。思想枷鎖被打碎了，精神自由的本性也就噴薄勃發，思想解放的火車頭也隨之啟動。這次大討論啟動了中國人民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思想解放運動的開端：
西單民主牆和理論工作務虛會

真理實踐標準大討論，啟動了中國大地人的思想解放運動的開端。有兩個戰場：在民間，自由民主思潮湧動了起來；在體制內黨政機關幹部，思想解放潮流也開始高漲。

民間西單民主牆

1978 年春，全國湧現著平反冤假錯案和知青爭取返城的熱潮。在「兩個凡是」方針禁錮下，他們的維權要求在社會基層遭到了壓制。社會底層到處發洩著不滿、不安、焦躁情緒。全國各地到處有貼大字報伸冤、訴苦、投訴的，有的赴京上訪。在北京，在交通便利的鬧市，便出現了

他們的蹤跡，特別是在西單大街一角的牆上，更成為他們貼大字報表達他們伸冤、訴苦、投訴之情的集中地。西單大字報由此而生，並成為北京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政治景觀，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注意和關切。起初，大字報的內容全是伸冤、訴苦和投訴。實踐真理標準大討論激勵了大字報思想鋒芒指向的變化。全國各地思想最活躍的青年先鋒分子，起而響應，寫文章，油印刊物，結成小團體，熱烈討論國家大事和發展前途，批判毛澤東和文革，提出自由民工訴求。當時，有一個稱為貴州「啟蒙社」的青年組織，非常活躍，在貴州和北京，都流傳有他們政論文章的印刷品和大字報。在北京，也有一批這樣的青年，發動起來，在西單牆上張貼了他們的政論大字報。這些政論文章，開始時主題集中在批判「四人幫」和「兩個凡是」，要求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為劉少奇平反，支持鄧小平。西單民主牆一度受到黨內高層領導人的稱讚。葉劍英讚揚它是人民民主的典範。鄧穎超說，要知道民主，就到西單民主牆看看。甚至王震也說，西單民主牆真不錯。鄧小平也很讚賞，在接待外賓時公開發表支持意見。但大字報政論文章的主題，很快就擴展到了對專制獨裁政治體制的批判和對自由民主的訴求：(1) 探討社會民主；(2) 主張民間辦報、民主辦報；(3) 要求言論自由，廢除「惡毒攻擊罪」；(4) 讚賞西方民主；(5) 批判毛澤東：等等0 1979年3月，任畹町等在西單民主牆貼出《中國人權宣言》大字報，25日魏京生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大字報，告誡人們警惕鄧的獨裁傾向，鮮明地擎起反對專制獨裁要求自由民主的旗幟。「西單民主牆」成為一個熱烈的、令人振奮的自由民主思想陣地。鄧小平惱恨成怒，態度突變，在魏京生大字報後的第四天（3月29日）就下令逮捕了他，後來又採取一系列措施絞殺了西單民主牆。11月14日，郭羅基發表文章：《政治問題也可以討論》，強調「不能以言治罪」，被認為是為剛判刑的魏京生辯護的，是反對鄧小平的。鄧小平也把他逐出北京，以政治異類對他苛待多年。耀邦同志自始至終都表示了對「西單民主牆」的支持，讚賞它的大字報「和「四五」天安門大字報一樣，是人民出自內心的呼聲，是人民新的覺醒」。

對逮捕魏京生也表示異議：「我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他一死就會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他又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發言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他義正詞嚴地伸張他的民主理念，令人肅然起敬。

幹部理論工作務虛會議

另一戰線是國家黨政機關體制內的幹部隊伍。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真理實踐標準」思想路線戰勝「兩個凡是」思想路線，取得了主導權，並決定會後再舉行「理論工作務虛會議」，進一步清算「兩個凡是」。這次會議在 1979 年 1 月 18 日舉行，分二個階段。第一階段，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有中央和北京理論宣傳工作者和地方省市各一名聯絡員共 160 人參加。第二階段，由中央召開，邀請各省市代表參加，有四、五百人，開大會進行交流。會議長達三個月。耀邦同志主持會議，首先對會議作了《理論工作務虛會議引言》報告，要求「把思想理論上的重大問題討論清楚」，「澄清理論是非」。鄧小平也通過周揚向會議傳達了他的「指示」：要「解放思想」，「不設禁區，不下禁令」。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民主氣氛下，與會者情緒熱烈，暢所欲言。發言者各抒己見，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簡報就登什麼，無人審查，無人刪改。會議出了兩百八十多份簡報，數百萬言文字，問題涉及很多，內容豐富多彩。與會者揭批最集中、最要害的問題，是毛澤東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及其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並揭批了制度上的根源，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要求，表示了對民主、自由、人權、法制、人道主義的要求。這些觀點，振聾發聵，大大激發人們精神振奮。這是中共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次寬鬆的、民主的、思想解放的會議。如果這次會議能夠朝著這樣的

方向正常發展，可能為中國開拓一個自由民主的前景。但是，會議引發出來的那些思想、意見、政治要求、政治意願，卻引起了黨的原教旨主義守舊傳統勢力的震動，他們不能容忍新的價值觀念的挑戰，認為這種挑戰必然動搖黨的地位、動搖他們的權力。每一份會議簡報，他們都一一過目，這種感受也越來越濃重。鄧力群在《十二個春秋》回憶錄透露，他強烈感到：「會開的時間愈長，發言的人愈多，離譜的東西也就愈來愈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從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要連根拔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胡喬木說：「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鄧小平說：「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他們再也不能容忍，決心封殺。在會議第二階段，取消了一切大會發言交流議程，只舉行相互隔離、無聲無息的小組會。在3月30日，也就是逮捕魏京生（29日）的第二天，鄧小平張舞餘威，出席大會，作了由胡喬木起草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這四個堅持是毛澤東反右時發佈的「六項政治標準」的翻版。同工異曲，是鉗制自由思想的政治枷鎖。鄧小平既支持批判「兩個凡是」和平反冤假錯案，又封殺西單民主牆和理論工作務虛會，這是為什麼？我們只能作出這樣的判斷：他需要通過批判「兩個凡是」、平反冤假錯案以及初期的西單民主牆，是為了把毛澤東從神壇上請下來，為他的復出開闢道路，並為他自己的新權威重建社會、政治和組織的基礎；但是，他仍然需要毛澤東這把刀子，他非常需要繼承毛澤東思想政治遺產，接過他的極權衣缽，實行個人的獨裁專斷。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了這一判斷的正確。

中共中央全會決定的這次理論工作務虛會議，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收兵了。在中共官史上，除了鄧的那篇昭著的宏文之外，會議簡報全部收回，關於這次會議再沒有留下片言隻語。但是，這次會議留給後人的思想解放精神和這樣民主思想財富卻是無論作出怎樣的估價都不為過的。

它徹底批判毛澤東和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它張揚民主、自由、人權、人道主義的普世價值，至今對我們仍然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它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精神和政治遺產。後人仍須奮鬥，繼續完成它遺留後人的歷史任務。

蘇东巨變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思：無產階级專政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分野

這次會議遺留給後人的歷史任務是什麼呢？時任會議第三組副組長王德惠在主持會議時作的開宗明義的發言有這樣的論述：「現在全黨面臨著一個重新認識的問題。建國快 30 年了，現在還有兩億人吃不飽飯。面對這種情況，全黨、全民都在思考：我們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這個重新認識的要求是阻擋不住的。」建國 30 年，有幾千萬、幾億人在饑餓、苦難、死亡之中。根源何在）全黨、全民都不能不思考。這個由「探源」而反思的歷史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住的。什麼「六條政治標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都沒有能使這一時代潮流的歷史腳步停下來。

1989 年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點。在中國，民主運動雖遭到血腥鎮壓，卻推動了人類歷史的重大轉變。1991 年，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社會主義體制在各國一一倒臺。它向人們提出了新的思考：這是為什麼？根源何在 P 這個歷史性探源反思的時代潮流，也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住的。

多年來，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都把這個原因，歸咎於「帝國主義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後來又歸咎於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暴行的報告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民主改革。現在，這種認識大大長進了。1954 — 1989 年主政 35 年之久的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一書記

日夫科夫寫的回憶錄，認識到了社會主義瓦解有體制方面深層次的原因，就是實施了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三大體制為基本架構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前蘇共政治局委員、蘇聯解體後任俄共主席的久加諾夫則有更深刻的判斷，認為這三大體制形成了蘇聯共產黨在蘇聯的「三個壟斷」：政治壟斷、經濟壟斷、思想壟斷，並認為這是蘇聯紅旗落地的根本原因。但他們都沒有能更深入地挖掘和找到這三大體制的病根所在。

馬克思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無疑地有著極其緊密的關聯，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國際共運其表、馬克思主義其裹的不可剝離的關係。至今，仍有人把馬克思主義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併入憲成為人人必須堅持的原則。馬克思主義果真神聖如此嗎？讓我們以它的歷史實踐來檢驗它的真理和謬誤。

首先，我們要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弄清楚馬克思主義自身的歷史演變，辯明它不同發展階段的真實思想內容。

馬克思、恩格斯同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他們的思想，在一生中各個階段有不同的發展變化。19世紀30年代，他們曾經是青年黑格爾派。1843－1845年，他們成為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擁護者，創立了人本人道主義社會主義。1845年以後，他們創立了以階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為基本思想、以《共產黨宣言》與《哥達綱領批判》為基本綱領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他們自稱為「科學共產主義」）。由於當權的共產黨一直奉之為圭臬，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形成了它的排他、獨尊、正統地位。學界則稱之為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了。年代到90年代，歐洲社會經濟政治發生了重大變革。馬克思1883年去世。恩格斯1889年創立和領導了第二國際，與時俱進，自我修正，在新的歷史環境和鬥爭條件下實現了思想政治路線的轉變，開拓和奠定了第二國際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在共產黨主導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中，除青年黑格爾派思想階段，完全否認和抹殺馬哲史中人本人道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存在，一直把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視為馬克思主義始終一貫的、不能

逾越的、獨一無二的馬克思主義教義。這是與歷史事實完全不符的。事實上，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上，他們的思想有不同的內容、不同的歷史地位和不同的歷史命運。

人本人道主義社會主義。

1843—1845 年，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論猶太人問題》、《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神聖家族》等著作中，突出地表現了他當時「對費爾巴哈的迷信」（馬克思自語）和尊崇，以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為出發點，以人的本質的異化的基本原理為理論前提、理論基礎和理論框架，分析了私有財產、資本、商品、貨幣、勞動、工資、無產階級都是人的本質的異化，認為人的本質的異化對人的本質的復歸就是共產主義的實現。他說：「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矛盾間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物件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人和類之間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馬克思的這段話和他最集中、最系統地闡發人的本質的異化思想和人本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論述，是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書稿中。這一著作，他生前沒有發表過，直到 1927 年才在蘇聯問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沒有產生顯著影響。但在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反人道主義思想政治路線的鬥爭中，一些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家（王若水、周揚等）發現了這一理論的價值，運用這一理論武器對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反人道主義進行了勇敢的批判。筆者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起源》，對馬克思主義這個歷史發展階段特有的理論形態進行了具體分析。

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

1845 年，馬克思、恩格斯創建和發展了學界稱之為原教旨馬克思主

義。它的基本思想，正如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約。魏德邁的信中闡明的那樣：「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各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正是意在突顯他們理論和學說體系的這個基本思想。「資本論」就是對他們所判定的當代社會兩大對立階級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存在條件和根源進行經濟分析，以「剩餘價值」學說揭示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秘密。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建立起社會主義。正是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思想，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主要理論基礎唯物史觀的精髓，《共產黨宣言》的基本要領和核心，剩餘價值學說對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進行經濟分析和論證的主體，並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支柱。應該說，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確確實實、實實在在地構成了馬克思學說體系的最基本的思想一是貫串他的學說體系的一根「紅線」，是它的靈魂，是他的思想體系的核心和最本質、最根本、最基本的東西。他們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就是實施《共產黨宣言》和《哥達綱領批判》闡明和規定的以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計劃經濟三大體制為特徵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有一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的觀點從人本人道主義社會主義向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轉變，是馬克思主義向「理論反人道主義」的轉變。不幸的是，這一看法為後來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實踐所證實。

十九世紀中業發生在歐洲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革命高潮（1848年法國工人起義到1871年巴黎公社），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建這一理論之後、恰逢其時遇到的、最重要的、實踐他們革命理論的歷史機遇。他們運用他們的理論，指導歐洲1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都——失敗了。他們從失敗中得到了深刻的歷史教訓，恩格斯去世前寫的最後著作一《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中，使用「錯

了」、「幻想」、「錯誤看法」「過時」、「不對」等用語作了最誠摯、最坦率的檢討和自我批評。20 世紀初，革命運動高潮轉向了東方，俄國首先成為它的中心。在東方經濟落後封建專制國家，有一批以列寧為代表的思想偏激左傾的知識分子群體，接受了原敎旨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國家，組成丫第三共產國際，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更形成了以蘇聯為首包括東歐、亞洲、美洲（古巴）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社會主義陣營。第三共產國際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共產黨，遵從原教旨馬克思主義，沉溺於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沉溺於以暴虐的階級鬥爭推行同人類傳統文明實行最徹底決裂的路線、方針、政策，實施對「社會總產品」（生產資料和自然資源）最高度集中的獨佔壟斷，實施對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進行徹底、全面、集中的一體化控制的計劃經濟，造成了千、萬、億人的饑餓、苦難、死亡，把人類推向了災難深淵。1991 年，蘇东巨變，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各國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體制，如同多米諾骨牌那樣，也一個接著一個地倒臺了。

對蘇東事變的性質有不同的評估。有些共產黨的政治家、忠誠信奉者和理論家認為：蘇东事變並不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根本失敗，只不過是一種局部性失敗、暫時性挫折而走向了它的低潮時期。是這樣嗎？不，不是的，絕對不是這樣的。蘇东事變，是一種全局性的、不可逆轉的、永劫不復的失敗，標誌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徹底失敗，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徹底崩潰。作為「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王義發源地和樣板，蘇聯還有復國的可能嗎 7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還能夠死灰復燃嗎？中國還能夠回到改革前那種狀況嗎？誰還有如此回天之力，能夠扶「無產階級專政大廈」於已傾、挽「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塌台的狂瀾於既倒？什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新紀元」、「社會主義將在全世界興起，資本主義將在全世界滅亡」，這些喧囂一時的神話，「俱往矣」，都已經銷聲匿跡了。蘇東事變標誌著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

的徹底破產。

在人類歷史上，社會主義以前的一切社會形態和社會制度，從來都是在它自身的、自發的自然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並形成的，從來都沒有預先設計了一個統一、完整的社會意識形態進行構建而成的。唯獨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在舊社會內自發地、自然地生長出來。第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各國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體制的產生和形成，最突出的歷史特點，就在於它完全是以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綱領作為意識形態和模式而自覺地、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構建起來的。列寧說：沒有革命理論就沒有革命運動。毛澤東也說：指導我們事業的思想基礎是馬克思主義。他們講的，都是說明馬克思主義是他們進行共產主義運動和構建社會主義大廈的基本理論和指導思想，是它的靈魂。在 1917 年— 1991 年大約 70 年這麼長的時間裏，在歐、亞、美社會主義陣營這麼廣袤的國度裏，在佔有世界三分之一以上這麼眾多的人口裏，共產黨進行自覺地、有計劃地、規模化的、系統化的實踐，構建起人類歷史上龐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大廈。共產黨形成國家社會的領導核心，成為壟斷國家政治、壟斷國家經濟、壟斷社會思想的惟我獨尊的專制獨裁的政治勢力。各國共產黨無不堅持不懈地開展黨內路線鬥爭，維護馬克思主義純潔性，忠誠地、頑強地執行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基本思想和基本綱領：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建立起人類歷史上最龐大、最嚴密而成本最高昂的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實施對「社會總產品」（生產資料和自然資源）最高度集中的獨佔壟斷，實施最嚴厲管制的計劃經濟，建立起人類歷史上最嚴酷的人身依附奴役體制，對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進行徹底、全面、集中的一體化控制，沉溺於以暴虐的階級鬥爭推行同人類傳統文明實行最徹底決裂的路線、方針、政策。共產黨發動連續不斷、全社會規模、暴風驟雨的階級鬥爭，對「剝削階級」和「反革命」、「反毛澤東思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無產階級專政」造成的「政治賤民」實施反人性、反人道主義的殘暴專政，以至導致「紅色恐怖」暴力肆虐，使千、萬、億人遭到人身折磨、精神蹂躪，

饑餓、苦難、家破人亡，甚至釀成階級屠殺慘絕人寰的悲劇，把人類推向了災難的深淵。這些血跡斑斑的暴政是這個時代最突出的特徵，成為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最野蠻、最暴虐、最恐怖的歷史時期。歷史實踐的選擇是嚴酷的。現在，這個大廈在頃刻之間轟然倒塌了，而且它的居民們還為這個大廈牆倒眾人推的熱烈場景歡呼鼓掌。大廈就這樣倒塌了。什麼原因，就是它錯誤的設計和錯誤的構建（它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綱領）造成的嘛。這是一個常識性的答案。筆者寫了一篇《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失敗探源》論文，深入地論證了這個觀點。

民主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自我修正、成熟發展的新階段。

19 世紀 70—90 年代，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重大變革。在經濟上，電力動力普及而進入「電氣時代」，推動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歐洲進入了又一經濟高速發展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化規模越來越高，出現了新的股份制、托拉斯、國有化，生長了明顯的新的社會化因素。在政治上，民主立憲制度逐步完善、成熟，普選制普遍確立，國家代議制機關形成為國家權力中心，民主憲法和法律體制主導了國家政治生活，多黨平等自由競爭的政治格局逐步形成，為工人政黨通過選舉取得政治權力，提供了現實平臺。馬克思 1883 年辭世。1889 年，恩格斯領導成立第二國際。1890 年，德國《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廢除，社會民主黨走上公開合法政治舞臺，通過選舉，進入了代議制權力中心，成為議會中起制衡作用的政治力量。恩格斯晚年所處歷史背景和鬥爭條件，已經與 40 一 70 年代完全不同，在領導第二國際鬥爭中，為鬥爭需要制定了新的思想政治路線而走向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筆者著《恩格斯——第二國際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一文，以他晚年最主要的基本著作，結合他給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書信，勾勒了他從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到民主社會主義偉大轉變的歷程。

在 1891 年 5 月德文版《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恩格斯注重分析了當代資本主義發展中新產生的股份制、托拉斯、企業國有化

社會變革的重大意義。他認為，資本主義由此產生了新的社會化因素，「資本主義向行將到來的社會主義的投降」，增強了資本主義自我調節的功能。產權的社會化，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揚棄。產權社會化與經營管理權的分離，「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王薪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被從資本和企業經營管理的壟斷地位中排擠了出來，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中產階級的隊伍不斷擴大，而逐漸成為主導社會穩定發展的中堅勢力。社會階級結構發生著根本變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階級對抗的社會結構逐漸被兩頭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中間大（中產階級）的社會結構所取代，資產階級大大削弱，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的差距逐漸縮小。資本主義發展的變革，不能不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在這一著作中，恩格斯擯棄丁無產階級專政思想，認為：「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國家對資產階級鎮壓的職能，全然沒有了。這還能叫做無產階級專政嗎？他把它稱之為「整個社會的代表」，與過去一直堅持的國家是階級鬥爭、階級統治的工具的說法，實在是大相徑庭，而與當今人們耳熟能詳的「全民國家」倒是挺接近的。社會民主黨思想政治路線也隨之發生了歷史性轉變。

1890 年，德國《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廢除，德國社會民主黨提出了制定新黨綱的要求。在制定新黨綱的過程中，產生了三個檔：《哥達綱領批判》、《1891 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愛爾福特綱領》。《哥達綱領批判》是 1875 年馬克思制定而未曾發表過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恩格斯這次首次發表，就是想以它的思想政治路線來主導社會民主黨綱領的制定。經過激烈辯論，產生了幾個綱領草案，都送交了恩格斯審閱。恩格斯寫了《1891 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對這些綱領草案進行了批評。在這一批評意見中，顯示了恩格斯思想發生了明顯變化，承認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有「暴力炸毀」和「和平方式」兩種可能，認為：「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

舊社會有可能和平長人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英國報紙上每天都在談論即將贖買王朝的問題，這個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軟弱無力的。」恩格斯這一觀點，給黨綱的制定打開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平轉變的大門。社會民主黨在恩格斯直接領導下制定通過了《愛爾福特綱領》。這個綱領，在政治上要求健全普選制、直接立法制、人民自決和自治、公務人員選舉制、言論結社集會自由等，在經濟上要求實行免費教育、免費律師和司法援助、免費醫療藥品助產救助、國家承擔全部工人保險、免費安葬等高福利政策。綱領的基本內容集中在通過普選實現和平轉變、堅持民主立憲政治體制、實行高福利社會政策，這是一個鮮明的民主社會主義綱領。這個綱領很快成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旗幟，成為整個第二國際各國社會民主黨制定黨綱的典範。它既然是恩格斯領導德國社會民主黨嘔心瀝血制定出來的，也就理所當然地應該視為恩格斯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的歷史性標誌。

從此，恩格斯在他的餘年全心全意地、毫不動搖地沿著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走完了他的一生。在他給各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函件中，我們看到了他是如何熱忱地、充滿信心地引導著他們走向民主社會主義道路。1891 年 3 月 24 日，他在致奧本海姆的信說：「再過五至十年，形形色色的國會將完全是另一種漾子。」1891 年 9 月 29 日，在致倍倍爾的信說：「顯而易見，這樣的時刻日益臨近，到那時，我們在德國將擁有多數，或者無論如何將成為唯一有足夠的力量執掌政權的黨——在保持和平的條件下。正是這個原因，我不希望這一持續不斷的發展過程因某種危機而中斷，誠然，這種危機可以使它縮短二、三年，但也同樣可以使它延長十至二十年。」為保證黨的路線的實施，他告誡黨的領導人要避免「危機」事件，以防造成「中斷」和「延長」的干擾。1895 年 1 月 19 日，他在致勞拉的信中說：「不管怎樣我們的五十個法國社會主義者議員是走運的。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內他們推翻了三屆內閣和一位總統。這說明在法國或英國的議會這個確實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中，社會主義少數能夠爭得什麼……將使他們成為帝國國會的仲裁人，國會中的政治均勢也

將取決於他們。」他信心十足地認為，普選已經造成了資產階級統治的危機。1895年1月16日給弗·阿·左爾格的信說：「今天不僅在英國，而且在德國和法國，我們可能面臨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新的選舉。而在意大利是最嚴重的危機，奧地利不可避免地要進行選舉改革，總之，整個歐洲的形勢日益接近危機。」他已經把爭取民主自由，建立民王共和國，和平過渡，作為指導社會民主黨鬥爭的基本策略。1894年2月19日，意大利勞動社會黨領導人致函恩格斯，請他就意大利黨的鬥爭策略發表意見。恩格斯的復函簡要地說：1. 獲得普選權和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2. 組成共和國，擴大民主自由。3. 不讓無產階級在徒勞無益的地方起義中被滅絕，防止無產階級黨的核心作無謂的犧牲。4. 成為新政府的新反對派，堅持獨立鬥爭。恩格斯把這個復函在黨的刊物上發表，顯然顯示了它對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鬥爭策略指導的普遍意義。他已經建立起一種完全新的理念，1894年3月6日致拉法格的信說：「對無產階級來說……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共和國既然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還需要進行暴力革命把它摧毀、打碎而另建無產階級專政來取代它嗎？他完全拋棄了巴黎公社歷史經驗的總結，完全拋棄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旗幟。這是恩格斯在鬥爭實踐中形成的民主社會主義綱領的基本論據。

1895年3月，在恩格斯逝世前的五個月，來日不多了，他寫了他一生中的最後著作：《卡·馬克思V1848年至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文獻裏，這是獨一無二的系統、完整地闡明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平轉變的歷史文獻。這篇著作是他在生命的最終時刻，留給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人的政治遺囑。恩格斯在文中用「錯了」、「幻想」、「错誤」、「過時」、「不對」等同類的連環用語，對40—70年代他和馬克思所主張的法國大革命模式的武裝起義暴力革命，進行了誠摯的、深切的反省和自我批評。他真誠地認為，他們過去的革命實踐經驗「徹底證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實現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而應該「慢慢向前推進，在嚴酷頑強的鬥

爭中奪取一個一個的陣地」，表達了他奮鬥一生直到晚年才深切體驗到的極可寶貴的社會逐步改革進步的發展理念。他還指出，當資本主義經濟「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社會主義革命必然失敗。這種觀點，在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看來，實在是一種十惡不赦的革命取消主義。《導言》的重點，是著重論述德國社會民主黨通過選舉、掌握人民代議機構權力中心、實現政權的和平轉變的政治路線。他認為，這是德國無產階級貢獻給國際無產階級的一種最新式的、最強大的鬥爭武器。他還以相當篇幅對無產階級在當代軍事變革新形勢下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劣勢和不利條件作了具體分析，進一步論證了和平轉變路線的根據和理由。他針對有人堅持不能「放棄自己的革命權」而不願放棄暴力革命，指出：「為了不讓這支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在前哨戰中被消滅掉」，必須避免「使它同軍隊發生大規模衝突，像 1871 年在巴黎那樣流血」那樣，以避免其導致「阻礙正常的發展進程，使得我們臨到緊急關頭也許沒有了突擊隊，決定性的戰鬥就會推遲、延緩並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的犧牲。」在這裏，我們可以感受到恩格斯對「堅持革命權」論者的一片淳淳勸阻的熱忱。

很顯然，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和平轉變是通向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一扇大門，一旦進人了這扇大門，也就拋棄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而通向了民主立憲發展的道路。恩格斯是明確地認識到這一點的，所以他說：「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在恩格斯晚年著作裏，雖然對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公然否定的說辭，但在著作中公然把它抹去再不讓它拋頭露面卻是明顯的事實。特別明顯的，是恩格斯公然表述了對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修正。在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觀的通信中，已經不把國家看作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而是社會分工發展的產物，是從社會生活中將社會的公共事務分離出來進行公共管理的產物。在《導言》中，他更接受了被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稱之為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契約論》的思想，把德國資產階級君主聯邦國家視為「契約的產物」。他承認社會民主黨取得國家政權的和平

轉變「是靠遵守法律來從事顛覆的」，他承認：「德意志帝國，同一切現代國家一樣，是一種契約的產物：首先是君主之間的契約的產物，其次是君主與人民之間契約的產物。如果有一方破壞契約，整個契約就要作廢，另一方也就不再受約束。」「遵守法律來從事顛覆」，就是按照國家的契約規則進行的「和平轉變」。這個論述表明，恩格斯修正了過去固持的國家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是階級鬥爭和階級統治的暴力工具的國家學說，而接受了作為近代政治文化結晶的、民主立憲理論基礎的孟德斯鳩的《契約論》。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是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理論基礎。恩格斯晚年在實現了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轉變的同時，對這一重大理論也產生了重大轉變。這是勢所必然的。

恩格斯晚年開拓的民主社會主義應該是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自我修正、成熟發展階段的產物。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和理論家，直接繼承了他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繼續領導了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就是他們最傑出的思想家代表。伯恩斯坦被稱號「修正主義」鼻祖，但他的基本思想卻是繼承和發展了恩格斯開拓的民主社會主義。伯恩斯坦有句明言，「最終目標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被視為放棄「共產主義」目標的最著名、最經典的修正主義代表思想。這句話，只不過是直接復述了恩格斯 1893 年 5 月 11 日回答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的話：「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恩格斯在世時，伯恩斯坦在他身邊在黨的報刊上不斷發表過系列論文讚揚民主立憲和通過民主立憲走向社會主義的主張，恩格斯從來沒有表示過任何異議。恩格斯所立《遺囑》，伯恩斯坦被立為「遺囑執行人」和全部手稿和書信的受贈人，如同馬克思對恩格斯那樣，被視為思想遺產的繼承人。在遺囑中，還列有一項特殊的財產遺贈：1000 馬克遺贈給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作為他們議會議員競選經費專款使用，也表明了恩格斯對執行黨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熱忱的積極性。

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繼承恩格斯遺志，在 20 世紀整整一個世紀，

在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先後取得領導權，堅定地走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堅定地堅持民主立憲政治立場，經濟高速發展，人民高福利水平普遍提高，展現了人民富足、社會福利日益擴大、貧富差距日漸縮小、人民自由安居樂業的人類美好生活景象。中國一個政治保守、思想禁錮的領導人到英國訪問，看到那裏工人家庭生活，禁不住說出：我們部長的生活也比不過他，這不就是共產主義了嗎？有的領導人到瑞典去考察，也被那裏人民幸福生活的景象所吸引。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世紀末，幾乎有半個世紀的世界和平發展時期，各種社會思想和社會制度，譬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無不進行著拼著老命的競跑，證實著優勝劣汰的鐵的歷史規律。歷史已經作出了公正的選擇和判決，無疑地，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已經出局，民主社會主義卻正在並繼續顯示它的生命力。

在歷史上，馬克思主義自身發展的階段性，主要是：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在它各自展開的歷史實踐中形成了各自不同而決然相反的實踐結果和歷史命運。明智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們，應該作出明智的選擇了。

（2009 年 3 月定稿於北京）

緬懷耀邦，把中國的民主化事業推向前進

周成啟

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倡導者、國家民主化進程積極推動者胡耀邦離開我們已經20年了。他在有生之年，和中國歷史上其他改革者一樣，多災多難，遭受了不少冤屈，付出了巨大犧牲。我和耀邦同志沒有直接的工作關係，只是上個世紀50年代初我在西南局辦公廳秘書處擔任文秘工作時，對他所領導的川北地區的狀況有點滴的瞭解，特別是在1951年下半年參加了他領導下的川北宣漢縣的土地改革後，知道的東西就多了一些。當時鄧小平是西南局書記、胡耀邦是川北區黨委書記，我是他們麾下的無名小卒。在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之際，我不想就自己的回憶寫回憶錄方面的東西，而只是根據我多年來進行中國政治改革研究的若干心得，對今後中國民主建設方面的問題，提出一些看法，我認為這是對他最好的緬懷，亦供學術界和社會各界志士同仁參考。

一. 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是建國後中國共產黨最為傑出的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執政時期是建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為輝煌的時期

根據歷史資料，中國共產黨內擔任過第一把手職務的人有：陳獨秀

(1921．7—1927．7)、張國燾（1927．7—1927．8)、瞿秋白（1927．8—1928．6、向忠發（1928．6—1931．6)、王明（1931．6－1931．9)、博古（1931．9—1935．1)、張聞天（1935．1—1943．3)、毛澤東(1943．3—1976．9)、華國鋒（1976．9—1980．12)、胡耀邦（1980．12—1987．1)、趙紫陽（1987．1—1989．6)、江澤民（1989．6—2002．10)、胡錦濤（2002．10—）。鄧小平正式職務未擔任過一把手，但是他是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到他自己逝世前這一段時間（胡耀邦、趙紫陽時期及江澤民時期的前半段）被國人稱為「鄧小平時代」的實際掌權者。在1921—2009這88年中，為中國共產黨作出過傑出貢獻的領導人應該是陳獨秀、毛澤東、張聞天、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

說到胡耀邦，誰也不能不承認他是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他是在中國共產黨國內形勢嚴峻瀕於危亡的時刻，挑起總書記這副擔子的。那時，他的從政條件很不好，表面上他是總書記，實際上不掌握實權，上頭有幾個「婆婆」，一切都得聽鄧小平和其他老人（所謂「七老」、「八老」）的招呼，看他們的臉色行事。有時當鄧小平與陳雲出現意見分歧時，他的為難的處境，是我們一般人難於想像的。或者當鄧聽了「老左」們的進言而他的正確看法被否定時，他的「表裏不一」讓他痛苦不已。他是總書記，理應既擁有「名義權」，也應享有「實際權」，但實際情況往往是由於「左」的干擾、阻撓，出現胡耀邦「說話不算數」的情況。他的發號施令，「老左」們可以執行，也可以不執行。所以有人說，胡雖是「當權派」，但還不是「實權派」。

當然，胡耀邦對自己從事的事業，有自己獨立的見解。不是對鄧的一切，都言聽計從，都無條件執行，不是「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執行」。他對部分學生1986年的上街、遊行等行動，往往不願採取強硬的手段，進行暴力鎮壓。他對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學術上的爭論，往往採取「三寬」政策，不搞文字獄，比較能夠容忍，更不無限上綱，採取極端措施。因此他被鄧批評為「一手硬，一手軟」，被「老左」們誣陷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求他下臺。實踐證明，胡耀邦保護學生，愛護知

識分子的政策是得人心的，效果也是好的。把學生推向對立面、作為敵對勢力進行暴力鎮壓，實際是違反憲法，混淆敵我，化友為敵，效果並不好。把依靠的對象劃為專政的對象，降低了共產黨的威信，使群眾與黨離心離德，喪失黨心、民心、軍心。

耀邦的一生，是力主發揚民主、推進中國政治改革的一生。他說，鴉雀無聲，是走向滅亡的前奏曲，七嘴八舌人氣旺，民族復興有希望。他在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小組會上曾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我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他堅持政治改革必須與經濟改革同步；他認同人類社會進步的普遍規律，必須走民主、科學、法治之道，力促輿論開放，言論自由，反對「老左」們的無端干預。他提出執政黨應該尊重創作自由的主張，認為黨非但不應該干預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而且應該尊重知識分子及其精神勞動的獨立性，保證創作自由和學術自由。

他把民主原則運用到自己身上，就是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十分大度地對待別人，即使對當面頂撞過他的人，和他激烈爭論過的人，他也從不記恨在心，打擊報復。趙紫陽也說過，和他爭論後不記仇。但是他對自己卻十分嚴格。他曾因廬山會議上批判過彭德懷，曾在中央會議上表決開除劉少奇黨籍時舉過手，一再表示他的內疚，一再認錯道歉。他還為自己檢討時傷了一些人，為項南的處理不當後悔不已。這就是胡耀邦對人寬、對己嚴的為人原則，就是民主原則在自己身上的光輝體現。

現在人們在議論，哪一段時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黃金時期。我認為，要說黃金時期，可能是胡耀邦、趙紫陽執政時期比較恰當。這段時間（胡耀邦上臺到趙紫陽下臺）雖然不太長，大約10年光景，1989年是個分界線，此後形勢就急轉直下。「其消極影響直到今天還依然在黨群關係、台海兩岸關係以至我國的對外關係中繼續存在。由於這一事件的影響，還使十三大開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以至造成在我國改革開放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種種社會弊端迅速滋生蔓

延，社會矛盾加劇，黨內外腐敗懲而不止、愈演愈烈的嚴重局面。」（趙紫陽 1997 月 9 日 12 日上書十五大中的話）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 10 年，即 1979～1989 年，是國內政治形勢比較好的 10 年，這段時間雖有曲折，受到清理精神污染、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干擾，但是總的看還是比較好的，是建國後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躍的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建國後最有威信的時期，也是中國人民心情特別舒暢的時期，也是 1949 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為輝煌的時期。那時大部分「階級鬥爭為綱」時期發生的冤假錯案獲得了平反；地富及其子女都不再受歧視，成了社員，能平等地做人；知識分子不再與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八大專政對象列在一起成為「臭老九」，恢復了名譽，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打倒」了的「走資派」又結合到了各級領導班子中。由於政策對頭，實行了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生產有了較快發展，生活有了改善，短缺經濟的狀況有了改變，憑票供應已一去不復返了。與此同時，綜合國力有所增強，國際地位也有了提高。國家顯得有朝氣，有活力。人民群眾和幹部的主僕關係開始重視。這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值得驕傲的時期。現在雖然多方努力，貧富懸殊、幹部腐敗、社會治安不良、群眾不滿、老百姓和政府部門對立、「三信危機」嚴重存在等狀況依然如故，真可說是民怨蜂起、民主倒退、專制回潮、民心渙散。任仲夷在 2004 年所說：「八十年代，報紙傳媒還是活躍開放的，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這樣敏感，是可以公開討論的，經常能看到和聽到不同的聲音。而現在，只要有一點出格的言論，就禁書、封報、攔網。」這是十分中肯的話。

二. 我對胡耀邦的總體評價：他的功勞、業績及其人格魅力

關於對胡耀邦的評論，包括胡耀邦的歷史功績及其缺點毛病，我在

《中華成功者雜誌》2001年8月號上發表的《耀邦同志永遠活在人民心中》一文中，談了自己的看法。文章是這樣寫的：

第一，他是長征路上的「紅小鬼」，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有過重要貢獻的老紅軍、老幹部、老革命。他1930年（15歲）在湖南瀏陽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轉為中共黨員，在革命根據地先後擔任過反帝總同盟青年部長、宣傳部長，共青團蘇區中央局秘書長。1934年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時期，先後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抗日戰爭後，歷任冀察遼軍區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第三縱隊政委，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他在解放後，任中共川北區黨委書記兼行署主任，1952年任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1957年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在川I北時工作大膽潑辣，雷厲風行，頗獲好評。他是有名氣的演說家、鼓動家。在團中央時，能根據青年的特點進行工作，成績卓著，頗得青年團幹部的喜愛和社會各界的好評。

第二，他是意志堅強，凜然正氣，反對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鐵骨錚錚的硬漢子。「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關牛棚，遊街示眾，受盡各種侮辱。他是「四人幫」不共戴天的仇人，江青對其恨之入骨。當別的幹部已經參加「三結合」時，他仍長期靠邊站。

第三，他是主持正義、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否定「兩個凡是」的積極分子。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12月18日至22日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耀邦站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和廣大幹部這一邊，正氣昂然，挺身而出，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堅定地批判了當時擔任黨主席的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按既定方針辦」的錯誤方針，主張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东思想的科學體系，使華國鋒原定的純粹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變為糾正「左」的錯誤、撥亂反正的會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它摒棄了長期執行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實現了全黨工作著重點的轉移。

第四，他是肯定鄧小平工作成績、為其復出排除障礙，撥亂反正，

干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急先鋒。他組織和推動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重新確立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做了準備。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他以非凡的膽略和勇氣，衝破重重阻力，組織和領導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王作。他與其他領導人一起，肯定了 1975 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所取得的成績，並否定了 1976 年 4 月 5 日「天安門事件」的所謂「反革命」性質，他糾正了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同志等所作的錯誤結論，他先後平反了所謂「二月逆流」、「武漢「七二。」事件」、「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楊余傅事件」、「新疆叛徒集團」、「東北反黨集團」、「三家村」、「習仲勳「反黨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地方民族王義」等冤假錯案，為瞿秋白、鄧子恢、彭德懷、陶鑄、李維漢、譚震林、羅瑞卿、黃克誠、陸定一、楊尚昆、曾三、馬明方等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他又為劉少奇平反昭雪，推倒了強加於劉少奇及受劉少奇一案牽連的一大批黨政領導幹部的污蔑不實之詞。他還十分關心群眾中的冤假錯案。只要是他經手的，都組織專人在複查的基礎上，作出正確的結論。有的人在「四人幫」、華國鋒時期被多次判為死刑而尚未執行的冤案，也終於得到了澄清，作了改正。他的看法是，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第五，他是忠心耿耿、一心為黨、積極工作的「工作狂」和「老黃牛」。1975 年恢復工作後，他曾任中國科學院黨組織領導人。1977 年 3 月起先後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他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紀委第三書記，隨後兼任中宣部部長、中央秘書長。儘管每處工作時間不太長，但是「走一處，亮一處」，成績卓著，有口皆碑。他主持制定了農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參與制定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推動了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改革，擴大了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

第六，他是一個憂國憂民、勇挑重擔、具有崇高革命精神和革命情

操的革命家。他在位期間，積極推進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主張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促進改革開放和特區建設事業。他與人民同命運，共呼吸，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重視人才，重視科教文衛和新聞工作，主持制定了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和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他深入農村，深入基層，走訪了1000多個縣，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訪貧問苦。即使寒冬臘月，甚至過春節，也仍然在貧困山區慰問調查，為這些地區脱貧致富出謀獻策。

第七，他是勤奮好學、思想比較開放、不唯書、不唯上、光明正大、剛正不阿、直來直去、不隱瞞自己觀點的「直腸人」。他不吹牛拍馬、投人所好，並能以身作則，主動提出結束領導職務終身制，包括鄧小平和他自己。這反映了他以革命事業為重，黨的利益第一、個人利益第二的高尚情懷。他渴求知識，勤於思考，廣讀馬列的書及古今中外名著。他重視知識，喜歡與知識分子交朋友。

第八，他是克己奉公、遵紀守法、清正廉明的「清官」。他在位期間，有失誤，有錯誤，但在群眾中沒有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等一類醜惡行為的反映。他本人生活簡樸，十分節儉。他對子女要求嚴格，不求他們「仕途」上高攀，「商場」上致富，子女本身也比較爭氣、本分。有材料説，胡耀邦當了總書記後，湖南瀏陽老家的所有親人沒有一個被轉了戶口和安排城市工作，繼續做普通農民。他哥胡耀福的兒子胡德資已進國營企業當工人，胡耀邦得知後戶口仍退回農村。

第九，他是襟懷坦白，勇於承擔責任，富有自我批評精神的正派人。他不文過飾非，凡自己説錯的話，做錯的事，他都能勇於承認錯誤。他不承認自己是「聖人」、「完人」，他説自己的缺點、毛病多得很。他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會上對自己擔任黨的主席（總書記）一事，曾説：「有兩條並沒有變：一是革命家的作用沒有變，二是我的水平也沒有變。……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的胡耀邦。」這説明他有謙虛精神和有自知之明。

第十，他是被黨內保守勢力明槍暗箭擊中的雄鷹。從鄧與胡的關係

上講，胡耀邦解放後一直在鄧小平的麾下任職，也頗得鄧的信任，他們的關係應該說是可以的。鄧小平選中胡耀邦、趙紫陽、萬里三人分別擔任總書記、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職務則可見一斑。鄧小平選擇胡耀邦為總書記，這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也反映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心願。但是怎麼會在後來以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義，通過黨內過民主生活的方式寸巴胡耀邦趕下臺，其中的「學問」很多人是不清楚的。是不是由於黨內保守勢力的壓力？是不是胡耀邦的民主思想和開放思想以及某些問題上得罪了其他革命老人？為什麼鄧小平最後又犧牲胡耀邦？李銳在《懷念耀邦》（第4集）一書中寫的懷念胡耀邦的文章有所披露，不妨一讀。

第十一，他是功過沒有得到正確評價、是非沒有得到澄清、蓋棺沒有論定的被冤屈的改革家。胡耀邦懷有自由民主理想，為中國的改革、進步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他為完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促進民族團結、繁榮民族經濟文化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推動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實現領導班子年輕化，改善黨的領導，調整新時期的對外政策上傾注了大量心血。他被逼下臺後，心境當然是不好的。這不是由於他把「做官」看作生活的寄託，而是由於功過難辨、是非不明，思想上有委屈、有壓力。現在他已離開人世，黨中央對他擔任中央領導職務期間的功績作了某些肯定；但是總的來說，迫使他下臺的真正原因，人民群眾並不清楚，還沒有一個以理服人的「說法」。有人說是鄧小平屈服於黨內保守派的壓力，出於政治平衡的考慮才出此下策的。實際上胡耀邦得到的是一個沒有最後結論的「結論」。正因為這樣，人心不服，他本人在九泉之下也是很難瞑目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對胡耀邦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估計肯定的成分會愈來愈多。他應該由黨中央重新作出正確的結論。

第十二，他是稱職的、人民懷念的共產黨的好領導和對中國改革開放有重大貢獻的熱血男兒。有人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絕大多數沒有好下場，十個有九個沒有好的評價，只有毛澤東是例外。至於對胡耀

邦的評價，鄧小平、過去的黨中央可能是一種看法，人民群眾可能是另一種看法。無數事實證明，凡是違背歷史事實的，違背人民群眾意願的，最終還是要改正的。過去中央說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最後改正了。過去中央說，有「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司令部」，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黑後臺」，也被否定了。這類例子不勝枚舉。過去中央說胡耀邦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將來一定能站得住腳嗎？儘管胡耀邦有缺點、有錯誤，但是總的來看，他還是稱職的總書記。他在職期間，成績是明顯的，貢獻是巨大的。正因為這樣，他自然而然地受到人民的尊敬。

綜上所述，說胡耀邦是中國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是一點也不過分的。簡要地說，他對中國政治改革的貢獻表現在：主持平反，主持並推動思想解放運動，推動新聞改革和言論自由，對知識分子、大學生的寬容和保護，政治上、個人進退上的大公無私，重視國際經驗、吸收全人類的優秀成果，推進中國的全面改革，開明正派、廉潔自律等各個方面。所有這些，都值得肯定並應廣泛宣傳。

當然胡耀邦也有一些缺點、錯誤，儘管在當時幾乎人人難免。他自己說過：「有兩件事是難以原諒自己的，提高來看，也是做人道德的問題。」《百年潮》雜誌載有朱尚同一文（2000 年 1 月 27 日《深圳特區報》曾轉載），詳細地談到了這一問題，現摘錄如下：

當時任湖南教育廳長的朱尚同最近回憶起他與胡耀邦同志的一次談話。那是 1988 年冬，朱尚同在談到農村教育時說，上面熱衷於加快九年制義務教育進度，下面就報假數字對付檢查。可見講真話也真不容易。對此，耀邦同志深有感慨地說，我也講過違心的話。

耀邦同志說，我這個人做過些工作，也犯過錯誤，就不說了。但回顧一生，有兩件事是難以原諒自己的，提高來看，也是做人道德的問題。一件是 1959 年廬山會議批判彭老總，我明知彭老總是對的，心理很矛盾，但因為相信中央，也舉了手。

第二件是 1968 年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大多數中央委員都被打倒了，為了湊足到會人數，我被匆忙解放出來，出席會議，一看到說少奇同志

是「內奸」的材料，根據我的政治經驗，就知道是不可靠的，這時我已經並不以為上邏說的一定正確了，而是抱著夫復何言和不得已的態度，勉強舉了手。會議公報雖然說是「一致通過」，但是就有那麼一個老大姐，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沒有舉手，這就是陳少敏同志。在表決前，她說自己心臟病又犯了，伏在桌上，拒絕舉手，真是難能可貴。耀邦又說，為什麼那麼多人不得不舉手，這當然是由於長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見，加上「四人幫」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壓手段，使黨內普遍形成一種奴化思想意識的結果。我們黨由於沒有擺脫封建主義的影響，有相當一段時期，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見，不能保護持不同意見的同志，甚至有的自然科學專家，因為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水庫，持不同意見，而被劃了右派，政治上的右派呵！我過去講過，也是從馬列著作看來的，在奴隸社會中，大多數人是「奴隸」，極少數是「奴隸主」，也有少數「奴才」。過去到現在，這種奴化思想都是有的，程度不同而已。

總之，胡耀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做出這兩件事，完全可以理解。可能很多高層領導，違心的事、違心的話，比胡耀邦做得更多。至於一般幹部、一般老百姓，更不能責怪了。作為理論教員，今天批判彭德懷，明天又為彭德懷平反叫好；今天批判馬寅初、孫冶方，明天又為馬寅初、孫冶方鳴冤，這都是常有的事。這說明中國缺乏民主制度，大家不敢說真話，提異議。怕的是「大禍臨頭」、殺頭坐牢，甚至株連九族。胡耀邦的正氣、廉潔、開明等，得到了國內無數百姓及知識分子的擁戴。有人說，他是中國共產黨內懷抱自由民主理想、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作出重大貢獻的政治明星。他的死亡是星辰的隕落。有人說，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最後一個企圖醫治自身專制腐敗的理想主義者。正因為這樣，他被保守勢力加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被趕出權力圈子而飲恨終身。當然他在領導崗位時，也有缺點和弱點、失敗和錯誤，對此人們也有客觀的批評。他下臺時的「檢討」，傷害了一些好人。他政治上陷入理想主義，從不設防。他對中國的政治缺乏精心的分析，對處理高層人

際關係不夠經心。在處理若干重大問題上他不夠慎重，線條較粗，不夠注意實際後果。當然，存在他身上的名義上的第一號人物與實際情況（不是一號人物）之間的矛盾，也使得他處境困難，講話不靈，某種情況可以說無權。

三. 繼承胡耀邦遺志，繼續把中國的民主化事業推向前進

我們今天緬懷胡耀邦，最好的辦法，是繼承他的遺志，把他一直關心和宣導的民主化事業推向前進，把中國實現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政治改革推向一個新階段。

我認為，實施憲政，建立民主政治，實現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標，也是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和歷史趨勢。

有沒有民主，這個問題對中國人民實在是太重要了。為了獲得民主，中國革命的先驅和中國人民曾經前仆後繼，英勇犧牲，奮鬥了幾輩子人。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就曾在政治上提出開國會、改立憲、定法律制度、允許人民上書談論政事、裁汰冗官冗員等。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就曾提出民權主義的理論綱領，主張建立民主政治；他說的「民權」，就是人民管理政事，他說的「民權革命」，就是人民起來同皇帝作鬥爭。他十分推崇西方國家人民獲得的選舉、罷官、創制和複決四大民權。從20年代到40年代，中國共產黨人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綱領，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奮鬥目標。毛澤東在1940年1月寫的《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一文中，曾明確提出「革新內政，開展憲政運動，樹立民主政治」的主張，並認為憲政就是民主政治，「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缺少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他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系統地提出了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設想，認為新中國的國體應該是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建國

前夕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 1954 年制定的第一部憲法，都是為了實現人民民主的理想。現在中國人民日夜盼望的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只有經濟上富強，而沒有政治上民主、精神上文明，仍然說不上是完整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不能離開政治民主化孤立地搞經濟現代化，也不能認為經濟現代化可以早於政治現代化。政治民主與經濟繁榮應該同步發展，政治民主決不能滯後於經濟發展。

民主從相對於經濟基礎來說可以說是手段，但從根本上來說則是目的。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民主成為一種社會理想，成為一定的社會集團追求的目標和行動目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就是實現人民民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列寧說：「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列寧全集》第 2 版，第 28 卷。第 168 頁）因此，「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列寧全集》第 2 版，第 28 卷，第 168 頁）鄧小平也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168 頁）實現人民民主，建立民主政治，實施憲政，實現政治現代化，乃是中國人民長期奮鬥的目標。《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是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靠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來保證和支持。中共十三大更明確指出，「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設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本人認為，從民主的一般意義上來講，它內含著每個人的固有權力，應該說這是民主的本質屬性。

實施民主政治，是今日全球的總趨勢。不論處於地球哪一端，都趨向於政治、經濟、文化的開放性和多元性。一個明智的政治家不會不搞政治改革，也不會忽視黨內思想派別的客觀存在，更不會動用國家機器，採取「專政」辦法消滅政治異見者。在台灣，統治者尚知吸取教訓，面對歷史上的慘敗與大陸和平統一祖國的呼聲，勵精圖治，並適應人民的

民主要求，解嚴開禁，允許多黨競爭，而不敢重蹈歷史覆轍，不敢實施專制獨裁統治。中國內地已今非昔比，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已日益增強，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更臻成熟。只要今日執政黨的當權領導人，能拋棄個人的權位觀念和私心雜念，順應歷史潮流，做到民意至上，那麼，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實行民主政治，是大有希望的。

誠然，由於中國的歷史特點和文化傳統，實現民主政治不可能一蹴而就。由於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使得不少人寄希望於「君主賢明」、「皇恩浩蕩」，而缺乏主人翁的思想。也由於封建文化長期的冰封澱積和「文化大革命」動亂所帶來的影響，使得中國部分人的苟安心理特別嚴重，不願承擔因推進改革而引發的任何風險。所以，改革必須有步驟、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不過，有一種看法也是錯誤的：認為中國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不夠充分，群眾覺悟及訓練不足，公民意識沒有建立，一旦實行民主，國內必然大亂。並以「穩定大局」為藉口，壓制民主，否定當前大力推行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性與迫切性，以有限的村民政治和基層選舉點綴門面，盡力回避和拖延中央、省、地、縣各級以及某些主要機構的民主選舉、民王進程。民主選舉只能從村開始試點而不能從中央開始實行，這種思路使人們有權懷疑某些上層人士是在做戲給老百姓看，而不是真心要在中國實行民主，讓人民獲得真正的民主權利。也有人把13億中國人看作阿斗，認為他們根本沒有民主要求，根本不想實行民主政治，而只有自己或某些上層人物才是救世主，才能拯救萬民於水火。這是對民眾心理的歪曲. 我們要克服各種阻力，防止裹足不前，防止所謂「慢慢來」，無所作為。要反對以維護「安定團結」為名，以保持「社會穩定」為藉口，保護舊的已經過時的政治體制，取消政治民主化行動，取消政治改革，對實施民主政治製造各種障礙，違背時代潮流，把歷史拉向後退。「慢慢來」的思想，是要人民不要在實踐中學習民王，增強民主意識，增加實際政治鍛煉的機會，而要消磨人民的鬥爭意志，放棄民主權利，淡化政治意識，更便於他們進行統治。

正確處理民主與法制的關係、人治與法治的關係，也是實施民主政

治的關鍵問題。民主要靠「法制」去保障，沒有「法制」，就等於沒有法律依據，民主成了各人可以隨心所欲、任意解釋、沒有準繩的東西，因而最終使民主成為一句空話。所以法制是民主的必要前提。法制的完備標誌著民主的發展和成熟。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就必須加強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鄧小平說，法制不完備，往往會把領導人說的話當成法。而健全的法制，則首先又要有真正的民主權利才能確立：法制必須以民主為基礎、為內容，沒有民主就不會有健全的法制。當人民大眾沒有民主權利時，要從法制的層次尋求中國改革的出路，是枉費心機的。人民沒有民主，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不能說想說的話，不能做想做的事，只能秉承上峰的旨意，看著別人的臉色行事，那麼這種情況下所制訂的法律，包括政黨法、新聞法等等，也只能是官樣文章。它所反映的只能是「官方」的旨意。其目的是服務於官僚階層的統治，既體現不了「民意」，更做不到「順乎民心」、「順從民意」和「民意至上」。沒有真正的、充分的民主，也就沒有正確的法制，當然也就說不上有合理的、有效的法治。即使有了「法制」、「法治」，也是為官僚階級統治服務的、鎮壓群眾的「嚴刑峻法」，而不是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法制」、「法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國民黨制訂的《六法全書》，不能說不詳盡、不完備，但是它所反映的乃是統治階級的旨意，其目的是鞏固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其中不少條文是針對民眾的「造反」行動的。它規定的「顛覆政府」罪，說穿了就是要求勞苦大眾老老實實、服服帖帖地任其剝削、壓迫和奴役。

中國是一個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因此要特別注意民主政治文化觀念的培養。對封建主義的傳統文化要進行批判，肅清封建主義的影響。要讓人民群眾瞭解，「清君」、「賢臣」都不是救世主，只有自己才是歷史的主人。只有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拯救自己。對資本主義的政治文化要科學地看待，有的地方要批判和摒棄，有的地方要借鑒和參考。對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的政治文化，要瞭解其歷史背景和曾經起過的正反兩方面的作用，對其歷史上的錯誤應注意避免，對其歷史上的教訓要認真吸

取，對其不正確的理論、觀點及不良影響，則必須進行批判和肅清。

四. 關於民主政治的通行規則

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人們習慣的思維方式是，對任何一件事物都得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即是資產階級的還是無產階級的，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如是前者，就堅決反對、拋棄；如是後者，就堅決堅持、發揚。如果不這樣做，那就是不問政治、不搞政治掛帥，成了「只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的「糊塗蛋」。但是事物又往往並非如此簡單，萬事萬物並非都可以用非此即彼來做判斷，即用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加以定性，加以概括。有些東西，它既不是資產階級的，也不是無產階級的。例如鐵路，能說它是無產階級的還是資產階級的？鐵路就是鐵路，它本身不具有階級性。正因為如此，無產階級在革命以後，還是要利用鐵路作為交通工具，而不是因為它曾經存在於舊社會，為資產階級服過務，就把鐵路拆掉、廢棄。在經濟領域中也有這個問題，價值規律、商品、市場、利率、匯率等等。它本身不具有階級性，它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也可以為資產階級服務。如果把商品貨幣關係、市場經濟，看作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或者看作是壞西，要一律加以廢除，或者儘量縮小其範圍，那一定是「左」傾幼稚病。人們看到，有的國家的共產黨在掌權時，曾經幹過這種蠢事：廢除商品貨幣關係，恢復原始社會末期的物物交換。最後碰了壁，吃了大苦頭。對此，鄧小平是清醒的、明智的。他當人們對市場、對計劃是屬於資本主義性質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爭論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站出來說：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能以有無市場、有無計劃來區分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更不能說搞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正因為這樣，才會在以後的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大

報告中，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正確思想。

誰都知道，外語名詞中有的屬陰性，有的屬陽性，有的既非陽性、也非陰性，而是中性。在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的東西既不是資產階級的，也不是無產階級的，它不具有階級屬性，它作為事物本身，既不姓「資」，也不姓「社」，資產階級可以利用，無產階級也可以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利用，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利用。如飛機、大炮、原子彈、電腦等等，本身不具有階級性，不能說有資產階級的飛機、無產階級的原子彈等等，只是利用這些東西有階級背景，有時它掌握在某一階級手裏，為某一階級服務。又如計劃、市場、商品、貨幣、價格、價值規律、經濟競爭等等，同樣也是這個道理，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可以利用。人們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不意味著人們把市場經濟分為姓「社」的和姓「資」的，這只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的簡稱。再如社會現象中的婚姻、戀愛、家庭、母愛等，也不是某一階級所特有，其他階級就不存在。有人說市場經濟是屬於中性的東西，也是指的這個意思，它既可以為資產階級所利用，也可以為無產階級所利用，而不屬於某一階級的專利。把「市場經濟」看作洪水猛獸是沒有必要的，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貶義詞也是不對的。

要搞市場經濟，就有超越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一般。這就是說，不論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還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作為市場經濟，其運行規則上是相通的和相似的。正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相似。」（詳見馬洪主編：《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一般包括很多內容，主要有：個人和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競爭；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及其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配置的調節；按商品價值及市場供求關係形成的商品價格；發達的商品貨幣關係及相應產生的一系列經濟範疇、經濟杠杆；物質利益原則及利潤原則；現代企業的充分自主權；國際經濟關係的發展及國際市場的形成，國際經濟慣例的發生，為保證市場經濟正常運轉

所需要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等。只要搞市場經濟，不管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這些東西都不能回避，都必然存在，且會長足地發揮其作用。

馬洪主編的《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書認為市場經濟的共性是：(1) 承認個人和企業等市場主體的獨立性，它們自主地做出經濟決策並承擔相應的經濟風險。(2) 建立起具有競爭性的市場體系，由市場形成價格，保證各種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由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3) 建立起有效的宏觀調控機制，以導向和監控市場運行並彌補市場經濟本身的弱點和缺陷。(4) 必須有完備的經濟法規，保證經濟運行的法制化。(5) 要遵守國際經濟交往中通行的規則和慣例。

要搞民主政治，也有超越於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政治一般。這就是說，不管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還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只要是實行民主政治，就必須遵循民主政治的通行規則。民主政治一般，或民主政治規則的通行，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多黨制或一黨多派制。民主政治是眾多政黨競爭的政治，它不是某一政黨的壟斷政治，更不是獨裁者統治的寡頭政治。在實行民主政治的社會中，所有政黨都必須一律平等、獨立自主。而不是一個政黨領導其他政黨，存在著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它們雖然經常對立，但都平等地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進行活動，為民主政體產生的法治（包括憲法、政黨法）所統一和制約。在這裏，不同的政黨不僅僅表現為不同的政治綱領、政治主張，也不僅僅是本階層、本集團利益的代表者，它還有分享社會權力和相互監督、相互制衡的至為重要的作用。

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從代表的根本利益上看沒有什麼大的區別。在對外關係上，往往是驚人的一致。但在野黨在兩院議會中卻發揮著強大的制衡作用。這使得不管是共和黨掌權還是民主黨掌權，不管是誰在朝、誰在野，都不能胡作非為。這種運作方式，使得美國不可能發生像中國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那樣，把55萬知識分子打入地獄，造成震驚中外的災難性後果；也不可能發生像中國這種持續10年之久的屬於內亂性

質的「文化大革命」。即使在當時有在位的、發了瘋的總統和執政黨想搞這種異想天開的、史無前例的「大動作」，但必然會遇到作為制衡力量的在野黨和新聞媒介的強烈反對而難於實現。所以毛澤東、鄧小平自己也承認這種悲劇事件在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

在實行民主政治的社會中，不但允許多黨制的存在，也允許同一政黨內不同思想派別的存在。黨內意見分歧是正常現象，意見「完全一致」才是假象。黨內民主保證了黨內政治異議者的合法地位和合法活動。日本自民黨能夠在國內穩固地統治幾十年（有時黨內不同派別輪流上臺），承認和允許黨內思想派別的存在是其重要原因。中國共產黨是有著 7000 萬黨員的大黨，在這樣大的政黨中，有不同聲音、不同見解是正常的，有不同思想派別存在也是可以理解的。列寧採取唯物主義的態度，容忍黨內思想派別的存在，並提倡對黨內、國內的大事、方針和政策展開討論。作為黨內主要領導成員，他和布哈林經常發生爭論，有時是布哈林接受了列寧的意見，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作了檢查，有時則是列寧接受了布哈林的正確意見，改正了自己的看法。只是到了斯大林階段，情況才發生了根本變化。斯大林不允許有黨內思想派別的存在，更不允許黨內有「反對派」的存在，甚至對「反對派」不惜採取肉體消滅的辦法。斯大林的做法，完全背離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則。

關於多黨制的問題，在中國屬於科學研究的「禁區」。有的人談虎色變，避之不及，以免觸犯「天條」，禍從天降。其實這個問題並不神秘。在理論上，馬克思早就說過共產黨並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一個特殊政黨。這說明他可以和其他工人政黨聯合。在實踐中，蘇聯 1922 年以前也是多黨制，只是以後才由多黨制變為一黨制。蘇聯經歷的道路是：多黨制（1922 年底以前）——一黨制（1923 年—1990 年蘇聯解體前）——多黨制（今日的獨聯體各國）。布哈林曾經是 1936 年 12 月頒佈實行的《斯大林憲法》的主要起草人。在這部《憲法》中，採用了普通的平等的普選權，確立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目的是「為了把國家從一黨專制制度和平過渡到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伯里斯・居

古拉也夫:《權力與蘇聯上層人物》)。在起草憲法的過程中,布哈林還支持過應由候選人進行競選的主張。這一主張是由高爾基、巴甫洛夫等人提出的。高爾基認為,為了充分地發揚民主,廢止一黨制,可以考慮把知識分子聯合成一個單獨的「第二政黨」,同共產黨人競選。布哈林贊同這種設想,他說:「某種第二黨是必要的。如果只有一個候選人名單,沒有競選,這就和納粹主義一樣了。為了在俄國人和西方人的眼裏使我們和他們有區別,我們建立有兩個候選人名單的選舉制度,作為一黨制的對立物。」建立第二政黨或實行競選的制度,主要目的在於改變一黨制的局面。這些建議當然不可能被獨裁的斯大林採納。

第二,實行直接選舉制(包括差額選舉、競選執政)或代議制。選舉制是一個國家民主程度的晴雨錶,較集中地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民主狀況和水平。選舉制發展到今E1,已完善為普選制、任期制、監督制、彈劾罷免制四大環節。在實行民主制的國家中,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要經過民主選舉。有的是直接選舉,有的是間接選舉,決不允許由某一權威人物欽定。選舉制特別是普選制,較之封建世襲制,是一大歷史進步。

由於現代社會的規模和複雜情況,決定了選民不可能在任何情況下都能進行直接選舉和直接管理國家。因此必須通過由民主選舉產生並向選民負責的一定數量的代表,來代表他們做出決策和對國家事務進行管理。這就是代議制民主。代議制是民主制國家較多採用的形式,其特點是:由選民選出的代表组成國家權力機關或立法機關,然後由他們產生國家的行政、司法機關;代表機關(權力機關)行使立法權和對行政、司法的監督權;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具體負責國家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並向代表機關負責;代表機關向選民負責。

代議制在中國的形式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機關作為國家的權力機構,它代表的是人民的權力,選舉國家主席,決定國務院總理。它不僅直接行使立法權,而且產生並監督國家的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在人民代表最高權力機構的支配下,根本不應存在和它的權力相等的權力實體。但是在中國由於當前的問題是黨政沒有分開,中國共產黨的政

治局常委會也成了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由於黨領導一切，因此全國人代會這一最高權力機構又必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領導下進行工作。這樣一來，它的「最高」實際是「次高」，有時恐怕連「次高」也說不上。

代議制在西方國家是議會制。議員中大多數人是資產階級的代表，表面上是將國民的意志提升成法律，而實際上是將資產階級的法律提升為國民的普遍意志。它不是國民的統治，而是國民受人統治。但是我們應該看到，西方國家由於議會議員是由選舉產生的，且權力互相監督，互相制約，又實行新聞自由，所以資產階級內部有充分的民主保證，這就減少了國家決策上的失誤，避免了工作走向極端。西方議會制度也防止了個人迷信、高度集權、專制獨裁、寡頭政治的形成。中國不會照搬西方的議會制度，但確有必要借鑒西方議會制度運作的經驗，改善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防止類似反右派運動及「文化大革命」的再度發生。西方國家的議會制，是民主政治的形式之一，不能一概否定。實際上，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在研究了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是可以學的。

第三，三權分立，權力制衡。三權分立是資產階級總結長期統治經驗所得出的重要結論。早在 18 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等認為權力是一種腐蝕劑，不受制約的權力會產生腐敗，絕對地不受制約，則絕對地產生腐敗。孟德斯鳩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英國 19 世紀著名歷史學家阿克頓也說：「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執政者的腐敗。」在他們看來，實行權力制衡，建立權力制約、監督機制，可以防止封建皇權的復辟，可以避免專制獨裁、寡頭政治的產生，可以協調資產階級的內部關係，可以廣泛發揚資產階級民主，可以減少工作失誤，可以降低和杜絕腐敗現象的發生，等等。當然，「三權分立」也有它的不足之處，各方面、各部門往往互相掣肘，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增加了摩擦，降低了工作效率。但是總的看，「三權分立」利大於弊，特別是它相

對於「三權合一」來說，確實比較優越。中國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也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在新的形勢下，這種黨政不分的一元化領導，已日益暴露其嚴重缺陷。正如鄧小平所說，有的人往往在「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使一切事情都得由黨組織及其負責人說了算。這種情況不利於人代會、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各在其位、各謀其職、各負其責，不利於權力制衡、互相監督，不利於克服「人治」和加強「法治」。因此在當今中國，有必要借鑒西方國家「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的經驗，吸取建國後「一元化領導」所帶來的不良後果的教訓，改革領導體制，完善領導方法，提高領導水準。社會主義國家同樣需要分權制衡。權力制衡的原則同樣不能違背。它可以防止濫用權力，防止腐敗，減少決策失誤，及時糾正已經犯的錯誤，使各部分權力能得到有效的調控和監督。權力制衡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

馬克思、恩格斯對巴黎公社的「議行合一」持肯定態度，因為它符合當時法國的國情及處在當時的戰爭情況下。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有將立法權與執行權分開的思想，這反映在他們參與制定的《共產主義同盟章程》中。章程規定代表大會是全盟的立法機關，中央委員會是全盟的權力執行機關。中央委員會得出席代表大會，但無權表決。這說明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不是本屆代表大會的代表，是執行機關，必須接受大會的監督和審查。在實踐中，前南斯拉夫也不是實行「議行合一」。這說明「議行合一」不是判斷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標準。

第四，少數服從多數。民主的原意是多數人的統治。民主政治的核心在於「人民的統治」，人民當家作主。但是人民是分屬於不同階級、不同階層和社會集團的，即使是同一階級、階層、社會集團，也有不同的願望、利益和要求，因此人民當家作主，只能以多數人的認識、選擇為前提。「人民的統治」，就是按照人民中的多數人的意志進行統治。少數服從多數，乃是民主政治的一項基本規定。中共黨內實行的「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的民工集中制原則，核心的一條是「少數服從多數」，其他三條都是從這一條派生出來

的。民主和集中嚴格說不是對立的統一，只有民主和專制、民主和獨裁才是對立的統一。「集中」是相對於分散而言的，它表明必須有統一的國家、統一的中心、統一的政策。「集中」是民主制的天然內容，它說的是在大眾民主討論的基礎上，按照多數人的意志進行集中，做出決定。現在有人對蘇聯、中國實行的民主集中制提出了質疑，認為現在的民主集中制，實際上是集中制，而不是民主制。這種民主集中制，不過是裝飾了的集中制，並不符合馬恩的原始思想。這個問題需要用心研究。

「少數服從多數」並不意味著多數對少數的專制和排斥。有時多數人做出的決定，也可能發生錯誤，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裏。如開除劉少奇的黨籍，確定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都是在黨的會議上經過多數人舉手通過的。但是實踐證明，這種「多數」並不正確，相反，持反對意見者卻掌握著真理。正因為這樣，保護少數成為絕對的必要。尊重和保護少數，也是民主制的有機構成部分。沒有少數服從多數，談不上起碼的真正的民主；沒有多數保護少數，也談不上完全的民主。二者的有機結合，才是民主制的完整含義。

發生多數人不掌握真理，而少數人卻掌握著真理這種情況，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認識的局限、覺悟的遲緩，可以使得多數人有時也會對事情做出錯誤的決斷，對人做出錯誤的處理。這種情況在蘇共、中共的歷史上均屢見不鮮。毛澤東、鄧小平本人就曾幾次經歷過。在特定情況下，或因個人迷信，或因屈服於某種壓力，或因其他各種原因，使得錯誤的決定在多數人「違心」的情況下獲得通過。這主要是在破壞民主、破壞法制的情況下發生的。要避免出現這種情況，只有依靠健全民主制度來解決。

第五，實行自由平等原則，保障各種自由。民主和自由往往是聯繫在一起的。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必然是既有民主，又有自由。自由也是民主的一種反映。例如新聞自由，可以使新聞媒介能夠披露社會上的各種腐敗現象，包括上層領導集團的以權謀私等等。這是一種輿論監督和社會監督。能夠做到這一點，說明這個國家還有一定程度的民主，而

不是完全實行專制。

中國憲法和其他很多國家的憲法一樣，都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各種自由。應該說，這些規定是真的，是準備付諸實施的。現在的問題在於：如何把這些紙上的東西變成現實的東西，變成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讓人民得到真正的實惠。現在有人提出，國有企業產權不清晰，「全民所有」實際上是人人有、人人都沒有。筆者認為，中國既存在經濟上的「產權不清晰」，也存在政治上的「民權不清晰」，即存在人民民主權利的不清晰。口頭上說是人民當家作主，實際上是人民既當不了家，也作不了主。試問：中國的子民能有真正的議政、參政的條件嗎？能對國家的領導人做出選擇嗎？能對國家的方針大策施加任何影響嗎？企業的工人能對企業的產供銷、人財物做出實質性的決定嗎？所以，在中國談自由、民主，首要的問題是解決「民權清晰」的問題，落實憲法、讓憲法到位的問題。

第六，實行嚴格的法制和法治。民主靠法制來貫徹，來保證。二者相輔相成，沒有健全的法制，民主成了一句空話。無產階級需要民主，也需要法制。社會主義的法制是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服務的，專制政治體制下的法制是為封建專制、獨裁政治服務的。

法制原則要求人民行使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權力；因此，這種權力必須法律化、制度化。這是民主政治的一般要求，是人民民主的法律保障。法制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守法、護法等內容在內的法律制度體系。

法制的核心是法治。它把公民的普通意志上升為國家的意志和法律，而國家和公民則依據法律行使對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權力，不允許任何人（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有凌駕於法律之上、享有法外特權的權利。法治意味著人民對國家領導人有選舉權和罷免權，有立法權，有對政府的監督、制約權。倡導法治的人，就是法治論者，一般也是民主政治論者。只有君主、貴族、某些高官政要及其它一切法外特權的享有者，才喜歡「人治」，倡導「人治」，而反對「法治」。

要擺正黨權和法制權力的關係。中國共產黨強調「黨領導一切」，並且長期黨國不分、黨政不分，以黨代國，以黨代政，這在實質上是「黨治」，而不是「法治」；因而最高權力是共產黨，而不是憲法；最高權力機關是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而不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七，人民參政議政。公民不但有權選舉自己的代表（人民代表、議員）參加議政參政，而且有權在法律範圍內，直接地、廣泛地、自由地瞭解和議論國家的一切政治事務。應讓每個公民和國家直接對話，表達民意，議論國事，參與決策，實施監督，使國家政治生活成為每個公民的現實生活的重要內容。人民參政議政的前提是政治民主和政治自由，國家事務公開化，具有透明度。這就要求消除國家權力的神秘化以及公民對國家權力的盲目崇拜。

在人民參政、議政的條件下，人民有了選舉權、罷免權、質詢權、監督權、決策權，政府官員又有任期制、考試制、監察制、審計制等制約，這就有可能防止政府官員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

民主測驗、民意調查、全民公決，是民主政治體制下人民參政議政的有力工具。它對國家、社會瞭解民情、順從民意、科學決策起著重要的作用。

第八，軍隊國家化。軍隊是國家機器的主要組成部分，其任務是保衛國家安全，維護領土完整，反對外來侵略。它不應受任何政黨的領導，服從政黨的指揮。它不介入黨派鬥爭及黨內鬥爭。當前很多國家由文官控制軍隊，國防部長由文官擔任。

「黨指揮槍」是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曾經在歷史上起過積極的、進步的作用。在今天，國家政權屬於公共權力，軍隊是國家的核心力量之一，國家理應掌握和指揮軍隊。因此，中國軍隊舊的領導體制應逐步改變。

第九，自治制，包括民族區域自治和群眾自治。

以上各項，就是民主政治一般的規定性。它所要求的各項原則，作為工具、方法、途徑，資產階級可以利用，無產階級也可以利用；資本

主義國家可以利用，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利用。利用它的人，當然有階級背景；利用它所要達到的目的，當然也會有所不同。但肯定一切多黨制、議會制、普選制等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無產階級必須拒之於門外，這是一種偏見。同樣，把一黨制、欽定制、終身制、傳位制看作是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固有屬性，也是一種偏見。一黨制，可以是共產黨領導的一黨制，也可以是資產階級、法西斯政黨領導的一黨制。多黨制，可以是勞動人民內部的多黨制，也可以是資產階級內部的多黨制。議會制的情況也是這樣：有資產階級的議會制，有勞動人民的議會制。說到底，這些都是形式和手段，目的是要搞民主政治，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怎樣有利於民主政治建設、怎樣有利於人民民主，就應該怎樣辦。以「一黨」還是「多黨」、是議會制還是非議會制、是普選制還是委任制來區分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是不科學的。可以這樣說，在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的今天，要搞民主政治，卻想全部拋棄多黨制、議會制、普選制、權力制衡制、自由權利和法制，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在現階段，恰當地利用勞動人民內部的多黨制、議會制等形式，廣泛發揚民主，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把多黨制、議會制、普選制看作西方資產階級的專利，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完全不能利用、不能染指，這未必就是正確的。當然，我們並不排斥：為建立民主政治，將來會有比多黨制、議會制更優越、更高明、更能發揚人民民主的東西（形式、方法或制度等）出現，到那時，多黨制、議會制又可能落後了，過時了，必須代之以更高級的形式。但是在目前，多黨制、議會制、普選制中某些科學的成分、合理的方法還是必須加以利用的東西。它雖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產物，但對我們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卻有借鑒、參考的意義。正像資產階級為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提出的平等、自由、博愛、人權，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在今天對我們仍有可資利用的積極作用一樣，我們仍然要用真的平等、自由代替假的平等、自由，用大多數人的平等、自由代替少數人的平等、自由。

有一種觀點認為，對中國的老百姓來說，最迫切需要的是穩定和經

濟發展，而不是民主政治建設；只要政府能保持穩定並在穩定的基礎上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這個政權就能取得人民的支持。所以經濟自由和政治專制可以有機融合，並行不悖。中國需要走這一條路，必須暫時犧牲民主而成全經濟發展，必須實行專制統治來實現經濟的增長，至於民主的事現在還提不到日程上來。這是一種危險的想法。專制可以實現經濟的增長，民主反會促使經濟倒退，那麼世界各國都可以用這個「法寶」來達到經濟的增長了，世界的發展趨勢就應該是獨裁專制而不是民主政治了。中國這30年經濟發展較快，能歸功於專制政治嗎？一切有頭腦的人都會進行分析。

有人認為，中國需要像毛澤東、鄧小平這樣的強人政治，實行新權威主義，或者一定程度的獨裁統治。這種獨裁統治是在沒有公眾參與的情況下，通過自上而下的組織管道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在他們看來，這一道路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吻合，也與中國的歷史特點相一致。這實際上是傑出人物統治論與專家統治論的看法。他們認為，在工業化的早期和中期階段，經濟增長只有在獨裁政治中才能完成，新加坡、韓國、日本、台灣的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日本18世紀晚期的明治維新，就是在「不民主」的條件下或者說在政治獨裁的條件下才取得成功的。中國要取得政治改革的成功，不能學西方的多黨制、議會制的辦法，不能在競爭中、吵吵嚷嚷中進行。中國應該學習新加坡、日本的經驗，即經濟上民主、政治上保守或者獨裁，實行新權威主義，一切都自上而下，權威人物說了算。這與中國儒教傳統中的開明觀念相吻合。他們認為，只要中國有了開明的「君主」、開明的政府、開明的政策，一切問題都好辦，這比西方的多黨制、議會制、普選制，要實惠得多，也實際得多。

作為一種學術觀點，上述看法可以討論。從短期看，從權宜之計看，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是從長期看，從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要求上看，獨裁政治論、強權政治論、集權專制論，不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我們的根本目標是要建立民主政治，是要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不是只要求一個「新皇上」，只要求一個「開明」政府。當然，老百姓包括學生在受到政

府的鎮壓之後，可能會對自己前期的民主行動感到失望，失去興趣，產生漠視政治、淡化政治的情況，但這並不說明老百姓對民主政治已經沒有要求，贊成獨裁專制制度。中國民眾希望出現的是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的局面，而不是經濟市場化、政治獨裁化的局面，依賴的是民主政治，而不是依仗於專制統治。市場經濟即經濟市場化、經濟自由化只與民主政治相適應，而與專制政治、政治專制主義相排斥。

其實，新權威主義理論是一種根本站不住腳的理論。如果說，藉口多黨制、議會制、普選制等等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因而社會主義根本不能採用，那麼，一黨制就是社會主義的東西，而必須採用的了。事實上，希特勒、墨索里尼在二戰時期就是搞的一黨制。毛澤東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可見毛澤東也承認「一黨制」就是封建社會的「皇黨制」，即只允許擁護皇帝的那一幫派存在，其他就格殺勿論，所以「慈禧黨」也必須消滅「光緒黨」，哪怕母子、姑侄也不行。此外，欽定制和等級制等這些純粹封建主義的東西，社會主義也一定要採用嗎？既然不能退回到總比封建主義先進的資本主義，就一定要退回到遠比資本主義還要落後很多的封建主義嗎？這是科學還是反科學，是進步還是落後甚至反動，不是一目了然、昭然若揭了嗎？我們並不主張一切照搬資本主義的民主制，而是要利用、改造、擴大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民主形式，使之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制。例如，資本主義的民主選舉，實質上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因為候選人有財產限制，並且必須得到大資本家的支援才有可能在選舉中獲勝，這對一般的勞動者來說是不可能的。而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選舉，則必須取消此種財產限制，並由財政支付選舉費用，因而保證平民也能當選。這就使民主真正成為具有廣泛人民性的民主，從而把有限的資本主義民主發展成為真正的廣泛的民主。實際上，反對利用資本主義民主形式的人也並沒有真正離開這個「民主」，只不過是要把這個資本主義民主形式賦予封建主義的內容和實質罷了。例如規定首先由組織部門提出候選人名單，並採用等額選舉形式，然後交由選民或代表投票。這實質上是變相了的欽點制，只是已被套上了「民主選

舉」的外衣罷了。所以他們也是在利用資本主義的民主形式，只不過是要把它改造成變相了的欽點制而已。所以他們只是口頭上反對資本主義的民主形式，真正的意圖是要把資本主義的民主制改造成為封建主義的欽點制；或者說，用封建主義的欽點制改造、代替和對付資本主義的民主制。

現在我國經濟上遇到一些困難。失業人員多，就業難；有的下崗工人、農民工，生活低下，醫療條件、子女教育條件差。但是這不能全歸罪於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實行自由競爭，會產生某些兩極分化的現象（消極作用）。但從根本上來說，主要是市場化過程中「權力經濟」形成的後果，使一部分人該富的沒有富起來，不該富的反而富了。這正需要通過政治改革、政治民主化的配合來加以解決，而不是實行專制主義可以解決我國的就業、貧困問題。專制主義是一條死路，不是光明大道。

五. 關於如何推進民主化事業的一些思考

毫無疑問，現在舉國上下，不分性別、職業，不分黨內、黨外，不分老、中、青，不分領導者還是被領導者，都應該在中國民主化事業上用力。但是，我以為，鑒於中國情況的複雜性，有志於民主化事業的人們還需要在幾個關鍵問題上取得共識：

第一，在中國革命變革中，要明確是用暴力革命的途徑還是用和平改良（和平演進）的途徑達到我們的目的。暴力革命和和平改良這兩種途徑，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時都曾設想過，那是指奪取政權。今天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完成國家的民主化事業，任務、性質變了。暴力革命的思想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一般說來，只有通過和平改良、和平演進，通過運用法律手段、輿論的力量，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內部的鬥爭，通過民意調查、實地採訪等方法，保衛憲法規定的人民權益，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達到自己的目的。否則，搞暴力鬥爭，甚至進行恐怖活動

（爆炸等等），這只能脫離群眾，喪失社會同情，遭到徹底的失敗。如果和平演進，碎步前進，鬥爭成果日積月累，最後量變引起質變，在經過多少時日之後取得一個大成績，達到實現民主政治的目的。

有人認為，持這種看法，不過是民主化問題上扯個「幌子」，實際不想動。說別人「不想動」，沒有依據。問題在於凡事講話要切合實際，不能只講空話、大話。只講「過癮」，不講辦不辦得到，最後還是花拳繡腿，收不到實際效果。

第二，民主化鬥爭是在承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還是不承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一黨專政的現政權情況下進行，「踢開黨委鬧革命」，這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如果是後者，馬上就觸及到當權者的底線。因為誰都明白，當前當權者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就是共產黨掌權問題不能談。這裏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在當前，否定「黨的一元化領導」，等於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等於挑戰「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7，這是決不允許的。儘管國際國內壓力很大，要求中國當權者給人民以民主、自由、人權的空間，但在領導權問題上不會讓步，相反，還誤認為這是階級敵人內外串通，使執政當局更加保守，更加極端，對於有這種想法和行動的人，必然採取果斷措施，「消滅在萌芽狀態中」。我認為，目前這條底線最好不要去碰。應該承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執政者與民眾共同努力，把國家民主化事業推向前進。肯定不搞民主是不行的，但想通過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的辦法，推翻政權實現民主，也是不現實的。執政者應該明白，搞民主政治，發揚民主，並不會影響共產黨的領導，相反還會加強執政能力，提高共產黨的威信，增強執政的群眾基礎，使社會更加穩定。如果堅持專制，不搞民主，最後必然自討苦吃，步蘇聯瓦解的後塵。這不是危言聳聽。蘇共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當前在這一問題上是繼續搞閉關自守，「封閉療法」，實行愚民政策，還是遵守憲法，擴大開放，鬆動已經扭緊了的「螺絲釘」，這是實行專制還是實行民主的分水嶺和試金石。如果思想開明一點，開通一點，就不妨採取以下行動：1. 減少網上警察，不隨便「封網」。2. 對允許國

內一部分人看的鳳凰台網開一面，讓老百姓可以自由收看，不再在播送新聞時亂插廣告，屏蔽真相。3. 逐步取消存在於馬克思時代的新聞核查制度，讓新聞人員有較好的寫作環境。4. 使社會科學教學、研究人員有更好的教學科研條件，能自由閱讀國內外書刊，能自由發表文章、展示科研成果，真正做到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不搞文字獄。電影、電視劇劇本行政審查制度，要真正依靠專家，行政官員少當「劊子手」。5. 制訂政黨法、新聞法等法律，依法辦事，逐步取消「報禁」，實現言論自由，民間辦報。

我所以提出漸進地實行民主，主要是考慮到文化大革命的教訓、考慮到事物的可行性。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踢開黨委鬧革命」，一個單位一個早晨就成立了成百上千的戰鬥隊，各自宣佈自己是「老大」，誰也不聽誰的，弄得誰都難以收拾。2。年前的事也是這樣，當時靜坐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根本不聽趙紫陽的勸告，結束絕食，而是堅持與當權者鬥爭到底，直至最後勝利。以致執政者下不了臺，只好用「武力解決」。這是絕食指揮部學生不善於鬥爭、不懂妥協的結果。這裏既有執政者的責任，也有學生的失誤。一個迷信暴力、視百姓為「羔羊」、「刁民」；一個少了點政治智慧，不注意鬥爭有理、有利、有節。很多事情不能一廂情願，直線思維，單逼主義。該收時就收，不要什麼時候、什麼事情都對著幹，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有時要「換位思考」，有時「雙贏」比「單贏」更切合實際。

當然，在社會主義國家，公務員、當權者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群眾是我們的主人，是上帝，我們不能把百姓看作是「羔羊」，是「刁民」，騎在他們頭上，拉屎拉尿，橫行霸道，甚至動用專政工具，把遵紀守法的良民，打入監牢，判處徒刑。所謂「殺他 20 萬，穩定 20 年」的治國理念，完全不符合國家、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馬恩的教導。「殺人愈多愈能穩定政局」、「有些邊疆地區不穩定主要是殺人太少」等看法，我認為是「左」的思想作怪，沒有長遠眼光，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還要糟糕。我認為，和美國執政當局都可以談判、妥協，但就不能和國內普羅

大眾談判、妥協，這不是明智的政治家應有的態度。執政者擁有一切專政工具和輿論工具，優勢在自己一邊，對人民還是要大度一些、包容一些才好。遇到爭執的問題，應該儘量協商解決，不要激化矛盾，使矛盾尖銳化、複雜化、表面化。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先哲都教我們要多施「仁政」，少施「暴政」，更不要做「暴君」。

在對待民主建設問題上，有的比較激進的同志，容不得別人對問題的不同看法。他們看不慣主張和平改良、不主張暴力手段的人，瞧不起黨內民主派、改革派，認為他們是等待「恩施」，是怕死，革命性不強。主張用革命的暴力推翻現政權，實現政權更替，去爭得民主。我認為在現存條件下，搞暴力鬥爭奪取政權，實現「變天」，爭得民主，不可能達到目的。只有齊心協力，不斷地進行鬥爭，提高群眾覺悟，積累鬥爭成果，才有可能獲得勝利。中國執政者並非個個都是頑固派、死硬派，堅持專制到底，他們中也有開明的，思想比較解放的，在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大勢所趨的情況下，有可能與群眾一致，共同為實現民主政治而鬥爭。至於黨內民主派、改革派，更是我們團結和依靠的力量，他們有比較多的鬥爭經驗，思想相對比較成熟，見多識廣，有膽有識，我們必須爭取他們的支援和幫助。由於他們各人處境不同，因此在有些問題上，可能態度有所不同，有的願意在某一宣言上簽字，有的則不願意拋頭露面在宣言上簽字，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應該尊重別人的選擇，不必強求一律，更不能歧視他人。

第三，在爭取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的過程中，是一步到位好，還是分步到位好，要慎重對待。我認為能夠「一步到位」當然好，可能更多情況只能是「分步到位」。因為這個鬥爭是長期的、艱巨的、複雜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有時需要30年、50年甚至上100年。中國封建專制時間特長，影響特深，加上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抗，解決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孫中山宣導的「三民主義」，已經過了100年，但今天還不見頭緒。我們要有充分的耐心，認識到「畢其功於一役」不可能，一個早晨實現民主化也不可能。目前我們只能依據憲法，維護憲法、實踐憲法，

為國家民主化事業進行一步一個腳印的鬥爭，不斷取得成績。

第四，改革派人士爭取國家民主化必須既有近期目標，又有長期目標。長期目標當然指按民主政治的共同遊戲規則，全部達到民主政治的各項要求，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達到或者沒有達到，這不能由哪個人說了算，而是按照共同的遊戲規則進行衡量。也就是說，不管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還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只要是實行民主政治，就必須做到：1. 少數服從多數，又保護少數；2. 人民代表和政府負責人要通過選舉，包括差額選舉、競選執政，有時是一人一票的直選；3. 多黨制或一黨多派制；4. 三權分立，權力制衡；5. 實行自由平等原則，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各種自由；6. 實行嚴格的法制和法治；7. 人民議政參政；8. 軍隊國家化；9. 實行自治，包括民族區域自治和群眾自治。做到以上各點就算實行了民主政治，達到了民主政治的長期目標。

有人對民主政治並不真正理解。他們贊成民主政治，但反對多黨制，反對軍隊國家化，反對三權分立。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一套」，社會主義的中國不能用。其實，上述這些原則都是民主國家長期積累的共同經驗，屬於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只要真想搞民主，就不能離開這幾條。想搞民主政治，又要反對多黨制、三權分立，這是互相矛盾的。須知多黨制、三權分立是民主政治的固有內容。民主政治沒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分，正像市場經濟沒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分一樣，它是中性的東西，資本主義國家可以用，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用。我們經常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是指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不是指市場經濟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分。我們說「社會主義民主」，那是指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民主，不是說民主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分。社會主義與民主有緣，與專制無緣，如果社會主義只搞專制，那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假社會主義，或者叫「專制社會主義」。

完成上述指標、實現民主政治並不容易，故除長期目標外，還必須有近期目標。近期目標達到了，長期目標才有可能實現。這就是要有線

路圖和時間表。怎樣定線路圖和時間表？我意可以先易後難，由低級到高級，一步一步地來。先實行鄧小平已經提出過的，後實行鄧小平還沒有提出過的；先實行已取得共識的，後實行意見分歧大的。譬如：先允許言論自由，讓人民群眾有「話語權」，能自由地發表意見，能使每人說真話，做到思想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再進而允許結社自由，成立新的黨派，和共產黨展開競爭。應該說，做到第一步是容易的，它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權，影響一黨專政。它不過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讓大家說說話而已。大多數人是好心的，可以建言獻策，為國家出主意、想辦法，排憂解難，化解矛盾。這有利於國家加強執政能力，有利於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

我們不妨客觀地評估一下，究竟是民主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還是專制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認為民主有利於共產黨的領導，因為它得民心，符合世界發展潮流。而專制表面上可以鞏固統治，實際上「釜底抽薪」，更加失去民心，增加群眾對黨的不滿，使政權處於飄搖之中。

第五，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主要依靠國際力量還是依靠國內力量。我認為要依靠國內的力量，以國內力量為主。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根據他們的民主理念，會對中國執政當局施加影響，但是民主運動主要靠人民覺悟的提高，健康力量的增加，公民意識的加強。國外的推動是有限的，而且變數很多。

第六，在國民中，首先自身要學會民主，學會「三寬」。要能容忍不同派別、不同觀點的存在，不要搞清一色的純而又純，不要內訌，分散精力，自我消耗能量。要謙虛謹慎，不要老是計較廟堂中的「排位」。這方面的教訓很多。過去往往對立面沒有打倒，革命派內部先把自己打倒了，爭權力，爭高低，爭功勞，爭誰有資格受外國領導人的接見，鬧得天翻地覆。根據中國人有「內耗」的習慣，我總擔心這件事。但願這是庸人自擾，杞人憂天。

第七，在爭取民主憲政的過程中，要同時強調黨本身的改革，強調

中國共產黨的轉型。所謂轉型，就是要求中國共產黨由打江山的革命黨，轉變為與其他政黨相互競爭、長期共存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自身改革的內容，主要有：1. 承認和清理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犯的錯誤，吸取歷史教訓，挽回不良影響。欠賬早還比遲還好。2. 不搞一黨專政的權力壟斷，允許多黨制的存在，允許政黨間展開競爭。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應該到位。3. 允許黨內思想派別的存在。這是列寧的主張，毛澤東也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俄羅斯共產黨總書記久加諾夫認為蘇聯瓦解的原因在於經濟壟斷、政治壟斷、文化壟斷。共產黨一黨專政就是政治壟斷。4. 建立黨的權力制約監督制度。法比黨大，黨只能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活動，不能把共產黨變成「無法無天」、不受任何制約、監督的黨。5.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犯了法，也要依法治罪（如今天的陳水扁）。

我們不要認為只有共產黨下臺，中國民主才有希望。我們希望它能改，改了就好。改了就能出現轉機。如果中國共產黨出現了頭腦清醒、有勇有謀的英雄人物，自上而下地實行政治改革，推行民主憲政，這有什麼不好呢？如果違背歷史潮流，違背民意，堅持專制到底，那麼垮臺就是自然的。誰想保也保不了。

關於穩定問題，我和某些人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我認為，以發展、改革求穩定，則穩定存；以專制獨裁、武力鎮壓求穩定，則穩定亡。改革當然包括改掉專制，實行民主。現在國人都希望國內局勢穩定，不能亂。我也認為穩定是對的。但如何達到穩定可能見解不同，做法也大相徑庭。有人主張愚民政策，「封閉療法」，實行專制；有人主張擴大開放，讓國人更多地瞭解外部世界，實行民主，與世界民主政治接軌。這是兩種世界觀、價值觀的鬥爭。我贊同與時俱進，追隨民主憲政這個大流。

（2009. 2. 26於深圳）

本書作者介紹

李銳，湖南平江人，1917年生於北京。1934年考入國立武漢大學工學院機械系，參加「一二九運動」，為武漢秘密學聯負責人。193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分別在湖南、延安和東北從事青年和新聞工作。1945年後到東北，先後任高崗、陳雲的政治秘書。1949～1952年任《新湖南報》主編、湖南省委宣傳部長。1952年調北京燃料工業部，主管水電。1958年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兼任毛澤東秘書。1959年廬山會議上受到錯誤批判，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勞動。「文革」時期關押秦城監獄達8年。1979年平反後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1982～1984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局長、常務副部長。中共十二大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共十三大被選為中顧委委員。著述甚豐，主要有《論三峽工程》、《早年毛澤东》、《廬山會議實錄》、《晚年毛澤東的悲劇》、《龍膽紫集》等。

胡績偉，1916年9月生於四川省威遠縣界牌場，1936年考入四川大學。同年，參加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成都部隊，1937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1939年在成都，先後任《大聲週刊》編輯，《星芒報》（三日刊）主编。1940～1949年在延安，任《邊區群眾報》主編，兼《解放日報》採訪通訊部主任和新華通訊社西北前線分社社長。1949～1952年在西安任《群眾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西北總分社和西北人民廣播電臺總编輯。1952—1983年在北京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曾任中國新聞學會聯合會會長、中國新聞學基金會主席，並

任第六、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及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主要著作有《胡績偉自選集》七卷、《胡績偉自述》四卷等。

謝韜，原名謝道爐，曾用名謝道、謝以明、謝實之。1921 年生於四川自貢。1944 年畢業於金陵大學社會學系。大學畢業後曾任教於金陵大學和自貢蜀光中學。1946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擔任重慶《新華日報》公開記者、延安新華總社編輯。1948 年隨吳玉章同志參與組建華北大學（即中國人民大學）。建國初期，主持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的工作。1955 年因胡風事件被捕入獄。1965 年底被定為「胡風集團骨幹分子」，「免於起訴，寬大釋放」，於 1966 年回到原籍自貢市。1979 年從自貢回到北京，借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參與該雜誌的創建，主持哲學編輯室工作。1981 年開始擔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領導工作。1982 年至 1986 年擔任中國人民大學第一副校長。1986 年至 1988 年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近作有《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國命運》（《炎黃春秋》2007 年第 2 期）、《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與中國改革》（《炎黃春秋》2007 年第 6 期）、《值得倡導的精神價值》（《比較》第 39 輯，2008）等。

何方，1922 年 10 月生於陝西臨潼。1938 年奔赴延安，進抗大學習和工作。1939 年參加共產黨。後轉外語學校學俄文，參加整風和勞動。1945 年派去東北做地方工作，先後任縣委宣傳部長、省青委副書記等職。1950 年調外交部任駐蘇聯大使館研究室主任和部辦公廳副主任。1959 年受張聞天牽連，被定為反黨宗派成員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下放農村。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即被打成專政對象，1969 年押送幹校勞動改造整九年。1979 年平反、恢復工作，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1999 年離休。1991 年被評為政府特殊津貼領取者。為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此外，還受聘為北京、南開等大學的兼職教授，被授予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名譽博士。2007 年評為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著有《論和平與發展》、《何方集》、《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等書。

鍾沛璋，1924年生。原籍浙江鎮海。1938年考入格致公學，1942年離校。1939年經吳學謙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先後就學南京中央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初一時即參加上海學生抗日救亡協會的愛國活動，帶領全班同學進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宣誓，在班裏辦壁報，成立級會（班會）。組織同學參加「紅五月」歌詠活動，參加時事討論會，討論「中國往何處去」等問題。組織同學慰問被困租界的四行倉庫孤軍，悼念被暗害的謝晉元團長。初二時，接替吳學謙任中共地下黨格致公學支部書記，後任地下黨中學區委委員0 1942年秋到新四軍抗日革命根據地參加黨校學習。1943年到1949年在南京、杭州、上海等地參加領導愛國民主學生運動。在上海創辦黨領導的第一個公開的廣播電臺，參加創辦《學生報》，主編《青年知識》半月刊；組織上海人民宣傳隊，籌劃迎接上海解放宣傳等。解放後，在上海創辦新中國第一家以青年為對象的報紙——《青年報》，並任總編輯。之後在北京任《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共青團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長等職。離休後，任香港新華社高級研究員、《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卷主編和《當代中國叢書》新聞卷主編、新聞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新聞出版署特邀顧問等職，並先後創辦中國卓越出版公司和《東方》雜誌，並任總編輯。

辛子陵，原名宋科，1935年生，河北安新人。1950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9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助教、軍政大學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等職。在職期間和退休以後，為批判極左思潮，撥亂反正，有重要著述問世，如1974年根據鄧小平授意撰寫《林氏春秋的破產》，對南昌起義和兩軍會合作正確解說，重新肯定朱德、賀龍元帥的

歷史地位；1983 年應軍事科學院《軍事學術》雜誌之約，撰寫《恢復百團大戰的歷史地位》一文，全面肯定百團大戰及其組織指揮者彭德懷元帥的歷史功績；1986 年劉伯承元帥逝世後，受命代中共中央撰寫悼詞，中央一字未改照準，即是 1986 年 10 月 16 日胡耀邦總書記在劉帥追悼大會上所致的悼詞；1993 年毛澤東百年誕辰前夕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毛澤東全傳》一、二、三、四卷，150 萬字；2002 年 2 月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林彪正傳》，50 萬字，公正評價林彪一生功罪；2007 年 7 月香港書作坊出版《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70 萬字，首次由體制內人士對毛澤東一生作倒三七開評價，等等，在海內外產生很大影響。

林京耀，廣西壯族，1935 年出生，高中讀書時入黨，1954 年人廣東華南師範學院學習，畢業後分配到當時還隸屬於中國科學院的哲學研究所 0 1963 年到中宣部科學處，文革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遭到迫害。1978 年參與籌備全國科學大會，調到中國科協研究室。1980 年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因「自由化」觀點屢次受到鄧力群點名批判。現為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員。研究領域包括科學哲學、科學與社會、生態與環境保護等，曾於 1984 年、1987 年先後出版《哲學要追趕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和《哲學與改革》兩部文集，2001 年主持編寫的《綠色未來》環保叢書獲全國優秀科普作品一等獎。

宋以敏，1931 年 10 月出生，浙江金華人，研究員。曾就讀於清華大學外文系。1956 年參加共產黨。1949 年 11 月起在外交部工作，先後在外交部新聞司、中國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交使團、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外交部直屬國際問題研究所從事國際問題研究。1985 年在日內瓦聯合國裁軍研究所、1996 年在華盛頓國際研究與交流協會做專題研究 0 1987 年和 1993 年被評為各該年度的外交部先進工作者。1992 年被評為政府特殊津貼領取者。研究領域：國際戰略形勢、大國關係、中國外交。研究成果主要發表在外交部和研究所的內部刊物上，改革開放以來也為國內外

一些出版物撰寫文稿，包括:《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和我國對外關係的發展》、《2010年前我國在世界上面臨的機會與挑戰》、《中國的安全概念》、《蘇聯劇變和戰後世界格局的解體》、《關於冷戰後世界力量劃分及組合問題的探討》、《美國安全戰略、世界力量劃分和對外政策的新調整》、《中俄、俄美、中美關係及三者間的相互作用》等。

張顯揚: 1936年出生，江蘇省太倉市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歐洲哲學史和當代中國政治。196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4年受當時所在的北京大學指派，參加江青領導的中央工作組，清理林彪的一些文字材料。1979年應邀參加「理論工作務虛會」，對毛澤東極左的思想理論路線多有批評。從1980年起，不斷遭受整肅，1987年被開除黨籍，罪名是「一貫反對馬克思主義，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1989年六四「風波」之後，被欽定為兩個「老早要搞動亂的人之一。近20年來主要從事當代中國史的研究與反思，主持編寫、並在香港出版了《胡耀邦年譜長編》（三卷）和《趙紫陽中南海十年記事》（兩卷），著有「四項基本原則的來龍去脈」、「趨勢與選擇：歷史唯物論的解讀與批判」等當代史或歷史哲學方面的反思性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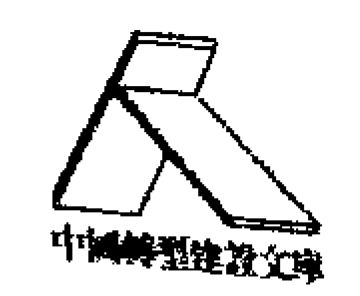
杜光，原名林道茂，浙江溫嶺人，1928年生，1946年考入北京大學。因積極參加學生運動，1948年8月被國民黨政府的特種刑事法庭傳訊、通緝，月底進入解放區，9月參加共產黨後，到華北局黨校學習。1958年初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工作時被劃為右派分子，1961年「摘帽」後留在黨校。1964年被遣送回浙江，在杭州第七中學工作。1979年初「改正」，調到杭州師範學院，年底回中央黨校。先後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科研辦公室主任（後兼圖書館館長）。1988年參與籌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任幹事長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雙月刊主編。因支持1989年的學生運動，於1990年9月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隨即離休。1995年開始撰寫一些徵求意見稿，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來分析歷史

與現實問題，2003 年開始在互聯網上發表時事評論和專題文章，至今已發表 200 餘篇。

王家典，原籍江蘇徐州，1929 年 10 月 25 日生於南京。中共黨員，離休幹部，原江蘇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1947 年就讀金陵大學物理系，投入學生民主運動。1948 年底由南京投奔濟南參軍，從教軍事院校。1956 年轉業，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系。畢業後任教院校多年，調入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從事中華民國史研究，著有《中國國民黨黨史》、《論國民政府抗戰前期的戰略得失》、《論國民政府抗日戰爭時期戰時經濟管理體制》等。個人志趣於馬哲史，著有《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起源》、《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失敗探源》、《恩格斯——第二國際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等。

周成敗，1931 年 11 月出生，浙江省寧波市象山縣人，研究員，中共黨員，原任貴州省社科院副院長。1949 年 7 月參加革命隊伍，後南下參加二野西南服務團。1950 年 1 月至 1954 年 8 月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辦公廳，任秘書科科員。1958 年 8 月畢業於四川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後在貴州師大任教，曾任政教系副主任，擔任過政治經濟學、經濟學說史、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選讀、《資本論》專題等課程的教學。1995 年底離休。主要著作包括《馬克思的貨幣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立》、《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理論》、《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學創建紀略》、《恩格斯經濟思想研究》、《政治經濟學原理的歷史考察》、《回顧與展望》等。1986 年國家科委、人事部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任全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史學會顧問、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顧問、中國《資本論》研究會理事、世界教科文衛組織專家成員等。近年來研究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推出《中國民主建設研究報告》、《過去 50 年的反思和未來 100 年的預測》等研究專著。

本書主編張博樹，北京人，1955年出生，1991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博士學位，並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至今。目前專事百年中國社會轉型和現代專制主義研究，已有《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從五四到六四：20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批判》（第1卷）、《解構與建設：中國民主轉型縱橫談》等研究成果問世。



中國轉型建設文庫
總策劃：石逸群



出品人：古心聖
製作協力：劉以秀

胡耀邦是中國共産黨内少見的開明領導人，改革派領袖，當代中國轉型進程中的重要歷史人物。1989年胡耀邦的逝世引發了八九公民維憲愛國運動和六四天安門事件，遂成爲中國當代史的分水嶺。

今年是耀邦先生逝世20周年，編輯、出版本書首先是爲了寄託有良知的中國人對耀邦先生的懷念之情。

但是，又不僅此。胡耀邦去世20年，中國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一黨專權的政治體制造成權貴資本氾濫，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結構失衡，在根本意義上阻礙中國回歸人類普世文明，當年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且其嚴重、惡劣程度已經遠甚于當年。20年來所取得的所有經濟成就在一個助長貪腐的體制面前，均顯得黯然失色。這就是我們當下面對的現實。它意味著，我們今日紀念耀邦，必然懷著一份深深的現實關懷；這種紀念，除了緬懷故人，更是爲了推進耀邦先生未竟的事業，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

—— 本書主編


ISBN 978-988-17804-9-2
9 789881 780492
定價：98.00 元
Printed in Hong Kong